新西兰简史

〔美〕J.B.康德利夫
〔新〕W.T.G.艾雷　合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新西兰简史

〔美〕J·B·康德利夫
〔新〕W·T·G·艾雷 合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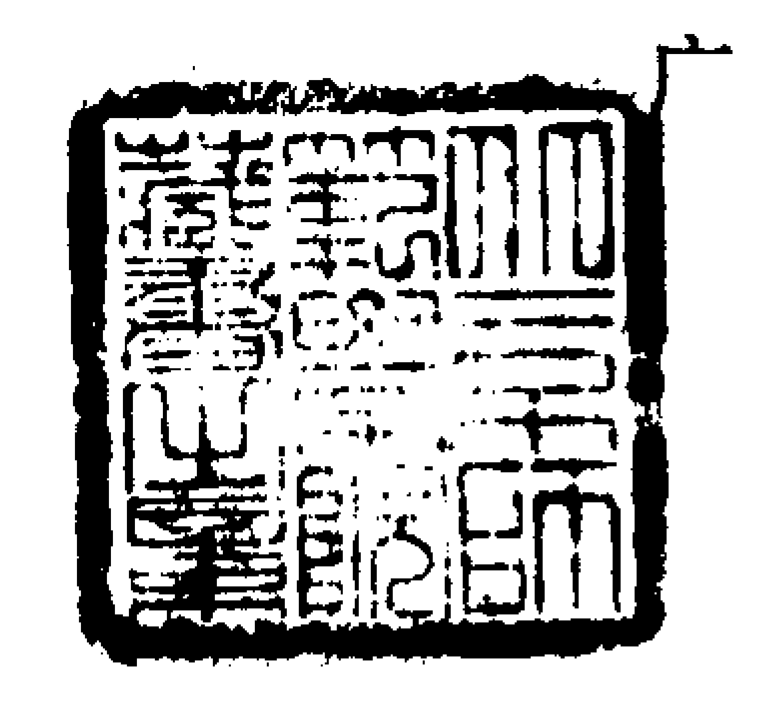
广东化工学院《新西兰简史》翻译组译

陈一百　吴江霖 校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
写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广东人民出版社



A SHORT HISTORY
OF NEW ZEALAND

By

J. B. CONDLIFFE and W. T. G. AIREY

NINTH EDITION 1960
REPRINTED 1968

根据新西兰惠特科姆与图姆斯有限公司1960年第9版1968年重印本译出

内 部 读 物

新西兰简史

〔美〕J·B·康德利夫
〔新〕W·T·G·艾雷 合著

广东化工学院《新西兰简史》翻译组译
陈一百 吴江霖 校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1978年3月第1版 1973年3月第1次印刷
书号 11111·31 定价1.20元

出版说明

新西兰位于太平洋西南部，是大洋洲的一个岛国，由南岛、北岛和附近的一些小岛组成，面积二十六万八千多平方公里。

约在1350年，毛利族人（波利尼西亚人的一部分）即定居于新西兰。1642年至1777年间，先后有荷兰人塔斯曼、英国人库克、法国人德苏尔维尔等到达新西兰。此后，英国殖民主义者开始向新西兰移民，1840年新西兰沦为英国殖民地。自1843年起，毛利族人多次举行反抗英国殖民主义者的斗争，但终于被镇压下去。嗣后，英国移民及其后裔日益增多，构成了新西兰总人口的绝大部分。现在新西兰总人口三百多万，其中百分之九十是英国移民的后裔，而原有的毛利族人只占百分之八左右。1907年新西兰取得独立，成为英国的自治领，现为英联邦的成员国。

本书开卷之际对英国殖民主义者入侵新西兰

前毛利族人的一般情况作了扼要的介绍，然后以较多篇幅叙述新西兰自1840年沦为英国殖民地至1959年约一百二十年的历史。原书第一版至第六版是J·B·康德利夫所作，自1953年第七版起改为康德利夫和W·T·G·艾雷合著。原书于1957年、1960年分别刊行第八版和第九版，而第九版复于1960年、1966年及1968年各重印一次。中译本是根据原书第九版的1968年重印本译出的。

康德利夫是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先后在新西兰和英国受高等教育，曾任新西兰坎特伯里学院、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等校经济学教授；艾雷是新西兰的白种人，任教于新西兰奥克兰大学历史系。两个作者国籍不同，但都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美化殖民主义统治、维护资本主义制度。他们按照英国殖民主义者的口吻，胡说英国吞并新西兰是出于“对毛利族福利的仁慈的考虑”，当时英国政府对毛利族人民的意图是“良好的”，英国殖民主义者开拓新西兰为殖民地同保护毛利族利益是可以“调和的”，但对于英国殖民主义者的侵略实质却避而不谈。他们竭力吹嘘新西兰是“久

已闻名于世”的“福利国家”,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之一”,而对于这个所谓“福利国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被剥削者同剥削者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则完全加以掩盖起来。

诚然，本书对新西兰这个岛国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提供了一个比较全面的轮廓，有可供参考之处,但由于作者观点上的错误,读者使用本书提供的资料时,务请注意分析批判。

中译本删去了原书刊载的殖民主义者照片。

目　　录

序　言

本书原为J·B·康德利夫教授个人的著作，于1925年刊行初版。当康德利夫博士准备本书的第五版修订本（1935年出版）时，他正在国际联盟经济情报处任职，要我撰写两章，将新西兰的历史写到1929年，并对新西兰和世界事务的关系这一部分的论述加以扩充。1938年刊行的第六版，内容大体与第五版相同。

1953年刊行的本书第七版是经过全面修订的版本，对于这一次的修订，我负主要责任。不过，当时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任职的康德利夫教授前来新西兰作短期访问时，曾看过全部修订稿。全书除补叙史实至1949年的大选为止之外，实际上是重写的。新版本以旧版本为依据，旧版本的许多内容在新版中再现，唯加以重新编排，而全稿的主要部分则完全是新写的。在1957年出版的第八版中，对一些节又作了修订，但没有试图

叙述1949年以后的历史。

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仅有新的事件出现，而且也产生了对旧事件的新见解。这两个方面都在本书新版本中得到兼顾。为了将内容写到1959年年底，在本书之末增加了一篇“跋”，并在适当的地方加了注释。为了消除差错或模糊不清之处，同时为了兼顾新近关于新西兰历史的研究成果，故对本书许多地方进行了修改。

关于波利尼西亚人的航程和毛利族人在新西兰定居的问题（见本书第12—14页），有人已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这些新的理论对我所发表的试用性的看法，特别是对根据传说写成的“大船队”的历史，提出了异议。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些新的理论只能说是提出了问题，而不是明确地解答了问题。因此，我还是保持原文不变。

我在前一版的序言里，曾向一些历史学硕士学位候选人在其论文中所完成的工作表示过敬意，现在我再一次表示我的这种敬意。许多作者的论文都在某种程度上同我有关，其中我要特别提出那些我认为其论文对本书有影响的作者们和他们所从事研究的领域。他们是：奥克兰大学历

史系副教授K·辛克莱博士：关于新西兰土著居民政策的问题；奥克兰大学历史系高级讲师R·M·查普曼先生：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至经济萧条时期的政治；R·W·S·法格先生：关于唐纳德·麦克莱恩的较早时期；K·C·J·斯通先生：关于1913年至1937年的工联主义；T·G·威尔逊博士：关于自由党的兴起；M·K·S·索伦森先生：关于毛利族人问题（特别是1862年至1892年期间的毛利族人问题）；R·T·香农先生：关于自由党的衰落；B·G·格雷厄姆先生：关于1902年至1922年的怀卡托政治问题。

我从前的学生K·辛克莱曾发表了《毛利族人战争的起源》和《新西兰史》两部著作（后一书是塘鹅丛书之一），对我都有帮助。另一从前的学生M·R·查普曼多次同我谈论，其中有些问题同本书的这一次修订版的编写准备工作有关。在这里，我再次向他们致谢。

W·艾雷

1959年12月于奥克兰大学

第一篇

文化的会合

3

第一章　两种生活方式

人们曾将十九世纪称为蒸气和钢铁的时代，但那时，在非洲的森林和草地以及在太平洋的各岛屿，人们仍然处在古老的石器时代。因为当欧洲的人民和被其开拓为殖民地的美洲各地的人民已在设计纺织的新机器、冶炼和铸造金属的新方法、牵引火车或开动轮船的新发动机、海陆通讯的新工具时，非洲和太平洋的许多地区的人民仍然沿用几千年来一直使用着的同样工具。

我们可以认为这些人处在原始而落后的状态，但我们却不应该设想他们没有过着一种有良好组织的生活。他们能利用周围环境，采取许多办法来获得食物、衣着和住所。同时，他们也有了表达他们对其周围世界的感情的各种艺术。其实，有关这些原始民族的引人注目的事情之一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是一种错综复杂地构成起来的生活形式，其中每一种仪式和风俗对维持他们的

社会的生存都具有其意义。在我们看来，他们的
许多生活方式也许是奇异的、粗野的和迷信的，但
是它们比起我们现在生活中许多不加怀疑而通行
无阻的事情来，一定不会更为荒谬可笑，而且它们
一般地都具有实际的意义。这些原始民族具有的
人间世界的知识比我们目前具有的为少，但他们 4
并不是比我们愚蠢一些或缺德一些。

鉴于这些原始民族将要面临的一些问题，我们可以特别指出两点如下。第一，他们习惯于一种长期以来没有多大变化的生活方式。诚然，他们当中有些人，如波利尼西亚人（毛利族人是其中的一部分），曾是伟大的航海者，并曾长途迁徙，在其旅程和暂时的定居区中，同其他民族有过接触，但他们对他们的工具没有作过多大变革，他们也没有经历多大困难就适应了新的环境。第二，他们的社会具有紧密结合的性质，这就意味着一旦它受到外界突如其来的干扰，他们的旧的生活方式就会陷于混乱，并妨碍新的生活方式的发展。这种没有什么变化的、紧密结合的社会生活，与欧洲人的生活截然不同，特别是在十九世纪，由于生产工具发生急剧变革，从而使后者受到影响之后，

更是如此。

由此可见，早在十九世纪，世界上就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这个时期，欧洲的势力已向从前很少受其影响的世界上许多地区扩展。欧洲人前往那些较原始的民族居住的地区：有的经商；有的作暂时或永久居留，创办种植园或经营矿业；有的建设公路、铁路、桥梁和电报线路；有的作传教士。他们的政府的权力往往随他们而渗入。如果我们将表示1800年和1900年的欧洲属地的地图作一对比，我们就可以看到十九世纪初年，欧洲人在非洲的属地仅限于非洲边缘地带的少数地方（他们对非洲的中部尚无所知），但是到了1900
5 年，整个非洲几乎都为欧洲列强所瓜分。太平洋的情形也是如此。但是，如果我们想到的是人民，而不是地图上着色的一块块土地，那么，我们就应该承认，这些地区的原始民族的旧生活方式已被欧洲人的强有力的和带干扰性的生活方式所破坏。许多欧洲人对自身在土著居民当中所造成的损害无动于衷。他们仅仅热衷于从中攫取利益。他们要获得土地；他们往往千方百计地诱骗土著居民为他们干活；或者他们的目标是以贱价收购土著

居民的货物，然后运往欧洲，以高价售出。至于他们强行破坏土著居民的旧的生活方式会造成什么样的危害，他们对此是漠不关心的，或许往往是不知道的。他们之中很少有人关心协助这些装备欠佳的土著居民去适应由欧洲人带来的较好的新式工具。大多数欧洲人要求土著居民居于从属地位。

即使象传教士那样立意良好、力求为土著居民造福的欧洲人，由于缺乏对土著居民的了解，往往也使他们蒙受损害。事实上，有些研究人类社会组织的一切发展阶段的人类学家，就认为慈善的传教士对土著居民的损害有时比漠视土著居民的商人更大。这些传教士虽然设法改变土著居民的生活方式，但由于他们单从欧洲人的眼光看待事物，因而他们没有认识到那些看来似是粗野的风俗对土著居民的生活所具有的重要性。他们有时还帮助破坏一种生活形式，却没有促使建立一种新的生活形式。如果你曾在丛林中迷路（你迷失方向，不知道往哪个方向走去），或者如果你曾在一间你并不悉熟其窗户和家具的陌生房间中突
然醒来，那么，你对于人们发觉其习以为常的生活 6
方式受到外界强大力量粗暴的冲击或破坏时所产

生的后果，就会有所认识。这恰似他们从供养他们的土壤里被连根拔掉一样。

在十九世纪，由于很不相同的文化日益频繁的接触而引起了种种问题，这并不是新鲜的现象。但因为产业革命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社会问题，使得欧洲人的势力的扩张进一步加速和加强，因而文化冲突的范围比过去更为广泛了。人们不容易找到避免文化冲突的方法，而这种冲突的后果又往往是可悲的。处于石器时代水平的人民是难以抵抗具有优越物质装备的欧洲文化的。他们要么被消灭，要么沦于从属地位。甚至各种良好的意图，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虽说这些良好的意图曾起了缓和这种打击的作用。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正如从前的原始民族已变得比较熟悉欧洲人的方法一般，他们也已开始寻求各种途径，以期达到他们作为一个民族而与欧洲人处于平等地位的境地。

贯穿十九世纪大部分时间的新西兰历史主要地是由于这种文化冲突所引起的各种问题的历史。这种文化的公开冲突，既非毛利族人的力量和智慧所能制止，亦非那种往往对英国政府的政

策有所影响的良好愿望所能防止。这种公开冲突必然导致欧洲势力的胜利。不过，毛利族人的力量和许多欧洲人的良好愿望却有助于防止毛利族人的彻底消灭。毛利族人大约经过三、四十年的衰落以后，又开始复兴起来，并找到了自己的领袖来率领他们争取在欧洲人占优势的社会中确立毛利族的地位。新西兰白种人和毛利族人的关系的
历史，在许多方面是和其它国家所曾发生过的类 7
似接触的历史有所不同的，但它毕竟是十九世纪由于“欧洲的扩张”而在全世界的许多地区所发生的事情的一部分。

我们必须考察所涉及的两个民族的情况。什么原因使英国人将他们的生活方式带到新西兰呢？当时毛利族人的生活方式是怎样的？我们将会看到英国人和毛利族人之间相互影响的各个阶段。早期的商人、捕鲸者和捕海豹者同毛利族人的接触对毛利族人的生活产生了什么影响？传教士有什么贡献？英国宗主权建立后，移民日益增多（其中有些是由新西兰公司组织前来的），他们的不断增大的压力所造成的结果是怎样的？什么原因导致六十年代的戰争？其后果又是怎样的？

8 第二章　欧洲人东来以前的毛利族人

波利尼西亚人

波利尼西亚人居住于南太平洋的很多岛群和赤道以北的夏威夷群岛，毛利族人是波利尼西亚人的一部分。波利尼西亚人原先不是太平洋的土著居民，他们航海到达太平洋，最初聚居于社会群岛，此后逐渐地向北方、西方和东方扩散。他们的航行在航海技术上是一个惊人的成就。至于他们从何处来，我们却无法确定。他们的一个后裔、已故的彼得·巴克爵士（即特·朗吉·希罗阿）是这个问题首屈一指的权威。他在其《东方海盗》一书中写道："我们可以把现在的看法概括起来说，在远古时代，波利尼西亚人的祖先可能确曾生活在印度的某个地区，后来东迁。但是，以口述流传下来的神话和传说都追溯不到那么遥远。他们为了到达太平洋，必然曾逗留于印度尼西亚。波利尼

西亚语和印度尼西亚的一些方言相似。他们在印度尼西亚逗留期间，海盐进入了他们的血液里①，并使他们由陆居者变为精于航海事务的人。当来自大陆的蒙古种人象潮水般涌入，其压力日益沉重时，波利尼西亚人的祖先便将其视线移向东方，并着手进行一切冒险事业中的一次最大的冒险”。

从种族上看来，波利尼西亚人和欧洲人是 9
同种的，都属于高加索种——人类中的主要人种之一。当他们逗留于亚洲的东南端时，他们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同当时在这个地区的黑种人和蒙古种人有混血关系。在一些情况下，这种血缘关系在他们的头发、鼻子和嘴唇的特征上表现得很明显。

一旦他们成为航海者并在太平洋找到了住处，他们便从一个岛群散布到另一个岛群定居，这也许是自然的事情。这一事实可以从他们的传统和地名中经常出现他们起初的故乡“夏威基”而得到证明。但他们的来到新西兰却是一个较大的变

① 巴克所说的“海盐进入了他们的血液里”，其含义是波利尼西亚人在印度尼西亚逗留期间，适应了海岛的生活。——译者

化，因为当时他们是从热带地区移居于温带地区；而位于赤道以南的奥塔戈和位于赤道以北的巴黎，它们和赤道的距离大致相等。

毛利族人自从发现新西兰，以至在新西兰探险和定居，延续数个世纪之久。库佩约在950年发现了新西兰，他回到社会群岛的腊亚特阿岛后，提供了前往新西兰的航向。约二百年以后，当托依从塔希提岛来到新西兰定居时，他发现这个地方已有其他居民，而这些居民的来源，史册没有记载。但是这些早期的移民在传奇记载中已被下面的事件所湮没：大约在1350年前后，有大批移民到达新西兰，即由水手们以独木舟组成的“大船队”到达新西兰。后来，毛利族人自称是这些独木舟水手们的后裔。此后，他们便和起初的故乡失去了联系。

新西兰的毛利族人

对那些在热带岛屿的较为舒适的条件下形成其生活方式的人们来说，当他们在温带的较为严峻的条件下定居时，就必须对其生活方式进行相当大的调整。有些植物，例如一种为他们用以制

成“塔帕”布的植物和一种可以充当粮食的芋头，10
在新西兰都不能生长。人们在这里需要较多的衣服，较好的住所及生产粮食的新方法；他们必须获得有关新的植物的知识。毛利族人依靠他们的原始工具，非常成功地适应了这些新的条件，这委实是一个真正的成就。

大约十八世纪末叶，毛利族人才开始接触欧洲人并受其影响。这个时期毛利族人的生活方式是怎样的呢？毛利族人也和其他波利尼西亚人一样，还不会冶炼金属，因此，他们的武器和工具都是以石块、木料或骨头制成的。使人发生兴趣的是，他们在这些武器和工具上都刻上花纹或把它们磨光擦亮，虽然这样做没有实际的用处，却满足了他们对形式和式样的美感。为了解决粮食问题，他们开垦土地，种植“库马拉”①；他们到河、海和淡水湖捕鱼；他们到海边拾贝；他们挖掘树根并从灌木地带采集浆果、“尼栲”②和甘蓝树苗以及各种羊齿植物叶子；他们还设罗网或用矛枪捕捉鸟类。他们以其有限的工具，表现出他们在获得

① “库马拉”(Kumara)，即甘薯。——译者

② “尼栲”(Nikau)，即棕榈。——译者

和贮藏食物上的技能和创造性。他们的主要生活来源视他们的定居地区的气候、土壤和位置而异。羊齿植物的根被广泛地用作可靠的食物来源，虽然取得这种根需要付出相当多的劳动。从他们的游戏和谚语中可以看出，挖掘羊齿植物的根的能手受到高度的尊重，例如，这种人往往被当作合格的丈夫。“库马拉”的种植为气候和土壤的肥沃程度所限制，因此，种不上“库马拉”的人只好更加依赖鱼类或鸟类以维持生活。他们采取互赠礼品的形式进行一定数量物品的交换，例如沿海居民和内地居民就是采取这种方式进行物品的交换的。在为缝制衣服而进行纺织（严格一点说是编织）上，他们也显示了他们的技能和艺术。他们也使用狗皮和鼠皮，并用羽毛作装饰品。

11 由一个“哈普”（即一个部落的部分）聚居的村庄构成一个典型的单位，村内有“华雷-鲁南加”（即会棚）和“马拉埃”（即草坪），它们构成毛利族社会生活的重要中心。一个由三、四代人组成的“华瑙”（家族），通常共居一间或两间“华雷”（棚屋）。他们也备有贮藏室、地窖、炉灶和一些小棚。

他们的生活有妥善的组织。整地、播种和收

割，捕捉各种鸟类和鱼类，采集林产品，休闲，乃至作战，都有固定的季节。他们从自然环境中学到许多知识，例如鸟类的习性及其对浆果的嗜好，鱼类的活动，以及各种树木的特质。为了使人们能以长远的眼光来利用各种资源，酋长们以“塔普”①来保证根据这一类知识而确立起来的一些规则能得到遵守。

贵族(即“兰加蒂腊”)阶级和普通人之间有明显的区别。酋长(即“阿里基”)拥有特殊的地位，而最下层的阶级是奴隶，这些奴隶主要是在战争中被俘获的，并且大都是属酋长所有的。但不存在闲居无业的阶级。酋长们仅从事一些比较高尚的工作，例如在为种植“库马拉”而整地时，他们参与一些劳动，但即使如此，他们的劳动大部分也是象征性的。另一方面，被认为卑贱的工作，如搬运、帮厨、拾柴、打水等都由奴隶们去做。人们期望酋长去做的工作是领导、指导、以榜样鼓励人们，及组织工作。他本质上是一个身负重任的人，注意在草坪上或会棚里讨论的事情。

“塔普”(Tapu)，意即禁忌、戒律。是指南太平洋一带不许土著居民接触或接近所谓“神圣”的东西。——译者

男子的工作主要是获取食物，妇女则负责烧饭、织布，拾柴和一些较轻的工作，有时也参加一些较重的劳动。但有许多工作是男女共同分担去做的，并且在家庭生活中存在着一种共同的责任感。

12 毛利族人的生活具有很浓厚的公有制生活的性质，但在社会福利的一般限制的范围内，容许个人和家庭拥有一些财产。一个人自制的或在战争中缴获的工具或武器都归他所有。虽然土地属部落所有，但每个家庭可分得某一小块土地供自己使用。各家庭还有权占有捕鸟的专用树木和养鼠的专用场地。集体劳动得到的果实，如大家一起张网捕鱼所得的收获，由酋长指导分配，既照顾到家庭需要，亦照顾到参加捕鱼的人所付出的劳动。公众对一个人在参加集体劳动所作的贡献的评论是起作用的。在他们之中没有与欧洲人的绝对财产权这一概念相似的东西。社会的紧密关系，部落、“哈普”和“华瑙”的紧密关系，总是易于限制我们所谓的私有财产权。

毛利族人以这种有限的装备相当良好地利用了周围的环境条件。他们熟悉利用和爱护本地区

的森林、湖泊、土壤和海洋。他们进行有组织的劳动以保持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对"塔普"和巫术的崇信，一般地是有一些感受性的基础的。正如在最原始的社会里一样，那些曾一度来源于常识的各种风俗和戒律，或许会倾向于变为完全固定的习惯和仪式，从而阻碍社会的变革和发展。但是，这种倾向并非原始社会所独有。当我们考虑欧洲人的压力对毛利族人的生活的影响时，我们应该记住，毛利族人的生活是同他们所热爱的环境紧密结合的，并且他们各自是适应于其所处的社会的。

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应该错误地认为毛利族人的生活是合乎理想的。部落是毛利族人最大的社会单位。部落之间的战争不仅被认可，而且被赞扬。战争不仅是一种极端的需要，而且是生活的顶峰。这是和他们嗜食人肉的习性有关连的。

13 第三章　早期欧洲人与毛利族人的接触

塔斯曼和库克

众所周知，第一个发现新西兰的欧洲人是荷兰探险家艾贝尔·詹斯佐恩·塔斯曼。他是在1642年扬帆沿新西兰的西海岸行驶时发现该岛的。塔斯曼是庞大的荷兰东印度公司的雇员。这家公司在爪哇和东印度的其它岛屿拥有很大的势力。荷兰人是大海员和大商人。他们在反抗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的统治中，打击了葡萄牙人（他们在1580年也受西班牙国王的统治）在东方建立起来的贸易行业。十六世纪末叶，荷兰商人派遣远征队到东印度群岛采购香料。他们获得了巨额利润。1602年，荷兰各城市的商人集股组织了势力强大的东印度公司。

当时，澳大利亚被称为新荷兰。荷兰东印度公司为了要知悉新荷兰是否向南伸延而形成一个

辽阔的南极大陆，派遣塔斯曼由爪哇启程，前往该
地观察。他发现了塔斯马尼亚岛，并把它叫做“范
迪门的土地”。由此东航，他看见了离格雷默斯的
位置不远的南岛。随后他又沿着南岛海岸向北航
行，一直绕过现在称之为“费尔韦尔角”的地方，最
后停泊在黄金湾。可是，塔斯曼称黄金湾为“凶手
湾”，因为凶猛的毛利族人乘着双木舟攻击了他的
一艘船的船员，并用木棍殴打了其中的四人。塔
斯曼没有通过库克海峡，而是沿着北岛的海岸航 14
行，直到抵达玛丽亚·范迪门角为止。他称这个
地方为斯里京斯群岛。但由于受到海浪和海潮的
影响，无法登岸补充淡水和蔬菜，他便启航他往，
以后就没有重到这个地方。最初他称这一片新发
现的陆地为“斯塔顿陆地”，因为他认为这一片陆
地可能横断太平洋伸延到南美洲的顶端附近的一
个称为斯塔顿的陆地。不久以后，另一个探险家
证实这一片陆地是一个岛屿，荷兰当局才将塔斯
曼发现的这一片新陆地命名为新西兰。

荷兰人并没有在塔斯曼发现的基础上对新西兰作进一步的探索，因此，直至十八世纪詹姆斯·库克船长航行到这里为止，欧洲人对新西兰仍然

模糊不清。库克在其年青时代所受教育不多，但是，当他十七岁在一艘来往于英国沿海经商的煤船上当学徒时，由于他具有异常的能力，不久便被提升为船上的大副。1755 年，当他二十七岁时，英法之间爆发了战争，他自愿参加了海军。他迅速地从水兵晋升为海军准尉。1759 年，他参加了围攻魁北克的战役，奉命在法国要塞的炮火直接控制下从事探测魁北克的河道这一艰险的任务。官方的报告证实：尽管库克受到法国人及其盟军红印第安人的严密监视，但"他给舰队司令提供了河道和水深方面的精确而完整的草图，其精确和完整程度同我们的同胞在占领魁北克以后所能制成的草图完全一样。"

在加拿大的几个漫长的冬季里，库克刻苦钻研，不久就成为数学和天文学方面公认的权威。他在 1766 年 8 月对日蚀的观测，引起英国皇家学
15 会的注意。该学会说服了英国海军部派船运送远征队前往塔希提岛，以便观测 1769 年 6 月金星的运行。库克被提升为海军上尉，并受命率领远征队出发，他所乘的船叫做"努力号"。当时给他的指示是：在完成观测金星的运行这一任务以后，他

可以自行决定，进一步探索南太平洋，特别是探索新西兰及其尚未为世人所知的居民的情况。

库克在塔希提岛成功地完成了观测工作之后，他所乘的船“努力号”便向南航行到南纬40度的区域。由于没有发现南大陆，库克便按照他所曾接受的指示向西航行，朝着塔斯曼曾经发现的陆地驶去。1769年10月7日，库克在扬·尼克岬看到了新西兰的海岸，两天后，“努力号”便停泊在贫穷湾。库克离开塔希提岛时带了当地的一个名为图比亚的酋长随行。这个酋长不久就发觉库克能容易地了解毛利族人并能使毛利族人了解他。库克之所以能同毛利族人建立总的来说是公正的、和平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这一点。

塔斯曼遗留下来的报告书中曾描述毛利族人的残暴性，这就自然地使探险家们保持着小心谨慎的态度。库克在同毛利族人初遇时，毛利族人的行为是那么一种行为，致使他向他们开了枪，击毙了其中的一人。库克在其访问中还碰到过其它一些类似的事件，但他总是小心翼翼，避免出现草率或不公正的行为。有一次，一个土著居民因偷窃一块布料而遭枪击，库克在其航海日记里记载

着他获悉此事之后感到的痛苦和不快。

库克从贫穷湾向南航行，经过拐子角而直达图纳盖恩角，方始返航。不管天气恶劣，他在扬帆
16 向北而转西，到达水银湾时，仍然调查了北岛的海岸。库克在水银湾作了短暂的停留，以便观察水星的运行。他以英王名义宣布北岛属英国所有。随后，库克继续航行，经过了太晤士河口湾①。他在其航海日记中，记载了这里盛产参天大树，而这些就是后来木材商人梦寐以求的木材。在向北航行途中，库克列述了海岸的许多特征，并让他的船短暂地停泊在群岛湾。在他的船被暴风卷出海面后，他在暴风雨的天气中抵达玛丽亚·范迪门角。不管当时的暴风雨，库克没有离开这个海角，直至他非常准确地测定了它的位置为止。

接着，库克继续沿西海岸向南航行，直至他驶进夏洛特皇后海峡的小船湾，方才找到停泊的地点，但他并不知道这时他已是在另一个岛上。他在该岛将船侧倾，进行维修。他从附近的一座小

---

① 这里和本章出现的“太晤士河口湾”(Firth of Thames)是指库克在新西兰看到的海湾，不是指英国的太晤士河(Thames)。——译者

山上第一次看到了目前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海峡①，由此才认识到新西兰是由两个分开的岛屿组成的。

在他以英王名义正式宣布新西兰属英国所有之后，他继续其航行，并且用了四十九天的时间，环绕南岛和斯图尔特岛一周。虽然很多时间他遇上了恶劣的天气，但后来的探索结果表明，他所绘制的地图，就其主要的轮廓而言，是非常准确的。库克未能确定班克斯半岛是不是一个岛屿，同时天气也妨碍他发现福沃海峡。他在夏洛特皇后海峡完成修船工作以后，再度航行，前往探索澳大利亚的东海岸，借以继续其发现事业。

库克离开新西兰之前，在其航海日记中详细地记录了毛利族人给他留下的种种印象。对一切有志研究白种人到达新西兰之前毛利族生活的人来说，这个记载是一种珍贵的资料。他率领的远
征队中的科学家们，特别是约瑟夫·班克斯爵士 17
和丹尼尔·索兰德，也尽量利用机会，仔细地研究了新西兰的自然特征。库克率领的远征队实际上

① 即库克海峡。——译者

是现代科学考察队的先驱者。由于库克关心其远征队队员们的健康，他也在航海技术上开创了一个新时代。他指出，即使是远程航行，只要对可怕的坏血症采取很简单的预防措施，就连一个人也不会死亡。

1772年至1775年，在库克乘“决心号”船进行伟大的第二次航行中，他曾三次在新西兰停留，借以维修船只，同时让船员们休息。在这三年的航海生活中，只有四人死亡，其中的三人死于意外事故，没有一个因患坏血症致死。在库克从好望角起，于高纬度地区进行了长期航行，以否定有关存在南大陆的学说之后，他于1773年3月底到达达斯基海峡。他在这里逗留两周以维修船只，并如同在其它许多地方一样，在这里播下了一些种子，释放了一对鹅。但在这个多山的地区他很少看见土著居民。他在小船湾又逗留了一些时间，并在这里同他的僚船“冒险号”会合。库克在南部海域以东（在这里他遇到在南纬71度10分的巨大的浮冰群）以及在太平洋群岛之间作进一步的探索的过程中，他再次于1773年11月在小船湾进行修船，一年以后又返回这里修船一次。他在返回

英国之前又从小船湾起航，绕过合恩角而到达好望角。在进行这些访问期间，他继续对毛利族人进行精细的、富有同情心的观察。

1777 年 2 月，小船湾再一次成为库克最后一次、也是致命的一次航行中的停泊港。在这次航行中，他勘探了北太平洋的许多地方，后来于 1779 年 2 月 14 日在夏威夷群岛遇害。

库克完成第二次航行后被接受为英国皇家学
会会员，并获得了该会的金质奖章。在出身卑贱
往往成为晋升的一种障碍的日子里，库克这个劳
动者的儿子却被提升为船长。然而这些荣誉同他 18
的工作的一切方面（他的航海术、科学工作、对其
船员的关注以及对待太平洋土著居民的明智的同
情心）的实际价值相比，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库克
的招致死亡，既非由于鲁莽残暴，亦非由于对土著
居民的各种想法漠不关心。他在夏威夷遇害这一
事件说明，在具有不同文化的民族的接触中，即使
具有良好的愿望和处事深思熟虑，也总是难以防
止由于这种接触而产生的悲剧性结果。在这些海
域探索的所有探险家当中，库克是最不应该遭受
这么一种命运的。

早期的法国探险家

法国探险家德苏尔维尔于1769年12月16日乘船绕过玛丽亚·范迪门角，次日停泊在无疑湾。当库克在第一次航行中同他在北角附近遇到的暴风雨搏斗的时候，他必然已越过了德苏尔维尔的船。德苏尔维尔是一个和别人合伙同印度进行贸易的冒险家，但他为关于塔希提岛的被夸张了的传说所吸引，因而秘密地乘船前往这块新发现的土地。由于他的船员患病，他不得不寻找塔斯曼所发现的新西兰，觅取防治坏血症的蔬菜。不过，他在那里的停留是短暂的，而且他除了或许看到北角附近数英里的海岸线之外，没有发现伸延的海岸线。德苏尔维尔对待毛利族人是不公正的和残暴的，并且在他最后启航前往南美洲海岸之前，绑架了一个毛利族酋长。他到达南美洲之后不久就丧了命。

马里翁·杜弗雷纳是一个对科学感兴趣的法国富人。他在一次也是前往塔希提岛的航行中，于1772年3月25日看见了埃格蒙特山。他根据塔斯曼绘制的海图，向北航行，一直绕过玛丽亚·

范迪门角，因要寻找淡水，不得不在群岛湾登岸。19
同时，他也需要在该地治疗患病的船员和维修船只。

马里翁·杜弗雷纳在岸上搭起帐篷。他误认毛利族人的举动都是友好的表现。他因此疏于戒备，过分信赖他们，结果于7月12日，他和几个船员同时被杀死并被吃掉。总共这个远征队有二十七人都遭到同样的命运。

人们常常说，这次屠杀事件的发生，是毛利族人对三年前德苏尔维尔所作的暴行的直接报复行动，但这个理由似乎靠不住。更有可能的是，马里翁手下的人曾将一个偷窃斧头的酋长捆绑起来，这侮辱了这个酋长的“塔普”，因而使他组织这次凶猛的报复行动。马里翁的副手克罗泽当时还不知悉库克已宣布新西兰属英国所有，也宣布新西兰为法国属地，命名为“澳斯特雷尔-法兰西”。屠杀事件发生一个月后，克罗泽无法进一步获悉马里翁的消息，只得怀着凄怆的心情离开了新西兰。

20 第四章　欧洲人贸易和移民的开端

最初的木材贸易

库克的航行报告发表以后，构成新西兰的各岛屿的存在，日益广泛地为人所知，而且有时还有迷航的游客到这里来。一艘环游世界的英国军舰也曾中途在这里停泊过。一、二个捕鲸先驱者，从新英格兰①扬帆出发，横越南美洲海岸，来到新西兰；法国探险家当特尔卡斯托于1793年在靠近斯里京斯群岛的海面停留了好几天。

1788年在悉尼设立了第一个罪犯移民区，第一批商人便是从这个移民区开始去开发新西兰的。那些舒舒服服地坐在伦敦办公室里的官员们曾发出指示说：为了在悉尼和诺福克岛建立服装工业，利用新西兰的亚麻是可行的。于是，早期的

---

① 新英格兰是美国东北部缅因、新罕布什尔、佛蒙特、马萨诸塞、康涅狄格、罗德艾兰等六州的总称。——译者

总督们曾下令从新西兰“抓一、两个懂得制麻的土著居民”来教会罪犯们怎样制麻。

总督们曾以高达一百镑的赏格征求一些初期捕鲸者去完成上述任务，但是捕鲸者在制麻者的原住地对他们进行了比较仔细的观察后，都不敢应征。直到1793年，英国军舰“迪达勒斯号”方才载着两个青年酋长匆匆地启航。这两个酋长被诱登舰，他们的注意被转移开，直至这艘军舰离开新 21
西兰为止。当这两个酋长发觉受骗，并在他们被从悉尼带到诺福克岛，发觉他们得从事妇女所做的工作时，他们感到非常厌恶和愤怒。不过，诺福克岛总督对待他们很好，并在同年特意把他们送回其故乡。为此，这个总督受到他的顶头上司新南威尔士总督的严厉斥责。

1794年，“幻想号”船来到新西兰访问，为的是要获得木材。这开创了新西兰木材贸易上的一个新纪元。在英国，最初讨论新南威尔士移民区的开发时，经常提到在新西兰可获得优质木材。库克在其航海日记中记述过，在被他称为太晤士河的附近生长着一片光滑而笔直的树木，这必定是属于白松和黑松的森林中的树木。人们认为，

这种近便的木材供应，对新南威尔士的初期移民区的发展具有巨大的价值。

“幻想号”船是专为经商而前来新西兰的第一艘商船。1795年初，这艘商船装运了一批优质的桅杆木材和相当大量的亚麻回到悉尼。随后，其它商船接踵而来，于是，最初的贸易便从木材和亚麻这两方面发展起来。

捕鲸者

甚至在“幻想号”船从新西兰运走货物之前，捕海豹者和远洋捕鲸者已开始涌向新西兰海岸，把它看作是可供他们进行活动的一个未开发的富饶地区。第一批捕鲸船在公海中捕猎抹香鲸。在奥克兰北部的良好的天然港，对于船员休息、获取
22 新鲜食物和淡水或者维修船只都很方便，而且这里和悉尼不同，既不必缴纳通行税，也不必拘泥于生活上的通常礼节。最早来到这里的人数众多的捕鲸者是美国人。他们闻说在新西兰海域捕鲸，收获较大，限制较少，就从南美洲的太平洋沿岸的原来捕鲸区被吸引到这里来。

早在1791年，一支捕鲸船队充当载运罪犯前

往悉尼的运输船只，曾报导发现了大量鲸群，而运输船只一经获准经过新西兰进入太平洋，一个捕鲸的兴旺时期便不可避免地要到来。然而截至1798年，英国的捕鲸者都被禁止进入这种行业，因为英国东印度公司仍然认为它在这些南太平洋海域享有这种行业的专利权。但在这一年，西班牙的巡洋舰在合恩角周围积极活动，因此，英国海军部便指挥英国的捕鲸者取道好望角和澳大利亚前往南太平洋。

1801年，诺福克岛的总督报告说，他认为捕鲸业确已在新西兰海岸建立起来。有记录表明，在1800年以后的最初十年间，经常有船只从悉尼和霍巴特到新西兰访问。

在很多前往新西兰的船只中经常发生罪犯逃走的事件，而毛利族人同欧洲人最初接触的经验往往具有反抗和残暴的性质。

在新西兰的最南端捕海豹的活动

捕鲸者的主要活动区是在群岛湾，而捕海豹者的最初总部则设在新西兰的最南端达斯基海峡附近。库克在其第二次航行时，曾对达斯基海峡

进行了准确的勘测，希望这个海峡能成为一个安全港，供远航到东方的船只停泊和维修之用。

23 由于“努力号”船的航海日记中提到这里海豹的货源丰富，因之，远在1792年就吸引了一些富于冒险精神的捕海豹者到这里来，当时有一帮人在达斯基海峡的海岸留下来猎取海豹，用以供应中国市场之需。其他的捕海豹者不久也在斯图尔特岛和福沃海峡进行积极的活动。

在前一年，即1791年，大探险家范库弗曾到过达斯基海峡，其目的在于获得库克所提到的亚麻纤维的样品，同时如有可能，他也要弄回一些土著的亚麻纺织者。1793年，意大利探险家马拉斯皮纳率领西班牙远征队，也到达可疑湾。但他为大雾所阻，未能进入达斯基海峡，因此，没有发现最初的一帮捕海豹者。

美国人和英国人的船队也参加了海豹的搜捕活动。他们毫无区别地将捕获的海豹加以屠宰，腌制其皮，然后运往中国市场。位于阿帕里马河之口的美丽的河口湾，即现在里弗顿所在地，是良好的港口。但是有证据说明，前往捕海豹区的船只经常在最北端的群岛湾停泊。在1809年宣布发

现福沃海峡以前，这些捕海豹者必然早已知道这个海峡的存在。那个时候，由于大批的屠杀，沿海的捕海豹业已受到破坏，在1810年至1812年期间，捕海豹者便涌到麦夸里岛，这一涌到该岛的现象持续了许多年。1820年，俄国的南极探险家贝林肖森在途经悉尼前往南极时，曾目睹麦夸里岛的捕海豹业正处于全盛时期。但是，这一行业后来就逐渐地消失了。

初期新西兰贸易的这一方面的永久性结果并不多。自1809年以后，人们在各个时期都打算利用斯图尔特岛的亚麻。1825年，斯图尔特船长（斯图尔特岛是以他命名的）制定了一个造船和制麻的庞大计划。一个白种人-毛利族人①名叫库克，
于1826年从群岛湾被带到这里来，建造了几艘小 24
船，然后于1833年返回北方。可是斯图尔特的计划失败了，因而在这里没有建立起永久的移民区。

1827年至1840年间的海湾捕鲸者

其他的早期移民乃是海湾捕鲸者。他们在

① 白种人-毛利族人，指同毛利族人杂居并受其保护的白种人，详见本书第五章第51页。——译者

1830年以前不久，主要在库克海峡开始建立岸上居留站，而在此后的十年间，他们又在班克斯半岛、奥塔戈半岛和福沃海峡的各个小湾建立起岸上居留站。最初的捕鲸业是深海作业，捕猎抹香鲸。但是，海湾捕鲸者如同他们仍在库克海峡所作的一样，在岸上建立了一些永久移民区，从这里出发，在一年的某些季节捕猎合适的鲸鱼。很多捕鲸者都是一些品德较好的人，但他们的工作条件是艰苦的，也出现酗酒闹事和难以形容的穷凶极恶行为的丑闻。现在在大多数的地方，只有象沃阿霍阿（又名戈阿肖尔）湾等地名以及象置于“小河管区”的或置于新普利默斯博物馆前面的炼（鲸）油锅这一类遗迹，才能使我们想起第二阶段捕鲸业的情况。但是，在一些地方，例如在怀库艾蒂，人们象约翰尼·琼斯那样建立起比较固定的居留区，捕鲸者和毛利族人通婚并在一些村庄里过着粗安的生活，而这些村庄后来就发展成为白种人的中心地区。在新西兰，正是在这些村庄中第一次进行了商业性的农业耕作，而传教士的早期农场当然是为着他们自己的给养而经营的，并不是为着贸易上的目的而经营的。

传教士

毛利族人对悉尼的访问，引起了想给新西兰
带来各种影响的塞缪尔·马斯登的同情和兴趣。
马斯登是悉尼的罪犯移民区的主要牧师。他在悉
尼的工作既艰苦又重要。他主要是管理罪犯。这 25
些罪犯有时是道德败坏的人。但他们有时仅是心
情躁烈的男人和女人，因犯了轻微的过失而在当
时的严酷的法律下受到残酷的惩罚，被判处流放
植物湾。这些人容易变成鲁莽轻率和仇恨那么严
厉地对待他们的法律。马斯登及其助手的任务是
鼓励他们形成一种在这块新的土地上重新开始生
活的愿望。马斯登在帕腊马塔有一个农场，在那
里他竭尽其权力范围内的一切方法，为罪犯们树
立勤恳而诚实的劳动的范例，并向他们表明怎样
在这块新的土地上使生活变成有意义的。

马斯登常常在这个农场款待乘船到悉尼来的毛利族人。他感到毛利族人具有许多优良品质。当他获悉白种人犯下罪行而遭到毛利族人的报复时，他感到自己有责任去拯救毛利族人免于堕落。他细心地计划着有朝一日能在新西兰建立一个传

教站，即使他本人不能在这个站工作，也要把它建立起来。1807 年，他到英国去物色自愿前往新西兰工作的传教士。但是，有关毛利族人的残忍和嗜食人肉的习性的可怕传说早已传到英国，因此，马斯登找不到一个敢于前往新西兰的牧师；只有一个叫做威廉·霍尔的造船者和一个叫做约翰·金的制麻者兼制绳者自告奋勇到新西兰担任这项危险的工作。他们的薪金每人每年二十镑，直到他们能够维持他们自己的生活为止。

马斯登在再度返回悉尼途中，在船舱里的水
手中间遇见一个名叫鲁阿塔腊的毛利族人。鲁阿
塔腊先前曾向马斯登讲述过新西兰的情况，使他
不辞长途跋涉，到英国去物色传教士。他对鲁阿
塔腊目前的境遇感到苦恼。鲁阿塔腊主要是因在
26 另一艘船上受到虐待而病倒，情绪低落；但在亲切
的照料下，他很快就恢复了健康。马斯登本来希
望在鲁阿塔腊的保护下立即开展传教工作，可是
“博伊德号”船屠杀事件的消息传到悉尼时，他的
这个希望就破灭了。鲁阿塔腊在帕腊马塔略作逗
留后，便启程前往新西兰。但是，和他同船的船长
再度欺骗他，使他在诺福克岛上岸。他于是再返

悉尼，在悉尼作短暂的停留后，就安全地回到阔别四年的新西兰自己的人民之中。他随身带了不少小麦种子。虽然他的部落中的一些急躁的成员拔起麦苗，以观察它们是否象马铃薯一般长起根子，但他还是设法培植一些小麦臻于成熟。马斯登在克服一些困难之后，给鲁阿塔腊送去了一具手推磨，以便他把小麦磨成粉。

1810年，来了一个叫肯德尔的教师，这使马斯登的工作人员班子有所加强。1813年，适有一艘双桅船待售，马斯登抓住这个机会把它买下。为了购买这艘取名“敏捷号”的双桅船，他付出了一千四百镑，其中九百镑是他出卖他的畜牧场的羊所得的款项，其余部分是借来的。1814年3月初，他让“敏捷号”船试航前往新西兰。同年8月21日，该船返回悉尼，并载来了鲁阿塔腊和他的叔父洪义以及另外九个酋长。马斯登把他们统统接到他在帕腊马塔的家里。

“敏捷号”第二次出航时，马斯登本人乘该船于1814年12月到达新西兰。值得注意的是，他到达新西兰以后便立即得到机会去实现其和平和亲善的使命。他在卡瓦利群岛获悉旺加罗阿部落

和鲁阿塔腊的族人发生战争，并且他们的战争是由“博伊德号”船屠杀事件所引起的。马斯登立即登岸，来到怀有敌意的营垒，向毛利族人了解当时屠杀的情况，随后披着大衣同对这次暴行负有责
27 任的战士共卧。他在离开该岛之前，以其能为这两个部落之间的纠纷取得和平解决而感到非常满意。

马斯登及其随行人员于1814年的圣诞节前几天在群岛湾登陆。他在圣诞节日作了第一次布道，讲的是圣经中的经文：“看呀！我给你们带来了极其欢乐的福音。”

传教士们的工作最初进展不大，十年间没有使一个毛利族人成为皈依基督教的信徒。但他们的工作逐步地扩展，他们的影响也逐渐地扩大，最后，他们在毛利族人中成为一股强大的和平力量。这一小股传教先驱者的人数逐渐地增加，新的传教站也开办起来，到了1838年，总共已有十三个传教士移民区，为数众多的毛利族人至少在名义上已成为基督教徒。1822年，卫理公会派来的第一个传教士塞缪尔·利到达新西兰，但是，多年来很少发生或者没有发生过教派竞争现象。1823年，

曾在纳尔逊之下当过舰长的亨利·威廉斯牧师到达新西兰，他是新西兰早期历史上最有力量的人物之一。他成为在新西兰的英国圣公会的实际上的领导人，虽然在名义上他不是领导人。他的兄弟威廉·威廉斯是熟悉毛利族文化而有才能的先驱者。他们兄弟两人在新西兰历史上都是有名望的人物。

马斯登曾一再尝试要为毛利族语言创造文字。1820年，在肯德尔带领洪义和怀卡托访问英国期间，李教授才有了可能为毛利族语创造一种拼音法和编写一种有规则的语法。十五年以后，一个称为威廉·科伦索的印刷商兼传教士开始进行印刷毛利族文《圣经》这一工作。

但是，马斯登对新西兰的访问，其所以重要，除建立传教站外，还有其它的原故。“敏捷号”船 28
为新西兰所曾经营的第一个畜牧场运来了充足的牲畜——牛、马、羊、鹅、鸡和火鸡。此外，带着家属来到新西兰的传教士们各自有其所从事的职业。约翰·金是制绳者，威廉·霍尔是建造业者，肯德尔是教师。这样，欧洲人的方法和知识便被较系统地传授给毛利族人。各传教站在有条理的

耕作和建筑方面为毛利族人树立了范例。伟大的博物学家查尔斯·达尔文于1835年访问了群岛湾的怀马特传教站，他把它同新西兰其它地方存在着的情况作了对比，热情洋溢地描述了怀马特传教站的情况。

此外，肯德尔在离开悉尼赴新西兰之前，已被任命为治安推事。新南威尔士的总督授他以全权去同某些毛利族酋长合力调节新西兰的贸易和防止在新西兰出现暴乱。当权的人们对欧洲人同毛利族人的接触的问题表现出某种关心。

第五章　早期接触对毛利族人的影响 29

阴暗面

当欧洲人正在发展较好的交通工具和寻求利用取自世界各地的产品的方法时，世界其他各地的人民不可能闭关自守，排除欧洲或好或坏的影响。从这种新的接触中总不免要产生种种困难和问题。注意到这类事情的较有头脑的英国人为这种接触给土著居民带来的不幸结果而深有感触；但是他们还是希望这种接触能获致较好的成效。毛利族人从他们同欧洲人的早期接触的经验中怎样过生活呢？

人们很容易看到一些恶果。来到新西兰的欧洲人，许多都是任性的、不守规矩的人。他们极少尊重其伙伴，不论其伙伴是白种人还是棕色人。即使是心地善良的海员们，由于要忍受当时海上生活的可怕的条件，他们登岸后，远离祖国同胞的

舆论和法律的约束，他们对土著居民大概也不会产生良好的影响。此外，他们对毛利族人的风俗的无知，也会导致发生一些行动，从而引起毛利族人的怨恨情感，尽管他们的行动是出之无意的。毛利族人的报复行为看来是粗暴而残忍的，因此又进一步导致欧洲人的背信弃义和复仇。

80 在1800年后的三十年间，新西兰历史上的一些最黑暗的篇章是在科罗腊雷卡和北奥克兰的优美港湾写下的。这些地方不仅是几个国籍的捕鲸船汇集的所在，而且也是来自新南威尔士的逃亡者和潜逃的罪犯寄居之处。有一个也许是夸大了的估计指出，科罗腊雷卡在1838年有一千个欧洲居民，却有“一座教堂，五间旅店，各式各样的酒吧，一间剧院和一间弹子房”。那里的生活往往是放荡而可怖的。毛利族人在这些地方和其它地方学到了对任何人都不会有好处的欧洲生活方式。

“博伊德号”船事件很能说明欧洲人同毛利族人的早期接触的一个侧面。毛利族人常常被引诱上船充当水手。他们有的是希望游览世界而愿意

前往的，有的是受骗上当而不得不前往的。到了1806年，在悉尼的街道上看到毛利族人就不是不寻常的事了。这一年，著名的酋长特·帕希(旧称提帕希或提普·阿·希)来到悉尼进行访问，受到总督的款待，后来带着许多礼物返回群岛湾。同年，一个年青的酋长塔腊(又名乔治)在捕海豹船"星号"充当水手，直到1809年他才同其他毛利族人一道乘"博伊德号"船返回新西兰。他回到自己的人民中以后，愤怒地控诉了他所受到的虐待和侮辱，并煽动他的部落去进行报仇和夺取战利品。当"博伊德号"船船长登岸为他的船寻觅桅干木料时，立即受到毛利族人的威胁，结果，船上的约四十名船员几乎全部被杀死并被吃掉。这是这些不祥年头中的最坏的悲剧，但还不是唯一的悲剧。阅读这些记载是令人不快的。

特·帕希有无参加这次屠杀事件是个疑问。31
根据现有的不多的证据看来，他可能没有参加，并且在另一方面，他试图把不幸被俘上岸的船员收藏起来。不过，当这次屠杀事件传开之后，在悉尼引起了极大的愤慨，一彩水手洗劫和烧毁了特·帕希的村庄。

火器的传入

欧洲人也带来了一些为毛利族人所不惯有的疾病，而毛利族人对这些疾病还没有发展很大的抵抗力。这就引起毛利族人口的下降——这是欧洲人最初同土著居民的接触所产生的一种常见的后果。但是，其它的因素可能给毛利族生活方式带来更大的破坏。首先的一个因素就是火器的传入。我们在上文已指出，毛利族人还没有成为统一的民族，各部落之间的战争是他们的生活中的一个被认可的部分。当一个部落通过同欧洲人的交易而获得这些新式武器时，这个部落同那些仍然依赖“梅雷”和“泰亚哈”①的部落相比，自然具有很大的优势。各部落之间的实力大致相等的互相威慑的局面遭到破坏，而势力较为雄厚的部落就想用火器屠杀他们的敌人。

北奥克兰的酋长洪义就是一例。洪义曾同鲁阿塔腊一起来到悉尼，后来他又协助把毛利族语言发展为文字。他的部落曾被另一个部落的拥有

① “梅雷”(Mere)和“泰亚哈”(Taiaha)，是毛利族人的原始武器。——译者

几支滑膛枪的酋长所击败。这件事给予他的印象是如此深刻，以致他到英国去的主要目的是获得足够多的滑膛枪，从而使他的部落成为不可战胜的部落。

洪义在英国受到盛宴招待，接受了许多礼物，
英王乔治四世接见了他，同他握了手，洪义说了一 32
声："乔治王先生，你好！"据说悠闲自得的英王也回答说："洪义王先生，你好！"洪义要求英王把放在伦敦塔①里的一套锁子甲送给他。他一回到悉尼，就将所有其它礼物变卖成现金，用以购买三百支滑膛枪以及火药和子弹。后来，他在参加一次战斗时没有穿上甲胄，被他自己的人的子弹打穿肺部，摇摇晃晃走了一会就死去了。他死于1827年。不过，在这以前，洪义曾在新西兰北岛的许多地方挑起了战火，使这些地方遭到破坏。此外，他还大量制造争端，使整个毛利族社会陷于不睦状态。

其他重要的战争领袖出现了，其中著名的有怀卡托的特·韦罗韦罗和豪拉基湾的特·瓦哈罗

① 伦敦塔最初是英王亨利三世(1207—1272年，在位期间为1216—1272年)的宫殿，现在是博物馆。——译者

阿。他们同洪义之间以及他们彼此之间都曾互相争夺那种施展凶恶狡诈和发动残酷战争的胜利。在这里缕述这一时期的许多战况没有多大意义；不过，关于酋长特·劳帕腊哈的经历却值得简单一提，因为他后来起了重要的作用。特·劳帕腊哈原来是一个小部落的小酋长，当他乘着白种人的船前往库克海峡访问时，他发现卡皮提岛有可能成为一个基地，机智的战士从那里可以控制新西兰中部。1821年，他将本族人和他所能聚集的增援人员集合起来，以其非凡的技能和决心，率领他们从考希阿附近迁徙到卡皮提岛。这是一次要通过敌对区域的惊人的长途行军。讲述这次长途行军的故事是很多的。征途中的战争是残酷的。通过这些残酷的战争，他完成了其长途行军。从旺加努伊到阿卡罗阿这一带地方，人们谈起特·劳帕腊哈时，无不恐惧万状。

特·劳帕腊哈干过多次最可怖的屠杀，其中
83 的一次是由英国双桅船“伊丽莎白号”船长协助的。这是当时经常前来新西兰的一些欧洲人肆无忌惮的贪婪的一个好例证。这个船长叫做J.斯图尔特。特·劳帕腊哈以一大批亚麻向他行贿，他受

贿将特·劳帕腊哈及其一百二十名战士运送到阿卡罗阿。这样，特·劳帕腊哈就可以为其被杀害的叔父进行蓄谋已久的报复。到达阿卡罗阿时，特·劳帕腊哈在J.斯图尔特的帮助下，采取了狡猾和欺诈的手段，几乎屠杀了塔哈普内克(红屋湾)的一个村寨的全部居民。J.斯图尔特更坏的丑恶行为还在于将特·劳帕腊哈那夥人连同少数留待折磨的俘虏和一些用篮子盛着的人肉一起运了回去。次年，即1831年，特·劳帕腊哈以毁灭凯亚波伊的一个村寨来完成他的报复行动，这是牺牲在他手里的另一个重要村落。

贸易的影响

人们曾发表了这样的议论：随着大多数部落都获得了火器，从而恢复了他们之间的力量平衡，这些新式武器的致命性质有助于抑制部落之间再诉之于战争；但在这期间肯定已经发生了很大的伤害。不管怎样，火器并非毛利族人渴望同欧洲人交易的唯一欧洲商品。他们所渴望的东西是斧头和其它钢制工具，这些工具较之他们自己的石制的、骨制的和木制的工具优良得多。但不论毛

利族人通过贸易所得到的是战争的武器还是和平生活的用具，他们同欧洲人的贸易都打乱了他们的生活。他们不按照过去自给的方式从事生产，有时却集中力量去积聚为欧洲人所需要的物资，以便换取其货物。亚麻是一项重要商品。毛利族人由于要储备大量亚麻以供应欧洲人，有时就忽
34 视耕种、捕鱼、设圈套诱捕鸟类和小动物以及妥善储存收获物等项工作。此外，毛利族的村落往往从山区迁移到靠近盛产亚麻的沼泽地带，这对他们的健康有不良的影响。

较光明的一面

上述这种不幸的图景，在过去四个半世纪期间，随着欧洲人扩张其势力、扩散其人员，对于美洲、非洲、亚洲和太平洋的较原始的民族来说，乃是司空见惯的；但是除这种不幸的图景之外，也出现了一种较有希望的前景。毛利族人看到了欧洲人所带来的东西的优点，不久便开始学习运用这些东西。到1840年，毛利族人已饲养了大量的生猪和家禽，种植了大量的玉米、小麦、蔬菜和水果。这些东西是通过各种渠道被引进来的。库克船长

曾将一些生猪和种子留给毛利族人。据说，玉米是1793年诺福克岛的金总督送给毛利族人的礼物。小麦来自同一来源，马斯登也带来了小麦。马斯登所保护的人鲁阿塔腊是种植小麦的第一个毛利族人。大甘薯是在1819年由一个美国捕鲸者引进来的。有一种趋势是以这种大甘薯取代以前种植的较小的甘薯品种。

各种新式工具，如钢斧和铁锹，都受到珍视。各传教站成为传授诸如木工等方面的改良知识的中心。白种人-毛利族人(同毛利族人杂居并受其保护的白种人)在使毛利族的生活方式适应欧洲人的方法上起了重要的作用。他们充当了商品交易的代理人和使用新式工具的指导者。他们和传教士一样，对于帮助毛利族改善其经济生活具有最重要的影响。

毛利族在这方面取得的成就是很显著的。他 85
们除了生产供本身消费或用于同欧洲人进行交易的新食品以外，还开始采用捕鲸船代替独木舟，供沿岸旅行之需。他们自己建造或者从欧洲人那里获得较大型的欧洲式船只。一些毛利族人在船上服务，而且变成了熟练水手、船员和投鱼叉捕鲸

的好手。这样，在欧洲人还是较少的时候，毛利族人在接触到欧洲人的较丰富的知识和优良的设备上显示了有从中获致进步的相当大的能力。关于毛利族人在农业上的进步的各种描述也表明了他们对其前途已寄予什么样的希望。詹姆斯·科恩在《拓荒者和移民》中谈及特·阿瓦穆图这个地方时写道："远在怀卡托战争发生以前，富于冒险精神的旅行家们在这个地方惊奇地看到，原野上一片令人悦目的绿洲，种上了大面积的小麦、马铃薯和玉米；在整洁的道路旁边，住房整齐，桃树和苹果树成荫；每一个定居区都有属于毛利族社会所有的水力磨坊，人们忙着把麦田的丰富产物磨成粉。"

倘若这种和平的进程能够如同一些欧洲人和许多毛利族人所希望的那样持续下去，那么，毛利族将会发展到怎样地步呢？这一点我们是无法知道的。因为各种势力是在世界的其它一边发生着作用，是不能被局限在那里的。这些势力如何把这些遥远的西南太平洋岛屿上两个民族的接触变为一个民族压迫另一个民族，并且由此造成冲突和战争，且待本书第二篇加以叙述。

第二篇
文化的冲突

39 第六章　英国的政策

态度的改变

虽然库克船长为英王占领了新西兰，并且在他的航海日记里还发表过这样的意见，即新西兰是一块可供开拓殖民地的好地方，但是后来英国政府却拒绝承认对新西兰有任何领土要求。英国议会1817年、1823年和1828年通过的法令，都不称新西兰为在英国主权下的地方。

有一些关于殖民地的新思想（它们和十八世纪关于殖民地的各种看法很不相同）正在发展起来，虽说它们还没有产生后来所产生的影响。从前，各殖民地被认为是具有巨大经济利益的地方。英国用关税法和航海法来鼓励各殖民地为它生产有利可图的原料，阻止或禁止殖民地制造业主的任何发展，如果各殖民地同英国以外的其它国家进行贸易，它们就要受到处罚。虽然各殖民地为其产品在英国获得了受有保护的市场，但它们的

经济发展却被局限在对英国商人和制造业主有利
益的范围内。现在，在十九世纪，正当制造业主们
和商人们从技术发明为英国工业带来的优势地位
中得到巨大利益的时候，人们的看法转而反对管
制经济生活的思想。哪里能找到市场，就让商品
在哪里出售去吧；哪里原料的价格最低廉，就从哪 40
里购买原料吧。从这个观点出发，各殖民地已不
复具有其以往的价值。如果各殖民地的贸易不受
控制，那么，把钱花在各殖民地的政府上，究有什
么必要呢？战争已给英国留下了沉重的债务，国
内又存在着尖锐的问题。也有一部分人认为开拓
殖民地对土著居民具有不良影响，因而加以反对。
这些都是英国政府不愿意承担殖民地责任的一些
原因。

英国的情况

实际上，一些事态的发展都在迫使这个开拓殖民地的问题及早解决。工业以及土地的利用正在发生变化，其速度和规模在人类历史上都是空前的。这些变化正在英国创造条件，使人们甘愿离乡背井，远适异邦，因为他们觉得在海外，前途

较有希望。这些变化所产生的影响，在任何情况下大概都具有足够的干扰性质。由于1815年才结束的长期战争所造成的各方面失调，就使上述的变化所产生的影响更大。法国革命在英国原有的地主贵族和新兴的有财富的工厂主阶级中间所引起的恐惧，造成了一个政治压制的时期，并推迟了急需的改革。

英国新兴城镇的工厂工人和农村无地的农场工人的悲惨命运，其所以发生，就是由于上述各种原因的联合作用，其中尤以制造业和运输业这两方面的方法上的大革命为最重要的原因。另一方面，需要更多的原料来供应各种新机器制造产品之用；需要更多的粮食来供应英国迅速增长的人
41 口。海陆运输费用的低廉，使得各发展中的工业地区所要使用的这些商品也可能在远离它们的地方进行生产，从而给予了海外一些人烟稀少的温带地区以新的可能性。于是英国移民奔赴这些地区，他们中间有些人是得到帮助并且被组织前往的，而有些人则是自行设法前往的。当时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南非都已成为殖民地，这些移民促使这些现有的殖民地扩大起来。这些移民也促使新

西兰有可能成为一个殖民地。自英国和欧洲来到新西兰的欧洲人与日俱增，因而毛利族便受到英国和欧洲不断变化的情况所影响。

大量的证据揭露了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英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悲惨生活。英法战争期间，在1799—1800年通过的严禁工会活动的条例，直到1824—1825年才被废止，而旨在争取改善条件的工人组织则仍然受到诸如禁止阴谋活动法这类法律的限制。1797年通过的镇压海军哗变的法令及1799年通过的另一项旨在对付谋反社团的法令，都被用来镇压试图在1837年组成一个工会的农场工人——著名的"托尔普德尔殉难者"被流放到植物湾。1832年的英国改革法的通过①，仍然剥夺工人阶级的选举权，而从该法获得新的政治权力的中产阶级，对于改变劳动条件和工时的社会立法都普遍地表示反对。有些人认为，对各种经济问题不应该加以干预；有些人则认为，商品和劳动力的市场仿佛是一种神圣的制度。这一点在1834年通过的"救贫法"反映出来。旧的救贫

① 1832年的英国改革法，其内容包括扩大投票权和改革议会代表制。——译者

制度诚然是糟糕的。有些规定如根据面包的价格和家庭人口的数目而实行的工资津贴，对农业工
42 人和工人都有恶劣的影响。但是新的救贫法却走向另一极端。它尽可能使接受救济成为一件不愉快和不名誉的事情。新的救贫法含有这样的意思，即如果一个人需要救济的话，那是他自己的过错。这是一种残酷无情的说法，因为市场上的自由竞争引起商业上的繁荣和萧条，而商业萧条时就伴有失业的时期。救济金很少发给济贫院以外的人，而在济贫院里的人，他们的家庭已被拆散，他们的生活被尽可能安排得枯燥无味。在英国北部的新兴工业城镇，人们非常憎恨济贫院，因而喻之为巴黎的巴士底监狱——这座监狱被认为是暴力的象征。

在改革以后，农村情况依然是悲惨的。十八世纪，农业和牧畜业曾有过巨大的改进。但是，各种新方法固然是好的，因为它们能增加生产，却也引起社会的动乱。采用新方法需要的资金比小自耕农所拥有的要多，而且还要求将原来分散的小块土地合并成为用树篱圈起的密集的农场。这种圈地过程受到1800年的“圈地法”的巨大支持，而

在此过程中，因为小自耕农付不起必需的法定费
用，他就容易被挤掉，有时被不公正的手段所排
挤。英国成为一个拥有大农场的国家，这些大农
场有的是由大地主经营的，有的是由拥有租用土
地的农业资本家经营的，而小自耕农则沦为农场
工人或流入发展中的工厂企业中找寻工作。农场
工人的命运随着时势不同而变动。英法战争年代
明显的特点就是小麦价格的猛烈波动。但总的说
来，农场工人日益陷于贫困。当欧洲的供应来源
被战争切断的时候，为了维持国内的粮食供应，英
国也利用贫瘠的土地进行耕种。当和平来临，欧
洲大陆的粮食供应源源而来，谷物价格开始下降 43
时，地主和农场主都要求关税保护。这样才保住
了粮食的价格。另一方面，这种贫瘠的土地只有
雇用低工资的农业工人，才值得耕种。

农村和城市劳动者的命运是何等不幸，可以由各种调查委员会提供的证明材料加以阐明。1837年，一个有关调查将囚犯流放到海外罪犯监禁地的制度的委员会在它的报告中称："罪犯的健康状况一般地比农业工人为佳"。1833年，塔斯马尼亚岛罪犯监禁站的副总监写道，将失业工人的

命运与罪犯的命运作一比较就表明，洁身自爱者吃亏，为非作歹者走运。无怪乎男男女女都准备到海外去进行一番冒险。

但是，同加拿大和美国相比，新西兰距离英国是很遥远的，除了英国国内对新西兰的前途持有稍微不同观点的两个集团以外，其他的人或许不会对新西兰感到多大兴趣。这两个集团对一些事件和英国政府的政策都具有相当大的影响。一个集团是由爱德华·吉本·韦克菲尔德领导或推动的殖民地改革派；另一个集团是一些传教士及其在英国的支持者。现在我们必须对这两个集团的观点作一番考察。

韦克菲尔德和系统化开拓殖民地

韦克菲尔德所关心的主要是他在英国社会看到的贫困和不满。他相信，开拓殖民地能成为减轻这些压力的一种手段，但只有按照他所设想的体系行事才行。这样，英国社会便能够从动乱中得救，而各殖民地亦可按照类似英国社会的方向
44 发展起来——并不是发展成为新社会，而是发展成为“一个旧社会的一些扩展部分”。对于居住在

可供移民定居的地区的任何土著民族，韦克菲尔德只给予次要的考虑。虽然韦克菲尔德在某些方面具有进步思想，但他的观点基本上是保守的。他的计划构成了完整的一套。他希望保存英国现有的社会形式，而在这种社会形式中，许多人只有为地主和资本家做工才能过活。为了确保这一点，他设想各殖民地也应遵循同样的社会型式。否则，他担心各殖民地会变成"贫穷的、愚昧的和民主化的"，因而就不能服务于他为之设想的目的。

韦克菲尔德看到，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这些现有的殖民地，事情已沿着其它方向走得很远，要实现他的想法已没有很多机会。他于是希望南澳大利亚这个移民区能成为实现他的计划的地方。但是，负责执行这项计划的机构——南澳大利亚协会，采取了一些为韦克菲尔德所强烈反对的步骤，使他不得不否认整个计划同他自己有关。在新西兰，难以归类的欧洲居民日益增多，引起人们对这些岛屿的注意，韦克菲尔德于是认为这些岛屿是进行他的试验的极好场所，因此，他协助引导更多的英国移民前往新西兰，否则，英国向新西兰移民的情况也许不会是这样的。

但是，还是让韦克菲尔德自己告诉我们关于他的系统化开拓殖民地这个伟大计划吧。他在其1849年出版的《开拓殖民地的艺术》一书中曾全面阐述了他的系统化开拓殖民地的计划，但他的大部分思想早在二十年前已在他的《悉尼来信》（这些信件实际上是他在纽盖特监狱中写成的）中作了概述。与此同时，他还忙于进行组织工作。在1838年，韦克菲尔德也曾为德拉姆勋爵效劳，当时他在加拿大草拟著名的《德拉姆报告书》——这份报告书建议采取一项重大措施，给予各殖民地实
45 行自治。报告书的一些部分诚然要相当大地归功于韦克菲尔德和他的朋友查尔斯·布勒爵士。

韦克菲尔德对英国"不能使所有阶级各得其所"，印象深刻。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各阶级缺乏按照各自的生活水平谋求一种舒适生活的手段，而这显然是由每一个阶级的各成员之间互相竞争所引起的"。换言之，劳动力过剩了，因而在工人阶级中造成失业和低工资现象。但正如韦克菲尔德所说，这种现象乃是"司空见惯"的老问题。使韦克菲尔德的印象更为深刻的是雇主阶级之间的互相竞争。这是新的现象。资本不能找到有利

可图的投资场所，上层阶级的成员们感到他们的地位不牢靠。

工人阶级对他们的“司空见惯”的地位日益不满。韦克菲尔德说，“这个国家的普及教育”（教育仍然是很贫乏的），“其当前的结果是产生了宪章运动①和社会主义”。他从工人阶级反对限制选举权和反对私有财产的斗争中看到“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极大的危险”。让这种不满消除在海外吧。“很值得一试的是，开拓殖民地，或者采取任何能减少工人阶级相互之间的竞争的办法，因为这种竞争是他们政治上的不满的原因”。

但是，为了减轻上层阶级之间的相互竞争，必须把各殖民地设计得既能吸引可供投资的资本，又能吸引一些拥有资本进行投资的人。韦克菲尔德认为，出售土地的方法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以前的各殖民地，政府采取的办法实际上常常是把土地无偿分配掉或以很低廉的价格把土地出卖掉。韦克菲尔德争辩说，既然任何人只要愿意的话就能够得到土地归自己所有，那就没有人为别

① 指1837年至1848年间的英国宪章运动。——译者

46 人劳动了，这就使各殖民地不能吸引“不喜欢用自己的双手去劳动”而“喜欢用自己的头脑去指挥别人的劳动”的资本家。而且，当每个人都能够获得土地（有时能够获得大面积的土地）时，移民区就会呈现出一种分散状态。这种分散状态，加上缺少一个劳动阶级，就产生一种简陋的、不文明的生活形式，对英国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也没有吸引力。

如果各殖民地要达到韦克菲尔德为之设想的目的，即援救英国的经济情况并提供一个安全阀①，那就必须提供一批不能立即获得土地而又必须为别人劳动的劳动者，同时还必须防止移民们过快地散居于广大的地区。韦克菲尔德相信，如果当局以“足够的”和“统一的”价格出售土地，这一点就能够得到保证。土地的价格必须高到需要买主拥有一定的资金。在某一个地区内，所有的土地，每英亩都应按同等的价格出售，这样，最好的土地就会最先被买去；只有随着这些已被购用的土地经过改良和建立起移民区而使其价值上升时，其

① 安全阀是指锅炉等的压力过大时减低压力的活门，这里喻开拓殖民地是解救英国的经济困境的出路。——译者

它较贫瘠的和较偏僻的土地才会逐渐地被认为是值得购买的。韦克菲尔德申辩说，这样，就可以防止移民区呈现分散状态，而城市中心就会形成起来，正象英国的城镇是位于分布较广的农业土地的当中一般。工资收入将要比英国本土高，加上劳动者劳动几年以后就有可能购买土地的前景，这就使各殖民地对劳动者们具有吸引力。

韦克菲尔德说，从出售土地得来的款项，就是“抛入大海里”，也没有什么不正当，因为“是出售土地而不是分送土地，其唯一目的是……为了防止劳动者过早地变成地主”。但既有款项，就可以把它用于几个目的上。其中主要的一项是资助由英国精选出来的男女新移民。这些新移民可以补 47
充劳动力的供应，因为有些早期到来的劳动者已有足够的积蓄来购买土地。有些地款可以象在本国那样，捐献给教育和宗教事业作为基金。

韦克菲尔德认为，如此产生的这一类殖民地，应该给予相当多的自治权。在他坚持的一些限制中，有一点是由本国政府控制那会影响公共土地的出售的立法。这样，就可以预防移民们只把土地看作是他们的切身利害事情，而不把它看作是

为了本国的后代而给他们的托付。安全阀必须敞开。此外，韦克菲尔德对于那些似乎自然地在殖民地土壤上孳长起来的先进的民主思想是没有什么同情的。他认为殖民地政府的形式应该是“代议制的、贵族政治的和君主政体的”。要取得选举权，必须具备财产资格，但这种资格必须低到足以包括“工人阶级中比较稳健的和比较明智的那一部分人”。上议院应该是世袭的，它的议员要具备很高的财产资格。

我们可以看出，韦克菲尔德要求保存现有的社会形式。要做到这一点，不仅必须扫除这个社会给工人阶级带来的一些苦难，而且必须向资本家敞开各种机会。韦克菲尔德设想的系统化开拓殖民地，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他说，“宗主国与殖民地将会在新的贸易中结成伙伴。——这将创造人类的幸福”；他又说：“殖民地将是一个广阔的养育所，并且，在所有的人都处于安逸自在的情况下，它将提供比过去所曾有过的更美好的机会，以便通过真正地教育平民这一途径而使他们尝试为
48 社会做些工作。”他是从英国上层阶级和中产阶级的立场来看待各种事情的。在这些限度以内，他

是胸怀宽大的。

在开拓殖民地上，还要考虑另一个因素，即对有关地区的土著民族的处置问题。韦克菲尔德对他们的安排是怎样设想的呢？他没有象人们有时所认为的那样完全地忽视毛利族的利益，但是明显的是，他的目的是通过将英国原有的社会扩展到新的地区去的办法，使它保存下来，因而他使毛利族的利益从属于他的这个目的。1840 年，他在英国下议院新西兰问题委员会作证时声称，新西兰公司对土著民族十分担忧，并十分重视这个问题。这个公司的结论（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韦克菲尔德的结论）是保留一些土地（相当于新西兰公司拥有的土地的十分之一），捐赠给毛利族各家族的首领——毛利族的贵族。在韦克菲尔德看来，这份捐赠的土地，并不是实际上付给毛利族人的土地的款额，而是"土地的真正购买金"，因为这份土地经过建立欧洲移民区和花钱开发的结果，"在极短的时间内"将获得"比以前毛利族人拥有的全部土地的价值为高的价值"。土著贵族"拥有财产，从而与英国移民中比较富有的阶级享有平等的地位，他们将能保存劣等的土著居民（即劳动

阶级)，使之免于灭绝。”

这就是韦克菲尔德对待毛利族人的思想。同当时许多关于对待土著民族的思想相比，韦克菲尔德的思想既不是较愚蠢的，也不是较不仁慈的。韦克菲尔德说，“如果新西兰的劣等种族在同文明人的接触中有任何可能被保存下来的话”，那么，他的办法就是唯一可行的办法。这里他明晰地表明：他把对欧洲移民区的期望放在第一位，而把对毛利族人的考虑放在第二位。韦克菲尔德对待毛利族人的计划“能否取得成功，这是一个只有由经
49 验才能加以解答的问题”。如果毛利族人衰落下
去——那么，他们就得衰落下去。

传教士的态度

韦克菲尔德把新西兰看作是“世界上最适宜于开拓殖民地的地方”，可是传教士们和各教会团体都把它看成是供他们进行旨在使毛利族人改变信仰和得到开化的试验的理想场所。象在其它地方一样，缺乏高尚动机的欧洲人在新西兰的存在，会妨碍这种改变信仰和开化的进程，并且会导致土著居民的生活的败坏而不会导致他们的生活的

进步。传教士们和各教会团体认为，在传教士们的影响下，土著民族能够组织起来，成为可以在平等的基础上同欧洲国家交往的独立国家。所以，他们最初既反对英国政府确立对土著民族的控制，同时也反对在新西兰开拓殖民地。

他们的思想往往是错误的，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人们的生活是多么深深地植根于他们过去的历史；他们的思想也是狭隘的，因为他们认为在他们时代的英国社会已概括了人类的文明。但没有人能够否认他们的思想是一种崇高的理想。他们设法把土著民族的利益置于那些入侵的、轻率粗鲁的、唯利是图的欧洲人的利益之上，并且他们用以实现他们的理想的力量确实有助于使土著民族得到较多的照顾。

1837 年，教会传道会的一个委员会曾发表声明，反对韦克菲尔德的计划。它宣称，"普遍的经验已指出，在未开化的部落聚居的地方开拓殖民地，必导致把种种最大的错误和种种最严重的损害加诸土著居民。……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尤其要反对这项开拓殖民地的计划。因为开拓殖民地具有一种不可避免的倾向，……即对于新西兰土

50 著居民实行宗教改善和开化的各种措施，倘若不会使之归于失败，也会发生干扰作用，而目前通过传教士的努力，这些措施的实行已得到顺利的进展。”教会传道会秘书丹德森·科茨于1840年在英国下议院新西兰问题委员会作证，提到“由缺德的英国国民在新西兰定居而在这个岛屿上引起的种种骚乱”时曾指出，教会传道会曾敦促英国政府“在不干涉土著居民的主权的情况下”施加其影响，平定这些骚乱，“并逐步地把新西兰的地位提高到一种使其能够维护其自身的独立的地位”。然而，他们觉得，如今事情已走得那么远，英国政府必须把统治新西兰的全部职责接管过来，“以便尽量保障土著居民的利益”。J·比彻姆牧师代表卫理公会发表了类似的看法：“如果能够完全地防止开拓殖民地的话，那就更符合我们传道会所持的观点……我们对于开拓殖民地，绝不满意”，但是，既然事情是那么样，我们只好同意建立英国宗主权是“两个祸害中较小的一个”。

这样，我们可以看到，有两股强烈地相反的力量都企图左右英国政府的政策和新西兰事态的进展。一派所关心的主要是以移民作为医治英国国

内弊端的处方，但它也愿意考虑毛利族人的利益，如果他们的利益能够和这个主要的目的相一致的话。另一派所关心的主要是毛利族人的福利与发展，并且也准备容忍实行移民，只要它不威胁毛利族的利益。

中间观点 51

在上述两股强烈地相反的力量之间，还有一派持中间观点。这种观点是人道主义的，1835 年创立的“土著居民保护协会”曾表达过这种观点。从英国下议院土著居民问题委员会 1837 年 6 月 26 日的报告中可以看到这种观点的影响。这一派承认过去欧洲人同土著民族的接触曾留下种种祸害。这对成功地开拓殖民地曾是一种障碍，曾引起战争，“并且这还把土著居民从我们管辖的范围内赶走或把土著居民消灭掉，而这些土著居民也许是有益的劳动者、良好的顾客和友好的邻居。”这一派还认为，对于土著居民的领土和权利原应从高尚的动机出发，加以尊重，而侵占土著居民的领土或漠视土著居民的权利是不符合英国的国家利益的。决不应默许压迫，并且弱者和无知

者都应该受到保护。

但这一派还有一种看法，即"为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的过多的人口寻找出路，乃是国家的需要。"这一派不象传教士那样反对开拓殖民地。他们采取和韦克菲尔德相同的立场，即鼓励向国外移民，乃是一项"慈善的和值得赞许的事情"。但他们与韦克菲尔德和传教士又有不同之处，即他们深信土著居民的利益和由欧洲人进行的开拓殖民地是能够调和一致的。他们认为，过去种种错误的发生，原因有三：一是无知；二是同那些不负责任的欧洲冒险家相隔太远，对他们的控制有困难；三是政策不明确和摇摆不定。为了纠正这些错误，英国下议院土著居民问题委员会建议采取一系列措施，其中的一些对新西兰后来发生的事件有关系，所以特别引人注目。一个殖民地的总督对于保护
52 土著居民应该负有完全的责任，因为殖民地开拓者们的利益大致对当地的被任命的立法机关有影响，他们实际上是争端的当事人，所以不应裁决争端。土地不应由土著居民卖给在各殖民地或邻近地区的英国国民。应从出售土地所得的收入中为土著居民提供宗教传授、教育以及其它服务事

业的经费，因为土著居民的土地往往被夺走，他们一无所得，而这些土地现在对欧洲人却是有利可图的。传教士应受到鼓励，但要防止对皈依者的身体健康有害的突然转变——这是对待土著居民问题应采取比较科学的态度的一种早期预见。同土著居民签订条约，一般地是被认为不适宜的，因为条约的签订乃是“为争端作准备和为争端作辩解”——不论是好是歹，这是对签订威坦哲条约的一些后果所作出的一种精明的预见。

英国对新西兰的政策

虽然在政策上还存在着许多不明确之处和摇摆不定，英国政府所遵循的政策大体上是上述第三种政策。传教士和人道主义的影响，对一些处理殖民地事务的内阁大臣和殖民地事务部的主要常务官员起了很大的作用。当土著居民的利益和移民们的利益似有任何冲突时，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土著居民总是被假定为无辜，其利益总是得到照顾。偶然也出现趋于韦克菲尔德观点的偏向，即把土著居民的利益置于次要的地位，例如约翰·拉塞尔勋爵于1839年至1841年担任殖民地事务

大臣时，曾作过很有利于新西兰公司的安排。

58 讨论这些事情，是因为它们有助于了解新西兰的历史。这些事情可以归纳如下：经济的和社会的发展带来了欧洲人及其生活方式对毛利族人的日益增大的压力。英国政府不愿意对新西兰承担任何责任的态度之所以改变，主要是出于对毛利族福利的仁慈的考虑。英国的政策一般地是基于这种信念，即如果谨慎地加以处理的话，开拓殖民地和毛利族的利益是可以调和的。由于受到英国国内状况的驱迫，欧洲移民的压力日益增大，遂使这一政策越来越难以推行；而毛利族人则感到政府已抛弃了他们，于是起来采取其自己的措施，借以保护他们的已经受到威胁的发展事业。爆发战争、没收土地、总督终于代表英国政府把管理土著居民事务的权力移交给移民们自己成立的政府：这一切都标志着善意政策的失败。

第七章　英国的行动 54

勉强的态度

我们现在可以进而叙述一些事件。这些事件将会揭露前一章所描述的几种力量如何塑造早期新西兰的历史。上面已经提到，新南威尔士总督麦夸里曾在传教士肯德尔离开悉尼赴新西兰之前任命他为治安推事，因而肯德尔在管理英国罪犯方面可以有某种权力。其后的一个步骤是在1832年任命悉尼的詹姆斯·巴斯比为英国在新西兰的驻扎官，薪俸为五百镑，外加二百镑作为赠给毛利族人的礼物之用。这是北奥克兰各酋长在克里克里举行的一次会议中，在传教士的指导下起草的一份要求“英国元首、尊贵的威廉王”给予保护的请愿书所取得的结果。

1827年，法国军舰“阿斯特罗拉贝号”在杜尔维尔的指挥下，访问了新西兰，并测绘了新西兰的部分海岸。这件事引起了英国传教士们的恐慌，

他们担心法国政府立意支持德蒂埃里的土地要求。德蒂埃里是一个在英国受教育的混血种法国人，一个冒险家。他声称他已在新西兰购有大面积的土地。另外，在1831年还有一些关于德蒂埃里的计划的谣传。这些情况导致上述请愿书的提出和巴斯比的被任命为英国在新西兰的驻扎官。

任命在新西兰的驻扎官，表面上是仿效以前
55 东印度公司曾委派驻扎官作为他们在印度各王子的宫廷的代表。但两者之间没有什么真正的相似之处。毛利族人没有组成在一个酋长的控制下的强大到足以迫使一切毛利族人顺从的政府。巴斯比本人曾经向英国政府报告说，当马斯登建议毛利族人自己立毛利族王时，他们“一致回答说，永远不会有一个独立的部落的酋长承认另一个酋长的权力，除非他及其部落首先被降服为奴隶”。巴斯比作为一大批各自独立的、互相猜疑的和彼此敌对的酋长的顾问，其地位是十分无希望的。

巴斯比没有被授予执行他作出的各种决定的权力和手段。给予他的唯一证明文件是采取致“新西兰各酋长”的信件的形式。他的主要任务是“抚慰各酋长，以赢得他们的善意”。此外，他还被

告知："把你的各种措施建立在你将取得的对各土著酋长的影响的基础上"。他的地位可以恰如其分地概括为"不带枪炮的军舰"。

巴斯比向毛利族人赠送一面旗帜，并向他们表明他的身份是相当于驻在一个独立国家的领事。可是在1835年10月，德蒂埃里再次出现，这使巴斯比采取了其官场生涯中的一次最重要的行动。德蒂埃里从马克萨斯群岛发表了一个公告，称他自己为"努库希瓦王和新西兰君主"。巴斯比召集了尽可能多的酋长，并说服他们发表独立宣言，以表示强硬的抗议。此外，他还说服三十五名酋长在他起草的一部宪法上签字。这部宪法为以后二十一年对新西兰的统治提供了一个精心设
计的议会制度。但是这部宪法从未能付诸实施， 56
巴斯比的顶头上司新南威尔士总督称它是"一项糊涂的、未经核准的法令，是一颗射向巴隆·德蒂埃里的纸制子弹"。

德蒂埃里这个冒险家不久之后到达新西兰；可是，毛利族人只给了他三百英亩的土地，而不是给他所要求的四万英亩。他的钱很快就花光了，后来沦落为一个穷光蛋，和一群不伦不类的人混在

一起。那时这些人都被集中在科罗腊雷卡。

兼并的序曲

在1835年的事件以后，可以明显地看出，英国在新西兰的宗主权的建立不可能长期拖延下去了。截至1838年，科罗腊雷卡的人口已达一千人，也有大约数目相等的白种人分布在库克海峡的各移民区。这些捕鲸站显出它们有成为永久移民区的种种迹象。一些有办企业心的先驱者已开始在从毛利族人买来的土地上进行投资。在新西兰，农业的开始溯源于教会在群岛湾经营的事业；但是商业性的农业却是在1840年建立新西兰的固定移民区之前几年才开始的。1839年，装运到霍巴特的一些羊毛被描述为在各新殖民地所曾生产出来的最好的羊毛。

英国兼并新西兰和在新西兰建立移民区的前景，在1838年和1839年掀起了一阵土地投机买卖风。被称为"陆上鲨鱼①"的那些家伙，以微小

① "陆上鲨鱼"(Land－sharks)通常指专门敲诈上岸水手的码头骗子，这里喻以诈骗手段进行土地投机买卖的骗子。——译者

的代价从毛利族人那里购买或骗说要购买大面积的土地。悉尼的一个以查尔斯·温特沃思为首的小型辛迪加，自称已从来访的酋长们那里把整个南岛的土地都买下了。

与此同时，科罗腊雷卡的居民自己组织了一 57
个保安协会，以维持镇内秩序。科罗腊雷卡保安协会所采取的制裁方法是粗糙的和简便的，但无疑是有效的。一个旧的船舱就可权当一间紧闭的牢房；至少有一次，一个犯罪者浑身被涂满柏油并黏上“羽毛”(这种“羽毛”是用劳波花做成的)。

担心法国兼并新西兰似乎又一次在新西兰引起了一些震动。1838 年，罗马天主教蓬帕利埃主教到达群岛湾，英国传教士们便怀疑法国图谋在新西兰开拓殖民地。同年，一支法国捕鲸船队乘渔汛期来到班克斯半岛，同时法国克尔维特式轻巡航舰“女英雄号”也出航，目的在于照料捕鲸区的法国利益和测绘海岸线。一个捕鲸船队的主人朗格卢瓦船长以一千法郎向毛利族人购买了班克斯半岛。在他回到法国以后，法国政府于 1839 年 12月对一个计划在新西兰建立移民区的小型企业“南托-博尔德莱公司”给予了一些支持；但是，法

国政府并没有表现出有兼并领土的意图。并且英国的移民们和行政官员们的注意力主要地是集中在群岛湾，而对法国在南岛的各捕鲸站的活动并未予以多大重视。

尽管如此，在短短几年内出现的所有这些运动，都使英国兼并新西兰一事成为几乎不可避免的事情。甚至传教士们也接受了这种思想，而马斯登在1838年去世以前和亨利·威廉斯也都同意这样的看法，即这样的一个步骤是符合毛利族人的最大利益的。英国政府决定采取行动，但是这种行动的时间和性质却受到一种意外的事态发展的影响。1839年，韦克菲尔德和他的新西兰公司
58 擅作主张，没有等到英国政府的批准就派遣了一支远征队前往新西兰。

新西兰公司

早在1825年，新西兰公司就已成立。那年它派遣了一支远征队前往群岛湾去建立一个供进行贸易活动的移民区。这个公司的许多发起人后来都成为韦克菲尔德的主要支持者；但是，1826年和1827年建立一个由一批商人组成的移民区的

尝试失败了。在1826年初，由赫德船长指挥的一艘船抵达豪拉基湾。他们为购买土地的问题同毛利族人进行了谈判；但是经过许多个月的拖延以后，这个远征队便转往霍基昂加。那里的毛利族人为他们表演了哈卡舞以示欢迎，但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似乎都被这种舞蹈吓跑了。这个远征队实际上获得的成果仅是一彩人数不多的木工在霍基昂加定居下来。后来这些木工在那里建造了一些船只。

然而，在1829年，韦克菲尔德写了其著名的《悉尼来信》，在其中他概述了他的有组织的开拓殖民地的计划。次年，他创立了“殖民地开拓协会”，开始积极地致力于把他的思想付诸实施。在关于在南澳大利亚开拓殖民地的计划采取了他所不赞同的形式以后，他便明确地将注意力转向新西兰。

韦克菲尔德于1837年创立“新西兰协会”。这个协会是由下面的一些人组成的：一些家族的首领和其他一些决心在拟议中的殖民地定居的人；一些关心这项计划的社会人士。这个协会的控制权完全地为一个由有声望的社会人士组成的委员

会所掌握，其中最杰出的是德拉姆勋爵。

韦克菲尔德通过散发小册子、个人访问、游说等途径以及采取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的任何其
59 它办法而积极地投入工作，以期获得英国政府批准在新西兰建立殖民地，并且如果可能的话，争取英国政府对在新西兰建立殖民地一事给予协助。但在韦克菲尔德的征途上存在着很多障碍。正如我们所已看到的，虽然传教士们现在已同意建立英国对新西兰的宗主权，但他们并不喜欢韦克菲尔德的建立大规模移民区的规划；并且他们对英国政府是有施加影响的力量的。此外，韦克菲尔德的经历和他所采取的方法都不免令人有所怀疑。但韦克菲尔德仍然坚持他的计划。

为了回答一种认为“新西兰协会”没有财政支持的反对意见，韦克菲尔德把这个协会改组成为一个联合股份公司，即新西兰公司，然而当他完成了这项改组工作时，英国政府却拒绝承担任何帮助新西兰公司的义务。于是他决定自行负责行事。新西兰公司创立了，其资金是十万镑，另外它还有与这个数目大约相等的资金是从出卖土地给那些打算前往新西兰的移民筹集的，虽然新西兰

公司实际上还没有从毛利族人那里购买过任何土地。1839年5月，在经历一些激动之后，“托里号”船奉命匆匆地出航，因为据认为英国政府可能在最后时刻阻止它离港。“托里号”船载着以韦克菲尔德的兄弟威廉·韦克菲尔德为首的远征先遣队前往新西兰，以便在那里购买土地，并为来年迎接移民们的工作做好准备。

霍布森海军上校的使命

英国政府已经打算有限地获取领土。“托里号”船的出航使英国政府作出了明确的决定，并且发出警告说，对土地的要求，“如果出现有欺诈或过分的情况”，是不会得到政府承认的。英国政府还立即发布一个公告，把新南威尔士的边界加以扩展，尽量将英王的代理人从毛利族人那里可能取得的新西兰土地包括进去。因此，英国政府正式地承认了毛利族人的独立。海军上校威廉·霍 60
布森被委任为英国驻新西兰领事，并受命直接地从悉尼前往那里就职。

霍布森于1840年1月18日离开悉尼，1月29日到达群岛湾。在这以前一个星期，载运新西兰

公司所组织的移民的船只已经到达惠灵顿港——这是以后出现争吵不休的岁月的序曲。新西兰公司和它所组织的移民之间也有摩擦。但他们双方都批评英国政府及其在新西兰的代表。

霍布森接到了英国政府阐明其动机的指示。指示说，英国在新西兰谋求宗主权的决定，是在极端勉强的情况下作出的；因为英国“采取的这一措施对于一个人数众多、不触犯别人的民族（这个民族享有的对新西兰土地的所有权和新西兰的主权是无可争辩的）是极不公正的，并且必定给他们带来灾难，”而由这一措施给英国所造成的危害决不是由这一措施所给予英国的财富和权力上的任何增加所能最充分地补偿的。不过，在这些情况下，英国政府认为，如果毛利族人自愿地把他们的主权移交给英国，他们的利益是会得到最好的照顾的。英国政府采纳这样一种观点，即英国的移民将会增加，但着重保护土著居民的利益。政府要审查欧洲人现有的土地要求，而在将来，毛利族人的土地只能卖给政府。不过，英国政府指示未来的总督不要购买“毛利族人的任何领土，而由毛利族人保留自己的领土，对他们的舒适、安全或生计

是必不可少的或是非常有帮助的”。要促进毛利族人的文明，创办学校的问题已被提出来，但在他们被培养到能够采用文明的生活方式之前，“他们 61
在遵守他们自己的各种风俗上，必须受到细心的保护，只要这些风俗同人性和道德的普遍准则是一致的”。

在向欧洲人出售土地时，霍布森必须遵守“那个已经被经验证明是明智的土地出售制度”——这个制度部分地体现了韦克菲尔德的思想，并且有意防止移民们取得大量的土地而任其荒芜。人们赞成这样的办法，即政府从毛利族人那里买到的土地，以比原来付给毛利族人高得多的价格转售出去。他们争辩说，很多土地对毛利族人来说都是没有实际用处的，其交换价值也不大；而另一方面，由于逐渐地分享从资金和移民的输入所得到的利益，毛利族人将会得到好处。出售土地所得的收入可供政府进一步购买土地之用，可用来进行测量、修筑公路及其它类似的建设事项，也可用来解决“地方政府必不可少的紧急需要”，而其余的款项则可用于接收来自英国的移民的工作上。英国政府还告诫霍布森，“在公共资源的开支

上要特别注意节约”。所有上述各点在英国政府行将对之承担责任的新西兰的后来的历史都具有某种重要性。

威坦哲条约和英国宗主权

霍布森到达新西兰时即发布公告，宣称他开始履行其代理总督的职权（虽然到那时为止他实际上还没有什么可管辖的），并警告欧洲人说，他们的土地要求在未经审核和批准之前，不能视为有效的。他然后于 2 月 5 日在威坦哲的巴斯比住处前面的大帐蓬内召开了一次有欧洲人和许多毛
62 利族人出席的大会，讨论毛利族人接受英国女王的统治权和保护的条约草案。这项威坦哲条约有一篇阐明英国政府的善意的序言和三条简短的条款。这些条款规定，毛利族酋长们把他们各自的领土主权让给英国女王维多利亚，保证新西兰各部落和酋长们所拥有的土地、森林、渔场及其它财产不受侵犯，并附有一个条件，即如果他们愿意出售土地的话，只能售给英国女王——即英国政府；许诺毛利族人可以得到英国女王的保护，并可以享有“英国国民所享有的一切权利和特权”。

几个毛利族领袖在会上发言，强烈地反对这项条约，因此，人们曾一度对霍布森是否能顺利地完成他的使命表示很大的怀疑。这些毛利族领袖大声疾呼："不要签署这项条约。如果你们签字的话，你们必沦为奴隶，必被迫去在公路上敲碎石子。你们的土地必被夺去，你们作为酋长的尊严必被破坏无遗。""我们不愿任人捆缚和践踏。我们是自由的。让传教士们留下，至于你，回到你自己的国家去吧。……我，甚至我——卡威蒂，也不能因为总督说了个'不'字，不能因为总督、他的士兵和他的枪炮，就可以任人随意摆布。""你能够矫正白种人在销售上、交易上的邪恶吗？你能够矫正他们的欺诈、说谎和盗窃吗？……如果他们确实听话和服从，那么，好啊，但是他们可曾听从巴斯比？他们会听从你这个最近到来的陌生人吗？""我们不要总督。回去，回去，离开我们吧。传教士们和巴斯比都是我们的父亲。我们不需要你，滚回去，回去，滚开。"

这些都是用激烈的措词和手势表现出来的恐
惧。另一方面，有一些毛利族人竭力主张总督要 63
成为毛利族人的保护者，使他们免受其他白人所

干的坏事的祸害，而这种祸害临头时，毛利族人是无法保护自己的。塔马提·瓦卡·内内就是这样争辩的。欧洲人和他们的生活方式就在眼前——他们的马铃薯、毛毡、枪支。土地已失去了，到处都是毛利族人管不着的陌生人。“你们说什么？让总督回去？我厌恶极了，我完旦了，你们害了我！从前，当那些商人和烈酒贩到来时，如果你们就这样讲，如果你们把他们赶走，那么，你们完全可以对总督说，‘回去吧’——这时候，我们大家都会异口同声地说，‘对啦’。但现在的情况不同了，不行，不行，不行。白种人到来以前，我们做过些什么呢？我们厮杀，不停地厮杀。但是现在，我们能够耕种我们的土地，白种人将同我们做大量的生意。让我们留下他们吧。让我们大家都成为朋友吧。”最后，他对霍布森说出下面的话来结束他的发言：“请你别离开我们；留下来做我们的父亲、裁判人、调解人吧。你决不要让我们成为奴隶。你要保存我们的风俗，千万不要让别人夺走我们的土地。……那么，留下吧，我们的朋友，我们的父亲，我们的总督。”

当我们研究毛利族人所经历的同白种人及其

政府的关系的后来史实时，我们应记住他们所表现的这些希望和恐惧。

大会休会，以便毛利族人在其下定决心之前能有时间进行思考和讨论。第二天下午，北奥克兰各部落的四十五名酋长（包括前一天表示反对条约的酋长在内）都签署了条约。条约被制成复本，传送到整个新西兰，使其他酋长都能签署。总的来说，霍布森的使命是成功的。1840年5月21日，当霍布森取得四百多名酋长的签署时，他便宣告英国 64
宗主权已在新西兰的北岛和南岛确立起来。在北岛，确立英国宗主权的根据是毛利族人割让土地，而在毛利族人稀少的南岛，这种根据是白种人发现该岛。到8月，已有五百名以上的酋长签署条约，但不包括下列大酋长：怀卡托的特·韦罗韦罗酋长；在怀卡托之东的恩加蒂豪阿的特·瓦哈罗阿酋长；陶波地区的特·赫赫酋长及罗托鲁瓦和陶朗加的酋长们。占领仪式分别于6月5日和6月17日在斯图尔特岛和在南岛的马尔巴勒海峡的多云湾举行。为了预防法国出于在阿卡罗阿开拓殖民地的冒险行动而可能把该地宣布为法国所有，8月11日在该地升起了英国国旗，并举行了一次宣布行使主权的大会。

65 第八章　困难的年代

——1840年至1846年

早期历届总督的难题

霍布森总督和他的继任者们认为，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和毛利族人建立良好的关系，并注意保护毛利族人的利益。总督们对欧洲移民区并不怀有敌意，但他们却以极大的疑虑来看待新西兰公司及其在库克海峡两边的活动。新西兰公司及其在新西兰的代表们，则对英国政府的毫无同情的态度感到恼怒，并担心英国在新西兰确立宗主权，将破坏他们的庞大的计划。他们对威坦哲条约以及对未经政府审查不许他们占有土地的法令感到气愤。当霍布森决定在位于毛利族居民的两个主要地区之间的怀特马塔建立首府，而不在新西兰公司正在设立移民区的库克海峡建立首府时，他们也表示忿怒。当他们拟在惠灵顿设立类似政府的机构来处理他们的地方事务，而霍布森却生硬

地加以干涉，称他们的行动是“叛逆行为”时，他们发怒了，那也不是不自然的事情。当霍布森在奥克兰向木匠和其他技工提供高工资，诱去了（用他们的话来说，“拐走了”）较富裕的移民带来的工人时，他们也感到恼怒。

新西兰公司所属各移民区和总督之间的这种 66
相互猜忌的气氛持续了许多年之久。各移民区也有其自身的种种困难。有很多事情都是仓卒从事，操之过急。新西兰公司在新西兰连一英亩土地的有效所有权也没有确立之前，就在英国以每一百英亩的农村土地和每一英亩的城镇地段、售价为一百镑而出售土地。拥有这种土地所有权的移民们在土地未经测量之前就已来到新西兰。新西兰公司曾对工人们作出诺言：如果他们不能在新西兰找到受雇于私人的机会，公司将给予帮助。这些工人也是在土地未经测量之前就已到达新西兰。且莫说土地委员会的委员们耽误了土地的调查工作，新西兰公司和毛利族人在土地交易上，工作进行得如此匆促，又如此不注意土地的边界，以致当毛利族人了解到他们所出售的土地的范围时，他们是否会真正地把新西兰公司所要求的土地交给

它，还是有疑问的。因此，新西兰公司在惠灵顿、新普利默斯和纳尔逊首先建立的各移民区的移民们和工人们感到很大的不满，那也是自然的事情。

总督对毛利族人也感到棘手。毛利族人盼望总督能遏制欧洲人在与他们接触中所发生的罪恶行为，并能增加一些他们认为是有利益可得的事情，例如贸易。另外一些毛利族人则认为，凡属他们自己的事务，应由他们自行管理。要满足这些愿望是困难的（霍布森的健康的衰退，也使他的工作更不易进行），或者要使毛利族人遵守条约，承认英国的宗主权和英国对他们的保护，同样也是困难的。事实上，对于所有涉及的问题，毛利族人的认识究竟有多深，是令人怀疑的。

霍布森和他的继任者菲茨罗伊以及在他们两人之间补缺的肖特兰德，都缺乏资金和维护他们的职权的实力。和几千个欧洲人相比较，毛利族人
67 占压倒的多数，估计他们的人数在八万至十万之间，其中约有二万人是住在奥克兰半岛。毛利族人有武装，忠于骄傲的和易怒的酋长们。霍布森在新西兰登陆时，只有四名骑警伴随，并且有一些时

间，他所能指挥的正规部队不超过一百人。结果，早期的总督们只要想到某些做法会伤害毛利族的感情，他们便不敢断然行使其职权。总督们所处的地位与被称为“不带枪炮的军舰”的巴斯比不尽相同，但他们颇象一艘武装拖网渔船面对着一艘主力舰。在科罗腊雷卡，每逢发生任何纠纷时，地方行政官和他的警察一般地都是避而远之。因此，历任总督都倾向于对毛利族人采取绥靖政策，而这种政策却助长了一些毛利族人更加咄咄逼人。

总督们的上述态度进一步引起了新西兰公司所属的移民们的反抗，后者已准备组织起来，以维护他们的要求。1843 年，当强有力的特·劳帕腊哈和他的支持者特·朗吉海阿塔把新西兰公司的测量员从该公司所称的已在怀劳山谷购得的土地上赶走时，纳尔逊和惠灵顿两地的移民就组成了一支临时警察队，并试图逮捕特·劳帕腊哈。结果发生了战斗，二十二名欧洲人被杀死，其中大多数是被俘后受害的。这次纠纷大都可归因于欧洲人对毛利族的态度缺乏了解。

这个事件自然使人们震动很大和害怕爆发公开的战争。在一些时间内，在未来的移民的心目

中，这个事件也给新西兰带来了恶劣的名声。新西兰公司所属的移民们指望政府对特·劳帕腊哈采取激烈的行动。如果政府这样做，几乎可以肯定会导致毛利族人对各欧洲移民区发动攻击，而政府对此是无法抵御的。况且，在危机发生期间
68 到达新西兰的菲茨罗伊总督和他的顾问们，都认为这次事件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欧洲人。菲茨罗伊没有进军攻击特·劳帕腊哈，却到南方去责备移民们；然后，出乎毛利族人的意料之外，他还在怀卡纳埃会见了特·劳帕腊哈。在会见时，他虽然责备特·劳帕腊哈杀害了俘虏，但再次向他作了保证，以消除其顾虑。菲茨罗伊在其给英国政府的报告中沉痛地陈述了自己的看法，认为他的同胞们“毫无必要地违反了英国法律的规定、慎重行事的准则和公正的原则”。

在新西兰公司所属各移民区附近一带，白种人和毛利族人的紧张关系郁积了好几年。人们认为特·劳帕腊哈和特·朗吉海阿塔又在策划更大的事件。1846 年 6 月，一队毛利族人终于向设在惠灵顿地区周围的前哨站发动了进攻，但没有取得成功。在 1845 年年底到达新西兰的乔治·格

雷总督，勇敢地迎击毛利族人，在波里鲁阿登陆，并活捉了特·劳帕腊哈。虽然这一行动或许是非法的，因为乔治·格雷也承认，对特·劳帕腊哈的阴谋活动的指控在法庭上是站不住脚的，但它毕竟是成功的。特·劳帕腊哈这个老勇士似乎颇钦佩乔治·格雷的勇敢的策略，他在去世前的几年间与乔治·格雷结成了知交。

北部战争

乔治·格雷已着手处理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当时新西兰的北部是毛利族人口最多的地区，在威坦哲条约签订之前，它也是他们同欧洲人接触最多的地区，而他们的不满却日益增高，终于在1844年7月达到了顶点。在科罗腊雷卡升起英国国旗，乃是北部毛利族人已同意把主权让与英国政府的象征。是年7月，霍内·黑克把科罗腊雷卡的飘扬着英国国旗的旗杆砍下来。在嗣后的六个月中，霍内·黑克又两次砍掉旗杆。虽然菲茨罗伊作了一些让步，如取消在科罗腊雷卡的关
税等，但他仍坚持要竖起那刺目的旗杆。于是当 69
局筑起了碉堡，派遣了少量增援部队到北部来，同

时从悉尼召集其他增援部队前来北部。1845年3月，霍内·黑克攻打了竖立旗杆的小山，而他的同盟者卡威蒂则攻打科罗腊雷卡镇。旗杆再一次被砍下来，科罗腊雷卡镇受到洗劫和烧毁（传教士的财物除外）。科罗腊雷卡的守备部队和平民被赶到港口的船上。

这个第一次发生的严重冲突，其原因是什么呢？政府是那么软弱，以致它不能有所作为，不能使毛利族人对它抱有希望，也不能使他们对它产生畏惧。政府既保护不了那些要求其保护的毛利族人，也约束不了那些反抗它的毛利族人。政府濒临陷入被藐视的境地，而欧洲人（其中有些是美国人）推波助澜地加速了这个过程，因为他们的利益可能受到政府的活动的损害。在这些情况下，这个软弱的政权的象征，即旗杆上的英国国旗，便成了激怒象霍内·黑克这样一个野心勃勃的、暴烈强悍的酋长（他憎恨任何声称要统治他的人）的根源。

首府迁到奥克兰以后，贸易和人民也随之从群岛湾转到奥克兰。这样，毛利族人想通过和欧洲人增多来往而获得利益的希望，在威坦哲条约

签订以后看来是要减少了。此外，输入新西兰的货物，现在必须向政府缴纳相当多的关税，因而费用也比从前增多了。另一方面，毛利族酋长们再也不能向停泊在群岛湾的船只征收通行税了。

土地的出售问题也引起种种不满和抱怨。这些不满和抱怨不同于十年或十五年后毛利族人害怕他们不久会丢失太多的土地时所发生的不满和抱怨。在这个早期阶段，毛利族人是愿意出售土地的，甚至是迫切地要求出售土地的。首先，他们抱怨政府禁止他们直接地将他们想要出售的一些土地出售给欧洲人，而政府本身又不购买这些土
地。政府不购买这些土地主要是由于总督们可以 70
自由支配使用的资金不多。毛利族人因不能出售土地而抱怨，欧洲人因政府禁止他们购买土地而不满，在这两方面的压力下，菲茨罗伊于1844年决定准许欧洲人直接地向毛利族人购买土地，只要前者向政府交纳每英亩十先令的注册费。这又一次引起了毛利族人的不满和抱怨。毛利族人指出，政府以注册费这种形式所得到的款额大大地超过毛利族人出售土地的收入，而政府为毛利族人所做的事情却少得很。如果作为购买者的欧洲

人愿意付出那么多的钱，为什么作为出售者的毛利族人却不能分得较多的款额？因此，菲茨罗伊便将注册费降低至每英亩一辨士。毛利族人又发觉，在土地经由政府买进卖出的情况下，他们以很低的价格把土地卖给政府，而政府则以每英亩一镑或更高的价格转卖给欧洲人。由于缺乏其它方面的收入，而英国政府又强调节约，这就诱使总督们尽量从土地买卖中谋利；但是这就自然地使政府在机敏的毛利族人面前处于不利的地位。

此外，为审查1840年以前出售的土地而设立的土地委员会，其各种活动并不总是使毛利族人感到满意的。审查的手续是缓慢的，而事实上，酋长们大都对过去达成的土地交易感到十分满意。他们认为他们能够处理自己的事务，而把土地委员会看成是干涉他们的权限的机构。在土地的购买超过政府规定的最高限额二千五百六十英亩的情况下，政府不是把超过最高限额的土地退回给毛利族人，而是将它收归英国王室①所有。毛利族人认为这是不公正的。

① 这里指英国王室的土地（Crown land），亦即英国自治领和殖民地的公有土地。——译者

这些就是导致上述战争爆发的原因。菲茨罗伊几乎没有财力来源或军事力量来成功地解决这 71
次战争。乔治·格雷在这两方面的供应都比较充足，并且除此之外，他还有采取果断行动的能力。他在一些曾反对霍内·黑克的策略的毛利族部落的帮助下取得了战役的胜利，终于在1846年1月占领了鲁阿佩卡佩卡村寨。乔治·格雷没有采取报复行动，而解决北部冲突后，这个地区即一直保持着和平。象塔马提·瓦卡·内内这样的人所率领的毛利族队伍给予了政府巨大协助。他们深信政府一经被推翻，毛利族人面临日益增大而无法加以控制的欧洲人压力，必将遭受更严重的祸害。

土地、财政和政府

除了毛利族的问题外，早期的历届总督还有很多困难。这些困难的产生部分地是由新西兰公司提出的要求所引起的。这个公司声称它已在库克海峡两岸从毛利族人那里购得了土地二千万英亩（近乎新西兰总面积的三分之一）。当英国政府干预这件事情时，新西兰公司的上述土地要求即归无效，必须等到土地委员会给予审查和核准以

后才算有效。事情不久便明朗化，即除了政府拖延对土地的审核给这个公司带来麻烦以外，它的庞大的土地要求将不会得到政府的承认。与此同时，新西兰公司继续在英国出售新西兰的土地，并运送土地购买者和工人来到新西兰。除了在惠灵顿开辟的第一个移民区外，又迅速地在新普利默斯和纳尔逊两地增添了新的冒险事业。因此，新西兰公司和移民们都迫切地需要土地，而政府却不能恰当地把土地交给他们。

新西兰公司的一个代表暗示说，威坦哲条约不过是“安抚蛮子并取得其欢心的一种权宜之计而已”。他们对英国政府施加压力，要它接受这样
72 的观点，即在任何情况下，对毛利族人拥有其土地的保证，并不包括那些他们实际上并没有占据和使用的土地。要是按照这一种观点行事，不但会破坏信用，而且正如新西兰历任处于负责地位的总督所断定的那样，还会引起同毛利族人之间的战争，而他们的人数则是远远超过欧洲移民的。

从1839年9月至1841年9月担任殖民地事务大臣的约翰·拉塞尔勋爵，比他的前任者诺曼比勋爵或他的继任者斯坦利勋爵，都更为同情新

西兰公司。在 1840—1841 年，拉塞尔签署了一项协议，由政府颁发土地权特许状给新西兰公司，并且同意：新西兰公司在开拓殖民地过程中每花费一镑，就由政府给它土地四英亩。根据计算，新西兰公司所花费用约为二十五万镑，因此，政府允许给它土地一百万英亩，而不是给它所要求的二千万英亩。至于这些土地究竟是从土地委员会判决为该公司以法定手续购得的土地中取得，还是不管这一点，由政府拨给该公司，这个问题后来引起了很多争论。

1840年1月，约翰·拉塞尔勋爵还发布指示，规定土地由政府按统一的固定价格出售，并将所得的收入尽可能多地用来援助移民工作。这样，在目前，韦克菲尔德的思想实际上已变成了官方的政策。可是在霍布森接到这些指示之前，他已为在奥克兰第一次出售土地作了其它的安排。霍布森在新南威尔士总督吉普斯（在 1841 年 5 月新西兰成为一个单独的殖民地以前，他一直是霍布森的上司）的支持下以公开拍卖的方式出售了奥克兰第一批城镇地段。他和吉普斯两人都认为韦克菲尔德的以固定价格出售土地的办法已导致

土地的投机买卖。此外，由于霍布森知道他的政
73 府不能指望从英国获得很多的财政资助，所以他
迫切地想从出售土地筹集尽可能多的经费。

在一个方面，霍布森并没有失望。他按大致分成四分之一英亩的地段出售土地四十四英亩，共得款二万四千四百七十五镑——平均每英亩约六百镑，比伦敦附近的建筑地基价格还要高得多。但是，当时的观察家们断言，这些土地中有很多是被买去进行投机买卖的。这些土地被分割成为较小的地段，据说在短期内被转售出去，获利百分之二百到百分之三百。后来被出售的郊区地段和小块农用地段，据说也有同样情况。但是投机商的活动并不局限于奥克兰地区。新西兰公司所属惠灵顿移民区的城镇地基也被以高价转售出去。同样，在纳尔逊地区，大部分购买了地段的人都不迁入居住，却成为"在外地主"，而其他的人也设法垄断大量的土地。

这里要注意的是，英国议会于1842年通过了"澳大利亚荒地法"，这一法令也适用于新西兰。根据这一法令的规定，除了城镇地基以外，所有土地都以公开拍卖的方式出售，开拍价格为每英亩一

镑。纯收入的半数将用于移民工作上。在 1853 年新西兰成立代议制政府之前，新西兰一直实行这一政策，唯略有更改。

第一次的土地出售，使霍布森对于从这个来源获得政府的岁入感到乐观。据估计，1841—1842 年的岁入可达五万镑，其中一万二千镑要用于向毛利族人购买土地、测量工作和公共工程。余款的一半要用于移民工作，而余款的另一半约一万九千镑则要供应政府的一般需要。一万九千镑这个数目约等于从所有其它方面预期可得到的岁入(包括一万三千镑的关税在内)。

实际上，类似上述的事情并没有发生。贸易 74
衰退了。测量工作由于缺乏测量员而停顿下来，因而政府不能够拨出土地以供出售之用。没有得自出售土地的款项，就意味着没有现金来购买毛利族人的土地。在怀劳发生的纠纷及其恶果，吓坏了本来有可能前来新西兰的移民。从建立欧洲移民区的观点来看，这个殖民地在早期所呈现的前景变得暗淡了。1843年底菲茨罗伊到达新西兰的时候，情况已很糟糕。政府的资金有二千七百七十三镑；而它的债务，包括积欠未发的薪金和未

付清的商人账目在内，共达二万四千镑。此外，在南方和北方都有土著居民的纠纷。

菲茨罗伊未能从英国财政部得到贷款，因此，他在得到其政务委员会的同意下，决定发行总额为一万五千镑的钞票作为法定货币供流通之用。发行额实际上超过了这个数目。他提高了关税，随后又加以取消，后来又给予恢复。至于他取消毛利族人只能向政府出售土地的规定，以及他把每一英亩的注册费从十先令降低到一辨士，前文已有叙述。当菲茨罗伊获悉英国政府对他已失去了信任并任命了一个继任人时，他没有感到意外。他办事缺乏坚定性和始终如一的精神。他曾遇到一些困难，但我们很难夸大他所遇到的这些困难。

第九章　欧洲移民区的发展 75

——1845年至1853年

乔治·格雷爵士和毛利族人

南澳大利亚这一殖民区早期在土地问题、财政问题和土著居民纠纷问题上都存在着种种困难。乔治·格雷(他当时是英国海军上校)在担任南澳大利亚总督期间，成功地解决了这些困难。因此，英国政府深信他能够在新西兰处理类似的问题。英国殖民地事务大臣在调拨军队和经费方面提供给乔治·格雷的支持，比提供给早期的总督们的支持都要充裕些，以此表示他对乔治·格雷的信任。意志坚强的乔治·格雷一般地都能得到他所要求得到的东西。

当乔治·格雷在1845年年底抵达新西兰时，他发现这个殖民地处于一种危急状态中；八年后他离开新西兰时，这个殖民地显然已很好地建立起来并且是繁荣的。新西兰的这一变化，应归功

于乔治·格雷的才干、他的善于采取果断行动的能力以及他在毛利族人中间赢得的声望。但是英国政府的支持、澳大利亚金矿的发现所提供的经济刺激以及达尼丁和克赖斯特彻奇的新移民区的建立，也都是新西兰的这种变化的强大的助力。而且，以后发生的各种困难，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溯源于乔治·格雷的政策。

我们在上文已注意到乔治·格雷对新西兰北部和惠灵顿地区的毛利族人采取了果断的行动。
76 他清理了菲茨罗伊遗留下来的财政混乱状态，并处理了由菲茨罗伊颁布的土地公告（这个土地公告是英国政府所不认可的）引起的土地要求问题。于是乔治·格雷便能够从毛利族人购得大面积的土地，从而使正在源源而来的移民不因缺乏土地而中止。同时，他和毛利族人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而毛利族人当时还没有觉得（他们后来就觉得）日益增大的欧洲移民区对他们的前途乃是一种威胁。他们仍然在某些方面从与欧洲人的接触中得到好处。他们种植着相当大量的小麦，而乔治·格雷又以贷款帮助他们建造磨坊，以便他们把小麦磨成粉。面粉和其它食品被运往主要港口，或就

地出售，或供出口之用。1849 年大量人口涌到加利福尼亚采金区，这就造成了一个不容易从其它来源得到物资供应的良好市场；而 1851 年在澳大利亚的本迪戈① 和巴拉腊特② 出现的淘金热也为新西兰的毛利族人和欧洲移民的产品提供一个较近的市场。

毛利族人也从欧洲移民区的建设中找到了筑路的工作和其它方面的职业。乔治·格雷评论说，毛利族人往往好好地利用他们这样挣来的钱去改善他们自己的农具。乔治·格雷认为，如果移民区的发展不是太快的话，这两个民族之间建立和平的和互利的关系是可能的。另一方面，他也认识到，企图在新西兰的毛利族人口众多的地区建立独立于毛利族人之外的自给自足的欧洲移民区，那是危险的。

新西兰公司

乔治·格雷认为毛利族的利益必须予以慎重

---

① 本迪戈在澳大利亚联邦维多利亚州南部。——译者

② 巴拉腊特亦在澳大利亚联邦维多利亚州南部。——译者

处理。他的这种做法不仅引起了他同英国圣公会
领导人亨利·威廉斯在土地要求问题上发生争
77 吵，而且也引起了他同新西兰公司及其所属各移
民区发生冲突。首先，我们必须略述新西兰公司
的立场。新西兰公司与约翰·拉塞尔勋爵达成的
协议并没有解决它的问题，而它在英国下议院的
支持者都是负责于1844年在下议院建立一个委员
会并为该委员会起草报告的主要人物。这个报告
指出签订威坦哲条约是一桩失算的交易，并且接
受了新西兰公司的观点，即该条约并不意味着毛利
族人对新西兰的“所有荒芜土地”都享有所有权。
该报告说，承认毛利族人对这些土地的所有权的
要求，乃是一个“错误，而这个错误已导致产生种
种很有害的后果”。“实际上没有被占有和享用的”
土地应被视为英国王室的土地。

格雷伯爵（其父老格雷伯爵所组成的内阁是负责 1832 年英国的改革法案的）于 1846 年就任殖民地事务大臣。虽然韦克菲尔德有时对格雷伯爵进行了猛烈的批评，但格雷伯爵和约翰·拉塞尔勋爵一样，给予殖民地革新派和新西兰公司的同情，比那个时期的大多数其他殖民地事务大臣

多些。在1847年，他与新西兰公司达成了一项协议。根据这项协议，新西兰公司接受政府的一个专员的监督，在三年的时间内可以享有英国政府的权力，在惠灵顿地区和南岛向毛利族人购买土地并在其后自行处理这些土地。新西兰公司除了已得到十万镑的贷款外，还将得到十三万六千镑的贷款。英国政府将以每英亩五先令的价格接收新西兰公司尚未出售的土地。这样的一个安排使英国政府付出了二十五万镑以上的款项。这些条款都被包含在英国议会公布的一项法令中。

新西兰公司没有很好地利用这些机会，以致
它在1850年请求准许它退还约翰·拉塞尔勋爵 78
在1841年发给它的特许状。关于新西兰公司和英国政府之间互相应尽的义务问题，双方进行了长期的争论。在新西兰成立代议制议会时，有人建议将出售土地所得的四分之一的收入给予新西兰公司，以满足它的要求。但这个时候，在新西兰没有什么人同情新西兰公司，甚至它所建立的各移民区的移民也是如此，因此，这个建议受到强烈的反对。最后，在1856年，根据再度担任殖民地事务大臣的约翰·拉塞尔勋爵的建议，新西兰政府同

意由英国政府作担保，发行公债，以二十万镑付给新西兰公司作为最后的解决办法——或者如一个英国评论家所说的，作为封嘴钱。

奥塔戈和坎特伯里

最接近于韦克菲尔德的原来思想的移民区，就是分别于1848年和1850年在奥塔戈和坎特伯里建立的移民区。它们不是直接地由新西兰公司建立的移民区，而是由和新西兰公司有来往的两个协会所建立的移民区。

英国议会的一个苏格兰议员受当时英国普遍的穷困和悲惨景象所震惊，首先提出要建立苏格兰移民区的思想。伦尼先生曾和韦克菲尔德进行过接触。早在1844年，新西兰公司的一个名叫塔克特的测量员对新西兰南岛的整个东海岸线作了仔细的考察以后，向奥塔考（即今奥塔戈）半岛的毛利族人购买了四十万英亩土地。这是由菲茨罗伊总督批准的。在多次令人烦恼的延误以后，第一批移民在卡吉尔船长和托马斯·伯恩斯牧师（苏格兰诗人罗伯特·伯恩斯的侄儿）率领下，于1848年到达新西兰。恰好在这个时候之前，苏格

兰基督教长老会由它的许多最优秀的成员作出决 79
定，分裂成为两派，另行成立了众所周知的“自由教会”。这个新的苏格兰自由教会的许多信徒接受了建设奥塔戈移民区的计划，并协助使这个移民区具有一种独特的风格。

移民们将他们的小镇命名为达尼丁，即爱丁堡的旧称。他们还用他们所喜爱的苏格兰地名给许多街道和郊区命名，以作永久的纪念。他们一开始就为教育事业和教会事业积累了储备金，并且由于他们的节俭和勤劳，不久他们就建立起一个坚固的社会。有一个时期，移民们能够从约翰尼·琼斯开办的农场买到粮食而感到高兴。琼斯开办的这个农场是和他在怀库艾蒂设立的捕鲸站相联系的，二者均在沿岸，相距不远。但是，甚至在1861年金矿的发现使奥塔戈成为新西兰这个殖民地的主要移民区之前，它也已经很好地发展起来，因而它在1860年就比任何其它移民区吸引了更多的移民。

坎特伯里移民区的建立，在许多方面和奥塔戈相似。早在1843年，新西兰公司就宣布了一项在新西兰建立一个英国圣公会移民区的计划。

1847年，韦克菲尔德曾同约翰·罗伯特·戈德利进行了接触。戈德利是牛津大学主要学院之一的神学院的年轻高才毕业生。韦克菲尔德发现他是发挥建立英国圣公会移民区这种主意的人才。几个月以后，戈德利组织了坎特伯里协会。他为这个协会选择这个名称是出自坎特伯里大教堂——这是圣·奥古斯丁在英国创建的第一个教堂，并且它现在仍然是英国圣公会的主教座堂的所在地。戈德利之所以给他组织的协会命名为坎特伯里协会，也许还因为受下面事实的影响：他所在的牛津学院的早期名称是坎特伯里讲堂，而他过去往往步行经过的这个学院的几座围着四方院子的建筑物①之一现在仍然叫坎特伯里。

克赖斯特彻奇的各广场和各街道，都以英国
80 各主教管区和英国各著名学校的名称命名，显示出这座城市的由来。此外，蜿蜒流经克赖斯特彻奇的小河“埃文河”②，也使我们回想起跟随新西兰公

① 牛津大学内一个学院由若干建筑物围绕而成四方院子。——译者

② 埃文(Avon)，读〔eivən〕，此河在英国苏格兰中部。——译者

司第一批移民到达惠灵顿的一个苏格兰家庭——迪恩斯一家人。他们是定居于克赖斯特彻奇地区的第一批移民。他们以其在埃尔夏①的故居的名称"里卡顿"为他们现在的家园命名，并以苏格兰的"埃文河"为流经他们的家园的小河命名。为迎接坎特伯里协会的第一批移民的到来，约瑟夫·托马斯船长花了将近两年的时间从事准备工作。这一批移民恰好在1850年圣诞节前分乘四艘船只到达利特尔顿港。

在奥塔戈和坎特伯里，土地是按照韦克菲尔德的体系出售的。在奥塔戈，每英亩土地售价二镑，一百二十镑十先令可以买到农村土地五十英亩、郊区土地十英亩和城镇土地四分之一英亩。在出售土地所得的收入中，有四分之一要付给新西兰公司(土地是向新西兰公司购买的)，八分之三要用于移民工作上，四分之一要用来修筑公路，八分之一要用于宗教和教育事业上。在坎特伯里，每英亩土地售价三镑，出售土地所得的收入，六分之一用于支付新西兰公司的地价，六分之一用作

① 埃尔夏(Ayrshire)，读〔ɛəʃiə〕，是英国苏格兰南部的一郡。——译者

一般费用，三分之一用于移民工作上，三分之一用于宗教和教育事业上。奥塔戈和坎特伯里两移民区虽然比其它移民区具有更浓厚的韦克菲尔德思想的气氛，但它们的发展多归因于韦克菲尔德的考虑以外的因素——在澳大利亚发现金矿，后来又在新西兰发现金矿，特别是在坎特伯里这个面积不大、人口稠密的移民区之外的空地发展了牧羊业。

荒地和宪法

新西兰公司较早建立的各移民区已经提出种种要求，奥塔戈、坎特伯里这些后来建立的移民区
81 加强了这些要求。他们并不跟着乔治·格雷总督那样尊重毛利族的利益和力量。他们叫嚷政府应由移民们掌管。英国殖民地事务大臣格雷伯爵同情这个要求。他是完全地接受1839年《德拉姆报告书》的原则的第一个人，也是他于1847年指示加拿大殖民地的总督们要委托由选举产生的议会所信任的部长们行使政府的职权。就新西兰而论，他于1846年批准设立代议制机构的法令。新西兰各岛将分为新乌尔斯特和新芒斯特两个省，后

者包括惠灵顿和南岛。每一省将设立一个众议院和一个立法委员会，同时，类似的机构还要在整个新西兰设立起来。

根据这一宪法，格雷伯爵发出处理土地问题的指示。这些指示是以英国下议院1844年设置的委员会(格雷伯爵是这个委员会的主席)的如下思想为根据的：承认毛利族拥有全部土地的所有权是一种错误；订立威坦哲条约是失算的。现在格雷伯爵向总督发出指示说，毛利族人要求的土地所有权，除已得到明确承认者外，凡是没有毛利族人实际花费过劳动力加以经营的土地都应视为英国王室的土地。政府在把这些土地出售给欧洲人之前，不需向毛利族人购买它们。

乔治·格雷爵士没有实施宪法中有关设立代议制机构的部分。他写给格雷伯爵的信说，在当时存在于新西兰的条件下，这样做是危险的。毛利族人在数目上远远超过欧洲人。根据宪法，毛利族人将是没有选举权的，因之，代议制政府实质上将意味着少数的欧洲人统治多数的毛利族人。 82
总督所强调的危险倒不一定是由于这件事的不公正。“在两个种族中，人数居多数的那个种族是最

强大的——属于这个种族的人民是武装得很好的、骄傲的和独立自主的。据我所知，没有理由认为他们会对少数人的统治感到满意并顺从于这种统治，恰恰相反，却有很多理由令人相信他们将会竭尽一切力量去反抗这种统治。”

格雷伯爵接受了格雷总督的观点，并且批准了一项五年内暂停行使宪法的法令。当欧洲移民们，尤其是由新西兰公司组织前来的移民们，听到总督这项不让他们参加管理政府的行动时，他们感到极端愤怒，并且对他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关于处理荒地的各种建议，自然地受到新西兰公司在英国的支持者们的欢迎。《旁观者》说，这些建议把“所有‘威坦哲条约’的谬论和所有过去唐宁街阻碍在新西兰建立移民区的计划”一扫而光了；《殖民地新闻报》则说，“最好把骗人的威坦哲条约束之高阁”。同样自然地，关于处理荒地的各种建议不但在毛利族人中引起了相当大的不安，也在如下的一些欧洲人中引起了相当大的不安：他们是同情毛利族人的，或者至少是了解毛利族人会在多大的程度上反抗实行这些建议的企图的。象首席法官威廉·马丁爵士和塞尔温主教这

些人都对这些建议提出了强烈的抗议。乔治·格雷爵士由于某种原因，也许是他不愿意在太多事情上立即反对他自己的上司，因而在这件重要事情上，他没有象他对待宪法问题那样立即采取明确的立场，虽说这件事情似乎也含有至少是同样危险的可能性。不过，最后，他对这件事情作了说明就把它搪塞过去。他安慰毛利族人说，拟议中的 83
土地条例并不真正地意味着他们所害怕的东西。他告诉毛利族人说，拟议中的土地条例并没有蓄意推翻他们相信他们根据威坦哲条约已经获得的对一切土地的所有权的保证。很难使人相信这是真实的声明，但它也许有助于保全殖民地事务大臣的面子。这个总督也想通过如下的办法来应付这个局面：向毛利族人购买足够的土地以满足源源而来的移民们的需要。

代议制政府和责任制政府

关于宪法的讨论继续进行着。1852 年经由英国议会通过了一项成为我们现政府的基础的关于实行宪法的法令。这项关于实行宪法的法令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乔治·格雷爵士的建议。截至

这项法令被通过的时候，由于移民的人数增加，特别是由于坎特伯里和奥塔戈这两个移民区的建立，移民的人数增加更大，从而使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引人注目的是，根据这部宪法，只有极少数毛利族人享有选举权，因此这个政府主要仍然是居少数的欧洲人的政府，但是这个少数比1846年的少数已强大多了（欧洲人已增加到约二万七千人）。当英国政府批准这一措施，即由下一任总督亲自管理土著居民事务（包括购土地问题在内），而其它事务则由代议制议会处理时，人们对居于统治地位的少数人能否以公正的态度对待毛利族人的怀疑便表露出来。

根据关于实行宪法的法令，新西兰分为六个省，每一省设一个由选举产生的省务会①和一个也是由选举产生的省督。由于新西兰的各移民区互相分开，彼此之间交通不便（这是当时众所周知的事实），不管新西兰整个国家面积不大，人口稀

① 省务会的原文是"Provincial Council"，按词义可取两个译名：一是"省议会"，一是"省政务会"。但初期新西兰的省级机构具有"省议会"和"省政务会"（即省政府）的双重职能，这两个译名都不能完全表达这个特点。由于目前没有较贴切的译名，故暂译为"省务会"。下同——译者

少，建立这六个省政府乃是一项明智的部署。另 84
外，还要设立一个全国议会，由一个由选举产生的众议院和一个由总督任命的立法委员会组成。有些人建议这个“上议院”① 应由各省务会选出。中央政府和省政府的职权范围不是划分得很明确，前者具有凌驾一切的权力。

总督于1853年1月17日宣布实行宪法。在乔治·格雷爵士离开新西兰之前，他采取的一项措施，一直成为人们争议不休的问题。他向各省务会提供进行工作的经费并授予各省省督必要的权力，从而使各省务会能够迅速地开展工作。到了1853年年底各省务会已很认真地掌握着各自的职责。但他却延期召开全国议会，直至1854年5月为止，这个全国议会还没有举行会议。

省督的人选由选举产生，正是这个总督想出来的主意。最初的几次选举就选出了若干有才能的人物。奥克兰省选出了新西兰高级军官温亚德上校，他在乔治·格雷离任后担任代理总督；惠灵顿省选出了能干而深孚众望的费瑟斯通博士，

① 这里所说的“上议院”，就是“立法委员会”。下同。——译者

以后他任新西兰驻伦敦总代表；纳尔逊省选出了E·W·斯塔福德，后来他任新西兰政府总理；奥塔戈省选择了它的创建人卡吉尔船长；坎特伯里省选出了卓越的新闻工作者J·E·菲茨杰拉德，他不久之后就成为新西兰政府的第一任总理。各省务会也包括一些具有非凡才能的人物，例如，在惠灵顿省有新近抵达新西兰的爱德华·吉本·韦
85 克菲尔德、狄龙·贝尔和菲茨赫伯特；在坎特伯里省有约翰·霍尔和亨利·坦克雷德。此外，还有许多其他在新西兰历史上起卓越作用的人物。

各省省督和各省务会出于他们的热情，采取了英国议会的风格。在坎特伯里省，这种热情也许是最强烈的；他们在六十年代便建筑了省务会大厦，而这座大厦至今仍然是新西兰最漂亮的公共建筑物之一。许多应由全国议会担负的职责，各省省督和各省务会都让自己承担起来。到了全国议会开会时，已经有了一个主张维护地方权力的强大派系，他们决心保住他们为各省务会已经取得的特权和权力。

后果是不幸的。多年来，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发生许多摩擦。人们有时议论，认为乔治·

格雷赋予了各省务会这种有利的开端，应对这种摩擦负责。诚然，他是各省的强有力的支持者，并且他认为全国议会没有必要常常开会。但是，要是很早就召开全国议会，实际上是有困难的，并且全国议会即使在省务会建立之前召开，事情大概也不见得会是很顺利的。

各省务会开始其工作较早，被人们用下面的事实加以夸大了：全国议会在其会议一开始时就将全部时间用来讨论全国议会的职权范围及其与总督的职权范围的关系问题，而不是讨论政府的通常事务。担任政府工作的官员，如殖民地事务秘书、殖民地财政部长和首席检察官，究竟是仍由作为英国政府的代表的总督遴选并对他负责呢，还是他们作为全国议会中多数派的领袖，由总督予以正式任命，只要他们能够得到由选举产生的 86
全国议会的多数派的支持，就能够以部长身份去进行工作呢？这就是单纯代议制政府和责任制政府的区别。这个问题在英国已得到了解决，其过程是从英国议会同斯图尔特王朝的斗争，发展到了十八世纪，英国议会中的领袖们依靠在下议院的多数议席取得他们的实力而组成内阁。近年来，

在1839年的《德拉姆报告书》中曾建议在各殖民地成立责任制政府，并且自1847年以来已在加拿大殖民地实行。

关于这个重大问题，宪法一点也没有提及。当众议院开会时，它在只有一票反对的情况下通过了赞成建立责任制政府的决议。新近抵达新西兰并当选接替赫特的爱德华·吉本·韦克菲尔德就是这一行动的领导人物。首席检察官威廉·斯温森向温亚德①提出这样的意见，即“不论是根据宪法，还是根据他借以掌管政府的正式文件，都没有任何条款使总督能有权建立”责任制政府。温亚德把这个问题提请英国殖民地事务大臣解决。

由于如下的事实，一个困难发生了：现任行政官员实际上都是永久性的官职，除非为他们另作公平的规定，没有理由解除他们的职务，让位给那些对众议院负责的部长们。根据斯温森的建议，采取了一个折衷办法，即扩大现有的政务委员会委员名额，任命三名得到众议院多数派的信任的议员为政务委员会委员，以后又任命一名立法委

① 温亚德原任奥克兰省省督，这时已改任新西兰代理总督。——译者

员会的成员为政务委员会委员。温亚德同菲茨杰拉德进行协商（也许令人感到诧异的是他没有同 87
韦克菲尔德协商），除了任命菲茨杰拉德之外，并根据他的建议任命了韦尔德和休厄尔，而巴特利则是最后从上议院遴选出来的。这样就组成了一个类似以菲茨杰拉德为首的内阁，一切顺利地进行了数周。由于不十分清楚的原因，这个安排垮了，政务委员会的四名来自议会的成员辞职，而第一届新西兰议会第一次会议剩下的时间就消磨在同代理总督的争吵之中。不过，不久以后，新西兰议会召开了为期短暂的第一届第二次会议，处理了为使政府继续工作下去的必要事务。

英国殖民地事务大臣在临近年底的时候裁决，对那些将被替换的永久任职的行政官员给予补偿，一经作出规定，成立责任制政府就没有什么障碍了。

在1855年8月8日召开新西兰第一届议会第三次会议的时候，温亚德邀请议员们为建立责任制政府采取必要的步骤，并向他们保证说，他自己将做到他所必需做到的一切；但是，不管前一年已作了鼓动工作，出席会议的人数依然极少，而议

员们只满足于按照旧的制度处理一些急需处理的议案。直到1856年重新选举后，新任总督托马斯·戈尔·布朗爵士才将政府移交给得到众议院信任的部长们，虽然，如前所述，这个原则不适用于土著居民事务。1856年5月休厄尔受命组织第一届责任制内阁。但他不久即让位于福克斯，而福克斯也没有取得更大的进展。斯塔福德接替福克斯，于1856年6月根据新的制度组成了第一届真正稳定的内阁。

责任制政府的成立标志着新西兰历史上的一
88 个阶段。在1840年，英国政府曾根据如下的信念行事：在建立欧洲移民区的时候，毛利族的利益是能够得到保护的。总的看来，着重点是放在保护毛利族的利益上，而不在于促进移民区的发展。基于同一的缘由，1846年，根据乔治·格雷爵士的建议，停止给予移民们以更多的被扩大了的权力。许可责任制政府对代表移民们而不是代表毛利族人的全国议会负责，这就意味着欧洲移民区已达到成为新西兰的主要因素的地步。对于毛利族的利益的考虑还没有被放弃，而在乔治·格雷担任总督的后期也没有显露出欧洲人和毛利族人将会

发生严重的利益冲突。一切事情似乎都顺利地进行着。

欧洲人和毛利族人都处于日益兴旺的境况中。早期毛利族的纠纷的解决，使他们恢复了信心。毛利族人仍然愿意向总督出售土地，并且在改进那些仍然为他们所拥有的土地的利用。政府从向移民们出售土地所得的收入增加了。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先后出现的淘金热，造成了两处向一些国家购买粮食的需要，其所付出的价钱使新西兰的欧洲人和毛利族人的劳动都得到了良好的报酬。但是乔治·格雷遗留下来的表面上幸福的境况不久即消逝，而试图在一起过生活的两个民族之间的摩擦日益增多的时期便继之而来。他们的摩擦终于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达到了顶点，爆发为武装斗争。

89 第十章　毛利族战争的起因

冲突的根源

在战争爆发前所发生的一些实际事件，可能不会对导致冲突的一些更深入的问题，提供很明确的概念。因此，在讨论毛利族战争之前，我们最好对两个民族从英国在新西兰建立宗主权到战争爆发这一期间发展其关系的方式有一个总的看法。

我们已经注意到，两个历史背景和发展程度很不相同的民族试图在一个小小的国家里和平地生活在一起，是存在着种种困难的。我们也已看到，英国的政策是基于两个民族的利益能够和平地调和一致这一信念的。战争的爆发及其结果足以证明这种善意政策的破产。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经达到这样的地步，即毛利族人感到他们的前途受欧洲人的压力所威胁，而许多欧洲人则认为毛利族人对他们的发展是一个障碍，必须把这个障

碍推开一边。毛利族人虽然进行了顽强而英勇的抵抗，但欧洲人终于战胜了大部分毛利族人，并且没收了他们大量的土地，这就意味着欧洲人的利益将占优势，而毛利族人则将沦于从属的地位。90
毛利族人对自己的前途感到绝望，而人们亦普遍地认为他们将会逐渐地消灭。只是到了十九世纪末，在他们之中才开始出现一种新精神。

欧洲人的压力和毛利族的土地

我们已观察到，很多毛利族人曾希望他们同欧洲人的接触能帮助他们进步。在某些方面，情况确实是这样。毛利族人改进了他们的耕作方法，提高了他们的农作物的产量，也改善了他们的生活的其它方面。他们通过供应大量粮食，建造临时棚舍和提供劳动力，也帮助了欧洲移民区的发展。只要他们觉得让欧洲人在他们之中定居，欧洲人能够帮助他们发展，他们是愿意，甚至是渴望把他们的部分土地出售给欧洲人的。

可是，他们改变其态度的时间到来了。欧洲人大量涌入新西兰。这些欧洲人没有初期移民们和毛利族人相处的经验，他们急着要得到土地使

用。当各省务会成立时，它们鼓励大规模的移民，例如奥克兰省务会对所有移民免费提供土地四十英亩。正如总督们所曾指出的，最初，当欧洲人为数不多时，他们必须按照为毛利族人所能接受的条件生活。随着欧洲人人数的大量增加，他们开始变得更加自信和更加不耐烦。责任制政府成立后，他们控制了政府。诚然，约有十年的时间，英国政府一直指望总督为它负责处理毛利族事务。但是，核准给总督以执行这项任务的每年七千镑的小额
91 经费是不充足的，而且实际上，他认为他在工作上必须和新西兰的部长们密切合作。他不能够轻易地忽视他们关于土著居民事务的意见，而他们一般地都持这样的观点，即欧洲移民区的扩展乃是他们主要关心的事情，而欧洲移民区的扩展就意味着对土地的强烈需求。曾存在过同一个人兼任土著居民事务部长和土地购买专员这两个职务的现象，例如唐纳德·麦克莱恩曾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同时兼任这两个职务，而且后一个职务有变成主要职务的趋向。土地交易的记录似乎表明，最初政府采取了十分慎重的态度，查明一切有关的毛利族人都同意出售土地，都认识到他们是在干

什么，并且都清楚地了解他们出售的土地的界线和为他们的利益而保留下来的土地的界线。可是到后来，由于欧洲人对土地的需求随着移民日益增多而增长时，土地购买工作就进行得比较仓促，而且只得到与利益有关的那些人中的少数人的同意。这种做法自然会引起纠纷。

在这种情况下，毛利族人就变得不愿意出售他们的土地了。早在1848年，塔腊纳基和怀卡托两个地区已经明显地出现这一迹象，而到了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后半期，不愿出售土地的现象就更加普遍了。常常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塔腊纳基的各部落终于为了这件事组成一个联盟，发誓除了在他们之间达成协议之外，再也不出售土地。新近的研究指出，这样的一个土地联盟究竟有没有存在过，是很令人怀疑的；但是，很多毛利族人不愿出售土地的态度则是无可置疑的。

戈尔·布朗总督于1859年写信给英国殖民地事务大臣，谈到北岛的一些更为辽阔的土地：“欧洲人垂涎这些土地并决心占有它们——‘如果他们能够占有它们，就合法地占有之，不然的话，也要采取一切手段占有之’”。他引用在奥克兰省 92

务会上的一篇演说的结论："人们不久就要开始按照如下的老原则采取行动：让土地属于那些能够保有它的人们所有。要阻止盎格鲁撒克逊人征服土著居民，那是不可能的。如果欧洲人不能在取得同意的情况下得到土地的话，那么，他们就无须取得政府的同意而占有之。"戈尔·布朗写道，由于移民的潮流，"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移民涌进奥克兰省，当欧洲人的势力强大到足以公然抗拒土著土地所有者和政府的时候，正如不久行将出现的情况那样，法律或公正都无法阻止他们占领土著居民的土地。"

戈尔·布朗也看出毛利族人所采取的立场有其原因。"随着欧洲人口的增加……毛利族人感到他们的主权和权力（毛利族人称之为'财产'）都会随着他们的领土的转让而一起丧失，他们以忧虑的心情预期他们作为一个种族的民族有灭亡的危险。"

英国女王的"皇家保护"

如果毛利族人感到威坦哲条约受到尊重，土地纠纷或许不会发生。毛利族人曾得到这样的诺

言，即他们受英国女王的“皇家保护”并享有“英国国民所享有的一切权利和特权”。人们难以明瞭签署这个条约的毛利族人是如何理解上述条款的意义的；但显然，他们指望得到保护，使之免于受到毫无约束的欧洲移民区所带来的种种祸害，并免于沦入一种低劣的地位。他们期望得到种种利益。

无疑，英国政府及其代表的意图一般地是良好的。戈尔·布朗在给英国殖民地事务大臣的上 93
述信件中提到，英国政府曾“毫不含糊地表明过它的决心：维护土著居民的基本权利的责任是首要的，即使是考虑开拓殖民地的话，也必须把这种考虑置于从属的地位”。可是当局从未作出一贯的努力来把这个良好的意图付诸实施。

霍布森曾接到指示，要促进毛利族人的开化，“把开化这一词理解为凡是与人类在宗教、知识和社会等方面的进步有关的东西”，着重设立学校，使土著居民接受教育；但是，在毛利族人能够“被引导进入文明生活的境界和被培养到能够采用文明生活习惯以前，他们在遵守他们自己的各种风俗上，必须受到细心的保护。”然而，这些事情都没有做到。毛利族人的旧的生活方式大大地遭到破

坏，他们的酋长的权威遭到损伤，并且不顾英国政府不时的提醒，对于建立土著居民管理区、使毛利族人能够按照他们自己的法律生活于其中这一事也全未办到。另一方面，没有施行英国的法律，为促进土著居民的开化而允诺给他们兴办的教育事业也没有着手进行。毛利族人特别抱怨的是，在一些情况下，政府曾允诺，凡政府转售毛利族人出售给它的土地，其所得的收入的百分之十五将用于土著居民的福利事业上，但是政府没有履行这项诺言。

乔治·格雷爵士不同意保护某些地区毛利族人的旧生活方式和旧制度的意见。他认为这会使两个民族尽可能快地混合起来的主要政策受到干扰。结果，他并没有按照他所接到的1846年的指示那样去建立土著居民管理区，而只委派了一些常驻地方行政官，由一些毛利族“助理员”协助，在
94 毛利族人之间推行英国法律。甚至是在乔治·格雷的指导下，这个政策能否获得成功，还是不能肯定的。欧洲移民不断增加，对土地的需求也不断增长，在这样的压力下，毛利族人几乎没有必需的时间用来使其生活方式适应新的情况。

1853年乔治·格雷权势的丧失也于事无补。没有严格执行关于禁止向毛利族人出售烈性酒的法律。戈尔·布朗允许向他们出售武器。各部落在出售土地问题上发生了不和。当毛利族的一些上层人物进城时，他们受到政府的一些小官员和新到的移民们的非礼的对待。特·瓦哈罗阿的儿子、恩加蒂豪阿的酋长威里穆·塔米哈纳(即威廉·汤普森)①曾竭力试图去解决这些纠纷并且希望能得到欧洲人当局的合作。他为此事前往奥克兰访问，想会见总督。但他却受到一名小官员的侮辱并见拒于总督府外。他因受到这样的待遇而感到自尊心深受伤害。

此外，英国殖民地事务大臣在提出1852年宪法法案时曾说过，宪法将“尽可能使土著居民完全取得和欧洲人同等的地位”，“很大部分的土著居民都将享有选举权”。在1854年新西兰第一届议会开幕式上代理总督温亚德也曾说过，代议制政

① 据原书第64页(见中译本第89页)所述，特·瓦哈罗阿是恩加蒂豪阿的酋长，而这里则说特·瓦哈罗阿的儿子威里穆·塔米哈纳是恩加蒂豪阿的酋长，前后有出入，兹姑根据原著译出。——译者

府“是没有种族的区别的”。但是，当毛利族的酋长们申请在选民名册上登记时，官员们告知他们说：不能这样做，因为他们拥有的土地没有英国女王授予的所有权。再则，新宪法所规定的土著居民管理区可能是毛利族人在新西兰议会中取得代表
95 权的一个办法，但是，土著居民管理区还没有建立起来。虽然毛利族人在他们的国家的政府中是这样处于没有发言权的地位，但是他们却通过关税对国家的收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好吧，”毛利族人争辨说，“如果我们被排斥在欧洲人的议会之外，并且得不到政府的帮助，以应付欧洲人的来临所带来的种种困难，那么，我们就必须自己采取行动”。这样，经过多次讨论以后，怀卡托的毛利族人便决定推选一个王来管理他们。这并不意味着向英国政府的权力提出挑战，而是旨在填补英国政府留下来的空白。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塔米哈纳的影响，年迈的波塔陶（即特·韦罗韦罗）于 1857 年 4 月在朗吉里里的一个盛大集会上被选为王。

关于导致毛利族人的选王运动和不愿出售土地的原因，1863年曾任政府驻怀卡托专员、后来成

为英国政界杰出人物的约翰·戈斯特爵士写道：
“土著居民……感到，在这个他们无法沾光的文明
社会中，他们是无足轻重的人，并且受人鄙视。在
他们最初同意与那些陌生人分享他们的国家时，
他们曾形成了一些关于社会进步的希望，可是，这
些希望已成泡影。他们的土地的迅速转让出去，
而他们的境况的改善缓慢，他们对此不会不作对
比，因而他们害怕按照这种速度发展下去，在他们
达到他们所期望的与其白种人邻居享有平等地位
以前，他们的土地将会全部丧失。……他们愿意为
了文明和平等而出售土地，但绝不以其它代价出
售土地。从政府方面得到这些实惠是绝望的了，
完全拒绝出让土地的想法就变成几乎是普遍的意
愿，目的是制止白种人势力的扩大，因为白种人势
力作为敌人将会伤害他们，而作为朋友也不会给 96
他们带来多少益处”。

还可以提一提一个最后的因素。澳大利亚的淘金热带来的繁荣并没有持续下去。许多淘金者在大失所望之后，只得留在澳大利亚改行务农——有的原来是务农的，则回去重操故业。在1856年，马铃薯、小麦和面粉这一类食品的价格

暴跌。毛利族人曾被卷进欧洲经济中的较为广阔的市场，现在他们却受到这些市场的不稳定性的打击——这同他们以往的较稳定的生活方式完全不同。生产方法获得改进的进步年代大都已经消逝了。毛利族人一心想回去依靠他们所剩下来的东西过活，并想一想他们对闯入他们生活中的新方式的不满。

在经济繁荣时期，欧洲人曾经能够在城镇里谋生，例如他们或许是充当商人以谋生，现在他们也感到受经济萧条的沉重打击。他们想，利用土地进行生产，将会提供他们较多的安全——可是他们所需要的土地却在毛利族人手里！

第十一章　毛利族战争的经过

97

塔腊纳基战争

第一次毛利族战争在塔腊纳基爆发。它是由怀塔腊①附近的土地纠纷引起的。1840年2月，新西兰公司的代理人在新普利默斯地区从阿蒂阿瓦部落的遗族购买了大量肥沃土地，1841年底来了第一批移民。在1844年，土地委员会委员斯佩恩认为这次的土地买卖是有效的，便把六万英亩的土地判归新西兰公司。

阿蒂阿瓦部落中的许多人在1824年左右就已迁移到奥塔基②，并南渡库克海峡。在他们迁移以后，怀卡托部落曾向阿蒂阿瓦部落中那些留下来的人发动进攻，杀死他们之中的很多人或把

① 怀塔腊位于新西兰塔腊纳基省的西南部，与新普利默斯相邻。——译者

② 奥塔基位于新西兰惠灵顿省的西南部。——译者

他们抓来当奴隶。甚至在斯佩恩把土地判给新西兰公司以前，为怀卡托征服者所释放、现在已成为基督教徒的阿蒂阿瓦族奴隶们，早已回到了塔腊纳基，并积极地反对欧洲人对他们的土地的要求。菲茨罗伊总督深怕引起严重的纠纷，便撤消了斯佩恩的裁决，只允许新西兰公司在另外偿付三百五十镑后取得三千五百英亩土地，并准许该公司在那六万英亩土地的范围内协商取得更多的土地。

其他的阿蒂阿瓦人开始返回故地，其中包括一个酋长特·朗吉塔克，即众所周知的威里穆·金吉。他不顾乔治·格雷总督的反对，于1848年带领许多追随者从怀卡纳埃迁移回来，并定居于怀塔腊河南岸。这个地方是属于那六万英亩土地的范围以内的地区，是移民们垂涎欲滴的地区，却
98 是阿蒂阿瓦人非常热爱的地区。金吉宣布了他不出售他的土地的决心。

这样，在塔腊纳基的毛利族人和白种人之间的紧张局势就日益尖锐化。这种紧张局势由于如下的事实而更加复杂起来：1854年，在反对出售土地的毛利族人和赞成出售土地的毛利族人之间

发生了包含有凶杀和战斗的冲突。这种情况有时威胁着塔腊纳基的移民们的生命财产的安全，因为他们曾对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它支持那赞成出售土地的一方。

在1859年3月8日，戈尔·布朗总督对毛利族人在新普利默斯举行的一次大会提出警告说：不要在欧洲移民区以内发生暴力行为。接着，布朗谈到土地问题。他说：他认为毛利族人还是出售他们自己不用的土地为妙；他将不允许任何一个不是土地的共有者干涉土地的出售；但他在没有得到土地所有者的同意时也不会购买其土地。于是一个名叫特腊（泰勒）的毛利族人遂即提出要出售怀塔腊的土地。布朗总督表示，如果特腊对这块土地的所有权被证实的话，政府同意把它购买下来。金吉和他的约二百名追随者实际上是住在这块土地上的。他便起来反对出售这块土地，并率领他的全部人员“不辞而去”。三天以后，布朗总督告诉移民们的一个代表说，不允许金吉“行使他的酋长权力”去阻止土地的出售；但是，如果他是土地的共有者，没有得到他的同意，那是不能购买其土地的。不过，说一个酋长没有分享土

地的所有权，是违反毛利族的财产具有公有制的性质的，而这一点在过去的土地购买上是得到尊重的。

在长期拖延，却没有进行过真正的调查研究以后，政府就以分期付款的办法偿付出售土地的毛利族人。同时，政府决定下令测量土地，必要时
99 将以武装力量给予支援。1860年2月20日，测量工作被“一群毛利族老年妇女”所阻止。政府发布了戒严令，增派了更多的军队，并在4月18日占领了金吉在有争议的土地上所建立的一个村寨，防守村寨的毛利族人逃走了。这一次小交战就是长期战争的序曲。

谁应对这次小交战负责？当时，塞尔温主教、首席法官威廉·马丁爵士及其他一些人都支持金吉。在1926年成立的关于没收土地的皇家调查委员会认为，在毛利族人进行任何叛乱以前，政府就向他们宣战了，而“他们在这种情况下除了为自卫而战之外，别无他途”。但是，谴责某些特定的个人，那可能是错误的。一场利害冲突已经发展起来，要用一种使毛利族人和移民们都满意的办法来消除冲突，那是困难的。象戈尔·布朗总督

那样一些必须作出关键性决定的人，面对一个不能够无限期地挂着的悬案，在寻求他们或许认为是一个公正的解决办法时，也许没有意识到他们受到移民们的压力的影响有多大。这些移民把怀塔腊看成是一个带考验性的案件，不是要考验事情的处理是否合乎正义，而是要考验毛利族人对出售土地的反抗是否会被压制下去。

在战争的这个最初阶段，当毛利族人破坏新普利默斯城周围的小块移民区的时候，英国军队在城里躲藏了好几个月。这些小规模战斗的主要结果是使毛利族人坚定了他们对英军的蔑视。1861 年 5 月，双方达成了休战协议，并在随后的两年间双方为和平作出了巨大的努力。

怀卡托战争

在这期间，怀卡托的选王运动取得了很大进展，并且得到了远至陶朗加和霍克湾的毛利族人 100
的极大同情。但是北部的毛利族人却保持着冷淡态度。毛利族王的顾问们建立了毛利族自己的各种机构——学校、法庭、议会、报社，并指导这些机构模仿白种人的文明进行工作。

批评毛利族人所作的努力是容易的，但是，如果政府是同情而不是敌视毛利族人的这种旨在谋求自立的努力的话，其结果可能是一种不同的图景。事实上，毛利族的王政府属下的毛利族人只是要求让他们自己进行他们的试验。他们把从东边流经怀卡托，最后向西流入大海的曼加塔威里河视为他们的北面边界。在河以南的广阔地带，他们没有出让什么土地给欧洲人，虽然有少数欧洲人相安无事地在他们中间居住着。1863年，他们有礼貌地把乔治·格雷爵士派去的政府驻特·阿瓦穆图专员约翰·戈斯特先生（后来成为约翰·戈斯特爵士）撵走，作为他们渴望独立自主的一种表示。

正当拥王派的好战分子力图以武力支持威里穆·金吉时，年老的毛利族王波塔陶已去世，他的儿子塔威奥是一个意志薄弱的人，被选继任王位。王位缔造者威里穆·塔米哈纳逐渐地感到自己的势力衰弱了。他在其好战的对手、恩加蒂-马尼阿波托的善战的酋长雷维面前不能保持其有利的地位。在选王运动中，两派总是互相争夺最高权力，而在塔腊纳基的战争及其胜利以后，有军事力量

的一方总是占优势。

1861 年接替戈尔·布朗担任总督的乔治·
格雷爵士再也不能象过去那样施展他的影响了。
他除了必须应付对新西兰议会负责的部长们向他
施加的压力以外，还必须面对他自己过去的行动
所造成的后果——他曾说服毛利族人让出很多土
地,却没有给予他们任何固定的报酬,因而后果不 101
佳。他不再象先前那样受信任了。虽然他只带一
名译员顺当地进入了怀卡托地区，但他在毛利族
人中没有形成什么印象,他说了一些话,其大意是
“不把毛利族王搞垮,誓不罢休”,因而引起毛利族
人对他的意图发生怀疑。当他开始修筑从奥克兰
到怀卡托地区的公路和桥梁以及要求增援部队
时，毛利族人对他怀疑愈深。

但是,在危机扩大到怀卡托以前,乔治·格雷爵士由于某种难以说明的原因,犯了一个大错误,使塔腊纳基战争重新爆发。他在对整个问题作一番调查以后,决定放弃政府占领怀塔腊的要求,但坚持要毛利族人归还其非法强占的塔塔赖马卡地区。不幸的是,他首先派遣军队到塔塔赖马卡去,而没有把放弃怀塔腊的意图暗示毛利族人。毛利

新西兰简史 八 ⑱

族人随即伏击和歼灭了前往塔塔赖马卡的一个护卫队；当总督紧接着宣布放弃怀塔腊时，毛利族人便把它看成是软弱无能的表现。

这桩事件自然加剧了怀卡托的紧张局势。毛利族王向总督提出警告说，英军一越过曼加塔威里河，就意味着战争。总督声称怀卡托的毛利族人正在计划进攻奥克兰，为了先发制人，他命令卡梅伦将军率领英军于1863年7月12日越过曼加塔威里河。长期战争从此开始了。怀卡托的毛利族人一直否认他们有过任何上述进攻的计划，约翰·戈斯特爵士在其所著《毛利族王》一书（前文已引用过）中写道，“我完全不相信怀卡托的毛利族人要渡过曼加塔威里河来袭击我们”；但是1926
102 年成立的关于没收土地的皇家调查委员会却认为有证据支持乔治·格雷的观点。在当时存在的局势紧张的情况下，断定谁是真正的侵略者，那是不容易的。这场战争或许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没收土地的政策是以毛利族人是反叛者的理论为根据的，而这种没收政策，至少在其某些没收的范围是较少根据公正的原则，却是较多根据欧洲人对土地的欲望，并且在这些欧洲人中，有些是投机者

而不是拓荒的农民。虽然大部分被没收的土地已经归还了毛利族人，并已缓慢地作过其它形式的补偿，但是没收土地的政策对毛利族人的生活却产生了极坏的影响。

还可以注意的一点是：人们有这样的观感，即英军官兵是在为土地掠夺者的利益而和一个英勇的民族作战，而这种观感使英军官兵感到不愉快。另据人们说，奥克兰的商人是欢迎这场战争的，因为军需的供应是一项有利可图的交易。这造成了卡梅伦将军为一方和乔治·格雷总督及新西兰政府的部长们为另一方之间的恶感。英国当局对战争的正义性和没收土地的政策也怀有疑虑。在到底是新西兰政府还是英国政府应该支付这场战争的费用问题上，有过长期的争吵。

战争的经过

在探讨没收土地的问题之前，先略述战争的经过。

卡梅伦将军的军队渡过曼加塔威里河以后，在朗吉里里（在湖① 和怀卡托河之间）同一支毛利

① 原著没有具体地指明那一个湖，按系指位于新西兰北岛中部的“陶波湖”。——译者

族队伍相遇并把他们击溃。可是，殖民者谋求速胜的希望随着战役的进展而逐渐地消失。英军小心翼翼地和缓慢地在那难以通过的怀卡托山谷推
103 进，而毛利族人则在英军面前且战且退，从一个预备好的阵地转到另一个阵地，直到他们被驱散入丛林为止，但他们仍然没有被击败。要探索各战役的进程是一件冗长和困难的工作。战斗几乎不是属于阵地战的性质。毛利族人是难以捉摸的敌人，他们可以在坚固设防的村寨里大造声势，但在英军进入阵地以正规方式向他们发动攻击之前，他们就撤退到另一个预备好的阵地去了。同其他许多土著人民的战争一样，英军企图完成的全部任务，只能是逐步地肃清一片土地上毛利族的武装力量，可是在新西兰的丛林里，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然而在1864年4月，一支驻扎特·阿瓦穆图的英国军队却能以迅速的动作在奥腊考的一个设防的村寨包围了不少毛利族人。英军约有二千人，而毛利族防御队伍只有约三百人。包括以善战著称的酋长雷威在内的毛利族人没有充足的防御手段，而英军装备良好，配备有大炮。而且，毛利族

人缺乏食水，除了少量马铃薯和葫芦瓜以外，粮食也极少。看起来他们似已处于一种绝望的境地。

毛利族人忍受了连续三天的猛烈炮轰和频繁攻击。卡梅伦将军号召他们投降，但他得到了一个堪与新西兰历史万古长存的回答。他们高呼："我们要永远战斗下去！永远！永远！"英军要求他们撤出他们的妇女和儿童时，他们的回答是，"妇女要和男人并肩战斗。"于是英军重新攻击。

第三天下午四时，英国军队惊异地看到一群
紧密相挨的毛利族人从村寨的后边突破并迅速地 104
冲向附近的沼泽地。这群毛利族人实际上是越过英军的一个团防守的战壕，如果不是受到一支森林保护队的截击，他们可能全部逃脱。经过短暂的激烈搏斗，一百五十名毛利族人被击毙；其余的毛利族人，包括其领袖雷威在内，都逃进了丛林。

在新西兰历史上，这是最著名的战斗，是显示毛利族人的英勇和纪律的典范，而毛利族人从自己的营垒发出的回答已成为他们的战斗号令。里夫斯说："土垒和胜利属于我们，但是战斗的荣誉却属于那些高呼'我们要永远战斗下去！永远！永远！'的人们，他们的这个口号在新西兰将永远不

会被忘记。”

1864 年 4 月奥腊考的战斗结束后，紧接着毛利族人又放弃了他们在毛加陶塔里的要塞，怀卡托的战役便告结束，于是和平谈判的建议被提出来了。选王运动被破坏了。虽然和平谈判有一个时间中断了，但威里穆·塔米哈纳在 1865 年 5 月 25 日代表毛利族王投降了。

然而在这之前，卡梅伦将军曾对普伦提湾的各部落发动过一次战役。英军最初在陶朗加附近的盖特村寨的军事行动遭到惨败，但整个战役还是以胜利告终，因此，怀卡托各部落赖以获得补给品的唯一港口被封锁了。这无疑地使在怀卡托不可能再次爆发战争。

派-马里雷

选王运动虽然被破坏了，但冲突的最坏阶段
105 还在后头。在怀卡托的战役正在进行的时候，英军除了防守新普利默斯及其外围地区外，没有采取其它行动。但是，零星的小战斗确有发生，其中之一是在 1864 年 4 月 6 日的一次小战斗中，英军第五十七团的劳埃德上尉及其属下的一些士兵被

击毙。参加这次小战斗的毛利族人，恢复他们的野蛮风俗，将遇害者的头颅砍下来，并痛饮其血。

数日之后，据说，加布里埃尔①天使便出现在饮血者之前。劳埃德的头颅被当成是同耶和华通灵的媒介物。基于这个事件，一种可怕的宗教信仰象燎原烈火一样在反叛的各部落中迅速地传播起来。在许多情况下，这些反叛的部落摒弃了基督教而参予派-马里雷（即大家更为熟悉的“豪豪主义”）的叛乱性活动。这种新宗教的祭司长特·乌阿教导他的信徒说，大批天使都在等待着要帮助他们的事业，如果他们投入战斗时高喊“豪！豪！”（即“起来！ 起来”）他们就不会受到伤害。

威廉·福克斯爵士曾把这种新宗教描绘为“由犹太教的思想、摩门教②的一些主要特征、少量的催眠术、偶尔出现的腹语术③和大量的嗜食人肉的习性混合而成的大杂烩”。那里有这种新宗

① 据基督教《圣经》上的说教，加布里埃尔天使是安慰人类并向人类报告喜讯的天使。——译者

② 摩门教（Mormonism）是1830年在美国创立的基督教的一个教派。——译者

③ 腹语术（ventriloquism）使人觉得说话人的声音不是从他的口中发出，而是从他人或别处发出。——译者

教的传播，那里的战争就带上一种新的和恐怖的特征。象在奥腊考进行的那样纯粹的英勇战斗的场面再也看不到了。代之而起的是令人毛骨悚然的屠杀和食人肉的行为。

这种事态的发展是完全不足为奇的。毛利族人改变了原来与他们的生活方式密切相关的信仰，改奉基督教和崇尚似乎与基督教相联系的欧洲文明，这是一个巨大的急剧转变。要使它成为毛利族生活的一个真正组成部分是需要时间的。毛利族人感到惊愕的是基督教究竟要把他们引向何处去？传教士们似乎已经为其它方面的欧洲影响力量铺平了道路，可是这些影响力量看起来似乎对毛利族人的前途有威胁，却与基督教中较为
106 美好的一些方面毫无关系。当危机出现的时候，虽然有许多传教士对毛利族人的处境表示同情，但是他们觉得不靠拢他们的欧洲同胞是困难的。有些毛利族人感到他们自己受了新福音及其传播者的愚弄。因此，在他们目前处于一种痛苦的、幻想破灭的心境时，他们就回过头来转向他们的旧信仰，并在旧信仰中掺杂上新信仰中的那些看起来似乎对他们最有吸引力的东西。

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把如下的事实记载下来：经过所有的战争以及新信仰所引起的激动，许多毛利族人仍然信奉基督教。许多毛利族人还为支持政府而参加战斗。事实上，如果没有象罗帕塔（即罗伯茨）和克帕（即肯普）这样的酋长和他们的追随者的协助，政府也许要进行更长期的战争，甚至要付出更多的战争费用。

煞尾的战役

在1865年，由于要开辟一条通过怀托塔腊的有争议的公路，在塔腊纳基和旺加努伊发生了一次战役。卡梅伦将军保持着靠近海滩，每天以一英里的速度向前推进。埋伏在距离海滩三、四英里的丛林中的毛利族人，嘲笑卡梅伦是“跛脚海鸥”。其实，卡梅伦推进缓慢的真正原因，是由于他和总督发生公开的争吵。在总督、卡梅伦将军和内阁之间缺乏协调，确实大大地妨碍了战争的进展。卡梅伦将军拒绝攻打韦腊罗阿的一个设防坚固的村寨，并宣称他需要二千名士兵才能作战；但乔治·格雷爵士却率领三百零九名友好的土著居民、一百三十九名森林保护队队员和二十五名

旺加努伊骑兵，亲自攻占了这个村寨。这次行动粉碎了旺加努伊的毛利族人的抵抗。1866年1月，
107 丘特将军胜利地从旺加努伊向新普利默斯进军。这样，第二次塔腊纳基战争便告结束。

虽然如此，至少却有六年的时间，由于未被征服的毛利族残部时常在北岛的深山密林中出没，因此，有必要维持一笔相当大的防御费用。有许多毛利族人被放逐到查塔姆群岛。这些被放逐的毛利族人包括特：库蒂。后来的调查证明，他的罪状至少是可疑的。特·库蒂于1868年从查塔姆群岛逃出，他在贫穷湾上岸后曾数次逞凶，这再一次使殖民者惊慌失措。特·库蒂在荒无人烟的乌雷韦腊地区到处避难，到处被搜捕，但始终没有被捕获。然而对再度发生暴乱的担扰逐渐地从移民们的脑海中消失了，并且自1872年以后再也没有任何足以使他们惊慌的真正原因。

第十二章 没收土地及其后 108

格雷的想法

乔治·格雷爵士似乎早在1863年就首先建议，把没收土地作为对毛利族人施加压力的一种手段。当怀卡托的情况日趋紧张时，他提出一个计划，即从怀卡托河口到豪拉基湾一带筑起设有防御哨所的武装移民的壁垒。沿河要设置前沿哨所，最远的哨所设在恩加鲁阿瓦希阿。他建议"最后没收敌对的土著居民的土地，将其中的一部分授予因服兵役而获得土地所有权的人，供其定居，借以保障今后奥克兰附近地区的安全，而将其余的土地出售，借以支付战争费用"。这一建议是在战争爆发前被提出来的。

新西兰政府的部长们欢迎这个建议。1863年7月9日，总督号召居于上述防线以内的所有毛利族人宣誓效忠于政府并交出武器，否则撤到曼加塔威里河对岸那边的地方。多数毛利族人选择了

后一个办法。同年7月11日，总督威胁毛利族人说，对“那些向女王陛下发动战争或仍然保留武装的人”，要取消“威坦哲条约所保证的他们的土地所有权”。总督的这项公告直到7月14日才传达到曼加塔威里河对岸那边的毛利族人，而英军在7月12日就已经渡过了这条河。

109 部长们的计划

在乔治·格雷的建议的基础上，新西兰政府的部长们拟订了没收面积更大的土地的庞大计划，其中提出武装移民的驻地的边界是从拉格兰到陶朗加。他们计划在这一地区安置大量的移民。这个计划，除战争费用不计在内，估计需要动用二百万镑。这笔经费将通过借款的方式筹集。多梅特总理在一个备忘录里申辩说，这笔巨额债务在十年或二十年内还不至令人感到是一个重担。“我们独自负担这个重担，那会把我们压得透不过气来；要把卸下这个重担的希望寄托在未来；只要我们当前得到保全——不，我们甚至由于采取这个行动而得到不可估量的加强——那个承受我们卸下的这个

重担的未来将会同样地得到好处并变得富足起来”。

偿还这笔债款（计划借债的总额实际上是四百万镑，其中包括战争费用一百万镑）的经费来源，一是出售取自毛利族人的土地所得的收入，二是由于人口的增长而增多的额外关税收入。除了已退还毛利族人的一些土地和答应授予武装移民的土地以外，多梅特指望仍有一百万英亩以上的土地可以出售。如果这些土地在以后的十五年内按他设想的每英亩二镑和一镑这种乐观的价格出售，就可以偿还一大部分的债款。多梅特讲到毛利族人的前途时有这么一句带结论性的话：“首先是政权……以后才谈得上为毛利族人设立教化机构。”在谈到这个庞大的计划时，他说：“这样，就有可能使新西兰的两个种族在和平与繁荣之中共存。”那些部长们醉心于获得大片广阔的土地，但实际的情况却使他们的幻想受到一次无情的批评，因为毛利族人不愿出售这些土地。

在这期间，武装移民被招募而来，他们大部分来自奥塔戈金矿和澳大利亚，以后又有其他武

110 装移民从“开普殖民地”①和大不列颠接踵而来。1863年12月新西兰议会通过了新西兰移民区法，批准没收1863年1月以来“曾参与反叛女王陛下政府”的任何毛利族部落的土地。

没收土地和依靠自己

到1864年5月，英军已占领了毛利族人的大片领土。这时，乔治·格雷总督和部长们之间在究竟要没收多少土地的问题上发生了长期激烈的争论。鉴于他们在1863年就已提出各种不同的意见，人们很难理解他们为什么不早些讨论这个问题。部长们最强烈的论点是，乔治·格雷的计划对那些曾经最积极地参加战争的部落的土地将没有什么影响。另一方面，得到英国殖民地事务大臣支持的乔治·格雷则设法促使这些参加战争的部落按规定的日期自愿地让出土地，以换取对

① 据韦氏新世界美国英语词典（1972年原版），“开普”(The Cape)有两义：一是指南非（阿扎尼亚）的“好望角”(Cape of Good Hope)，二是指南非的“好望角省”(Cape of Good Hope Province)；“开普殖民地”(Cape Colony)则是南非好望角省的旧称。南非好望角省即是《世界地图集》（地图出版社1972年版）所载的南非开普省。——译者

他们的特赦。

最后，在1864年11月底，组成了以韦尔德为首的新内阁。关于总督拥有处理土著居民事务的最后职责，而内阁负责管理其它事务的制度，从来没有执行得很好。有一个时期，英国政府还想把处理土著居民事务的工作也交由内阁负责。当部长们认识到这将意味着既要承担责任，又要负担费用（这里指的是担负英军作战的经费开支）时，他们对此便比较不热情，结果没有作出最后的安排。然而韦尔德仍然根据如下的理解而就职：新
西兰政府将要完全地负责掌握土著居民政策和指
挥战争，而且英军不久即将撤回。虽然在财政处 111
理问题上争吵了一些时间，但这却是著名的“依靠自己的政策”的真正开端。

或者是由于上述这一变化，或者是由于毛利族人没有按照乔治·格雷规定的日期(12月10日)交出土地，这位总督即在12月17日发布了没收怀卡托地区大片土地的公告。接着又没收了陶朗加、普伦提湾、塔腊纳基和奥克兰地峡的许多土地——实际上全是部长们曾经提出要予以没收的土地。

武装移民区

这个时候，一船船的移民从英国到达新西兰。政府不再要求他们服现役，并答应给予他们土地，或在给予他们的土地尚未准备好之前为他们安排工作。有些移民是在没收土地完全没有进行以前就已到达的，而很多移民则是在还没有测量好那些配给他们的土地之前到达的。这些移民必须等到曾服现役的怀卡托团的志愿兵被安置停当以后，才能分到土地。按原定计划，这些志愿兵被安排在怀卡托河上游地区的边界线定居。哈密尔顿、坎布里奇和特·阿瓦穆图的武装移民区的出现主要是实行这个计划的结果。

后来到达的移民将被安置在奥克兰和怀卡托河下游之间的地区定居。政府必须维持他们的生活，其时间比预期的要长，而经费用完了，他们感到不满，甚至感到绝望。在他们定居之前，政府不可能通过出售土地来筹集它所预期得到的巨款。

1863年部长们所描绘的如花似锦的美景与1865年出现的事实是多么不同啊！当有人建议必须按照原来的计划把移民武装起来时，负责处理

移民事务的专员提出反对的意见说，移民的处境 112
已如此悲惨，“如果能够保证他们取胜的手段被掌握在他们手中，那么，他们的反叛是一触即发的。”后来，这个专员的报告称，他们为了应付当前的困境，已经开始屠宰其他移民的牲畜。他下结论说，“将三千以上的移民引进新西兰的代价，其所产生的结果不是别的，只能是把一批穷困和饥饿的居民推给省当局负责。”

虽然这个计划没有按原来设想的实行，并且本来可以容易地偿还的债务也没有还清，可是许多移民最后还是在分配给他们的土地上定居下来。现在普克科黑、图阿考、毛库和波克诺等地的许多家庭可以回顾他们的祖先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乘移民船来到新西兰的情景。

对毛利族人的影响

不管毛利族战争和没收土地的政策对促进新西兰发展成为欧洲人社会起了多少作用，对毛利族人来说，以后的时期无疑是一个幻想破灭和严重衰落的时期。在某些情况下，毛利族人感到灰心并认为他们注定是要灭亡的。他们想：“既然

外来的耗子赶走了本地的耗子，有如移植进来的牧草挤掉了本地的羊齿植物一般，那么，毛利族也必将在白种人面前灭亡。”不然的话，他们就变得易于发生愤恨的情绪，虽然白种人提出要给他们帮助，他们也不愿意合作，对白种人敬而远之。毛利族的人口下降了，在 1896 年前后降到了最低水平。根据估计，1850 年前后毛利族约有八万到十万人，1896 年下降到四万二千人。

在这个时期，不是由于土地的没收而是由于土地的出售，毛利族人继续丧失他们最好的土地。
113 威坦哲条约曾规定限制毛利族人把土地直接地出售给欧洲人，但由于经英国政府同意的、1862 年新西兰议会通过的土著居民土地法的颁布，这些限制已被大大地放宽了。到 1892 年为止，土著居民土地法实施以来的三十年间，特别是在 1865 年土著居民土地法庭成立以后，“毛利族人便失去了他们祖先遗留下来的大部分土地，其中包括绝大部分地点最好的和最肥沃的土地。”

当然，没有强制毛利族人这样做，而且他们往往把出售土地得来的钱愚蠢地挥霍掉。但他们的出售土地就招惹了诡计多端的欧洲人的奉承，而

这些欧洲人往往是投机商，他们并不想当农民，而是想转售土地，从中牟取暴利。有关的毛利族人感到泄气了，幻想破灭了，不复能够以其古老的部落生活来加强其自己的精神设防，但又还没有具备在平等的条件上同欧洲人打交道的本领，他们“好象没有牧羊人、看守人或率领者的羊群一样”，容易受骗。他们的土地的丧失，既是他们的衰落的结果，又是他们的衰落的原因。

毛利族的复兴

这个时期的土地交易和土著居民土地法庭所作的处理受到一个在1891年进行调查工作的委员会的率直的谴责。结果，政府又在1892年恢复了对毛利族人土地的专买权。早在1867年就已经给予毛利族人从四个分开的毛利族选举区选出四名新西兰议会议员的权利，同时，在改善教育和卫生事业上，也已作了若干尝试。

但是，毛利族在新西兰的地位的真正变化，乃是由于在他们中间产生了新的希望。这在很大程度上乃是一批年轻的毛利族领袖的工作成果。他们当中有几个曾在特·奥特学院受过教育。阿皮 114

腊纳·恩加塔爵士、毛伊·波马雷爵士和彼得·巴克爵士对毛利族的这种复兴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这种变化的迹象之一就是毛利族的人口在同欧洲人接触，因受其各种影响而下降之后，现在又增长了。他们的人口从1896年的四万二千人已增加到1949年9月的一十一万四千人以上。毛利族的人口现在仍继续增加着，其增长率比欧洲人高得多，因此，他们并没有象有人曾一度所臆断的那样必然要灭亡，而是已成为新西兰人口的那日益增长的部分。

毛利族的复兴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赋予毛利族的文化（他们的艺术、风俗、传统）以新的生命，以期他们能有较大的信心在业已传入他们本土的异族文化中建立自己的地位。毛利族人缺乏那种能使其容易地在新西兰取得地位的欧洲生活背景。因此，人们认为，他们必须依靠他们自己的毛利族生活背景作为取得力量的源泉；如果他们无所作为，这个背景便会丧失掉，他们就会被抛弃，就象一块漂浮物颠簸在异国文化的惊涛骇浪中。

另一方面是设法找出毛利族人在国家经济生活中能够发挥积极作用的途径，使他们不至于依靠挥霍他们出售或出租土地给白种人所得的收入而虚度一生。这里他们又需要以毛利族过去的某些东西作为基础，因为他们没有受过异族的欧洲人的个人主义经济生活方式这一方面的教育和训练。

从已故阿皮腊纳·恩加塔爵士在东海岸毛利族人中实行土地开发计划这一特殊工作中，可以看出上述这两个方面之间的紧密联系。这项工作的目的是要鼓励毛利族人按照欧洲的标准，以家 115
庭所有制为基础，而不是以毛利族过去那种较大程度的公有制为基础，去进行有效的生产，但同时又要促进毛利族所习惯的公有制社会生活的某些方面——“马腊埃”生活的某些方面。人们也可以这样说：要帮助毛利族人变成象欧洲人那样有效率，同时又必须使他们感到作为毛利族人而自豪。

这个运动是毛利族人自己发起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也取得了白种人的富有同情心的帮助，因为白种人对于他们过去的行动使毛利族人民陷入困境，试图作出一些补偿。我们可以举出

1926年设立的关于没收土地的皇家调查委员会这个机构为例。该委员会谴责在塔腊纳基没收土地是不公正的，并且认为在其它情况下所取得的土地的数量也是没有根据的。它建议对没收的土地要给予补偿。该委员会一直要求调查和纠正土地买卖中被认为是错误的事情。例如在1948年，那个众所周知的北奥克兰的"剩余土地"问题，就是该委员会调查的主题。在一些情况下，有关的毛利族人对政府准备付出的补偿金仍不满意。

随着对于由毛利族的不同的生活背景所产生的各种问题有了较好的认识，毛利族人的教育和卫生事业都取得了很大的改进。正如阿皮腊纳·恩加塔爵士所说，在1929年，由于新西兰议会批准了政府经费的用途，它就是第一次"在威坦哲条约签订将近九十年以后直接地对如下的政策承担财政上的责任：在政府的指导与监督下鼓励和训练毛利族人成为勤奋的公民。"当然，白种的移民们早已享受了政府的财政补助。

116 **当前的问题**

由于篇幅太小，不能详述毛利族复兴的事迹。

新西兰以其欧洲居民对待毛利族的态度享有盛誉。确实，跟曾受欧洲人压迫的大多数民族相比，毛利族过的日子终究好得多。这是部分地由于毛利族人本身的力量和品质使然，部分地则是由于在十九世纪英国殖民政策受到强烈的人道主义影响所致。但是我们不能过于自满，设想问题已经全部解决了。没有人能够坦率地断言，毛利族人已完全适应于新西兰社会的其余部分或者对他们的命运感到幸福和充满信心。

我们仅举数事以供思考。前文已经提到，毛利族的人口增长比欧洲移民较快；但是他们的死亡率依然是高得多。就1949年而言，毛利族的出生率为千分之四十四点四八，欧洲人的出生率为千分之二十四点九八；可是两者的死亡率分别为千分之一十四点一七和千分之九点零九。这就是说，毛利族人和欧洲人的人口纯增长率分别为千分之三十点三一和千分之一十五点八九。毛利族的婴儿死亡率也是很高的——在1947年，每一千个出生婴儿中有八十五点八二个以上死亡，而欧洲人的新生婴儿每一千人中只有二十三点七八人死亡。某些疾病，特别是肺病，使毛利族人死亡极

多。①

最初，很强调安排毛利族人利用土地进行有效的生产。由于毛利族的人口迅速地增长，凭他
117 们保有的土地不足以实现这个要求，特别是在某些地区，如在毛利族的人口占大多数的新西兰最北部，更是如此。因此，重要的是年青的毛利族人必须接受一种训练，从而使他们能够从事其它职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军事生产对劳动力的巨大需要，把许多男女毛利族人带到一些条件对他们来说都是非常陌生的城镇。由于城镇缺乏住房及其它方面的设备，这使毛利族人的适应问题变得更加困难。

许多毛利族人和欧洲人都清楚地认识到迄今仍存在着的种种实际问题。仅有解决这些问题的意愿是不够的。各地的实际情况常有不同，有必

①注：毛利族的死亡率自1949年以来已经显著下降。1958年，毛利族的死亡率为千分之八点六七，而非毛利族的人口的死亡率为千分之八点九，因此，毛利族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为千分之三十七点五七，而非毛利族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则为千分之一十六点二八。毛利族的婴儿死亡率已经从1948年至1950年每年平均为千分之七十七点四一下降到1958年的千分之五十四点三七；但这比非毛利族的婴儿死亡率（1958年为千分之一十九点四）仍然高得多。——作者

要对它们作全面的了解；即使这样，在对待正确政策的问题上，也确实会有意见分歧。发给补偿金的办法，虽然可以有助于消除毛利族人的不满情绪（这种不满情绪使毛利族人的心灵过多地凝思其过去），但是光靠这种办法是不够的。虽然欧洲人能起巨大的帮助作用或阻碍作用，但任何解决办法，如果没有毛利族人作为他们自己的前途的建设者充分地参与其事，都是行不通的。许多年青的毛利族领袖的胆量和见识，为实现这么一种发展带来了美好的希望。

毛利族人面临着一个大问题。前文已谈及，为了使毛利族人有信心为自己作好准备，以便完全地参加到一个具有欧洲生活方式的社会中去，他们必须保持住毛利族文化的原有基础。"牢牢地保持着你们作为毛利族人的民族意识"——这是复兴过程中的一项不可缺少的政策。但这种做法可能产生一种危险，即被夸大为人为的守旧和过分强调毛利族人与欧洲人之间的差别。这就可
能妨碍毛利族人学会那些生活方式，使其能够完 118
全地和平等地参加到新西兰社会中去。现在的问题是，究竟是毛利族应该得到一种特殊类型的教

育并在经济生活中占据一种特殊的地位，还是与此相反，他们应该尽快地与欧洲人溶合在一起。这个问题主要是在毛利族人的民族意识和新西兰的一般生活两者之间求得恰当的平衡。在这一点上，白种人的活动和态度无疑会起很大的帮助作用。

第 三 篇
欧洲人经济生活的建立和扩展

121 # 第十三章　欧洲移民区的经济基础

形势

前面讲的主要是关于欧洲人与毛利族人的关系问题。随着移民区的增加和欧洲人活动的扩展迫使毛利族人处于防守的地位，两者的关系便变得尖锐化起来。在这场斗争中，装备较强的欧洲人势力取得了胜利，此后便成为支配新西兰的主要力量。我们现在必须转而叙述这个发展中的欧洲人社会（这个以欧洲生活为背景，却在一个陌生的新地方从事开拓工作的社会）的历史。

这个社会，曾不可避免地出现过一个不稳定的和困难的时期，其中有些情况已在上面述及。后来，逐步地建立起来了一个比较巩固的基础，特别是在南岛，那里在比较有利的条件下，发展较快，而这个时期的北岛，上面谈到的斗争却还在进行中。新西兰发展的基础主要是牧羊业，虽说黄

金也起过暂时的重要作用。到 1871 年，新西兰大约有羊一千万头，其大部份是在南岛。

战争的消耗和破坏，使新西兰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中，但跟着就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出现了一个大扩展时期。这一时期，新西兰的人口因移民 122
的迁入而迅速地膨胀起来，并且因主要地利用借款建立起来的交通系统而使新西兰得到了开发。不幸这一扩展演变成为一种不大健康的繁荣。它使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在新西兰出现的经济萧条变得更加严重，同时也显示出年轻的新西兰社会是多么严重地依赖于世界其它各地情况的变化。因为，约从 1873—74 年至 1895 年这一时期，同在此之前的约从 1850 年至 1873 年这一时期的保持高价景象比较起来，世界经济形势正是处在不稳定的时期。这一次的经济萧条同 1929 年发生的经济萧条一样，使当时流行于新西兰的那种生活和思想受到了某种冲击。

在恢复扩展时期，即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物价波动的那个时期，发明了应用于贮藏和运输易腐食物的冷藏技术，这对新西兰是极其重要的。供肉食之用的羊的饲养

业以及后来的制酪业均迅速地发展起来，以致它们在新西兰经济中终于比羊毛的生产占有更重要的地位。在北岛，许多地方的气候湿润均匀，对发展奶制品业特别有利。北岛的人口的增长也较南岛快得多。在南岛，大农牧场主的政治优势，这时受到了小农牧场主的挑战。运输业和工业的发展，往往同农牧产品的加工业和出口装运业息息相关，它们使得靠工资为生的人数增加了。这一点具有重要的政治后果。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出现的短暂的繁荣结束以后，世界形势处于不稳定状态，人们对于作为战前时期的标志的那种扩展和繁荣所抱有的信
128 心，多已消失了。我们在新西兰再一次认识到外部世界对我们的重要性。我们必须想出一切可能的办法，采取一切可能的行动，重新调整经济生活，使它适应正在变化中的世界。

对这些总的趋势有了一个概略的了解以后，我们便可以进而较详细地考察那构成历史的许多活动——在农牧业方面，在丛林方面，在矿业方面，在冷冻业方面，在内阁会议方面，在议会斗争方面，在组织选举方面。

寻找一个基础

人们从一个经济发达的社会移居于一个不发达的地方，他们面临的问题是：用什么方法能使自己的生活水平，比在原来的国家所能企望得到的生活水平更高一些。这通常就是他们所以甘冒危险、离乡背井、“深入不毛之地”的原因，不然的话，便只有出于逃避迫害，才会迁移到这种地方来。他们起初必须依靠自己带来的一些东西过生活，这些东西或者是供他们自己消费之用的物品，或者是能够同已在当地居住而且生产有剩余的基本必需品的人们进行交换的金钱或物品。但不久之后，他们便须生产能直接地和满意地供应自己生活需要的必需品，或者生产某些能够在海外换取自己所需物品的产品。要很好地种植或制作一些东西，使他们的产品能在海外获得市场，也许需要一些时间；如果这种“生产”所采取的方式是取得新地区原已拥有的、无需很多费用就能得到的某些资源，如木材或沙金，并利用这些东西去交换制造品和机器这类必需的进口商品，则获利当可较快一些。但这种办法也许会变成对大自然的一种 124

掠夺并且也不可能无限期地进行下去，除非这些资源的蕴藏量极大或者移民们注意对诸如森林之类的一些资源加以替换、补充。

我们能够在新西兰看到所有这些开创事业的方式。但是我们首先要注意到新西兰花费了多少时间才使它走出其幼稚阶段。1887 年以前，新西兰一般地是进口多于出口；1887 年以后，这种情况一般地就倒转过来了。这就是说，到 1887 年为止，新西兰人民不管是为直接需要而生产，还是为建设未来而生产，产品都不能满足消费的需要。他们的生活来源，一部份依靠移民们带来的金钱或物资（这些都是他们来到新西兰以前积蓄下来的），一部份依靠向海外借款。即使商品的进口和出口达到平衡，我们依靠我们的生产过活，仍然不能不负债。新西兰还是必需输出数量更多的商品，借以支付借款的利息和租用外国船只装载物资出口的运费等。只有在做到这一步的时候，这个国家的事务管理才能有良好的秩序。

新西兰在这个幼稚时期能够获得借款，这一事实说明了海外资本家（主要是英国的资本家）对新西兰能在经济上自立抱有信心。新西兰得到借

款的数额和资本家给予贷款的条件，任何时候都取决于这种信心的大小。

我们已知道，欧洲人于十九世纪初来到新西兰从事天然产品如木材、亚麻、海豹和鲸的贸易活动。这种贸易活动带有大量掠夺大自然的性质，关于海豹的贸易活动带有这种性质，尤为明显，而且这种贸易活动也难于使大规模的永久移民区建立起来。虽然如此，这种生产形式直到十九世纪末，在新西兰，特别是在北岛，具有很大的重要性。
例如，在奥克兰省，从1864年至1900年这一期间， 125
栲丽胶是主要的出口商品，到1900年以后它才让位于黄金。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止，木材一直保持着其重要地位，而亚麻也有几个占重要地位的时期。我们已看到，1861年在奥塔戈省以及1865年在韦斯特兰省发现沙金，给予南岛的发展以巨大的推动力，同时为其发展带来了人力和资本。

或许有许多早期在新西兰定居的移民，只想开垦土地进行混合耕种，以生产各种为他们自己所需要的物品，而不去考虑生产一些专供出口的商品。他们的这种做法充其量也是难于获致很高的生活水平的。而且这种做法还得有个前提条

件，那就是在移民们中间总得有一些人具有储蓄或收入这种形式的金钱来源。这些人在开始进行生产时可以靠此过活，同时也可以通过贷款给别人或雇用别人的方式而帮助别人谋生。政府的经费，例如用于筑路的经费，当然也能有所帮助。但英国政府在核拨经费上，向来是不会在这个殖民地本身能够筹集的数额以外另行慷慨拨款的。

虽然许多人的生活水平看来必定是简朴的，但这种生活水平较之英国给他们提供的有限的前景也许要美好些。他们能够吃得好，对儿女的未来满怀希望，这么一种健康的生活自胜于在烟雾弥漫的工业城市的工厂里受不稳定的雇用。

看来，韦克菲尔德的设想是建立一个在很大程度上自给自足的社会，然后逐渐推广，而另一些人（包括菲茨罗伊和乔治·格雷在内）则主张由比较分散的移民在小规模的基础上逐步创业，至少在那些有众多毛利族人居住的地区应是如此。尽管这两种设想有所不同，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即
126 认为人们应该主要是为了本殖民地内的消费而生产。根据这个生产方针，新西兰确曾取得了很大的发展，而这种发展对某些经营未加工的产品（如

木材和黄金）出口的人的工作起了补充的作用。当澳大利亚发现金矿时，它为新西兰的粮食出口提供了近便的市场，这便推动了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新西兰农业的发展。但是，这在新西兰只是一个短暂的繁荣，当澳大利亚的黄金寻找者受到挫折，重操农业，而使粮食生产扩大时，这种繁荣便消失了。虽说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新西兰有一个时期小麦出口占重要的地位，但一般地说来，在对欧洲的各巨大人口中心供应小麦上，它是无法与澳大利亚、阿根廷、加拿大和美国竞争的。

黄金和羊毛这两项出口商品事实上确曾推动了这个年轻的殖民地的发展。虽然到毛利族战争时期为止，北岛在人口和生产方面一直保持着它较早开始建立移民区所形成的优势，但是南岛却在黄金和羊毛的基础上向前发展，从而导致它在人口和生产发展方面，到十九世纪末为止，都走在北岛的前面。

黄金

南岛的坎特伯里省和奥塔戈省各移民区所遇到的困难，要比北岛的各移民区少一些。这两个

省的移民区，毛利族人较少，并且天然的困难也不多，因为这里有肥沃的平原和绵延起伏的丘陵草原，提供了美好的天然牧场和容易耕作的土地。这里没有北岛那样无法通行的崎岖山峦，也没有必须砍伐的丛林和必须排水的沼泽。从澳大利亚运来的羊群迅速地繁殖起来，提供了供出口之需的羊毛；而小麦和面粉则输往澳大利亚的采金区。因此，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期，黄金寻找者还没有大批涌入并推动这两个省的大扩展以前，它们就已经是巩固的和繁荣的省份了。

127 1861年，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这一年，有个名叫加布里埃尔·里德的加利福尼亚老矿工，在图阿皮卡地区的一个峡谷发现了一个可获利的金矿，他为此获得了奥塔戈省务会的奖赏。本迪戈和巴拉腊特两个矿区的最初的魅力已逐渐消失，因此，仅仅几个月时间，就有数以千计的热切而焦躁不安的黄金寻找者涌进了奥塔戈这个平静的省份。较早定居的移民们对这些新来者并不怎么欢迎，而这些新来者的确与那些曾将奥塔戈省建设起来的认真、严谨的苏格兰人很不相同。但是，没有任何预兆能够制止随后出现的迅速变化。全部

居民都染上了淘金热。

黄金寻找者的涌入，为奥塔戈的省库带来了意想不到的财富。在一年间，奥塔戈省的人口增加了一倍多，而该省在商品进口和黄金出口方面的关税收入增加了两倍。为了开发这些新矿区，必须修建一些公路。采金者们一批接一批地涌进来，他们遍察偏僻的乡村，希望能发现更丰富的金矿。

虽然如此，采金者们就其整体而言，并不都是幸运的。在溪谷和小川地带采得的每一盎司黄金，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奥塔戈省中部的山地不长树木，冬夜严寒，而可得到的木材过于珍贵，不可用于取暖；食物少而且很贵，在没有修好的公路上的马车装运费也很高昂。即使在达尼丁，面粉的价格也涨到每吨五十英镑，而在图阿皮卡，价格还要高得多。穷困和受苦并不局限于各采金区。1861年，奥塔戈省务会就收到一份由一千多失业工人签名的请愿书，要求以公费来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

事实上，从淘金热得来的主要收入并非为采金者本人所得，而是被那些供应他们伙食等生活 128

上需要的人取去。整个社会也得到了好处，因为采金者带来了大量的资金，帮助了新西兰的发展。首先是新西兰得到了数千个年轻力壮的移民。诚然，这些移民是不受很多较早定居下来的移民们所欢迎的，但是他们的到来，无疑加强了这个殖民地的力量。对于当时仍然统治着韦克菲尔德式移民区的贵族思想，他们往往是不表赞同的，因而在坎特伯里和奥塔戈两省，他们很快就打破了老移民们的排他性。他们来到新西兰以后，这个殖民地的面貌不同了，比过去进步了，但在某些人看来，却是变得不那么符合理想了。

由于坎特伯里省同淘金热的关系不是那么直接，上述新移民的到来反而使它变得比奥塔戈省更为富裕。坎特伯里省的面粉、肉类和奶油，被高价出售给奥塔戈省的金矿区。1865 年，人们在西岸发现了黄金，一批又一批的黄金寻找者从奥塔戈省源源来到坎特伯里省的克赖斯特彻奇，然后登山涉水，奔往格林斯通，再往南到达库马拉和霍基提卡，因之，坎特伯里省又从这些黄金寻找者那里得到了好处。三年间，坎特伯里省从黄金出口税中得到了大笔收入。1866 年奥蒂拉公路建

成后，人们因与韦斯特兰省进行贸易而变得富裕起来了。

因此，奥塔戈和坎特伯里两省，在经济方面比北岛远远领先。这两个省是比较富裕的，它们的土地资金是固定收入的一种来源，加上黄金税收和对激增的进口商品征收的关税，使两省省库更加富裕起来。两省人口的剧增，使它们能够控制全国议会，因而在以后的十年内分享到沃格尔借款①的最大份额。另一方面，塔腊纳基省、奥克兰 129
省以及在较小程度上惠灵顿省和霍克湾省，都在其发展的重要阶段受到了挫折，因而在进入二十世纪以前，南岛一直都是左右新西兰的力量。

羊毛

把绵羊引进新西兰的是一些早期进行传教工作的移民以及在1840年英国宗主权扩大到新西兰以前就在新西兰作永久定居的海湾捕鲸者和其他冒险家。根据现有的记载，1839年曾有过一小批羊毛由南岛的一个牧畜场运往霍巴特售出，但也

①关于“沃格尔借款”是什么一回事，详见本书第十四章。——译者

可能在更早时期已有出售羊毛的其它事例。一些比较重要的开发工作乃是由新西兰公司在惠灵顿的一些移民所开辟的。他们看到在该公司的计划的范围之外，还有发展的各种可能性。早在1844年，C·R·比德韦尔从澳大利亚进口三百五十头美利奴绵羊，沿着崎岖的惠灵顿东海岸，把它们赶到（有些地方是载运到）帕利泽湾，然后沿山谷而上，直达怀腊腊帕平原。不久，比德韦尔的三个堂（表）兄弟也仿效他的做法。这三个人是：查尔斯·克利福德、弗雷德里克·韦尔德、威廉·瓦瓦苏。克利德福后来是新西兰众议院议长，韦尔德于1864年担任总理，后来担任西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及海峡殖民区的总督。实际上，他们三人在比德韦尔之前就已把羊群安置在怀腊腊帕平原。1847年，他们又从澳大利亚运进三千头羊，横越库克海峡在安德伍德港上岸，这个港口位于后来建成的马尔巴勒省境内。接着他们使这些羊横越怀劳河和阿瓦特雷河，在弗拉克斯伯恩建立了一个饲养站。早在1851年，克利福德已在胡鲁努伊（位于后来成为坎特伯里省的北部）建立了一个斯通尼赫斯特饲养站。

1843年，在更远的南部——班克斯半岛开始 130
饲养羊群。澳大利亚的私占公地牧羊场主，由于遭到旱灾和经济萧条的打击，也被吸引到坎特伯里省来了。他们领到牧业执照，在坎特伯里省建立了一些大型牧场。最初这些大型牧场是在坎特伯里协会所属的移民区（即施行韦克菲尔德体系的移民区）以外的地方建立起来的，后来却发展到在该协会所属的移民区以内建立起来了。戈德利不久就看出，鼓励发展牧畜业和羊毛出口业，对移民区将有很大的帮助。因此，他于1851年放宽了在坎特伯里协会所属的移民区内租用牧场的限制。

在新西兰的那些气候比较干燥、地形比较开阔的地区，人们可以把羊群赶到天然牧场上放牧，因而毋须花费巨大费用或劳力，就可以迅速地得到收益。羊群迅速地繁殖起来了；严重的旱灾极少。因此，只要保持得住海外市场，以养羊来生产羊毛，便是这个年轻的殖民地取得经济上自立的一个最好途径。

1861年至1871年这十年间，新西兰的黄金的出口值大于羊毛的出口值；但是即使在这十年里，

羊毛的生产仍然是最重要的工业，这大概是确实的。因为在沙金被采竭之后，羊毛业已具备更牢固的基础，所以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羊毛再一次成为重要的出口商品。各牧场因播种青草而不断得到改进，对羊种也不断加以改良，而每头羊可供出口的羊毛，从1858年的二点五磅增加到1871年的三点九磅。

新西兰人民认为，他们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羊毛市场的状况，特别是依赖于约克夏①的大规模羊毛织造中心的状况，这是不足为奇的。同样，在这些年里，新西兰议会为大地主（主要是南岛的牧羊场主）所控制，这也是不足为奇的。

①约克夏（Yorkshire）是英国苏格兰北部的一郡。——译者

第十四章 沃格尔政策 131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期

在南岛发现金矿，曾多少有点人为地推动了新西兰的发展。新西兰的欧洲人口，从1860年的七万九千人增加到1866年的二十万零四千人，其中有移民三万五千多人是在1863年来到新西兰的。出口值从1860年的大约五十万镑增加到1867年的四百五十万镑以上。但是到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期，容易得到的沙金日趋枯竭，由于黄金寻找者的涌入而造成的美好时代也消逝了。即使在淘金热方兴未艾期间，也有大量的失业现象存在。黄金的生产原是用以支付进口商品和地方生产事业的费用的，现在黄金的生产正在衰落的时候，南部各省激增的人口究竟怎样才能找到一条生计呢？

与此同时，北岛的发展由于战争而受到了阻碍。有些人从军事行动所包含的非生产费用中得

到了利益，而这种非生产费用的一部分是英国政府支付的。现在，主要的作战行动已告结束，而经费的负担业已转移到新西兰自己身上。新西兰政府为了支付它承担的经费份额以及对武装移民区提供经费，除了小额借款以外，还向英国借款三百万镑。英国投资者一直是不热心的，新西兰费尽
132 周折才获得这笔借款。当时曾有一种乐观的设想，认为出售已没收的土地和增加关税收入，可以支付利息和偿还债务，但这种想法是不正确的。因此，在黄金繁荣转趋衰落时，这笔借款更使得新西兰在平衡收支方面成为问题。

此外，各省也因从事发展工作而债台高筑。除了坎特伯里平原以外，新西兰的地势大都崎岖不平。这一点，加上浓浓密密的灌木林覆盖着许多山峦和峡谷，使交通系统的建设成为一项耗费巨资的工作，而建设交通系统是会给需要购买土地的移民们提供通路的方便的。1856年，各省与中央政府作出一项安排，由各省接管公共土地的出售事宜。这就为一些省份，特别是为南岛的一些省份，提供了一笔可观的收入，使它们能以此作为担保，举借款项，从事发展工作。这复吸引了移

民们的兴趣，他们于是购买土地，因而使各省从出售土地所得到的收入有了增加。

由开采黄金引起的繁荣景象促使南方各省增加借债，其它省份也相率仿效。各省的借债同中央政府寻求向英国金融家借款是同时发生的。这不仅增加了新西兰人民的债务总额，而且由于竟相借债的结果，造成了利率的提高。在某些情况下，各省政府不得不支付高达百分之十的利息。1867年的一项法令才消除了这一弊端，该法令规定，由中央政府接管各省的债务，并禁止各省继续借债。1870年，新西兰的公共外债达七百八十四万一千镑，其中三百万镑以上是由各省负下来的债务。

因此，刚好在1870年稍前，就已经出现了一个困难的局面。战争的费用本身就是一个负担。
同黄金的发现相关联的繁荣景象的衰落，意味着 133
各省在债务方面的负担，比起它们先前满不在意地借债时所意识到的负担要重得多。失业人口不断增加，而国家岁入则日益减少。

沃格尔的借债政策

一种明白可行的政策就是削减政府和私人的

支出。根据这种政策，人民得缩减进口额，并且须满足于较低的生活水平。不幸的是，这种明白可行的政策执行起来显得很不平衡。需要牺牲的往往是那些最没有东西可以牺牲的人。看来那些既无土地又无机器，只能靠工资为生的人，多半就会遭到失业。此外，他们为了平衡收支而缩减支出，必然就会减少对别人所生产的商品的需要，其结果是，农场主推销其产品的市场缩小了，制造商无法销售其产品，因而裁减更多的工人。这样一来，经济萧条现象就会变得愈加严重。

曾有一个人挺身而出，拟订了一项政策，声称这项政策可以避免上述现象。他申辩说：象新西兰这样的国家，蕴藏着大量尚未开发的资源，人们应该对它的前途充满信心。现在，政府花费大量资金于开发这个国家，从而使人民可以用自己的劳动来开发全国的资源，这种开支只应被视为一种投资。这样，许多人就有可能在新西兰自立谋生，而与此同时，这种开支还可以为那些早已移居新西兰的人提供就业的机会，并堵住经济萧条的上升浪潮。

这项关于开支和发展的政策，其倡议者是朱

利叶斯·沃格尔（即后来的朱利叶斯·沃格尔爵士）。他是随第一批黄金寻找者来到新西兰的移民。他创办了《奥塔戈每日时报》，是该报的首任编辑。他在该报发表过拥护各省反对中央政府的 184
主张，并一度倡议南岛同受到战争摧残的北岛分离。他以成为奥塔戈省务会的一个成员而崭露头角，并曾作为达尼丁的代表被选进全国议会。1869 年，他在威廉·福克斯爵士所组成的内阁中担任财政部长一职。正是在他所制定的 1870 年预算中他提出了其政策。他主张，用于发展事业上的资金，应向英国金融家告贷。他建议在一个为时十年的时期内应借款一千万镑。这笔借款的一部分将用于修建铁路和公路，这种修建工程过去主要是由各省负责的，现在则应由中央政府接管起来。一部分借款将用以输送移民来新西兰，其中许多人在确定立足于土地谋生或从事其它职业以前，将受雇在新的公共工程中工作。由于人口的增加，就有可能兴办各种新的工业并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沃格尔还打算把新建的公路和铁路所开辟的地区内的大约六百万英亩公共土地（当时还是由各省掌握的）看作是一项巨大的国家

资产，随着移民区增多，国家的岁入便可以从中得到增加。同样，他认为森林也应作为未来经济发展可以信赖的一个项目而加以精心管理。

沃格尔的政策受到少数老移民的一些批评，但一般地说来，它是受人们支持的。事实上，由于人们对该政策期望过高，因而未能按照沃格尔的原计划范围执行这一政策。各省贪得无厌，互相争夺已借到的款项。在全国议会中，各省的领导人否决了保存公共土地的规定。他们不让中央政
135 府控制这些土地。他们为了使省库马上得到收入，竟然出售这些土地。这些土地往往落入投机商之手，然后又被用高价转售出去。利用这种损害公共利益的交易，从中获利，在各省的政治家中，某些人也并不是没有嫌疑的。1876 年，各省的地方分权派否决了一项森林保护法案时，沃格尔曾抓住机会加以报复，导致了省建制的废除。这个问题留待以后讨论。

沃格尔政策的影响

政府推行沃格尔政策将近十年之久，虽然在这十年间，并非全由沃格尔本人执政。他自 1873

年至1876年担任总理，除1874年为了接洽借款问题去英国访问以外，一直都没有离开过其职位。1876年，他离开新西兰前往伦敦，担任新西兰驻伦敦总代表。虽然乔治·格雷爵士在1877年至1879年间担任内阁首脑，但这届内阁不是一届很有成效的内阁，而且直到1880年为止，借债的欲求还是强烈的。在这个时期内，借债已不是一千万镑，而是超过了二千万镑，国债增加了将近三又三分之二倍，而与此相对照，新西兰的欧洲人口则增加近一倍。如果生产有相应的增长，则平均每人的债务的增加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但事实上在同时期内出口值只增长了三分之一。其部分原因是价格下降，但据估计，连这一点也考虑在内，平均每人的产量还是下降了约百分之十六。

这样，事情是分明的：这个庞大的规划没有按原定计划完成，而新西兰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遭受的经济萧条，因巨额借债遗留下来的负担而变得更加严重。我们知道，这种困难的发生，其部分原因是各方面开支过滥所造成的压力。各省都有 186
庞大的发展计划。正如沃格尔1875年在伦敦出版的一本手册中谈到的那样，各省对发展计划都

抱有过高的希望。例如，坎特伯里省有一条从罗尔斯顿联轨站至马尔文（谢菲尔德）的铁路线，该省打算把“终点设在紧邻煤矿和铁矿矿床之处”。其实那里只有几个小小的褐煤矿，而且大部分已经采竭；在马尔文山区根本就没有发现过什么铁矿。投机买卖活动强使土地价格高于实际价值，而新的工业则是在暂时繁荣和人口增长的基础上兴办起来的。

借债刚好出现在羊毛和兽皮这类产品的价格上升的时候，因而造成了一部分假象，好象经济繁荣的恢复是由于借债所造成的。这就助长了过于乐观的情绪，并使人们失去了警觉性。1874年，羊毛和其它产品的价格的暴跌，就是可能出现麻烦的第一个警告。这次价格暴跌，是持续到大约1894年为止的长期价格低落的开端。这次经济萧条的原因，我们将在下一章加以论述。

但是，1874年的这一警告并没有受到人们的重视。更多的借债给人们带来了继续繁荣的印象。移民继续涌入新西兰，从1875年至1879年，每年平均将近有一万五千人涌入。1875以后，出口额虽然稍有增加，但在1878年进口额达到的数字却

是直到1900年为止的最高数字。次年，即1879年，情况依然如此；但此后借债再也掩盖不住新西兰已经出现的经济萧条了。人们的生活更加穷困，艰苦的劳动只能换得更为微薄的报酬，这就是新西兰为借债而付出的代价。

沃格尔受到许多指责。人们认为，他好象是一个热衷于个人利益的投机商。在他为政府的财政问题访问英国期间，他滥于开支，热衷于私人事 137
务，说明他缺乏某些作为一个负责任的领导人所应具有的品格。这并不是说，他的政策，就其原初所设想的形式而言是坏的。不幸的是，普法战争后首先出现了商业上的某种繁荣，这种繁荣对新西兰公众产生了陶醉的作用，随后却又在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经济萧条。这种情况的出现是难以预见的，虽然关于事情的后果本该在较早一些时候便有所觉察。

再则，不管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出现的困难由于七十年代的过多借债而受到怎么样的夸大，沃格尔的政策确也为新西兰完成了对以后年代最有价值的各项公共工程。如果没有这些公共工程，在经济萧条过去以后，新西兰的发展势必遇到很

多障碍。新西兰的天然条件是困难的，公共工程的建设必然耗费巨大，而且不可能在一种严格的商业基础上来进行这种建设。从公共工程的建设中得到的收益，以国民生产的形式计算之，只能是缓慢的，这就需要沃格尔计划的果断，才能为了遥远的未来利益而把这些公共工程建设起来。人口的增加，也意味着在经济条件改善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有希望达到较高的生活水平，因为有了较稠密的移民区，花同样数量的费用(例如花在修建公路上的费用)，便可使更多的人分享到这种建设所带来的利益。

新西兰的铁路系统，可以说是根据沃格尔计划开始建设的。1870 年，新西兰通车的铁路线只有四十六英里；到 1880 年，铁路线约有一千二百英里，而到 1887 年它已超过了一千七百英里。较早的铁路线都是在没有全国性计划的情况下分别由各省修建起来的短线。现在制订了修建全国铁路干线的计划，虽说北岛的主要铁路干线实际上
138 到 1908 年才被建成。沃格尔在 1870 年也为通往旧金山的轮船运输业作了安排，这就大大加速了同英国的邮件联系，因为第一条美国横贯大陆的

铁路，即“联合太平洋铁路”，已于1869年建成。1873年，以地方资金设立了新西兰航运公司，其总部设在利特尔顿，因之，新西兰的航运事业也得到了改善。两年以后，在达尼丁成立了“联合轮船公司”，为新西兰沿海一带的贸易以及它和澳大利亚之间的贸易服务。1876年，敷设了一条由新西兰通往澳大利亚的深海电缆，从此，新西兰可以通过现有的海底电缆，与欧洲和美国取得联系。

值得注意的是，各航运公司都把它们的总部设在南岛。正是南岛提供了主要的出口地点。南岛的人口较多，能从借款的支出中分享到可观的份额，这或许也是必然的。南岛的地势平坦，建设工作较易于进行，建设费用也比较低廉。尽管如此，北岛的公路对于以后的发展事业也是有所帮助的。

废除省的建制

在讨论经济萧条时期以前，有必要进一步阐明废除省的建制的问题。长期以来，省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是棘手的。它们的职权范围没有明确规定，虽然中央政府一般地具有凌驾一切

的权力，但是各省力图包揽权力的事情却早就开始了。各省的省督和省务会的领导人，通常都被选进众议院，他们在众议院总是倾向于维护本省的利益。由于各主要中心区的起源和条件有所不同，彼此之间的交通有困难，加上各自的发展步调与形式也不相同，因而愈益加强了这种倾向。同
139 时，又由于南方各省都得到了发展，而北岛的发展则遭到战争的阻碍，因而这种倾向更是变本加厉。南方各省反对要它们分担那种妨碍它们的发展并且似乎与它们无关的责任。人们甚至还议论南北分治的问题。显然，各省很少具有利害一致的观念。

“1856年协议”使各省受益不少。根据该协议，它们接管了处理公共土地、办理移民事务和建设公共工程的权力，以换取从出售土地所得到的收入和最低限度的八分之三的关税收入。这至少对这样一些省份是有好处的，即在这些省份内，当时土著居民的土地已剩下不多，却有着大量的公共土地尚未出售，并且那里的自然条件比较好，又没有毛利族人，因而易于定居。这些省份发展很快，尽管有时花钱未免过多，但在公共工程和教育

事业方面却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例如，奥塔戈省1869年建立了自己的大学，而坎特伯里学院则于1874年建立起来。新西兰的第一条铁路于1863年从克赖斯特彻奇通车至费里米德（希思科特），而四年以后，波特山下隧道的竣工，开辟了一条通往利特尔顿的铁路线。同年，又增辟了一条从英弗卡吉尔到布卢夫的铁路线。1863年，奥克兰的铁路建筑工程开始动工。

根据1858年的一项法令，霍克湾省和马尔巴勒省于1859年成立，而索思兰省则成立于1861年，于是新西兰的省份增加了。韦斯特兰从坎特伯里省分离出来成为一个县，经过六年之后，也于1874年成为一个省。索思兰省由于负债累累，无法清偿，不得不卸下负担，于1870年重新并入奥塔戈省。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已明白了，在时势顺利的时候，各省不顾国家的整体利益，一意追求各该省的地方性利益，显然已超出它们的能力的限 140
度。它们在财政上变成要依靠中央政府积累的收入，而随着移民区的扩大，人们需要全国性政策而不需要地方性政策，已是明显的了。当各省的利益对沃格尔的政策发生了干扰而使事情达到了严

重关头时，就不可避免地要进行一些改组的工作。沃格尔，这个原先是一个热情的地方分权派，这时便通过了撤消各省省务会的法令。

中央集权化的结果

对废除省建制这一变革，并不是没有大量的异议的，那些老一辈的移民首先就反对它。乔治·格雷爵士从他退隐的地方卡渥岛东山再起，为维护主要是由他创建起来的省建制而斗争。他在1874年担任奥克兰省督，并且当选为众议院议员。这样，他就在他两次当过总督的国土上成了一个平民。作为一个民主派的政治家，乔治·格雷显示了他的性格上新的一面。他具有演说家的口才，在新西兰各地拥有许多热情的听众，但他的雄辩并未能阻止这一变革。再则，在几个月后当他担任总理的时候，他也没有作出任何努力使各省省务会获得恢复。

省建制有许多严重缺点，因而必须维护中央政府的最高权力，这是没有疑问的。从许多方面来看，这也成为一种必要性。省建制不仅机构臃肿和耗费大，而且在处理一些政策性的重大问题

上，各省有着缺乏划一性的巨大危险。各省修建的铁路，都是一些从乡村地区通往主要城镇的短线。要做到有可能计划修建现在横贯全国的铁路 141
大干线，国家统一的管理是必不可少的。还有许多类似的事情，从全国的观点加以处理比从各省的观点加以处理更为可取。

在省办的公共事业显得不够完备时，有必要代之以建立起国办的公共事业。在纳尔逊省、坎特伯里省和奥塔戈省，教育事业曾有良好的开端，但其它省份在这方面则是落后的。在南方各省，每一省均拔出充足的储备金专用于教育事业，并且在南岛，由于开始建立移民区时没有遇到什么困难，使它有可能及早设立学校。特别是纳尔逊省，在移民们定居以后不久，就建立了一套完备的初等教育制度。

不过，当各省遇到了财政困难时，教育事业便成为首先被紧缩的公共事业之一。因此，在各省务会撤消之后，中央政府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为整个殖民地建立起统一的教育制度。这项任务由1877年的教育法加以解决了。该法建立了同我们现有的制度有许多相似之处的初等教育制度，

即“普通的、义务的和公费的”初等教育制度。当时在全国实行公费的教育制度，是一种大胆的试验，它使人们把新西兰看成是一个在教育事业方面很先进的国家。

省建制的彻底废除，曾不时引起人们的批评。人们认为，在中央政府和象镇务会和县务会这类较小的地方机构之间，有必要建立起某种中间机构。由于地方机构为数很多，有时又是在同一个地区工作，因而在处理密切相关的共同福利问题上，往往会引起摩擦和缺乏协调。1946 年设立了地方政府委员会，并于 1953 年把它确定为常设机构。根据地方政府委员会的各种建议，已导致了进行某些改组。

第十五章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经济萧条 142

价格的下跌

1875年以来，新西兰的羊毛价格一直在下跌，到了1879年它的下跌更为显著。新西兰主要依赖羊毛这一商品的出口，借以购买必需的进口商品，而羊毛价格的下跌对这一出口商品实是一个打击。这次羊毛价格的下跌，是新西兰进入一个暴露其发展上的许多弱点的漫长而困难的时期的开始，并成为新西兰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这一次的经济萧条显露出在经济生活上新西兰与世界其他各地之间有着密切关系。经济萧条的原因是很复杂的，对此的争论又很多，不是简单陈述几句就能说得清楚的；但有一个方面却值得加以注意。

世界各国已经建立起来的农产品加工工业，都开始感觉到来自北美和俄国的新开辟平原的竞

争的压力。这种情况的出现，乃由于铁路、轮船的改进，使海陆运输费用有所降低而始有可能。在1861年至1865年美国南北战争以后，美国在中西部未开发的大草原上修建了铁路。俄国在1861年废除了农奴制度以后，其经济生活中有了比较浓厚的商业气氛，铁路修建以后这种气氛更有所增长。美国和俄国的谷物这时开始源源涌入欧洲市场，特别是在欧洲经受了1864年至1871年普鲁士战争的破坏作用以后，更是如此，所以价格不断地下跌。

143 造成价格下跌还有其他原因，采用金本位制是其中之一。金本位制（英国从1819年起即已采用）最初由新兴的日耳曼帝国采用，后来其它一些国家相继采用，其中包括美国在1873年采用此制。当时，纸币和支票并不象现在这样通行，因此，当某些重要的国家突然采用黄金作为它们的货币时，便造成其它国家黄金储备的短缺。黄金货币不多，但货物的生产却稳步增长。因此，用同样数量的货物只能换取比较少的货币，换言之，这是价格下跌。从1873年到1894年，全世界普遍地保持着低价格。

由于北美的生产有了大幅度的增长，农产品的价格较之其它物品的价格跌得更凶，因而世界各国的农产品加工工业受到严重的影响。在新西兰，由于沃格尔的政策造成的繁荣，曾使人们指望继续保持高价格和容易得到的繁荣，因而困难增加了。指望羊毛继续保持高价格的牧羊场主们，曾以高价为自己取得土地。当羊毛价格下跌时，他们的抵押借款就显得太重，并且常常无法支付利息。

各商店也是如此。它们原来为了供应富裕农牧场主的伙食等需要而把业务加以扩大，现在由于顾客减少，就感到无法支付房屋建筑费的利息和赊来的存货的利息。一间间商店相继遇到困难。最后连银行也陷入困境，因为向银行借债的人都还不起债务。各银行确应自负其咎，因为根据一般银行实际工作经验，它们是不能如此随便向外放债的。最糟糕的一个事例是新西兰银行（新西兰最大的金融机构），它在1894年不得不依靠政府的援救，使自己免于倒闭，否则便会有数以 144
千计的人因此倾家荡产。

长期的经济萧条，使这个殖民地的公共财政

也受到严重影响。当一个国家的公民不富裕时，税收便立即减少。在当时以至后来许多年内，国家岁入的大部分是依靠进口税。1888年，由于处在困难时期，新西兰的进口额，按人口平均计算，还不到十年前的进口额的一半。其它的岁入来源也同样缩减了。

另一方面，在繁荣过去以后，只有支付高利率的利息才能借到债款，因而每年要支付的利息单的数额增加了。即使不存在高利息的现象，价格的下跌也会造成偿债更加困难。新西兰必须出口更多的羊毛，才足以向英国支付每百镑到期的利息。

政治影响

如果我们只考虑国家财政问题，我们将会觉察不到这些年来经济萧条的许多后果。这是绝大多数人遭受贫困和苦难的年代，而时光一年一年地消逝，好景却依然渺茫得很，这便不由得不引起人们深思。难道除了勉强过活，忍受苦难，坐待好景到来以外，人们就毋需再有所作为了吗？在现有的生活秩序中，有无不合理的地方，其革除将会

赋予人们更好的机会去从事心愿的工作，并从中取得更佳的报酬呢？因为有很多人失业，而当有失业的时候，那些就业者的工资也就被压低了。我们已知道，绝大多数人是在淘金热时期来到新西兰的，而沃格尔的移民政策引进了许多工人则 145
是基于这样的一种假设，即事业的发展将能为这些人提供取得富裕生活的机会。现在，他们之中有许多人只感到前途一片暗淡。从1888年开始，四年内离开新西兰的人比迁入的多了将近一万四千人。这就表明新西兰是多么地失去了它对前来定居者的吸引力。

正是上述的这些情况激发了人们的思想和组织活动，使得一个重大的政治活动应运而生。为了解决因经济萧条而暴露出来的问题，1891年至1912年执政的自由-工党实施了一项立法纲领，引起了全世界对新西兰的注视，把它看成是社会试验的中心。新西兰进入了政治和经济发展的新阶段。为要了解这些变化，我们必须注意以下问题：有关土地所有制和土地利用等方面的土地问题；有关那些没有土地而在不断发展的工业、商店和运输系统中靠工资为生的人的问题；有关那些

在这样一个日益复杂的世界中其本身并没有错过、却备受折磨的人的问题。我们也将看到冷藏技术这一伟大的新发明的重要意义。

“连续内阁”

在探讨自由-工党的兴起之前，我们必须研究经济萧条时期的政治形势。以前新西兰在政治上不存在任何明显的党派区分。许多问题曾引起争论，例如成立责任制政府问题，处理土著居民事务和处理毛利族战争问题，解决地方分权派和中央集权派之间的摩擦问题，但是都没有根据利益的不同或原则的差异而形成巩固的党派。新西兰曾
146 经有过一些杰出的人物，但他们结成的集团都已起了变化。

在实施沃格尔的政策所带来的繁荣时期之后，历届内阁的当务之急是设法使各年度公共财政达到收支平衡。从1879年至1891年，在新西兰执政的是那个所谓“连续内阁”。直到1890年为止都不外是一些部长来来去去、入阁出阁的局面，没有可能建立可以互相替换的政府。在这期间的各届内阁实际上不过是在原班人员中互相调换职

位而已。

这个时期的杰出人物是哈里·阿特金森爵士。他几乎在这一整个时期都主管这个殖民地的财政。只有老练的乔治·格雷爵士才有可能组成一个对阿特金森来说是有力的反对派。乔治·格雷具有一些新的思想，这些思想后来在新西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从未消失。从1877年到1879年这一期间，他实际上担任了新西兰的总理职务。但是他的性格如此乖僻，又有如此盛气凌人的作风，以致没有一个人能够同他共事。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最后变成了“孤家寡人”。

1884年至1887年，朱利叶斯·沃格尔爵士同罗伯特·斯托特（后来成为罗伯特·斯托特爵士）一起重新执政，“连续内阁”便中断了三年之久。但这届内阁没有统一的政策，政绩甚微。由于有了约翰·巴兰斯和斯托特参加内阁，这届内阁便在乔治·格雷爵士于1877年至1879年主持内阁期间曾试图贯彻的自由思想体制与自由-工党于1891年的开始执政之间，起了一种桥梁作用。

虽然阿特金森本人具有某些自由主义思想，

并且试图引进一些立法，在某种程度上比以后的社会保障立法还先走了一步，但是他领导的政府
147 主要是根据大地主的利益而行事的。担任新西兰议会议员多年的艾尔弗雷德·桑德斯在其所著的《新西兰史》一书中谈到：阿特金森是新西兰第一个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总理；阿特金森自己“宣称是持有民主主张的人，但是他总是成功地获得最反对沿着民主主义方向前进的寡头政治集团的支持”。

不过，阿特金森在反对派的力量日益强大的时候，确实也通过了一项使他的许多支持者疏远的措施。他对公众的要求作了让步，并于 1888 年突然实施了一种开创先例的关税税则，旨在保护新西兰的各种工业，而不在增加政府的岁入。这些工业大多数是经济繁荣时期的产物，当时大量涌入的人口和充足的资金都是促进地方制造业的发展的因素。长期的经济萧条，严重地打击了这些年轻的工业。工资低，工作条件恶劣，而且还有大量的失业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工人和雇主双方自然都要求政府能采取某种保护性措施，对廉价进口商品的竞争加以抵制。但这样做，却违背

了那些支持阿特金森的大牧羊场主的利益，因为现在羊毛的价格低，牧羊场主需要廉价的进口商品。于是，就在一个反对大地主统治的新政党正在形成的时候，阿特金森的这个行动使他的支持者们发生了分裂。这个新政党的党员支持阿特金森的保护性关税税则，并投票赞成它。

从1888年至1890年，不管冷藏技术已开始对新西兰有所帮助，经济萧条还是达到了其最恶化的地步。现有的政府看来无法给社会上各重要部门带来援助或希望。因此，毫不奇怪，在1890年大选后召开的新西兰议会中，阿特金森发觉他没有赢得议会的多数议席。1891年1月，在约翰·巴兰斯领导下的自由-工党执政了，这是新西兰 148
历史的一个紧要关头。新政党有一个有关解决经济萧条中出现的种种问题的政策纲领。新政党既带来了新的思想，又把许多新人物带进了新西兰议会，他们代表普通的人，而不是代表那些早期在新西兰发迹起来的、每每具有优雅的英国生活背景的人。现在，我们必须回顾一下这个新政党是怎样形成的。

149 第十六章　自由-工党的兴起

主要的支持力量

在新西兰的大发展时期，自由-工党执政达二十年之久，它的根基是建立在处理土地和劳工问题上。支持这个党的有小农牧场主，那些希望自行负责、置业务农的农业工人和城镇的那些指望得到土地、使自己确能享有自己劳动成果的人。站在对立一方的是占有大面积土地（通常是用作牧羊场）的人们，而他们对土地的占有已被看成是一种障碍。在经济萧条期间，这些人的土地有时落到了如银行这类金融机构手中，因为在繁荣时期，这些金融机构曾向他们放债。这些金融机构为了要收回它们出借的款子，往往不愿意出售这些土地，除非它们能以普通人所不能支付的高价售出。

支持自由-工党的还有城镇的工人和他们参加的各工会。在经济萧条时期，工人们备受困苦，

但地主们对他们的困难却漠不关心。这一点可以从地主们如何冷待阿特金森提出的某种形式的社会保险计划的态度中表现出来。小商人和制造业主也希望这个新政党能带来一种改进。

现在我们必须回顾土地和劳工问题是怎样产 150
生的，自由-工党的政策又是怎样制订起来以期解决这些问题的。

土地问题

我们已看到羊毛成为如何重要的商品，人们无需花费大量的时间和劳力就能把它生产出来，用以支付进口商品的费用。象空旷的丘陵地带这类广阔的地区，是适于羊群的放牧的。其结果是在新西兰产生了一个拥有相当多财富的大地主阶级，他们在新西兰政治中具有最重要的影响。在经济萧条时期，小麦的生产曾有助于弥补羊毛价格下跌的损失，但为了加速取得利润，这项生产也是在大面积的土地上进行的，而不是在小型农场上以集约的耕作方法进行的。因此，大地主依然保有其自己的土地。

韦克菲尔德和早期的历届总督，都不欢迎关

于设立大型农场的思想。虽然韦克菲尔德曾设法用“充分的价格”来防止劳动人民立刻得到土地，但他也希望土地价格能高到足以不让人们购买大面积的土地，他并且试图采用一种出售土地的办法，防止人们单纯为了日后以高价出售的目的而购入土地。

但是，韦克菲尔德政策尚未执行多久，澳大利亚的牧羊场主就来到了新西兰，并开始在新西兰公司及其附属移民区的人口较稠密的地区范围以外占用荒地。在澳大利亚，“私占公地的牧羊场主”与新南威尔士早期的历届总督之间进行过的多年斗争是很激烈的。第一批澳大利亚的“私占公地的牧羊场主”都是那么一些人，即他们离开海岸附近的移民区，以期越过崇山峻岭，进入内地平
151 原。他们在内地平原上居住下来，并在荒无人烟的广阔地区放牧羊群，既不需付出任何费用，也不需申请土地所有权。他们的羊群成倍地繁殖起来，而且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已变成了富翁。虽然原来的“私占公地的牧羊场主”并不是地主，但是目前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私占公地的牧羊场主”这个词已被用来泛指任何富有的地主了。

为了对擅自占用公地加以某种控制，澳大利亚各移民区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初期曾推行了一种牧业执照制度。1842年，这种制度有所改进，并被引进了新西兰。根据这个制度，占用荒地者每年要交纳少量款额作为执照费。

因此，在所有的移民区，特别是在坎特伯里省和奥塔戈省，只有较小面积的土地是按照韦克菲尔德计划以高昂的价格售出，而在这些小面积土地的范围之外，却有许多大面积的牧地，由持有每年可更换一次的牧业执照的人使用。

乔治·格雷爵士强烈地反对韦克菲尔德的"充分的价格"原则。他早年在爱尔兰的经验，使他深信建立一种只有社会中比较富裕的阶级才能拥有土地的制度，必会产生种种恶果。1853年，乔治·格雷得到了实现其思想的机会。1852年的有关实施宪法的法令结束了英国政府对土地出售的控制权，并在新的全国议会召开以前赋予总督以某些职责。1853年初，乔治·格雷便抓住这个机会来降低英国王室的土地的价格，只有坎特伯里协会和奥塔戈协会控制的地区除外。他把土地的价格降低到每英亩十先令，在某些情况下，降低到每

英亩五先令。乔治·格雷这样做，是因为他已经能
152 够从怀腊腊帕和南岛的毛利族人那里购买了大面积的土地，也是因为他急于要使那些没有多少资金的劳动人民能够买到足够的土地而变成农场主。

乔治·格雷还设想过，应该采用一种征收土地税的办法来防止少数人购买大面积的廉价土地。作为一个总督，他是无权这样做的；可是全国议会召开时，也没有按照乔治·格雷所设想的方针采取行动。土地出售的控制权落入了省务会手中，而省务会也没有采取防止措施。实际上，乔治·格雷发布的公告的影响是，"私占公地的牧羊场主们"由于担心移民区的发展不久会剥夺他们按牧业执照拥有的土地，便开始用低价购买大面积的土地。这时，他们对小移民的利益便构成了更大的危险，因为他们已变成了真正的地主，而不是仅仅被准许一年又一年地使用土地的人了。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大量借债进一步助长了土地的积聚。这时候土地买卖激增，尤以坎特伯里省为甚，大量可利用的土地都被人购去了。这些土地常常得不到适当的利用，而只是被买来作为投机买卖之用或防止落入别人手中。已经建立基业

的牧羊场主，不一定要对此负责。肆无忌惮的投机商们试图把所有带关键性的土地买光，可是按牧业执照经营的牧场，一旦失去这种带关键性的土地，便将沦于毁灭。投机商们想日后迫使牧羊场主按被抬高了的价格向他们购买这些土地。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许多牧羊场主便不惜以相当大的代价购进了较多的土地。但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在这场争夺中往往败于投机商们。总的结果是造成了土地价格的上涨，同时，正当数以千计的移民被运送到新西兰的时候，也妨碍了实现较密集的移民定居。

“私占公地的牧羊场主们”关心于阻止实现较 153
密集的移民定居或制止投机商的活动，更甚于关心为自己的牧场所占有的土地取得合法的所有权。他们采取了种种不良手段，使他们不必购买土地就能控制其所需要的土地。有时候，他们把整片土地用栅栏围住，或者购买一块块狭长如带的土地，把大片土地包围起来，使别人无法进入，因而他们就可以毫无疑问地利用这一大片土地了。另一种手段叫做“精选土地”。这包括买下肥沃的山谷和河溪，使新来者只能得到没有任何水

源的秃山。

在其它的情况下，他们采用各种各样“冒名顶予替”的方式，利用政府为鼓励移民区的发展而给移民以土地使用权的机会，诱使许多人充当他们的“冒名顶替”者。这样一来，地图上可能出现一大片土地是有移民密集定居的，每个移民都在其住宅附近根据优厚的条件得到了一块好地，但实际上这一大片土地却属于一个人所有，因为这些被怂恿用这种方法取得土地的移民，不是他所雇用的牧羊人，就是他自己家庭的成员。

由省控制土地，使得一些拥有资金的投机商们能利用他们在当地的势力积聚土地。沃格尔原来的意图是把土地作为一种财产保存起来，用以抵付他的各项借款，但在经济繁荣初期，在因修建公路和铁路而开辟起来的地区内，已有大量的土地落入私人手中，这些土地不是被使用，而是被用于投机买卖。这是沃格尔的政策遭到反对的某些根源。

因此，在1880年，新西兰大部分地区几乎全都是从事养羊业的大型畜牧场或放牧场。除了某些
154 地区，如那些遵循韦克菲尔德的移民区发展计划

的地区以外，小型农牧场是比较少的。整个新西兰严重地依赖于大地主的羊毛支票。

人们将不难看到，随着羊毛价格一再下跌，这些大面积土地的占有，是对国家福利的一种极大威胁的根源。许多土地落到了各银行和各代理公

[illegible]

这一时期的土地立法

处理这项土地问题的初次尝试，是坎特伯里省最后一任省督威廉·罗尔斯顿在该省进行的。1874年出现大量的失业现象。为了减轻失业造成的苦难，罗尔斯顿着手建立一些所谓“农村移民区”。通过测量，把现在称为特穆卡的附近一个移民区分成一些小块地段，帮助和鼓励失业者在这
155 些小块地段上定居下来，并努力用集约的耕作法养活自己。不过在以后的岁月里，坎特伯里省和其它地方都变得那么繁荣，已使得这种初次试验失去作用，到今天已几乎没有什么痕迹遗留下来。

其次的一个步骤是由乔治·格雷爵士本人采取的。这就是他力图消除他在1853年宣布降低土地价格所造成的损害。乔治·格雷于1877年担任总理，他的主要政纲之一是实行征收土地价值税。他在执政的第一年，就采取了一项征收未被使用的土地价值税的措施。由于这种征税使那些拥有最多土地的人们必须缴纳最多的税款，他希望这就会迫使他们把其大面积的土地分割开来，从而使这些土地适合于实行较密集的移民定居。

在乔治·格雷内阁的殖民地财政部长约翰·巴兰斯的指导下，这项措施实际上已成为法律，但从未取得显著成效。在对土地的估值能作出适当的规定之前，乔治·格雷已经离职。在下一届新西兰议会中，哈里·阿特金森爵士用一种财产税来取代土地价值税。这种财产税直到1891年巴兰斯作为自由-工党领导人开始执政时才被取消。

不过，在这一整个时期，征收土地价值税一直是一项重要的提案，人们对此存在着真正的、重大的意见分歧。各派人士逐渐地各自集结起来。大地主们和那些认为羊毛生产者在殖民地的地位非常重要而不能受干扰的人，便联合在一起保护现有的秩序。那些渴望得到小块土地的人，那些受到令人苦恼的财产税所损害的城镇商人，以及面临失业和低工资的工人则逐渐地组成一派，反对土地垄断者。

1882年，当时的土地部长威廉·罗尔斯顿采 156
取了另一项重要措施。他根据他在坎特伯里省担任省督的经验，看出了让少数人拥有大面积土地的所有权的危险性。他于是建议停止出售剩余的英国王室的土地，代之以出租英国王室的土地

的制度。这种租借应是永久性的，以使农场主们有权利用土地而不受干扰，但过了三十三年之后，对他们租用的土地要重新估值，并按比例确定其租金。

如果这项法律能按照罗尔斯顿所拟议的形式获得通过的话，则十九世纪九十年代采取激烈的土地立法措施的必要性就减少了；但是主要地由大地主所组成的立法委员会，却坚持要让承租人有权用很低的价格立即买下他们所租用的土地。于是，新的土地租借办法就变成了购买土地的一种廉价而方便的形式，从而风行一时。立法委员会的这个修正案，严重地破坏了罗尔斯顿提出上述措施的意图。

在长期经济萧条期间，解决土地垄断问题的唯一其它尝试乃是在斯托特-沃格尔内阁（1884年至1887年）中担任殖民地财政部长的巴兰斯所作的尝试。这届内阁是哈里·阿特金森爵士的“连续内阁”长期统治中的一段插曲；但如我们已在上文指出的，这届内阁并没有与其前届内阁截然相对立的明确而坚定的原则。沃格尔爵士本质上是保守的，因此，巴兰斯所能做到的只是继续罗

尔斯顿在坎特伯里省进行的“农村移民区”的试验而已。他所建立的移民区中，有些是成功的，有些则否，主要原因是他对有关用作试验的土地的问题，经常没有经过周密的考虑。但不管怎样，在 157
1887 年“连续内阁”重新执政时，这项试验便告结束，而当巴兰斯再度执政时，他却采取了一个较为激进的步骤来打破当时正在掐着新西兰脖子的土地垄断权。

工人运动

在一个居民稀少的不发达国家里，许多移民，或许是绝大多数移民，都想依靠土地过活，并作为土地的主人而进行劳动。虽然韦克菲尔德设想的开拓殖民地的体系，是要“防止劳动者过快变成地主”，但他曾期望劳动者有足够高的工资收入，以便几年后就能为自己购置土地。可是，谁都知道，即使在那些地方，其土地是由农业工人而不是由土地所有者耕作的，农村的工人总是比较难于组织起来的，而且一般地说来，在争取其切身利益受到重视方面，他们一直都是远远落后于城市工人的。在某些对新西兰发展有贡献的非耕作的生产

事业（如伐木业）中，情况也是如此。

因此，我们不要指望工会和其它有组织的工人运动，在新西兰早期历史上会成为重要的力量。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应忘记，在那些来到新西兰谋求改善其命运的人们当中，绝大多数并没有变成大地主或小地主。他们为赚得工资而劳动，并且他们的许多劳动都不是在土地上进行的。因为新西兰的发展需要建设和维修交通系统，需要往返城镇之间运输货物，有时还需要往返海外运输货物，并且还需要工艺、办公室工作和政府管理工作
158 等许多方面的服务行业。随着新西兰的日益发展，这些对在土地上进行的生产来说是辅助性的服务行业，便超比例地增加了起来。在地方上制造一些东西也比从外国进口这些东西方便得多。这样，一些城镇发展起来了，在非耕作的行业上受雇用的男女职工的人数也增加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当这些工人感到未能身受公平的待遇时，他们便开始发出他们的呼声给人们听。这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事实上，在韦克菲尔德式移民区一开始建立的时候，工人就发出呼声了。移民区当局曾许诺

给工人们以工作或生计，当这些诺言没有兑现时，工人们自然要提出抗议。1841年，在赫特公路上劳动的工人们为争取实现八小时工作制而举行了罢工，在奥塔戈省建立的初期，工人们也为这个目标而进行了斗争，并取得了胜利。有些移民过去在英国参加过工会和宪章运动，也把他们的这一部分英国传统带到了新西兰。有些工会在淘金热时期就已成立，不过这些早期成立的工会看来都已消声匿迹了。

1871年1日，当存在着一些失业现象时，在克赖斯特彻奇举行了一次有六百人参加的集会，决定成立一个“工人保护协会”。两个月以后，该协会讨论了一项关于建立合作性质的生产与分配制的倡议。协会秘书报告说，他已致函设在伦敦的“国际工人协会”，叙述了新西兰劳动力市场的状况。

沃格尔的借债政策在两个方面加速了新西兰的发展。其一，这项政策为新西兰带来了数以千计习惯于工会活动的英国工人；其二，人口的增加和开发工作的展开，为各种工业和辅助性行业的发展提供了机会。工会增多了；乔治·格雷在

159 1877年至1879年的那届不很成功的内阁执政期间所通过的措施之一是1878年的工会法，这一法令给予了各工会以合法的地位。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经济萧条造成了失业现象，并迫使工资降低；但看来它还没有摧毁工业。可能有些人看到，这是一个可乘之机，即以很低廉的价格购买劳动力，并用这种廉价劳动力生产可同进口商品竞争的货物。经济萧条对各工会有错综复杂的影响。工人们及其家庭的苦难遭遇，更加促使他们为了反抗剥削和争取救济而组织起来。但是，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激烈和工人们害怕失业会影响其家庭生活，这些都倾向于削弱各工会赖以存在的团结。此外，贫困还使得向工会组织缴纳必要的会费成为许多工人无法应付的负担。其结果是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虽然工联主义有了巨大的发展，但工会的组织与活动却仍然处于困难的境地。

达尼丁是工会活动最活跃的中心地区，1881年在该地成立了奥塔戈同业和劳工协会。自1881年至1886年，这个协会是活跃的，但自1886年至1889年，它的活动曾一度中断。到了1889年，同

业和劳工协会这个组织已在每个主要中心地区建立起来。1885年，奥塔戈同业和劳工协会召开了一次全国同业和劳工大会，受到了罗伯特·斯托特总理的同情的关注。不过，原定1886年在奥克兰召开的全国同业和劳工大会，由于各工会负担不起代表们的旅费而不得不取消。

英国工会运动的趋向，影响了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在英国，无需熟练技能的工人正在组织大型工会。1889年，英国船坞工人们为争取雇主承认他们的基本的体面生活的权利——每小时一 160
"坦纳"①（六便士）的工资，举行了一次艰苦的罢工，并取得了胜利。他们在罢工中得到了伦敦《泰晤士报》和象红衣主教曼宁这样显赫人物的支持。在罢工最困难的时刻，从澳大利亚各工会寄来的一笔未经要求和出乎意料之外的赠款，给予了船坞工人精神上巨大的鼓舞。接着罢工工人又收到来自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大量捐款。

新西兰的许多工会都是大约在这个时候成立的，其中的一些与澳大利亚各工会有联系。铁路

① "坦纳"（"Tanner"）是英国俚语，指英国旧时的六便士币。——译者

工人、海员、矿工和码头工人的工会都是重要的集团，其中有一些已与海事协会建立联系。

以上所述就是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有影响的1890年海员大罢工的背景。这次大罢工是由于雇主反对澳大利亚海事职员同业工会加入悉尼和墨尔本同业协会而引起的。它得到了新西兰海员、矿工和码头工人的支持。与伦敦的船坞工人不同，参加这次罢工的各工会都失败了。但它们也有收获，即各工会把注意力转向政治方面。各工会给予自由-工党的支持，是1890年选举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这次有六名工联主义者当选并成为获胜的自由-工党的工人的一翼。

我们已看到，各工会赞成对新西兰的制造业主给予某种保护，作为一种保障措施，确保工人能在体面的条件下受到雇用。某些工业部门，其当前的工作条件的恶劣程度，可从1889年皇家委员会的一个报告中显露出来。该委员会是由政府成立的，成立的原因是拉瑟福德·沃德尔牧师在达尼丁最大的长老会教堂所作的一系列布道演说，鼓起了公众对现状的愤怒。参加这次运动的
161 《奥塔戈每日时报》披露了这些布道演说，它后来

还得到《利特尔顿时报》及其它报纸的支持。据报道，在服装制造业中，特别是把活送到家里去做的情况下，女工和女童工的工作条件的恶劣，确是骇人听闻的。这样，就使公众感到有组织工会的需要，同时也看到必须使政府对劳工问题有较多的重视。这是工人、工会和反对“连续内阁”的其他集团之间的又一个联系。

自由-工党的背景

自由-工党由于提出了一项措施，有助于实现更为民主的选举权，因而在1890年的选举中得到了好处。当代议制机构业已在1853年建立时，准予享受选举权的范围已是相当广泛；但这种选举权是建立在财产的基础上的，妇女没有投票权，而富人凭其所拥有的财产，则可以在一个以上的选举区参加投票。当乔治·格雷爵士在1877年至1879年担任总理时，他的基本纲领中有两点：一是给二十一岁以上的所有男子以选举权，二是将众议院的任期由五年缩短为三年。由于立法委员会不同意，否决了一项关于给毛利族纳税人以选举权的提议，因此，上述这些提议，乔治·格雷都未能加以

贯彻。但是乔治·格雷的继任者约翰·霍尔爵士在1879年却把乔治·格雷提出的这两项措施制定成为法令，予以颁布。

此后，乔治·格雷主张妇女也应享有选举权，并主张限定男子每人一票。后一主张在1889年实现了，当时阿特金森在众议院提出了一项关于代表权的法案，乔治·格雷也提出了一项关于实行“一人一票”的原则的修正案，并成功地获得通过。因此，在1890年的选举中，有产者们不再享
162 有过去他们所享有的那种每人不限于一票的有利地位了。1893年的新政府制订了法律，赋予妇女在与男子相同的基础上享有选举权。

乔治·格雷的1877年纲领的其它要点，已预示了自由-工党受选民欢迎的政策。乔治·格雷常常同显赫人物争吵；但他对“普通人”却怀有极大的同情，特别是在“普通人”可能受到富豪施加压力的场合，更是如此。1877年，他周游全国，发表演说，赢得了广大公众的支持，但也受到了比较保守的人们的严厉指责。历史学家鲁斯登说，乔治·格雷“‘飞行’〔当然是隐喻的说法〕于各地之间，通过挑动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尽情

激怒他的政敌，如果这是可能的话。他宣称群众仍然处于农奴地位，除非他被赋予权力来拯救他们，否则他们就不能改变这种处境。他的宣传博得了群众的欢呼”。乔治·格雷除了主张三年制的议会和“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以外，还主张对没有利用的土地课以土地税，主张有租用期的土地使用权，主张对每个人可获得的土地数量规定限额，并主张强制收购大面积的地产来发展密集的移民定居。但是，乔治·格雷是在议会中取得极微弱的多数下掌权的；他同斯托特和巴兰斯这两个最同情他的基本纲领的部长不能合作，使他们疏远了；他同总督也有争吵。1879 年，他在众议院连微弱的多数也失去了，过后他又失掉了反对派的领导地位。后来乔治·格雷总算能以看到曾使他遭到失败的霍尔不得不采用他的一些措施而自鸣得意；但是一个进步的自由主义政党，其前景却遭到了冲击。

我们已经提到过，乔治·格雷的两个比较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同僚斯托特和巴兰斯，从 1884 年至 1887 年是怎样同沃格尔共事，但没有充分的机会来贯彻一个前后一致的政治纲领。斯托特在

163 1887 年的选举中失掉了其席位，从而阿特金森内阁的反对派便少了一个领导人。不过，随着赞成进行一次政治改革的各种力量的汇合一起和阿特金森内阁的垮台，采取一种比较积极的态度还是可能的。1889 年，在税则问题的辩论以后，约翰·巴兰斯当选为自由-工党的领导人。

第十七章　新西兰的社会试验 164

新议会和政府的性质

巴兰斯内阁在1891年开始执政，这是新西兰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这届内阁有一班新人当权，投票支持他们的就是那些人，其利益在过去没有受到这个国家的政府最大的重视。曾有一些领域过去被视为政府最好是撒手不管的，现在人们却希望政府在这些领域里积极地行动起来。由于政府通过了对土地、劳工和社会问题有影响的立法，新西兰便获得了社会试验的实验室的声誉，引起了世界各地的注视。

政府的这一新任务，虽然可能引起当时一些保守分子的诸多指责，但它却是世界总趋势的一部分。十九世纪中叶，特别是在具有最高度经济发展的国家，存在着一种倾向，即人们厌恶和蔑视国家做出超出其最低限度的活动以外的任何事情，特别是做出超出其在社会和经济事务方面的

最低限度活动以外的任何事情。这里，凡是干预都被视为或多或少地足以破坏自动再调整的过程，因而是害多益少。“放任主义”或“自由放任”成了流行的理论。但是这种自由放任的结果，终于使得一些人大为震惊。它似乎包藏着不必要的
165 苦难，特别是给予一些男子、妇女和儿童以不必要的苦难，这些人愿意为社会的需要而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却已经受了种种困苦折磨，而这决非来自他们本身的过错。人们觉得，许多人被注定要在“自由放任”的政策的各种条件下生活，可是这些条件并没有提供他们任何可能性，使他们果真能象“自由放任”的政策所设想的那样，成为一些富有思想、能认真思考的人。象牛津大学教授T·H·格林这样的一些人，曾撰文要求国家采取较多的行动。他们之中有些人曾帮助受苦者组织起来并对当权者施加压力。各工会以及在扩大选举权以后获得投票权的、人数正在日益增加的工人，都表示这样的需要，即制定能帮助和保护多数人的法律——用一个作家的话来说，即他们表示需要集体主义，而反对个人主义。

在日益复杂而个人难以把握自己命运的世界

里，这种立法的反对者可能断言这种立法会削弱社会的基础和破坏人们的道德素质，然而这种立法的出现是势所必然的。

政府的这种行动，其实在新西兰也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一个年轻而又正在成长的国家，必须指望政府兴办许多事业，而在比较老的国家，这些事业可能会交给私人企业去办理。在新西兰，除了现有的土著居民的土地以外，政府拥有所有的土地；除了一两条铁路线以外，政府修建了所有的铁路线；自初期以来，政府一直积极地援助国内许多地区的发展。正如这一时期最有影响的领导人之一所指出的那样，在1890年，政府仍然是新西兰最大的土地所有者和收租者，并且已经成为新西兰劳动力的最大的雇主。政府几乎拥有全部的铁路系统和电报系统。政府是最大的财产托管人，拥有最大的人寿保险公司。政府担负了许多
法律工作，而这些法律工作在别的国家里，通常是 166
由私人律师办理的。政府还使十分之九的儿童受到了教育。

前文提到的1877年的教育法，仅仅是新西兰走在世界其它各地之前的许多著名的措施之一。

1872年，沃格尔在政府中设立了公共信托局，而国家人寿保险局则在比此更早的1869年就已成立了。由于没有私立医院，政府在新西兰全境设立了许多公立医院和精神病院，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医疗系统。对我们来说，自然认为这些机构的建立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在其它许多国家里，这些重要事业仍然由私人企业或私人慈善机构经营。

对于早已熟悉政府的这类行动的人民来说，向政府建议扩大其行动的范围，借以解决新西兰1890年蒙受的一些困难，这并不是什么新奇的事。自由-工党在其早年制定的法律，从其范围和性质上看，确实是激动人心的，特别是同"连续内阁"的无能相比较，更显得如此；但是这种立法并不是很革命的，有人有时给它贴上"国家社会主义"的标签。这表明了他们既不懂得这种立法，也不懂得社会主义。

不仅政府的措施与过去有所不同，而且掌权的人物也有些不同。艾尔弗雷德·桑德斯写道："在新的众议院里，受过高等教育或者具有经验的人占着非常小的比例；而且其中大部分人都反对

巴兰斯先生及其各项富有爱国热忱的建议”。桑德斯说，土地和农业部部长约翰·麦肯齐是一个被驱逐的苏格兰高地佃农的儿子，身高六英尺四英寸，“曾受过一个原籍苏格兰的新西兰牧师的教 167
育，并曾在众议院工作若干年。他的语言现已充分英语化，一般能为人所听懂”；桑德斯还谈到他“脾气暴躁，不时突然发火。”“我们的迪克（这是对后来任总理的理查德·约翰·塞登的爱称）就连受到一个苏格兰牧师的教育这种有利的条件都不具备，却充分地具备了那种极为不利的条件，即在鲁莽、吵闹和争夺黄金的人群中间，受过一种英国酒馆老板式的教育。甚至到现在，他在众议院经历了连续十四届的会期，也只是很片面地有了一点点文化。”我们不妨指出，桑德斯是一个禁酒主义的热心鼓吹者。

自由党的长期执政

自由-工党（后来一般地称自由党）在连续三个领导人的领导下，一直执政到1912年为止。该党提出的重要立法，都已在1900年以前得到贯彻。在该党第一届任期内，它只有微弱多数的议

席；它的许多重要措施虽已在众议院获得通过，但是这些重要措施的绝大部分最初都被立法委员会内的反对派所拒绝，因而它进一步受到了挫折。

为了打破上议院和众议院之间的僵局，总理建议总督委派十二名立法委员会新成员，以期在议会中对政府给予更大的支持。但总督格拉斯哥勋爵拒绝这样做，从而使政府陷入十分尴尬的处境。巴兰斯越过总督，向英国殖民地事务大臣上诉；1892 年，英国殖民地事务部通知总督说，他必须听取他的责任内阁各部长的建议。这是新西兰历史上总督拒绝按内阁建议行事的最后的一次事
168 例，因而它标志着新西兰沿实行自治的方向发展的一个重要步骤。

新政府在第一届任期内所作的主要革新有：1891 年实行具有重要意义的土地税和所得税的征收；准予妇女享有选举权；制定一项法令，规定由选民投票决定其所属选举区是继续或是停止出售烈性酒。其它重要的措施则推迟到 1893 年的选举以后执行。在经过一段主要是处在反对派地位的紧张政治生活以后而上台的总理巴兰斯，因领导工作的过度劳累，于 1893 年 5 月 1 日死于任

内。他的职位由塞登继任。

塞登执政到1906年逝世为止。是年他从澳大利亚乘船回国，死在海上。塞登任职期间，不仅完成了大部分的重要立法，而且他在新西兰也取得了独特的地位。塞登在很大程度上象征着他所处的时代的最好的与最坏的东西，象征着一个年轻的殖民地国家成长时代的到来——这个年轻的殖民地国家为自己具有朴素的常识而感到自豪，有着一副好心肠，但不是过于敏感或是拘泥于细节，正在挣脱那些依然倾向于“旧世界”① 文化的人们的影响而形成起来。塞登是一个支配新西兰政治达十三年之久的人物，并且在他之后没有任何人能象他这样。现在让我们回过来看看桑德斯对塞登的评价。桑德斯说：“塞登不是向明智、善良的人们，而是向那些意志薄弱、处于屈从地位的人或那些奸诈无耻的人征求意见和寻求帮助；他抱着不流芳百世就遗臭万年的态度去追求名望；为此，他可以同布思将军〔救世军创始人〕在一起祈祷，也可以同那些酿酒商及其挤满议会走廊的代理人同流合污。……对任何真正体现自由主义的措施，只

① “旧世界”(the Old World)指当时的欧洲。——译者

要从宪法上妨碍他的独裁权力，他从来都不予支持。……无疑，他是一个快活的、脾气温和的暴君……；但这决不能说明他有充足的理由可以自称
169 为一个自由党人，因为他一心就是要把新西兰的民主制度转变为一种笑脸相迎的专制制度。”这种论断听起来似乎有点冷酷无情；但是，桑德斯在论述了当时塞登之所以能够成功地表达的时代潮流时，却接触到了问题的实质。桑德斯这样写道：“塞登对现在就要受到控制的大土地垄断者，丝毫不表尊重或同情，而他取得全面的成功，其最大的原因是，他对任何人（男人、女人或儿童），不管其地位高低，都可以进行随便的和显似关心的攀谈。”

不管保守的反对派发出新西兰将有灾难临头的悲观预言，自由-工党在1893年的选举中以坚实的多数获胜，而这种坚实的多数在塞登执政时期的随后各次选举中都被稳固地保持着。塞登死后，约瑟夫·沃德爵士继任内阁总理。在1907年新西兰取得自治领的地位时，“总理”这个职衔已被改为“内阁总理”了。沃德作为一个财政家，素负盛誉，但他缺乏塞登那种温和性格和名望。由于他在处理私人财务方面有可疑的地方，因而他

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有好些年都陷入受嫌疑的处境。不管怎么说，在他执政时期，自由-工党已丧失了它改革社会的使命。该党的纲领已经实施，它领导下的政府工作便成为不断受到批评的对象。各种情况的发展都使得该党力量的主要源泉日益分崩离析。1911年的选举使各党的势力达到大致平衡，而经过一个不稳定的时期以后，同阿特金森时期的保守分子有一些联系的革新党就上台执政。

自由-工党的立法：关于土地方面的立法

我们现在必须研究一下使新西兰非常引人注目的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自由-工党的立法。

1891年的土地税和所得税法有两个显著的 170
特点：第一，所得税是累进的，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高，因之，富人就要对国家的岁入支付他们的所得的较大比例。这一点现在一般地被认为是合理的，因为一个人每周收入十镑或十二镑，每镑被抽税三先令，另一个人每年收入一千镑，每镑被抽税四先令，两者相比，就意味着前者的负担重于后者。但是当时许多人批评这种税收是对财富的不

应有的干涉。第二，征收土地税乃是乔治·格雷对大面积地产占有的攻击的恢复。这不是单纯地为了增加岁入，而是由于对没有利用的土地按值课税和分级课税，也使得拥有未被充分利用的大面积土地变成无利可图。因此，政府是有意通过这种征税办法来迫使大地主出售其一部分土地。根据这项法令的特点，如果土地所有者抱怨土地税率太高，政府得根据为征税而估定的价值购收这些土地。坎特伯里省北部的切维奥特牧羊场便是按此处理土地的一例。该牧羊场有土地四万英亩，属于丘陵地带，但土质肥沃，并靠海，养羊六万头，为四十人左右提供生计。政府在该牧羊场内安置了许多家庭，各户都享有有租借期的土地使用权。事实证明，承租人和政府双方都对此感到满意。

有关土地的立法主要是由苏格兰高地人约翰·麦肯齐负责的。他热心于使更多的人立足于土地谋生。1892年的"供移民定居的土地法"授权政府每年动用五万镑的款项来购买大面积的土地，以促进较密集的移民定居。1894年，这笔款项增加到二十五万镑，并规定政府有权按合理的价格

强行购买土地。到1912年，计有原来没有多少居民居住的二百份土地已改变成为五千份土地，每份平均有土地二百六十英亩，为一万七千人提供 171
生计。与此同时，财政部长约瑟夫·沃德提出的“对移民的贷款法”获得通过。根据该法，政府可以举借款项，以便按低利率发放贷款给小农场主们。

政府也决定不再出售英国王室的土地，而用它来出租。这样，可以防止国家地产落入少数人手中，以致多数人蒙受不利。出租方式规定为租期九百九十九年，通常称为永久租借。承租人除交土地税外，还要交百分之四的地价税，但无明文规定对土地进行定期的重新估值。这项出租土地的办法对承租人很有利，对移民定居也起了鼓励作用；不过这对政府和社会却是一项亏本交易。这种土地使用权于1907年被取消了。

因此，可以清楚地看到自由-工党政府曾作了大量工作以对大地主们施加压力，特别是在这些大地主没有充分地利用其土地的场合为然。与此同时。自由-工党政府还帮助资金不多的人们在小块土地上创业安家。农业部的成立，也使这些人得到帮助。农业部对新西兰耕作问题的研究，以

及它向农场主们提出的建议，都已成为新西兰开展有效生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

劳工法

在自由-工党政府的立法中，正是劳工法这一部分吸引了外国的注意。政府中主要负责这项立法的部长是威廉·彭伯·里夫斯。他是内阁中的“知识分子”，于1896年前往伦敦担任新西兰驻伦敦总代表(后称高级专员)，在经济和社会问题方面成为有名望的作家。他的最著名的措施是实
172 施“劳资调解和仲裁法”。该法及其修正部分，至今仍然是我们的法律的一部分，一般仍称“劳资调解和仲裁法”。

1890年的海员罢工，似乎使某些自由党人相信，强制性的仲裁能为工人罢工提供一种替换办法，也可保护工会免受资方的破坏。工会领袖们在遭到失败中也欢迎这项建议。里夫斯提出的法案，曾两次受到立法委员会的否决，终于在1894年获得通过，成为法律。根据这项法律已注册的工会必须首先把纠纷事项提交调解委员会处理。如果没有达成协议，然后把问题报请仲裁法庭处理，

由仲裁法庭发布在一定时期内有约束力的裁决书。调解很少获致成功，所以仲裁法庭便成为劳资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仲裁制度受到许多赞扬，也受到许多批评。各工会有一个时期曾热情地赞扬它，后来对它就冷淡下来。“劳资调解和仲裁法”的制定者曾描述该法是如何在一个对它“觉得有趣而略有怀疑的众议院”里通过的。这个众议院显然没有预见到该法在这个殖民地的未来生活中将要产生的全部重要意义。该法原初有一个小标题，后来已被删去；这个小标题指出，“对各工会的鼓励”乃是“劳资调解和仲裁法”的宗旨之一。该法无疑推动了各工会的成立，而各工会不久也开始依靠该法所起的作用。1895年交由仲裁法庭处理的第一个劳资纠纷案件，给予各工会以进一步的鼓励，因为法庭在它的第一个裁决书中即明文引用了“优先照顾工会会员”的著名条款。

仲裁法庭在其早期的成就是无可争辩的。新西兰经济的全面恢复，有助于使仲裁法庭能够在历次裁决书中宣布提高工资比率，而且更重要的 173
是，法庭的裁决的执行迫使所有雇主都不得不按

标准的工资比率付给工资。这样，那些无耻的雇主便再也无法通过降低工人的工资这种不正当的手段，来压低一般的工资水平了。

当雇主们发觉仲裁法庭的权限在稳步地扩大时，他们便开始担心他们经营的事业会受到干涉。总的来说，多年来雇主们对仲裁法庭是敌视的，而工会会员们对这种法庭则表示同情。一个美国观察家在其《一个没有罢工的国家》一书中，对仲裁制度作了热情洋溢的描述，而书名的本身也就是十多年来新西兰面貌的如实描绘。大部分澳大利亚殖民区仿效了新西兰的做法；但在世界上比较老的工业国，却还没有采用一整套强制性的仲裁制度。

1894年，塞登政府还通过了一项包罗广泛的"工厂法"，以期防止那种曾于1890年导致成立"血汗(劳动)制① 调查委员会"的情况有再度出现的任何可能性。"工厂法"所规定的工厂条件的标准在当时是很高的。该法还规定由劳工部对工厂

① 血汗(劳动)制(Sweating System)是资本主义国家资本家压迫和剥削工人的一种方式，即前者以极低的工资雇用后者，并驱使后者在极恶劣的劳动条件下干活。——译者

条件进行有效的检查。劳工部是一个新成立的机构，劳工部长里夫斯有一名热情而能干的秘书爱德华·特里吉尔协助他处理行政工作。这一时期的立法包括对商店、机关、矿业、航运业、农业工作、假日以及雇主对工伤者的赔偿等方面的规定。另一方面，在1894年，修改了1878年的“工会法”，使各工会可以摆脱由于政府贯彻原有的英国防止阴谋活动法而给自己带来的种种威胁。

在论述这一系列涉及劳工问题的法令的时候，里夫斯写道：“它们的目的不是废除工资制度， 174
而是尽可能使工资制度变得公平和为人们所能忍受，是通过保护工人来保护公正的雇主”。这是一个极其稳重的纲领，其背景可以溯源于紧接着沃格尔时期的繁荣便出现了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经济萧条这样一种特殊的情况。

1895年，政府成立了一个关税调查委员会，它发表了一份赞同保护地方工业的报告书，其结果是哈里·阿特金森爵士在1888年开始实施的一项适中程度的保护关税的征收额被提高了。

扶助平民

塞登没有一种明确的政治哲学，却有着一种对普通人的同情，特别是当普通人似乎受到豪门巨贾的势力所威胁的时候，更是如此。他也机智地谋取选民的投票。因此，当他看出为了公众福利而需要干涉私营工业的时候，他就积极地准备去进行这种干涉。当时据说存在着煤业垄断现象，他就在1901年开办了一个国营煤矿来同它竞争。同样，当他确认当时存在着保险业的“垄断集团”时，他就在1903年设立了国家火灾保险公司。

塞登长期担任总理，在他执政末期，他越来越倾向于实行所谓人道主义的立法。由于他的努力，新西兰采取了许多关心母亲和儿童的措施，使这个国家成为世界上婴儿和产妇死亡率最低的国家之一。但是他自己总是认为他的最大成就，是通过1898年的养老金法。养老金的数额是不大的，并且是只有在严格的条件下才发给的。塞登
175 在前两年中所提出的关于养老金的法案，由于有人提出各种修正案，删去其中的一些条件，他便放

弃了那个法案。但他仍然受到两方面的强烈反对：希望多做一点事的人反对他，希望少做一点事的人也反对他。只有象塞登这样富有决心和体力充沛的人，才能坚持实现他的中间道路的措施。在关于养老金的法案正由议会委员会审议期间，议员们提出了几十种修正案，使这个法案的通过受到了耽搁。议会委员会的会议历时十一天，总共消磨了八十七个小时。每次会议，塞登都坐在议会委员会主席右侧席位，自始至终全神贯注，参加辩论。

新西兰银行

自由-工党政府在1894—1895年曾采取一项措施来挽救新西兰银行，使它免于倒闭，从而使数以千计的人免遭破产。政府的这一行动，并不是政策问题，而是迫不得已而采取的应急措施。在沃格尔的政策造成的繁荣时期，新西兰银行曾不适当地发放贷款，自此以后，困难与日俱增。在善于判断的人看来，新西兰银行截至1889年便已处于破产状态，但它却靠做假账来勉强维持事业和支付股息。1892年，经济情况稍有好转，但到1893

年再度恶化。这终于使这家银行再也不能维持下去。1894年6月，银行经理向塞登报告说，除非政府出面为银行作保，银行就得在该周周末倒闭。政府被迫采取行动，匆匆忙忙拟了一项法案，几小时内就完成全部手续在上议院和众议院通过。政府为银行作了保证，给它提供了新的资本；而作为交换条件的是，政府有权任命银行董事长和六名董
176 事中的四名董事以及银行审计人员，其余两名董事仍由私方股东选任。从此以后，只要政府愿意的话，它就能够把新西兰最大的金融机构的政策控制起来。

政府在这次事件中很少利用自己的权力，说明它不打算对经济关系进行任何重大的改革。新西兰银行在工人和小农场主中间是不得人心的，他们中间许多人宁愿看到政府控制国家的信贷系统。然而，政府并没有按照这种办法行使其职权，而只是恢复了新西兰银行的地位，并且还允许它继续作为一个普通的资本主义企业存在下去。

塞登的去世

1898年以后，自由党很少提出重要的措施；

但是塞登仍然深孚众望，因而他的党在1902年及1905年的选举中轻而易举地获得了胜利。人们常常认为，自由党在这两次选举中获胜，乃是由于塞登个人深孚众望，而他在1906年突然去世，就不可避免地导致自由党的衰落。

塞登支配新西兰的政治生活达十三年之久，确是前所未曾有过的事。但在1908年的选举中，不管自由党失去了塞登或缺乏一个可明晰地称为"自由党"的纲领，它仍然取得了显著的胜利，这表明自由党仍然享有公众的支持。事实上，自由党的新领导人沃德在1908年的选举前就曾宣布，新西兰须暂停进行立法，以便得到休息。

不过，显然可见的是，在1911年的选举中，这种消极的政策使自由党不能保住它原来的两股主要支持力量——小农牧场主和城镇劳动人民。

177 第十八章 价格的上升形势

情况的转变

自由-工党的上台执政，同新西兰出现某种转变的开始，大致上是在同一时间。首先，以1921年年底作为我们的下一个观察点，我们可以看到一些重要的变化，因为到这一年年底新西兰开始出现一些新的、不同的问题。从1890年年底到1921年年底，新西兰的人口从略少于六十七万人增至略多于一百二十九万人。在这个总人口当中，当时的北岛占的比例较大——1890年，北岛人口占新西兰总人口还不到百分之四十五，而1921年却占百分之六十以上。这个时期的出口值从大约九百五十万镑（按人口平均每人为十四镑八先令九便士）增至大约四千五百万镑（按人口平均每人三十五镑二先令三便士）。羊毛的出口量从1890年大约一亿磅增加到1920年至1922年平均每年二亿一千万磅；冻肉从九十万英

担①增至每年平均四百万英担以上；奶油从三万五千英担增至将近九十万英担；干酪从四万英担增至一百三十万英担以上。

以上数字表明，尽管羊毛的增产是巨大的，但冷藏商品出口额的增长更为显著。这时，养羊不仅对于取得羊毛是重要的，而且对于取得羊肉，也是同样重要的。更引人注目的是，制酪工业从开始时规模很小，发展到可以同养羊事业媲美的地 178
位。这一点也从如下事实表现出来：羊群从大约一千七百万头增至二千三百万头，而在1895年（这年以前没有作过统计）奶牛则从二十五万七千头增至一百万头以上。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到北岛制酪业和混合饲养业获得发展的真相。北岛制酪业和混合饲养业大部分是由一些资本不多的人经营起来的，其经营规模比南岛的大牧羊场要小。他们得到了自由-工党政府政策上的帮助。但不管怎么说，冷藏技术或许曾有助于这一类型的牧畜业的发展，而且在经济生活中这一种科学技术的运用已成为新西兰这一时期的发展中最重要的因素。

① 一英担在英国是一百一十二磅，在美国是一百磅。——译者

另一个有助于政府贯彻其政策的因素，是1895年开始的价格的普遍上升。1900年以后，价格的上升更为显著，并且直到1921年和1922年战后繁荣结束时为止，价格的上升几乎没有间断过。由于工业制造品的价格上升倾向于比农产品的价格上升稍微缓慢些，新西兰就从中得到了好处。它支付旧债的利息，也就比较容易办到。但是决不应把事情全部归功于冷藏技术和价格上升而抹煞约翰·麦肯齐土地政策的作用，因为他的土地政策有助于打破僵局和加速土地的分成小块。土地的分成小块是必需的，如果要充分地利用冷藏技术的可能性的话。此外，自由-工党的政策还有助于保证繁荣到来时，人们将能较普遍地分享繁荣的利益，而不是仅仅创造少数几宗大财富而已。

冷藏技术

这里是回顾冷藏技术的起源的适当场合。正如铁路运输和远洋运输在早些时候业已使得美洲
179 草原成为日益增长的欧洲人口可以达到的地区一样，冷藏商品运输对于新西兰也起着同样的作用。在欧洲，也是由于使用日益改良的机器，提高

了劳动生产率，才为自世界的另一边所输出的粮食扩大了市场。提高了生产率的“旧世界”，只要能从海外取得粮食和象羊毛之类的工业原料，就能够供养更多的人口。因此，新西兰的发展是同英国和欧洲的发展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如同所有重大的发明一样，发明冷藏技术的荣誉为许多不同国家的人员所共享，但是，首先成功地把冷藏技术实际应用到肉类保存方面的是两名澳大利亚人：悉尼的托马斯·萨克利夫·莫特和季隆的詹姆斯·哈里森。1861 年，莫特在悉尼的达令港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冷冻工场。多年来，他致力于发展这些工场，使其达到具有商业效率的境地；但他在进行这样的努力时却遭到许多挫折和重大损失。哈里森从事冷藏工作比莫特迟一些，但他能于1873年对墨尔本的观众作出示范，证明冷藏技术能够使肉类保持新鲜达六个月之久。但是这两个从事冷藏工作的先驱者，却因他们的第一批运往英国的冻肉宣告失败而感到极大失望。不过，造成这次失败的机械上的缺陷是可以补救的，而从美国和阿根廷成功地运出几批冻肉的消息，却激励了人们从事这项事业的兴趣。

1879年11月，“斯特拉思利文号”轮船首次成功地把冻牛肉和冻羊肉从悉尼运到了伦敦，这一事件揭示出冷藏商品运输的前景，从而鼓舞了新西兰人去进行类似的试验。

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建立肉类冷藏这一新
180 工业的都是一些大地主。奶制品的冷藏业出现较晚。最早负责冻肉试运的大地主们都是牧羊场主，他们的努力自然是为了推销其过剩的羊肉和羔羊肉寻找市场。在新西兰，最早进行这项冷藏商品试运的功劳，应归于“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土地公司”总经理W·S·戴维森。这个公司是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拥有大面积土地的“在外地主”所设立的一些公司之一。戴维森在调查了各项工序之后，说服他的董事们预支一千镑，从新西兰进行一次试运。1882年初，对在查默斯港装上“达尼丁号”轮船的肉类，在挑选、屠宰和制备方面都作了最细致的考虑，并且在航程中也对这些肉类作了同样细心的照管，因而保证了这次船运工作取得完全成功。这种引起新西兰发生变化的新工业于是开展起来了。

甚至在“达尼丁号”轮船离开新西兰进行试航

以前，在奥塔戈省、坎特伯里省和惠灵顿省已组织了三间公司进行建立冷冻工场的工作。在冻肉的出口贸易牢固地建立起来之前，还必须进行大量的试验工作；各海运公司对这项业务也表示支持，建造了适于从事这种贸易的专用轮船。政府的铁路部门也提供了有隔热设备的货车。这三间新公司都必须制订出合适的经营方法，各保险公司也都必须对这种海运的危险率进行估计，并尽量把保险费定低，借以鼓励这种新的贸易。

这一切都花去了时间，但取得的经验却使肉类的冷藏和海运的费用以及市场销售的价格能有所降低。这就鼓励了牧场主们运出更多的肉类，而这又有助于使上述各种费用得以进一步降低。于
是，冷藏工业便积聚了力量。1882 年，冻肉的出 181
口值是一万九千镑；到 1890 年和 1895 年，这种出口值已分别增加到一百万镑以上和一百二十五万镑以上。

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经济萧条年代的情况实际上是够坏的了，但如果没有冷藏技术的出现，情况还会坏得多。不过，最初从这方面得到的好处，几乎全都落在那些创建冷藏业的大地主手

中。后来，虽说地势高的地区被保留下来以供饲养生产羊毛的美利奴绵羊之用，但土质较好的大面积土地则被分割成为面积较小的出租地。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部分地是由于必须花钱改良牧地，才能把羊群养肥，以取羊肉，部分地则是由于受到自由-工党立法的压力。

制酪业的反应比较缓慢，它的巨大发展始自1899年左右。奶油和干酪的生产者，通常都是小牧场主，他们没有足够的资本投入冷藏出口商品所需的工厂和机构。羊毛的生产者及其经济上的支持者，希望节省他们对土地和羊群的投资；他们的现有的利益驱使他们探求羊的新用途。制酪业主们并没有可保持的现成的出口市场；他们必须依靠自己的努力从头把出口市场建立起来。其结果是：小牧场主们为要创建和管理自己的奶油工厂，彼此之间必须建立起某种合作关系，而发展这种合作关系也就成为这项新工业的兴起的一个最重要特征。这种合作关系保证了实际生产者从其产品的市场价值中所得的份额，比之依靠经纪人投资和管理干酪和奶油工厂所得的要大得多。农业部的专业性指导和检查，有助于提高干酪和奶油

的生产效率和质量。1890 年，威斯康星大学教授巴布科克发明了一项有关牛奶含脂量的可靠的检验方法，也有助于这项工业的发展。生产者能够对产品进行科学的检验，他们对进一步改进饲养 182
方法和生产优质牛奶，就受到了鼓励。这转过来又促进了对牛群和牧场实行细致的管理。

同南岛坎特伯里和北岛霍克湾、怀腊腊帕（在这些地方养羊业已经发展起来）的一些较干燥的平原和丘陵地带相比较，北岛的一些地方，其气候比较润湿和均匀，特别适合于发展制酪业和混合饲养业。1921 年，北岛的奶牛占全国奶牛的百分之七十五，到了1946年，这个数字上升为百分之八十八。特别是在北岛的丘陵较多的地区，养羊业的经营是同奶制品业的经营结合起来进行的。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南岛的羊群在数量上没有明显的增加，而北岛的羊群到 1921 年却增加了一倍以上，超过了南岛的数量，而且仍在增长中。

以上数字表明，北岛借助于冷藏技术，有了多么巨大的发展；但这些数字还不足以说明全部情况。应该记住，北岛大部分地区是丘陵地带，灌木林密布，缺乏公路和铁路。到 1908 年才建成从奥

克兰至惠灵顿的主要铁路干线，而到1925年才建成北奥克兰至旺加赖的铁路线。因此，这里的发展乃是一种拓荒的过程。人们必得在崎岖的山区砍伐丛生的灌木并加以焚烧（这一工作做得如此无所吝惜，以致土壤受侵蚀，这就是现在正在付出的代价）；必得定期地用驮马把供应品从最邻近的乡村中心运来；必得住在帐蓬或棚屋里，或住在用"彭加"树干和尼棒树搭成的"华雷"①里。在许多情况下，这种生活乃是一种艰苦的、与世隔绝的生活，同五十年后北岛制酪业主所能享受的那种有平坦公路、小汽车、收音机和舒适房屋的生活相比，大有天渊之别。

183 我们已经看到，从1890年起，在三十年间新西兰人口几乎增加了一倍。虽然靠土地过生活的人数有了增加，但从事其它职业的人数增加得更快。在1896年的现职受雇人员中，将近百分之四十是从事农牧业生产的。到1921年，这个数字下降到百分之二十五点七。这时候，从事商业、运输业、公共行政和各种专门职业的人数占百分之三

① "华雷"(whare)即棚屋或窝棚，参阅本译本第16页。——译者

十五以上，而三十年前从事这一类行业的人数只占百分之二十五点六。工业人口的比例仍稳定地保持在百分之二十四左右。

我们已经指出，以上这些职业的增长，是同遥远的市场有关的生产发展的一个必需部分。这些职业的增长，也影响城乡之间人口的分布。1891年，在新西兰的欧洲人有百分之四十三住在都市和城镇；1921年，这个数字增加到百分之五十六。在比例上日益增长的这部分城镇居民，一般说来都是为挣取工资而受雇于别人的人，而不是为他们自己而工作的人，他们在政治上对新西兰是有重要影响的。

政治趋势：革新党的兴起

新西兰在有利的条件下的长期发展，带来了政治上的重大变化。经济萧条已临结尾，这有助于自由-工党取得政权。虽然自由-工党政府起初必得同这已临结尾的经济萧条作斗争，但不久价格便开始上升，情况即见好转，这就为自由-工党政府铺设了较平坦的前进道路，并有助于保持它在公众中的声望。但是，大发展最终还是产生了

破坏该党地位的各种力量。

自由-工党的力量的特殊源泉是小农牧场主或那些希望成为农牧场主的人和城市工人的联盟。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仅这种联盟垮了，而且它的两股力量都背离了它们过去曾经支持过的自由-工党。曾经在自由党政府的帮助下依靠土地创
184 业的小农牧场主，成为革新党兴起的决定性因素。这个革新党终于在1912年执政，直到1928年为止（其间自1915年至1919年是同自由党人联合执政）。另一方面，大约从1904年起，工人们开始转向于建立一个独立的工党。这个工党终于在1935年的选举中获胜。以后我们将会看到，在革新党和工党之间，自由党是怎样衰落和消失的。

北岛的各农村选举区和为这些地区服务的各乡镇对革新党的支持日益增加，从这一点可以看出革新党和北岛的新制酪业主之间的联系。在农牧场主业已很好地建立其基业的那些地区，较之在移民区的那些边缘地方，这一点表现得更为显著。必须记住：经过每五年一次的人口普查以后，北岛在新西兰议会中的席位，因人口增加而有所增加；在席位分配之前，当时对二千人或二千人以上的

居民中心区以外的人口，还增加百分之二十八的席位。这样，各农村地区和各乡镇地区比之城市便具有较大的发言权。

小农牧场主支持的革新党，同被自由-工党在1891年撵下台的“连续内阁”有某种联系。这个“连续内阁”曾被看做是妨碍小农牧场主发展的大地主和金融势力的代表。在革新党处于反对派的时期，它在1893年、1896年、1899年和1902年的各次选举中都不走运。1902年，反对派领袖拉塞尔声明，一个有组织的反对派不再存在了，也不需要什么领袖了。可是在1903年，威廉·弗格森·梅西却被选为领袖。他赋予这个反对政府的党以一种新的特性。这个党不久即取名为革新党。

梅西诚然不是那些老牌土地垄断者的代表。185
他在年轻的时期，于1870年从乌尔斯特来到其父母的住处，和他们一起居住。他的父母早期已移居于塔马基，后来又搬到奥克兰附近的曼格里。梅西在坎特伯里省的著名的“长滩种植园”工作以后，便北返经营其自己在曼格里的土地，还开设了一间碾谷厂。在1894年的一次补缺选举中，他第一次被选为怀特马塔反对自由-工党政府的代表。

1896年，他赢得了代表其自己的富兰克林区的议席，并保持着这个席位到1925年他逝世时为止。因此，他是一个在经济萧条时期创业起来的自营农牧场主，其特点是既不同于那些占有大面积土地的老牌牧羊场主，也不同于那些靠冷藏技术起家的新的制酪业主，更不同于那些深入灌木林地区从事拓荒的略知皮毛的人。也许就是这一点，才使得他能够成功地建立起一个这样的政党，即它把“连续内阁”的那种陈旧的保守性和在经营上获得成功的小农牧场主的那种较激进的独立性结合起来。

引起革新党和自由党发生纷岐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关于土地使用权应当采取什么形式的问题。自由党人由于看到了大面积的土地落到少数人手中所引起的恶果，曾作出决定：政府不再出售公共土地，但人们得按长期租借办法使用土地。根据宽厚的租借条件租用土地的办法帮助了资金不多的人们有可能依靠土地过生活；不过，当他们经营的事业已很好地建立起来时，他们之中有些人就要求能够把土地称为自己的财产，并且如果他们愿意的话，可以把土地售出。当价格上升和有好前

景的时候，把土地卖出，售价往往有可能高于当时土地本身加上农牧场主进行土壤改良后的实际价值。因此，革新党主张土地的完全保有权而不主张土地的租借权。这种主张受到那些曾在自由党政策扶持下得以创业起来的人们的欢迎。这一点早在1891年就为当时任新西兰驻伦敦总代表F·狄龙·贝尔所预见。他是早期来到新西兰的移民。 186
他这一年在给他的儿子弗朗西斯·贝尔（后来成为爵士）的一封信中写道："现在表示喜欢（这是很自然的）永久租借权的人们，一旦度过了其最初的困难并改良了其租用的土地以后，就会本能地要求享有土地的完全所有权，正如这种情况都曾在各个时代和各个国家出现过一般，而压抑他们的各项法令都会被废除"。这番话把问题说得很清楚，因为除了利用土地买卖以渔利的意图之外，一个人看到自己使用的土地在自己的努力经营下发展起来，即使不存在丧失使用这块土地的权利的危险，也总是情愿能够称之为自己的财产。

这种个人奋斗的自豪感，或许是另一个因素，有助于解释已经创业起来的农牧场主们为什么舍弃自由党。即使在1900年以后，自由党已停止

积极地通过社会立法，而且开始失去工人阶级的一些支持，但该党还是被人们视为倾向于制定那一类的法律的。自由党通过保护人民来帮助人民——例如，用工厂法和养老金法来帮助人民。那些在经营上取得成就的小农牧场主们，忘记了帮助他们取得经济上自立的来源。在他们看来，取得报酬仿佛是任何人自愿工作的必然结果。在有土地可经营的农牧场主们和被迫向他人出卖劳动力的人们之间，差别就变得越来越明显。情况良好的时候，农牧场主们可以肯定他们的收入至少是会和他们的勤劳和技能相称的。另一方面，工资总是落后于日益上涨的物价。这样，小农牧场主们就愈来愈变得同靠工资为生的工人们有分歧；前者热衷于追求财产和私人企业，因而在支持革新党上，就使他们同一些比较保守的商人和金融家联系在一起。

187 导致革新党兴起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并不是政治原则的问题，而是自由党人执政已久这一事实。人们对自由党的施政工作的批评越来越多，例如人们指责它借债太多，用在南岛的拨款过多，行政效率不高，用人有偏私。这些都是一些细

事，而不是政策方面的问题。虽然在土地的完全保有权和土地的租借权的争吵上有很多议论，但实际上由于大部分土地早已转变为完全保有的财产，这时已没有什么大面积的土地可能受到土地的租借权的政策的影响；而且在塞登死后，政府领导人约瑟夫·沃德爵士已经修改了土地的租借权的政策，规定了英国王室的土地的承租者如果愿意的话，可以把土地买下来。

在1911年的选举中，革新党取得了可观的胜利。自由党内阁在托马斯·麦肯齐爵士的领导下进行了改组，但该党有一些成员对党的忠诚是可疑的，他们后来竟投了革新党的票，因而造成了自由党的失败。梅西在1912年7月就任内阁总理。他虽然一直保持着这个职务到1925年去世时为止，但他在新西兰议会里只有一个时期能够得到革新党的一个满意的多数的支持，这个唯一的时期就是在1919年和1922年两次选举之间的时期。梅西遇到了一系列的困难；但他解决这些困难的决心，使他在新西兰政治上成为仅次于塞登的人物。

工党的创建

梅西担任内阁总理后遇到的第一个麻烦，是工业界的不满情绪的高涨，这种不满情绪在1912年和1913年的大罢工中达到了顶峰——第一次大罢工在怀希金矿爆发，第二次大罢工主要是在奥克兰和惠灵顿码头爆发。这些罢工引导我们去
188 考虑那些靠工资为生的工人对自由-工党（在独立的工党候选人出现以后，自由-工党可以更确切地称为自由党）的支持所以减弱的原因。

工党同自由党的分裂，是在1904年至1906年间开始出现的。1905年，工党候选人在大选中没有什么收获。1908年，工党有一人当选，1911年则获得四个议席。议席增多的动力，主要来自各工会。这时候，一个“劳工政治联盟”在1904年同业和劳工协会大会召开之后正在组成中。但是“劳工政治联盟”这个组织不是永久性的组织，后来召开的同业和劳工大会才导致工党在1910年①的

① 新西兰工党成立的日期在原书第191、200及220页（中译本第272、282—283及310页）均谓1916年，唯独这里谓1910年，兹姑从原著译出。——译者

成立。除了各工会以外，还有自由党的一些比较激进的成员，他们感到自由党已经失去了其原来要求革新的热情，因而也倾向于采取作为劳工代表的立场。新西兰社会主义党也于1908年成立。

这样，虽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新西兰议会里已经出现了一个可以被看作是代表劳工的集团，但这个集团还缺乏一种具有共同纲领或共同政治见解的统一行动作为支柱。然而，这个集团的出现，加上工会运动有了重要的发展，这就成为新西兰正在发生变化的一个标志。工业、矿业和运输业的工人们正在变得愈益察觉到他们和那些靠土地发迹起来的人们以及城镇中的资本家都有着不同的利益。1895年后价格的不断上升和新西兰全国由此产生的繁荣，加上仲裁法庭的工作，起初曾使工人的地位得到了改善。失业人数减少了，仲裁法庭在其最初几年也改善了工人的劳动条件和工资待遇。但是，随着物价的继续上涨，出
现了工资落后于物价的倾向，因而工人用同样的 189
工资只能买到较少的东西。正如经济学家们所说的那样，与货币工资相反，实际工资在1900年和1914年之间下降了。到1905年，仲裁法庭亦已

开始使自己的工作局限于定期地把工资提高到它先前的购买力水平，而对于工人们在这当中业已受到什么样的损失以及雇主们正在取得什么样的利润，都熟视无睹。

这样做的结果，引起工会对仲裁制度的反对。有些工会认为，它们直接地同雇主交涉还可以得到更多的好处。有些工会撤消了它们按照“劳资调解和仲裁法”的规定办理过的注册。从1906年起发生了多次罢工。西海岸的矿工们是这个运动的领导者，并成为在1909年成立的劳工联盟的核心。这个“红色”劳工联盟不仅攻击仲裁制度，而且还持有明确的社会主义观点。成立较久的工会一般地都满足于在资本主义制度的范围内讨价还价；而劳工联盟的支持者，就象其他正在出现的鼓吹社会主义的比较带有学究气的人们一样，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导致少数生产资料占有者对多数人的剥削，导致繁荣和萧条的交替出现，也导致浪费和苦难。对于他们来说，最大的希望是在于把各种主要的生产资料从私人手中拿过来，并把它们置于社会的占有和管理之下。

“红色”劳工联盟接受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一书中最早明确阐述的观点：从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不是和平的、合理的劝服问题，而是阶级斗争问题。劳工联盟章程的序言说："工人阶级和雇主阶级没有任何共同之点。""这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必须进行下去，直至全世界的工人作为一个阶级组织起来，占 190
有土地和生产资料，并废除工资制度为止。"但劳工联盟在某些方面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有所不同，并暴露出它受工团主义① 的影响。这个运动是基于这样的信仰，即只要通过工人直接地夺取生产资料，而不必考虑任何政治行动，就能够达到社会主义。这个运动在当时具有世界范围的影响，特别是在法国，影响尤大。这种信仰也是美国的"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思想基础，"红色"劳工联盟在1912年就是采纳前者的这种思想基础作为它的章程的序言。全世界工人运动暂时出现这种工团主义的倾向，是由于工人方面对他们在议会的代表们所抱的幻想已趋破灭。工人在议会的代

① 工团主义（Syndicalism）主张采取直接行动如举行总罢工等，把一切生产资料和生产分配都置于各工会的联合会的控制之下。——译者

表们除了取得一些微小的改良之外，似乎并没有取得什么成就，却以此为满足，丧失了他们的战斗热情，并变得和其他议员毫无区别了。

同工联主义①的这种新倾向相联系的工业世界的动荡局面，导致了怀希矿工的大罢工。这次大罢工从1912年5月持续到11月。由于出现了一批所谓“自由”劳工在得到增援的警察的保护下强行介入，同时这些“自由”劳工还组成了工会，依据“劳资调解和仲裁法”注册成为合法的工会，从而使这次大罢工受到了破坏。次年10月和11月，爆发了普遍的码头工人罢工，其中也有矿工、海员和一些运输工人参加。这次罢工也被用同样的方法加以破坏；但这次罢工有一个特点，即小农牧场主生产的出口商品受到罢工的影响而运不出去，他们起了一种特殊的作用。他们大批大批地来到惠灵顿和奥克兰充当临时警察，并装货上船。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小农牧场主和城市工人原有的联盟，在自由-工党政府全盛时期曾经给予政府以大力支持，现在这种联盟已经破裂了。

---

① 作者在这里把工团主义看作是工联主义(unionism)的一种新动向。——译者

与此同时，有些人试图使工人运动各派系的 191
力量彼此结合起来。但这做起来并不容易，因为这些派系很多，自正在致力于革新的自由主义者直至热衷于富有战斗性的阶级斗争的社会主义拥护者都有。在怀希罢工期间，原来拥护仲裁法庭的工会、同业和劳工协会和作为它们的政治集团的统一工党，都不支持劳工联盟，却严厉地加以批评。尽管如此，经过反复协商以后，却于 1913 年 6 月成功地召开了“统一大会”。一个称为“统一劳工联盟”的机构也建立了起来。这个机构负责开展工业领域里的活动，同时它在议会活动方面是与社会民主党有联系的。

各种分歧被掩盖着而没有得到弥合。码头工人的罢工不久便暴露了这一点。统一劳工联盟号召举行一次总罢工。这个号召在奥克兰和惠灵顿得到了广泛的响应，但得不到完全的响应，特别是铁路工人仍继续工作。而且，统一工党仍在社会民主党之外继续存在着，并反对总罢工的号召。这一点也是关系重大的。

这次罢工的失败，对最近取得的统一是一个严重的打击。这一点加上随后不久即告爆发的世

界大战，实际上破坏了 1913 年的“统一大会”的工作。象现在存在着的工党，只是到 1916 年才宣告成立。它是在各团体和各工会都可以参加的组织“地方工人代表委员会”的基础上成立的。工会运动直到“劳工联盟”在 1937 年成立的时候为止，都没有再次取得统一。但是，酝酿组成工党的运动，其发展的历史更多地是属于经济不稳定（这种经济不稳定现象，在 1929 年世界经济大萧条开始时达到了顶峰）的战后时期的历史。这个问题当在下面另一章加以叙述。

第 四 篇

新西兰处于变革中的世界

195

第十九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

第一次世界大战至大萧条时期的经济趋势

后世子孙可以回顾第一次世界大战，把它看成是一个时代的结束的标志。总的说来，人们对世界进步的信心，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仍然持续着，但这种信心却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的一些事件所动摇；人们对当时几乎被视为当然的信念表示怀疑。但是他们却不愿意承认这一点，并且存在着这样的一种倾向，即试图按照如同战前一样的基础来重建世界。

新西兰并不例外。当和平到来时，在人们之间流行着对未来经济发展的乐观情绪。但当战后的繁荣消逝时，这种乐观情绪很快就受到猛烈的冲击。新西兰的经济动荡不稳，因而人们对市场问题产生了新的忧虑。当局曾采取了一些不寻常的步骤来应付一些正在出现的问题。但是一般地

说，人们似乎总是把这些问题看成是战争引起的暂时失调，以为无须经过任何急剧的变革，情况不久总会自行改善，新西兰又会按照原来轨道恢复它的日益增长的繁荣。人们没有想到1929年开始发生经济大萧条的可能性，而1929年开始的经济大萧条带来的困难使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年代出现的困难相形之下就显得渺小了。

战争本身刺激了而不是妨碍了农牧产品生产 196
的发展。从1915年年底开始，英国政府以稳定地上升的价格购买了新西兰的主要产品，这时新西兰在英国市场所占的份额也增加了。由于有了这个市场，就有力地推动了生产的增加。这种情况在制酪业方面尤为明显。战后出口的奶油和干酪分别比战前增加两倍和一倍。

大战期间，虽然英国政府对新西兰肉类、奶油、干酪和羊毛的购买量不断增加，但由于缺乏运输船只，有一些这类的产品留在新西兰待运。战争结束时，新西兰各仓库都堆满了这些产品，因此人们渴望清理这些存货，以便腾出地方容纳即将供应市场的新产品。很多人都强烈要求英国政府结束“战时征用物资”的做法，他们认为这些物资在

公开市场上出售，必会获得更好的价格。1920年解除了对肉类的管制，1921年又撤销了对奶油的管制。至于羊毛问题，则由新西兰、澳大利亚和英国的羊毛商共同拟订了适用于一个时期内的有控制的处理制度。

人们要求一个自由市场，而不愿接受英国政府征用物资的保证，这说明他们多么坚信他们能有机会在旧的轨道上取得越来越多的发展。对安置退役人员立足于土地谋生的要求也是指向同一的方向，而当时报纸上的许多舆论也都强调了这一点。1920年元旦，某报纸使用了“充满着繁荣”、“满足不了的市场”和“各阶级共享的财富”等辞句。该报称，未来的前景是很有希望的——“由于具有良好的气候和肥沃的土壤这些有利的自然条
197 件，人们只要明智地去开发这些财富，巧妙地运用他们的能力，就可以保住他们的繁荣和安乐”。

随之而来的是希望的幻灭。战后出现过一个短暂而欢乐的繁荣时期，但它很快就结束了。1920年出口的羊毛为一亿一千六百三十二万七千一百七十六磅，价值一千一百八十六万三千八百二十七镑；而1921年出口的羊毛为一亿五千

八百七十一万四千八百二十八磅，价值只有五百二十二万一千四百七十九镑。一年以后，奶油的价格下跌了，1921 年，奶油出口量将近十七万英

价格波动幅度很大；但也出现过一些好年景。在另一方面，奶油价格却从未恢复到接近于战后的繁荣时期所曾达到的价格。可是它在国民经济中仍然占有日益重要的地位。一般地说，奶油的出口量仍然继续增加，1927年到1929年这三年，每年平均出口量约为一百五十万英担，而在大战爆发的前几年，每年出口量还不到四十万英担，即使在1921年，出口量也只有九十万英担。奶制品业
198 是小农牧场主经营的工业，农村人口的一大部分都在从事奶制品的生产。在大战以前和在大战刚结束后吸引人们立足于土地谋生的前景，现在已不复是光明在望，不复有预示繁荣必将到来的灿烂阳光照耀着。

当国外的价格下降时，最直接受到影响的是农牧场主；可是，在象新西兰这样密切地依赖农牧产品出口的国家，这种影响不久就波及社会上其他各阶层。那些有比较固定收入的人们，不管他们的收入是依靠利息、薪俸，还是工资，在某一个时期或许可以用自己的进款取得较多的东西，但是他们不能始终肯定他们会得到这些进款。商业呆滞了，土地又回到受押人的手里，失业现象也出现

了。在工业、运输业和农牧产品生产上，日益增多地使用节省劳动力的机器，或许早已成为造成失业的一个原因。这种失业现象在1926年变得更为严重，并引起了人们的忧虑。这是时代的性质正在发生变化的一种迹象，而直到目前为止，人们还没有想到有必要采取任何经常性措施来处理失业问题。尽管如此，1928年还是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其任务是就失业问题提出报告书。移民的规模也是人们对战后的持续不断的繁荣抱有信心的一个标志。从1920年到1926年，在政府的资助下从英国到新西兰的移民人数，平均每年达八千人，1926年竟达一万人以上的高峰。在同一时期内，自费前来新西兰的移民人数，每年平均有六千人左右。对从英国到新西兰的移民的资助，到了1927年年中实际上已中止了。

政治趋势：革新党的执政

在讨论第一次世界大战至经济大萧条期间的政治趋势之前，我们不妨先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即这些年来日益加剧的不稳定状况出现以前，价格的长期上升所带来的某些一般的影响。繁荣是有

199 其诱惑性的。土地的开发因价格的上升而得到助益，但人们却不把土地当作进行正当生产的源泉，而视之为一种可供买卖、从中获利的东西。1915年至1924年期间，几乎半数已被使用的土地换了主人。由于人们预期土地价格的上升，也放松了正当的耕作。从1910年直到繁荣时期以后的年代，按人口平均每人的产量已经逐步地下降。

国家的岁入日益增加，兼之受到来自各方面要求分享利益的压力，致使政府在支出方面不够谨慎。政府借款来发展各项事业及帮助移民和家庭主妇，使国债大大地增加。在这时期，偿还利息还是比较容易的。虽然农牧场主可以从其他方面，如牲畜业和牧场代理商方面，借到大部分资本，可是，政府提供的贷款，条件比较宽厚，有助于使农牧场主借到数量多而且利息低的信贷，这就助长了人们对形势抱有过于乐观的看法。战后对退伍军人的安置，意味着使不动产市场增加了“二万二千五百八十五名身带借款二千二百六十二万七千八百六十四镑的新买主”。这就助长了人们夸大当时业已出现的那种过分乐观的倾向。

农牧场主的繁荣景象对城镇发生了影响，因

为前者的需要仰给于后者。钱(大部分是借来的)被随意地用于公共事业和私人享乐方面。各地方机构借款很多，其中大部分是在国内举借的。因此，在繁荣时期，特别是在战后繁荣时期及其以后，国家、地方机构和私人方面，负债额都大大地增加了。

“国家的”繁荣，按整个国家的各项统计数字来衡量，不一定意味着整个社会的所有成员的生活都得到均衡的改善。有证据表明，从 1906 年到 1921 年，财富的分配不是变得较为均匀而是变得
更不均匀。往往出现这种危险，即一些狡猾或走 200
运的人，他们靠价格上升，不是靠真正为社会服务而获得大量的钱财，此后就依靠这些收益过活。新西兰国内借款数额的增加，同样也使不劳而获的收入的数额增加了。上面已提到过的工资的实际价值的下降，一直持续到 1927 年，而在这个期间失业现象也是日益严重的。

因此，人们在对新西兰的看法中，往往容易抱有某种虚假的乐观主义。这种虚假的乐观主义，只是部分地为新西兰在 1921—1922 年以后出现的不同情况所削弱。人们的一种思想，在某些条

件的支持下一经形成，即使那些条件已发生了变化，总还是趋于保持不变。人们之所以区别于其它动物在于人们能够思考，但是人们并不终日从事深思。总的说来，我们并不以思考为乐，却宁愿让一种观念成为一种习惯，而不愿使之成为一种生动活泼的思想。因此，从政治上来看，在度过了许多人所曾经历的繁荣日子之后，新西兰人完全没有作好准备，去老老实实地正视这个变化中的世界已经给他们摆在面前的问题，更不用说去正视行将到来的经济萧条的冷酷岁月了。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一个具有政治意义的酝酿组成工党的运动在战前年代就出现了。产生这种运动的条件有二：一是靠工资为生的人口比例不断增长，这些人没有多大希望能成为立足于土地或工业的独立生产者；二是实际工资有下降的趋势。这些条件并没有随着战争而消失或在战后即行消失。人们对这一运动的真正的需求从如下的事实表现出来：虽然在大战期间有些领导人采取了不得人心的立场，但酝酿组成工党的运动还是有所发展。这一运动的支持力量在1914年的大选以及在补缺选举中均有所增长，而到了1916

年工党便在其现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了。虽然这
实际上只不过是所谓激进自由党人和那些公开声 201
称为社会主义者之间的某种折衷物，但这个党与自由党和革新党是显然有所不同的。

甚至当革新党于1912年开始执政的时候，曾使它区别于自由党的原则，例如有关土地的完全保有权和土地的租借权的争论等，就早已在很大程度上消失了其原先的基本分歧，因而这两个党的政纲早已没有多大区别了。革新党在1911年和在1914年两次大选中取得的胜利都不是决定性的胜利。在大战期间成立了一个代表这两党的国民政府①，由约瑟夫·沃德爵士和W·F·梅西共同分担领导责任，那是不困难的。本来，实现两党合并以反对工党，似乎是自然的事。可是各个政党，正如各种思想一样，是不容易消亡的，有关这两个党的合并的谈论并没有产生什么结果。在1919年的大选（这次大选由于世界大战而推迟了两年）以前，沃德和自由党人已退出了国民政府，

① 这里所说的“国民政府”(National Government)系指由革新党和自由党组成的联合政府，不是指下述1935年新西兰国民党成立后当选执政的“国民党政府”。——译者

因而这次大选便由三个政党即革新党、自由党和工党进行竞选。

这次大选和其后两次大选的特征是，自由党趋于衰落，而工党得到了发展。在这个发展时期的工党是由H·E·霍兰领导的。由于出现了革新党和工党之间的更为尖锐的相互对抗，自由党的存在看来正在被挤掉。诚然，在1925年工党失去了一些议席，可是自由党已如此严重地受到了削弱，以致工党便成为革新党政府的正式反对党。在1925年梅西逝世以后，当合并自由党和革新党的建议遭到失败时，自由党即更改了其名称，用"国民党"的名称参加竞选。这标志着当时出现的一些趋向；可是这种戏法却没能变出任何奇迹来。

因此，在这个困难时期中，革新党都一直在执
202 政。该党在1922年到1925年期间，只得到不牢靠的多数的支持；但在1925年的大选中，这个党的新领袖J·戈登·科茨却取得了巨大的胜利。科茨是北奥克兰的农场主，在大战时服役曾立过大功。1911年，他作为一个自由党独立派人士被选进众议院，并在1912年的选举中，他和另外一些人的投票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使得自由党被撵

了出去，改由革新党入掌政权。后来，科茨在梅西政府里担任部长，以工作有精力和有效率闻名。在 1925 年的大选中，选民们曾得到这样的号召：与其说去投票选举革新党，倒不如说去投票选举科茨这个"能把事情办好的人。"

革新党的主要支持者是北岛那些发迹的农牧场主，但它同反对原来自由-工党内阁的更为保守的势力有联系。现在自由党正在衰落中，而代表工人阶级的酝酿组成工党的运动方兴未艾，作为这一运动的主要劲敌的革新党，便日益得到城镇较富裕的势力的支持。因此，在战后繁荣结束后的困难时期，革新党政府不得不找出一些方法来帮助遭受困苦的农牧场主，特别是帮助制酪业主，而这些方法当然是以不会过多地触犯那些较大的金融界的利益作为前提的。

革新党的政策

总的说来，革新党执政的时期，是一个较多地致力于帮助那些已利用土地从事耕作的人们的时期，而不是一个较多地致力于扩张移民区的时期。农场主为了维持得过去，必须更有效地耕作，更多

地采取集约的耕作法，而这种耕作法需要的资金支出较多。在大战期间，采用土表追肥日益广泛，在北岛且已成为通常的做法。为了提供资金以便贯彻直接或间接帮助农场主的政策，政府向伦敦和在新西兰大量借债。铁路和公路建设加速了，水
203 力发电工程也发展起来了。给农场主运输肥料，运费低廉。梅西农学院创办起来了。1923年，扩充了便利农场主向国家借款的种种设施，同时，作为在1925年成立的一个调查委员会的结果，在1927年根据“农村贷款法”和“农村的中间信贷法”，进一步制定了农村信贷的条款。从1921年到1928年，给予农牧场主的贷款已超过三千六百万镑。

在帮助农牧场主方面所采取的一项最引人注目的措施是设立了若干个管理局来调节他们的产品的出口和销售。许多农牧场主认为他们自己是生产者，但是他们并没有得到足够的报酬，因为支付给商人和运货人的代价太高。1922年成立了肉类出口管理局，奶制品出口管理局则成立于1923年。随后，有关水果、蜂蜜和栲丽胶的出口管理局也相继成立。在这些管理局中，生产者的代表占多数，这些代表同政府的代表以及其他与某特种

商品有关的人员坐在一起工作。例如，肉类出口管理局有一个牲畜业和牧场代理商的代表，奶制品出口管理局有一个奶制品业主的代表。这些管理局并不取代工商业上的正规的渠道。它们的任务只是：对产品的更好的配制、分等、包装和销售规定一些条件；调节市场上商品的流通量，以防止商品供应过剩；为谋求更合适的运费和其它费用而进行协商。整个办法乃是一种引人入胜的合作和国家援助的扩大，表现出新西兰发展的特点。这些管理局出色地做好工作，可是当各种情况仍是不稳定的时候，就出现一种倾向，即批评政府干涉私人企业的自由活动。

1926年海外市场的价格的下降，失业人员的
增多以及前景的不稳定，都是1928年大选的背景。 204
自由党的残余势力以统一党的名义于1928年重新组织起来。曾经在1919年失去议席的自由党原来的领袖约瑟夫·沃德爵士，在1925年重新获得了议席，他仍然坚持打着自由党的旗号，但自1925年以后，他大部分时间都不在国内。1928年的大选前不久，他从国外回来，接受了统一党的领导职务。这样就给选民提供了一个在工党以外可

以替换革新党的政党。在这一次的大选中，人们预料革新党将会失去它在1925年的选举中取得压倒多数的一些议席，可是没有什么人预料到革新党竟会被统一党和工党夺去那么多的议席，以致它在众议院不再能成为多数党，也没有什么人预料到统一党在所有各类选举区获得的议席竟然大致足以和革新党相匹敌。

竞选运动为时短暂，而且情况混乱。一个重大的特点是约瑟夫·沃德爵士建议在伦敦筹借七千万镑，用来促进移民区和工业的发展。沃德在奥克兰发表第一次竞选演说中声称，他“保证将在十二个月内把七千万镑引入国内供人民使用”。其中的一千万镑将拨作完成各条铁路的费用，这一措施也会有助于吸收失业人员就业。其余的六千万镑则将用于发放贷款，借以安置更多的人立足于土地谋生，而这“决不”以征税的方式“使公众付出任何代价”。这一措施转过来将会激发贸易和工业的发展。这种主张与革新党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革新党表现出了害怕它过去的大规模借款会受到人们指责。1894年的“对移民的贷款法”的发起人沃德爵士，则似乎是在缅怀塞登执

政的兴旺岁月以及过去价格上升和对移民区的发展提供了无限机会的年代，虽然即使是在那些幸福的日子里，政府也从未筹措过这样大规模的借款。

人们提出了种种解释，说约瑟夫·沃德爵士 205
仅仅打算在第一年内安排这笔借款，但实际上将分布在八年或十年取得这笔借款。这样的一种借款的速率并没有超过革新党政府的借款的速率。在一个非常短的时间内把七千万镑引入国内，为大胆的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提供资金——这种思想，不论其意图如何，似乎已经给公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革新党嘲笑统一党的这个政策为“借款——繁荣——破灭”的政策，希望使自己较为稳重的纲领能取得公众的支持。但革新党的这一宣传反而有助于公众形成对统一党的政策的深刻印象。

约瑟夫·沃德爵士因患眼病，不久以后不得不进医院治疗。他在奥克兰发表的竞选演说中，看来可能是把讲稿中打算在第一年筹借七百万镑的数字偶尔读成七千万镑。一旦把数字读错，就难于有效地加以否认，特别是沃德及其在报界的

支持者给人们造成了这么一种印象，即他正在提出一项新的而且大胆的发展政策，使人缅怀起沃格尔的繁荣时代,这就更不妨将错就错了。事情最有趣的一面是,革新党本意是用穷奢极侈、挥霍无度的画面去煽起选民们对统一党的愤慨，但看来反而使选民们对统一党感到满意；农村的大部分选民以及城镇里的中产阶层都转而支持统一党。

在选举以前，约瑟夫·沃德爵士最后曾发表声明说，如果统一党掌握了决定权，他们将在众议院协同工党一起投票推翻革新党政府。实际上正是工党协同统一党投票，才把革新党政府撵下台。但这次选举的结果却使新西兰的政治出现了混乱局面。客观形势趋向于使劳资之间的分歧成为真正的争端，要求有两个政党各自代表一方的观点。可是选民们主观上还是念念不忘立足于土
206 地的或在其它领域里的小规模独立企业，希望有朝一日能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他们看来并不愿意接受这种客观的趋向。因此，他们便转而支持统一党，这样他们就可以不用支持工党以达到其反对革新党的目的了。事实表明，统一党的部分号召虽不是工党的观点，可是这个党只有得到

工党的支持才有可能执政。由此可见，选民们所采取的立场是多么不现实。

当约瑟夫·沃德爵士就职时，他发觉现有的安排妨碍了他向外借款的计划。可是无论如何，他在健康方面日益衰弱，没有旺盛的精力来进行领导工作。他在1930年5月辞职，并且不久之后就死去了。G·W·福布斯接任他的职务。人们逐渐地认识到，这个国家面临着比经济生活中的波动无常的不稳定性更为糟糕的情况。

在经济萧条到来时，出现了一种使工党以外的各党彼此结合起来的倾向。虽然直到1935年大选以后它们才完全合并成为现在的国民党，但它们在1931年大选之前，就已联合组成了国民政府。经济萧条无疑结束了关于七千万镑的款额到底是在一年内还是在十年内借得的问题。如果没有发生经济萧条，那么，各党的关系将会怎样发展下去，对这个问题进行推测是有趣的。试问：统一党与工党之间的真正分歧究竟需要经历多少时间才会导致出现危机和可能举行一次新的选举呢？

207 第二十章　新西兰与世界经济大萧条

经济萧条的起因

在战后繁荣转入衰退以后，整个世界的经济生活经历了一个重建和恢复的时期。然而，在这个时期中却出现了大量工业界的动乱和失业现象，1926年大不列颠的总罢工便是一个标志，显示出了隐藏在表面现象底下的这些时代潮流。可是，由于被世界大战造成的经济失调所引起的部分问题已由国际联盟通过国际行动加以处理，而当时欧洲的生产已经达到了战前水平，随后又超过了战前水平，因此人们对未来便显示出了日益增长的乐观主义态度和饱满的信心。

人们的这种看法并不完全正确。其实，局势并不象许多人所想象的那样，已经真正地恢复到了战前水平。世界大战有助于增强美国经济的重要地位。资源丰富的美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出口

商品的较大生产国和金融中心。欧洲经济的恢复，正在由美国资本通过贷款和工业投资的方式加以援助。其中德国就是主要的受援国之一。另一方面，美国工业界的操纵者却给美国政府施加压力，要它提高关税率，限制其它国家的商品的进口。这一措施给那些必须支付借款的利息的国家 208
造成困难，并且当这些国家的生产从大战的创伤中恢复过来的时候，这一措施也妨碍其正常贸易的恢复。

此外，美国还出现了一次大繁荣，它具有使人们对未来产生极度狂妄的乐观情绪的特点。美国的一个领袖赫伯特·胡佛先生（他后来担任总统时不得不对付最初几年的经济萧条）曾大谈特谈美国正接近于"克服贫穷的最后胜利"。基于这种信心，信贷大大地增加了，商业也兴旺了起来。可是，正如两个美国历史学家所指出的那样，"国民收入过大的一部分落到占人口比例很小的那部分人身上……落到工人、农民和白领阶级① 身上的

① 白领阶级(white-collar class)系指在资本主义国家企业或机关内受雇的从事非体力劳动的人员，如打字员、速记员、记账员等。——译者

则不够多，但整个商业系统却要依靠这些人的持续购买力”。

1929年10月，突然之间，信心枯萎了，人们出现了一片恐慌，繁荣消逝了。价格下降了，借款被收回了，银行出现了挤兑现象。由欧洲提供的短期信贷被收回了，不久全世界都感受到这些影响。世界经济大萧条已经来临，一切有过当时经历的人对此当能记忆犹新。这次经济萧条在1932—1933年达到了其最坏的顶点。

经济萧条对新西兰的影响

象新西兰这样一个依靠海外市场的国家，必然会感受到经济萧条的严重影响。不管1931年和1932年新西兰的出口量有巨大的增长，但出口值却急剧地下降。1928年的出口值超过五千五百万镑，而在1931年，出口值还不到三千五百万镑。在这种经济危机下，新西兰出口的农牧产品的价
209 格，往往比进口的工业品的价格下降得更快更多。因此，我们出口的商品，不能换回同样多的进口商品。我们用于发展事业上的资金大部分是向英国金融家借来的，而我们出口的商品，必须以相当大

的部分来支付过去这些借款的利息。价格虽然下降了，可是要偿付的利息单的数额依然如故，因此我们必须出口更多的羊毛、肉类和奶油，才能提供所需的款额。1928—1929年，百分之十四点四二的我国出口商品须用于支付政府和地方机构向国外借款的利息；1931—1932年，债款虽然稍有减少，可是须用于支付借款的利息的出口商品却增至百分之二十六点零九。这自然就进一步减少了我国出口商品所能换回的进口商品量。

在国内，曾经借款来发展农牧场的场主们，也遇到相同的情况。当价格下降时，农牧场主们为了支付他们的抵押借款的利息，必须耗费他们更大部分的农牧产品。农牧场主们只有较少的钱花在其它事情上了，因而那些为他们供应必需品的城镇商人就受到了影响。国内贸易衰落，而失业人数增加。经济萧条的严重性好象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由于缴纳所得税的个人收入以及来自关税和其它间接税的收入减少了，政府的岁入亦随之下降。公共工程的建设受到削减，政府采取的其它经济措施进一步使经济萧条的雪球滚大了。那些坐享其成的人，如收取利息的金融家们，感到经

济萧条对投资不利，因而企业萎缩不振。货币不在市场上流通而被贮藏起来。因此，农牧场主们，特别是制酪业主们，都在挣扎度日，而根据1933年10月份的统计，登记为失业或从事失业救济工程方面的劳动的二十岁以上男子，数目几达八万。如果把二十岁以下的男子及其他没有登记的人包括进去，那么，在十六岁到六十五岁之间靠工资为生的男子当中，估计每三人或四人中就有一人失业或从事失业救济工程方面的劳动。

210 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长期经济萧条中也遇到类似的问题，但现在的情况却有某些不同。诚然，新西兰再也不那么严重地依赖于一种出口商品——羊毛。出口项目中已添上了肉类和奶制品，但这两种出口商品都是属于一些高度专业化的工业的产品，这些工业雇用的人数比羊毛生产事业雇用的人数要多。而且从整体来说，新西兰同海外市场已更加紧密地联结在一起。经营肉类和奶制品出口的农牧场主们都是一些财力有限的人。他们比不上羊毛的生产者那样易于度过艰难季节。他们所处的地位也和那些较早从事农业的小农场主不同。这些小农场主是为当地市场进行

生产，依靠他们自己的土地就可以维持相当舒适的生活。肉类和奶制品这两种出口商品在各加工阶段也要雇用一大批人，还有在总人口中占比例更大的一批人虽然与出口业有关，但不是直接地受雇于耕耘田地。一旦经济萧条的影响从农牧场主扩展到整个社会的时候，能够自力解决困难的人就比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更少了。再则，同先前的经济萧条比较，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出现的经济萧条，也更为严重，而且更多地带有整个经济体系的危机的性质。

应付经济萧条的各种措施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新西兰曾被人们视为“社会的实验室”，而在战后时期，新西兰人仍然认为他们在社会立法上，走在世界的前头。实际上，当其它国家正在处理由于经济生活的日益增多的复杂性而引起的各种问题的时候，新西兰在这方面却无所作为而落在后面了。在那充满机会可立足于土地谋生的年代里，人们忽略了有必要做好象失业保险之类的事情，这或许是自然的。但是，乐观情绪持续的时间太长了，因而经济萧条带来 211

的种种问题一出现，新西兰就显得毫无准备。

自十八世纪结束以来，那些开创用私人资本发展现代工业的人（主要是英国人），往往被各种强加给他们的、根据大地主和早期商业巨头的利益而制订的条例和限制所阻碍。因此，他们反对政府在经济生活中采取行动，而主张经济事务应该通过市场的自由活动任其自行调节。事实上这种主张带来的严酷后果后来终于导致了实行一系列的社会立法；而在新西兰，我们则早已看到政府被迫插手于一些在别国往往全由私人企业处理的事情。尽管如此，当时有一种看法依然十分强烈，即认为经济萧条现象是有来有去的，如果听其自然，情况就会自行改善。因此，在这次经济萧条的初年，政府没有采取什么积极的行动，而倾向于把它自己当作一个企业，认为只有励行节约，才能在好光景到来之前维持得过去。

然而，甚至在经济大萧条到来之前，失业现象就已经达到如此严重的程度，致使政府不得不在1928年成立一个委员会来进行调查研究，随后又在1930年通过了一项“失业救济法”。政府要筹集一笔基金，用以供应失业救济工程所需的资金或

支付失业者生活补助费。因此，凡是二十岁以上的男子，每人都得为筹措这笔基金缴纳三十先令的税款，另有百分之五十的津贴则由国家总岁入拨付。这项课税对低工资的工人来说是一个负担，政府所筹集的资金数额也很不充足，所提供的失业救济工程又往往是缺乏建设性的和使人感到沮丧的。如果把“失业救济法”同内容更全面的1908年“英国国民保险法”相比较，就可以看到，新西兰议会是多么不愿意与各种困难作斗争，而这些困难不久便如洪水一般涌来了。

自1931年9月组成了国民政府①（在随后不 212
久的一次选举中受到追认）以后，政府显出有较大的能力。福布斯继续担任内阁总理，科茨被任命为失业救济部部长，而在W·唐尼·斯图尔特于1933年1月辞去财政部长职务以后，科茨即接任该职。科茨成为政府中的主要人物，特别是在他担任财政部长以后，更是如此。那些应付经济萧条的较富建设性的措施，主要是由他负责制订的。

① 这里至本章之末所提到的“国民政府”，都是指由统一党和革新党组成的联合政府，不是指由1935年新西兰国民党成立后当选执政的“国民党政府”。——译者

如果他有更大的行动自由，他也许能做更多的工作。

国民政府最初得到了农牧场主、制造业主、金融界和商业界的支持。它的措施却受到了以城市工人为后盾的工党对手的批评。在经济萧条来临时，首先最直接地受到影响的就是农牧场主们。他们的产品价格下降了，而成本的下降却没有那么迅速。政府所代表的势力集团认为，必须削减工资才能降低成本，因而他们攻击仲裁法庭，把该法庭视为减低工资的障碍。结果，政府于 1932 年对“劳资调解和仲裁法”作了修正，采取强迫性的调解，而不诉诸仲裁。在当时到处充满失业现象的情况下，各工会讨价还价的力量削弱了，工资也降低了。政府还授权仲裁法庭拟定一项降低工资的通令。此外，政府还削减公务人员的薪金，而教育经费也受到猛烈的削减。

政府采取的一项较有建设性的措施是提高新西兰镑对英镑的兑换率。二者的兑换率稳定在一百一十新西兰镑兑一百英镑之数，这已实行了一些时间。但在 1933 年 1 月，兑换率提高为一百二十五新西兰镑兑一百英镑。这就是说，新西兰农

牧场主在英国销售其产品后所得的每一百英镑，
在新西兰国内则具有相当于一百二十五新西兰镑
的购买力。因此，那些向国外销售产品的人，同那 213
些在新西兰向农牧场主出售产品或出卖劳动力的
人相比较，前者的地位便得到了改善。但是政府
也具有这样的一种意图，就是通过提高农牧场主
购买力的办法，为新西兰贸易的发展和增加就业
人口提供某种促进因素。正是由于政府采取这一
种“非正统的”做法，才引起了W.唐尼·斯图尔特
先生的辞职。

为调整受押人对抵押品的权利而制定的条例，对农牧场主也是有帮助的；1935年成立了抵押公司来协助这项工作，并且接管了国家贷款公司的工作。1934年成立了农业执行委员会，其总的职能是监督农产品的生产和销售。

在工人方面，有关失业救济工作的规定是在较良好的基础上作出的，同时又规定了减低房租和减少用房屋抵押借款的办法。利率的降低，使商业得到了好处，而在这一方面，科茨成功地把政府的内债的利率改低，是起了领先的作用的。储备银行的创立也是为了保证信贷的提供不会变成

仅为牟取利润的事情，而应以照顾公众的利益为指导思想。

国民政府的这些措施，大部分仍受到工党的批评，但科茨由于攻击了“合同的神圣不可侵犯性”，也遭到了比较保守的势力的批评，例如干预利率的立法就遭到了批评。科茨是愿意听取别人的意见的，而且吸收了一批年青有为的顾问来充实他的工作人员班子。当时他正在草拟一些内容包罗更广的社会发展规划，虽则这些规划能否得到他的政治同僚的支持，还是有疑问的。

214 从1933年开始，生产的增长，特别是奶制品生产的增长，加以价格的提高，给人们带来了一些宽慰；1935年又降低了为办理失业救济工作而征收的税率，同时公务人员的工资也有所提高。但是，失业现象仍然严重，当1935年大选中工党获得巨大胜利、国民政府垮台的时候，城乡许多人仍处在苦难之中。

第二十一章　工党政府 215

支持工党的新选票

有一个时期，除了比较富裕的郊区以外，工党已掌握了大多数的城市议席。1935年的选举（新西兰议会的任期，因处于危急的经济萧条年代而延长）中引人注目的事情是部分小农牧场主的选票转向工党，因此，自1890年后的十五年间，曾经作为自由-工党的基本力量的小农牧场主和城市工人，现在再度部分地结合在一起了。特别是在北岛，工党获得了许多农村和半农村的议席，而一些在经济萧条时期遭受过严重打击的都市和城镇的中产阶层也第一次投票选举工党。工党的政策是通过较大规模地发展二类工业，使新西兰经济获致较大程度的平衡，这一政策在某种程度上也吸引了制造业主。但是，我们必须记住，工党获得的五十四个议席的纪录，如同各次选举中经常出现的情况一样，是与投票选举工党的票数极不相称的。工党所得的票数虽然在数量上比任何别的

政党所得的票数都多得多，但还没有达到总票数的一半。

政治上的变革主要是经济萧条带来的结果。任何一届政府在经济萧条时期执政，即使当时经
216 济萧条已呈现出正在消失的迹象，都往往会失去人们的支持。革新党和自由党(统一党)这两个老政党是早已卷入这种在经济萧条时期执政的政府的。对于那些要求变革的人来说，当前已不再象1928年的选举中选民有工党以外的其他两个政党可供选择，而是除了工党之外，没有任何一个熟悉的政党可供挑选了，因为有人曾试图组成一个称为民主党的新政党，但结果是完全失败了。城镇里有许多人，如那些过去没有同已组织起来的产业工人和运输工人联合在一起的店员和机关工作人员，现在都第一次为工党所吸引，其原因是不难理解的。在经济萧条时期，这些人都是各种经济势力的受害者，而他们的受害不能归咎于他们自身。工党答应给他们以较大的帮助。至于有关小农牧场主的情况，我们还必须作较多的阐述。

农牧场主们作为土地、牲畜和工具的所有者，总是按照自己的意图利用这些东西谋生，因而他

们都把自己看成是财产的所有人。他们对社会主义不感兴趣。那些已组织起来的工人，依靠其集体的讨价还价的力量和仲裁法庭，得以免受海外市场竞争的首当其冲的打击，而农牧场主们对于这些已组织起来的工人甚至还倾向于采取敌视的态度。任凭政府对小农牧场主们已特别尽力加以帮助，但作为经济萧条的结果，他们往往仍然感到难以自立。他们的农牧场的产值已下降到以其农牧场作为抵押而借到的款额以下。他们感到现在不再是为他们自身及其家庭而工作，而是为他们的债主工作了。他们已陷入于一种与靠工资为生的工人几乎完全相同的境地。1934 年成立的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中指出："在新西兰这个自治领，目前至少有百分之五十的制酪业主在不同程度上无力应付他们在财政上承担的义务"。

小农牧场主们传统上对那些金融业者是抱有怀疑态度的，尽管前者在创业之时往往必须向后者求借。在小农牧场主们看来，这些金融业者只
不过是金钱加权势，把小农牧场主们辛勤得来的 217
一些劳动果实搜括以去，而在不景气的时期，更横施威胁要把他们长年累月的劳动成果一口吞没。

在当时经济萧条的情况下，许多小农牧场主对现有的银行和货币制度感到很不满，那也不是不自然的事。他们之中有许多人向往一种称为“道格拉斯社会信贷”学说。这一学说把银行描绘成为一群寄生虫，并作出保证：只要改革银行、信贷和货币制度，就能取得巨大的成效。

工党对那些作为主要金融中心和资本主义柱石的银行自然也感到不满。农牧场主们和工人们自己都感觉到要起来反对一个共同的敌人。工党的一些党员对于受到制酪业主广泛欢迎的货币和信贷学说也感兴趣，但就整个工党来说，其政策则是要对银行和信贷政策加以控制，而不是让银行控制社会的经济生活。

由于工党许诺给奶制品以一种保证价格，这就使得它在农牧场主们面前更具有吸引力。这一措施将有助于拉平价格起落的影响，从而保证生产者付出的劳动能够得到较稳定的报酬。经历过经济萧条的年代以后，这种保证价格，对于农牧场主说来，正起着价格下降时期仲裁法庭对工人所起的类似作用。我们在这里研究农牧场主的立场的时候，也看到了多年以来工党发展的一些情

况。现在我们必须转而论述这个问题。

工党在新西兰议会的兴起

有关工党的起源问题，我们已作了一些叙述。1913年，不同的工人团体之间已首次达成协议，只是由于同年大罢工的失败和1914年第一次世 218
界大战的爆发，这个协议才遭到了削弱。然而，在1914年的大选中，那些特别吸引工人阶级支持的议员仍旧被选进了新西兰议会，现在的工党就是以这个集团为核心，于1916年取得新的统一而建立起来的。人们可以从各工人代表委员会的建立上看到工党的主要组织中心。这些工人代表委员会是1914年为了安排议会的候选人在一些中心地点组织起来的；现在它们已变成抱有多少不同观点的集团借以达成广泛协议的工具。各工人代表委员会是依据下列各单位的入会而组成的：各工会；1913年以后仍继续存在的社会民主党各支部；“其他赞成社会民主党党章和党纲而恰当地建立起来的进步组织”。工人代表委员会的宗旨据宣布是要实现生产资料、产品分配和产品交换的社会化。随后它提出了一套适合于议会立法的

计划纲要。随着时间的推移，工党的各支部（关于工党的支部，党章并无明文规定）即取代了社会民主党的各支部。

新西兰议会中的工党集团不断扩大，其核心虽由原来的“红色”劳工联盟的各领导人所组成，可是，总的说来，新西兰工党所代表的观点，却是广泛的工人运动中的温和派的观点。工党在其党章中虽然还保留着社会主义的目标，但它越来越倾向于把实现这个目标推迟到无定限的未来，并接受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结构。工党主张在这种结构的范围之内改善工人的地位，并在它上台执政的时候实行了旨在改善工人的地位的各种措
219 施。它扩大了国家在调节经济生活方面的活动，但并不按照社会主义这个名词的真正涵义对经济生活进行任何普遍的改组。H·E·霍兰死后，迈克尔·约瑟夫·萨维奇于1934年继任工党领袖，并于1935年上台担任首届工党政府的首脑。有意思的是，他说他的党要继续完成塞登遗留下来的工作，同时政府部长们对工人们讲的是关于政府对现有形式的整个社会所承担的责任，而不是关于实现社会的改造的问题。

工会与工党

工党的主要支持力量是工厂、运输业和矿山的工人，关于它怎样取得工人以外的其它集团的支持的问题，上文已经作过阐述。但事情还有另外的一个方面，即不管在酝酿组成工党的运动中往往出现各种摩擦和意见分歧，但是这个政党却得到工厂、运输业和矿山的工人越来越坚强的支持。这方面的历史也必须加以叙述。或许最使人感兴趣的进展是在 1914 年至 1919 年之间，当时的情况乍看起来似乎对工党是不利的。虽说在 1914 年的选举中，工党获得了六个议席（其中一个议席是否应算作工党的而不算作自由党的，仍有疑问），而在1919年的选举中它也只获得了八个议席，但是被推荐出来的工党候选人却多得很多，并且工党获得了百分之二十四的选票，而革新党只获得百分之三十七的选票并取得了四十五个议席。情况正如以后年代所表明的那样，人们这时必须认真看待工党了。下面几种情况或许就是增强了工党对工人的号召力的主要因素：工资收入赶不上物价的上涨，而有些资本家则获得巨额的

利润；有些人被征入伍服现役，而另一些人却能够继续发战争财；施行了限制各工会的讨价还价力量的战时条例；人们越来越怀疑，为战争付出的
220 牺牲，是否能够真正地换来一个和平的、公正的和更加民主的世界。战后年代动荡不安的经济状况以及人们对战争的结果所抱的幻想的破灭，都有助于加强工党对工人的号召力。

如同我们所已看到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年代里，工人运动的高涨，部分地是采取反抗仲裁法庭制度的形式。最好斗的一部分工人组织是受了工团主义的影响，它们对议会代表制表示毫不信任。在这一部分的工人组织（较早成立的工会）和那些指望新西兰议会实行改革立法或指望新西兰议会成为改造社会的工具的人们之间存在着各种分歧，而1913年的统一掩盖了这些分歧。但这种统一并不很牢固，由于罢工失败而受到的挫折以及大战的爆发，不久就使原来的各种分歧暴露出来了。

1916年工党的建成并没有使这些分歧得到完全的弥合。虽然有些工会在这个发展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但另一些工会却仍然奉行原来的

“红色”劳工联盟的某些传统，把工党看作是软弱地与工人阶级的敌人相妥协的政党。这个观点的主要表达者是劳工同盟。这个劳工同盟是在1919年成立的，它除了包括运输工人的主要工会以外，还包括矿工、金属制造工和冷却业工人。劳工同盟的目标是以产业部门为基础，而不是以手工业工会为基础，把新西兰的所有工人组织起来。一个特定的工业部门，如建筑业，其所有的工人都要组织在一起，而不要按他们所从事的特殊工种或手艺分开成立许多工会。这样，据说就可望动员工人阶级的全部力量来改造社会。仲裁制度原来具有这样的设想，即认为借助于劳资之间的利益的平衡，劳资双方就可以或多或少协调地共处于
同一社会中。劳工同盟自然是反对依附这样的一 221
种仲裁制度的。

劳工同盟的力量最强大的时期是1919年到1924年，但它始终没有机会在它所倡议的基础上取得内部的统一，特别是在失业不断增加、削减工资的压力不断增大的时期，更加难于取得内部的统一。那些置身于劳工同盟之外的工会都心怀疑虑，其原因或者是它们担心劳工同盟为了不可靠

的利益有可能把它们拖进冒险的政策中去，或者是有时它们觉得劳工同盟似乎在言论上强硬，而在事实上和行动上并不那么强硬。劳工同盟曾与其它工会团体进行过多次协商，最初是与成立于1913年、随后逐渐衰落的统一劳工联盟进行协商，后来又与同业和劳工协会及同业和劳工协会联合会进行协商——那些仍然拥护仲裁法庭的较早成立的工会，都是通过这两个组织继续开展工作的。

劳工同盟由于新西兰矿工联盟在1923年的解散而被削弱。1924年召开的大会表明，劳工同盟在种种事件的压力下，为了把所有的工会会员集合起来，越来越愿意妥协。它对仲裁法庭采取了批评的态度而不是采取否定的态度，并且有了较多的思想准备要和工党合作。1925年，劳工同盟受到了进一步的挫折。铁路职工联合会由于一次罢工的失败而发誓不加入劳工同盟。邮电职员联合会也放弃了参加劳工同盟的计划。由于1926年出口商品价格的重新下跌以及失业人数的增多，仲裁法庭开始显示出它是工人们的庇护所而不是束缚他们的脚镣。尽管如此，劳工同盟与同
222 业和劳工协会联合会为统一运动而达成的协议，

并没有产生有成效的结果。各工会都处于防御地位，但它们都害怕被拖进任何有关联合防御的庞大计划而受到约束。

这种趋势随着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开始出现的经济大萧条而继续发展下去。农牧场主们和雇主们对仲裁法庭的批评日益增多。他们声称，仲裁法庭限制了生产费用的调整，人为地保护了参加工会的工人。正是这种压力才使新西兰议会有了1932年的立法。这项立法撤消了强制性仲裁的规定，并授权仲裁法庭进行普遍的削减工资。在这样的情况下，工人们自然希望仲裁法庭保持原状。由于工人们缺乏以产业部门的直接行动来保护他们自己的力量（1933年，未受雇用的人数比在仲裁法庭注册的工会的会员人数还要多），他们便转而支持反对这项新立法和答应使仲裁法庭恢复原状的政党。工党也许诺采用削减工资以外的其他方式来抗击经济萧条，并许诺为失业人员制订比较有利的条款。因此，经济萧条加速了已经出现的趋势的发展。这时，工党已成为表现工人阶级的最强大的和最有统一性的组织，而工会运动也只是在工党政府成立以后，才统一在一个有各个

地区性同业协会参加的新的劳工联盟之内。这个统一，只是在工会运动原有的内部斗争给协商造成了相当大的困难之后，才于1937年实现。

工党的纲领：救济和改革

当工党政府上任的时候，经济萧条的最严酷
223 的时刻已经过去了，可是，还存在着大量失业人员或在失业救济工程中从事劳动的人员。政府的总目标在于改善这些人的命运，尽快地结束失业现象并把所有的人都吸收到国家的正常经济生活中去，同时保证这一类经济萧条将永不再影响新西兰。

工党认为，削减工资即降低购买力，其结果只能是加剧而不是减轻经济萧条。因此，1936年的“财政法”要求把经济萧条时期被削减的工资恢复到1931年3月的水平。增加了养老金，并使家庭津贴丰厚些，同时由于实施了一项大规模的公共工程计划，使得许多原按失业救济特殊标准领取报酬的人改领全工资。除特殊情况外，正常的工作周减少到五天，共工作四十小时，而每周工资并不降低。农业工人的工作条件和工资也第一次

由法律加以规定。

恢复了仲裁法庭处理劳资纠纷的全部权力，又作出了关于固定基本工资的规定。过去对工会用于政治目的的捐献数额曾施加限制，现在这种限制已被取消了。根据“劳资调解和仲裁法”的规定，凡是接受仲裁法庭裁决的一切工人，都必须是相应的工会的会员。这种强制工人参加工会的规定，曾受到雇主们的批评，也曾受到工党的一些比较激进的支持者的批评。这些比较激进的支持者声称，这种做法不啻是抽掉了工联主义的灵魂。赞成这种强制工人参加工会的规定的人申辩说：谁从工会赢得的胜利果实中得到了好处，谁就应当对工会的基金有所捐献；工人置身于工会之外，会产生削弱工会在困难时期同雇主讨价还价的力量的危险，因之，必须消除这种危险。可是，这项规定的最重要的一点是它意味着工党政府接受了当前的工业结构，即以雇主为一方，工人为另一方，224
而由仲裁法庭调解双方的分歧，或在双方对立权益的争执中，由仲裁法庭作出公正的裁决。这一点至少是与工人运动中某些团体的早期态度不同的，同时也是与工党的某些成员的观点背道而

驰的。

对农牧产品生产者的保障

新西兰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国外情况的影响，这一事实前面已着重叙述过了。按人口平均，新西兰的对外贸易额是世界上最高的国家，而且几乎全部的出口商品都是农牧产品。这些农牧产品通常是运往一些高度工业化的国家，一旦那些国家的购买力受到任何影响，对新西兰必然会有严重的影响。新西兰政府曾设法尽量限制这些影响——使新西兰经济同世界上的冲击“绝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政府采取了两项主要对策。第一是设法保护农牧产品生产者，使其免于受到1921年以来所曾经历的那种价格大幅度和急剧波动的损失。1936年的“农牧产品销售法”在这个方面已作出了相应的规定。虽说这项法令所提供的办法适用于任何农牧产品，但它首先是适用于奶制品。根据这项法令的规定，供出口的奶制品一经装上船，就成为政府的财产。政府根据这样的一些情况，如一个时期内市场上奶制品的平均价格，生产成本和参照新西兰一般生活水平，生产者应得的

公正劳动报酬等等，规定奶制品的价格，按价对农牧场主付款。这种价格被称为保证价格。如果政府出售产品后所得的款额，除去必须支付的运输 225
和销售的费用外，仍多于付给农牧场主的款额，则把剩余的款项列为一项专款。另一方面，如果政府在交易中受到亏损，则农牧场主仍然可以从这项专款的积累中享受到保证价格，如果专款项内没有这笔积累，则由储备银行预支。这样一来，制酪业主在价格上下波动中所受到的影响便被拉平，从而获得了一种较均匀的保障。

1937年，在政府的销售部中设置了一个国内销售局。它不但有权处理奶制品，而且也有权处理蛋、水果、蜂蜜这类商品。小牛、栲丽胶和蔬菜的销售也都属于这个局的管理范围。为了开创这个销售体制，政府收买了一家经营这一类产品的最大的公司，并任命该公司经理为新成立的国内销售局局长。政府的目的是：一方面保证生产者能够以他们的产品换取合理的报酬，尽量减少价格波动，加强保障；另一方面，尽量使消费者得到主要食品的正常供应，力求把价格控制在尽可能多的人的购买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要实现这一

点，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产品处理，就必须做到既节约而又有效率，而任何生产者不认真服务，就得不到报酬。

调节的方法因产品不同而各异。但是，不论政府干预程度的大小，不论这样做是否有效，其目的显然不是要使现有的经济制度发生急剧的变革，而是要使现有的经济制度在较有秩序的轨道上发生作用，在应该得到报酬的地方就给予报酬。政府在这方面采取的措施受到了许多批评。有些批评者申辩说，私营企业制度在没有政府的干预下将会更好地服务于这个目的；另外一些人却认为，要达到这个目的，有必要在更大的程度上摆脱商业上利润动机的作用。

226 一种更加平衡的经济

政府的另一对策的目的在于使新西兰稍微减少对海外市场的依赖。凡能适度发挥效率的地方工业，包括利用新西兰原料的工业（如制靴业）和以进口物资进行加工或装配的工业（如汽车车身制造工业和橡胶工业），都必须受到鼓励。1936 年的“提高工业效率法”，其目的是促进新工业的发

展和提高现有工业的效率。这项法令授权工商部部长实施发给许可证制度来调节各别的工业部门。这种办法是为了保证工业得到更加平衡的发展，不致在好年景里出现蘑菇似的迅速扩张，而在坏年头则面临倒闭的危险。

1938年底建立的进口管制制度加强了这种对地方工业的有计划的鼓励，虽然这种管制还具有别的目的。按照进口管制制度，人们只有在取得许可证时才能输入各种商品；而且获准进口的商品，其数量和品种要联系新西兰所能生产的产品来决定。因此，当一类工业和二类工业都仍旧操在私营企业家手中时，政府便须采取行动使这些工业协调起来，并保证国家的资源（物资方面的和人力方面的）都得到平衡的发展。

上述这种做法，如同工党的政策的其它方面一样，在行政管理工作上引起了种种重要问题。有一种危险是，一方面，企业的经营有可能受到损害，而另一方面，效率差的工业却有可能受到扶植。公正的批评都指向这两个方面。可是，二类工业无疑是受到了工党的政策的鼓励，而战时的特殊需要也为这类工业的发展提供了进一步的促

进因素。

227 在工厂从事工业生产的人数（当然不包括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在内）从1935—1936年的八万六千五百八十八人增加到1947—1948年的十四万零二百六十七人，产量也增长了百分之八十六以上，到1949年则增长了将近一倍。与此相比，农牧业生产增长了约百分之八。必须记住，新西兰有许多工厂的生产不是在纯粹的二类工业的范围之内，而是同农牧产品的配备和加工行业（主要是为提供出口商品）相联系的，也是同为建筑业和家具制造业提供原料的行业相联系的。然而从事农牧产品加工工业和二类工业的人数的比例已有所改变。1935—1936年，有百分之十五点二的工厂工人从事农牧产品加工工业，而在比较纯粹的二类工业（如各种工程和制造业）中从事劳动的工厂工人，其人数则占百分之六十七点七。到1947—1948年，从事农牧产品加工工业的工人和从事比较纯粹的二类工业的工人，其人数的比例已分别变为百分之十二点三和百分之七十三点九。

把着眼点由工厂工业转到就业人口的一般分配，我们可以看到早期就已出现的趋势仍在继续

发展。从1936年到1949年，不仅从事农牧业的人数的比例从百分之二十三下降到百分之二十点三，而且实际的人数也减少了。从事工业劳动（包括营造业和建筑业在内）的人数的比例已由百分之二十四点四增加到百分之三十三点二。从事交通运输业的人数的比例相当稳定地保持在百分之九至百分之十之间。从事分配和财务工作的人数的比例也是保持在百分之十五至百分之十六之间，而从事政府机关工作和专业工作的人数的比例（教育和保健是两个大项目）则从百分之十增长到百分之十一点九。

银行业

作为政府调节国家经济生活的总政策的一部分，新西兰政府于1936年通过了一项法令，决定收买新近建立起来的储备银行的所有私人股份，
并将该银行更全面地置于政府的控制之下。储备 228
银行是国民政府在1933年设立的，它过去还有某种程度的独立性，而现在它却不得不依照财政部长给它的指示，“使政府的金融政策产生实效”了。政府对储备银行的控制，举两个重要例子来说，是

同海外贸易和国家住房建筑问题有关联的。原来由国民政府创办的抵押公司，象国家贷款公司一样，转归政府全面控制。象铁路和广播电台这样一些公共机构，原受各独立的局管理，现在则由政府的一个部长接替主管。这个部长就是公共工程部部长森普尔先生。他曾对人侃侃而谈，说这个局或那个局不久“就要给它穿上跑鞋了”。

虽然工党的一些成员（包括新西兰议会中的一些议员在内）渴望政府控制所有的商业银行，特别是控制那间最大的银行——新西兰银行，但这间银行直到1945年才成为国有化。对这种主张持冷淡态度的人则争辩说，政府通过储备银行已能在信贷问题上发挥充分的影响，如再对新西兰银行承担责任，将会使政府受到许多不必要的繁琐事务的拖累。

社会保障：有关的问题

在上面所作的一切阐述中，政府所做的都是直接地处理经济生活的问题。政府的目的，是在不作出巨大变革的前提下调节经济生活，其所采用的方法是使一切有相应能力的人都能得到工作

的机会，并且都能得到与其工作相适应的报酬。但有一些人是没有工作能力的，如儿童、病人、残废 229
者和老年人；也有一些人能够并且愿意工作，却找不到职业。这些非生产者必须依靠别人的生产以维持生活。还有家庭主妇，她们担负了大量的工作，工会或仲裁法庭都没有给她们提供任何帮助，使她们在工时和工作条件上获得保障，她们的工作也没有得到直接的报酬。她们依靠别人（丈夫和儿女）生活，因而这些作为丈夫和儿女的就必须赚到足够的报酬来维持自己和家庭主妇的生活。对于这些依靠别人生活的人，不管他们或她们是非生产者还是无报酬的生产者，政府应该怎么样和在什么程度上作出规定呢？

在上一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英国普遍存在着这样的观点，即一切事情都必须诉之于市场上的竞争，政府采取任何行动大概都是弊多于利。让资本家们在他们所选取的地方按他们所能取得的价格出售他们的商品吧！让工人们用同样的办法出卖他们的劳动力吧！对于那些遭遇不幸的人，除了作为私人的善举给予赈济以外，政府也必须谨防自己插手进去，试图给予任何帮助。人们

议论说，这样一来，许多问题就会得到解决，每个人就会得到大致相当于他的劳动所值得得到的报酬，物品的生产也将能达到其最高的限度。如果一个人陷于贫穷的境地，那可能是他自己的过错；如果你试图帮助他的不幸的妻子和儿女，你就等于免除了他的责任，而这种责任本应是促使他努

说来，这种社会立法意味着接受了这一种思想，即生产出来的物品，应该部分地根据人的需要加以分配。因此，在许多国家都产生了诸如有关免费教育、养老金、健康与失业保险、家庭津贴、医疗服务、基本工资等等的国家制度。如果这种思想得到全面贯彻，那么，就会把我们引导到一个完全摆脱市场法则起作用的制度；人们就会出于对社会的责任感，按照自己的能力，自愿地进行生产，而生产的成果则将被分配出去，以满足所有的人的需要。到底我们将来会不会达到那种境地，现在我们还不能说；但我们现在肯定还没有达到那种境地，而且仍然是在一个混合的制度下进行工作。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承认人的需要，但是，一般地说，我们的制度是基于这样的设想，即对于大多数人说来，希望得到个人收益和害怕遭受苦难这两种思想的结合，是推动人们去工作的主要动力。

社会保障福利金

工党政府在执行一项广泛的社会保障计划的时候，它是在继续坚持新西兰政治上的人道主义
传统。工党政府是在更为急迫的条件下，更加彻 231

底地做着四十年前塞登政府做过的工作。正如我们已看到的，这期间新西兰并没有很多社会立法。其它国家已经走在前头，把从前被视为“社会试验的实验室”的新西兰抛在后面了。现在，新西兰又一次以它的进步吸引了人们的注意。1938年通过了“社会保障法”。它弥补了现有的养老金和生活津贴制度的不足之处，并规定了一种免费医疗或医疗补助的制度。社会保障法的大部分条款于1941年开始实行。1947年开始对十六岁以下的人实行免费医牙。

除了医疗计划以外，新西兰还有一些更为引人注目的创新，那就是实施普遍的年老退休金，普遍的家庭津贴，以及疾病和失业救济金等制度。从1898年以来，新西兰就已存在着发放养老金制度。工党政府取老年福利金这一名称，并使它丰厚些。1949年的老年福利金金额是每周二镑十先令；但如果领取者每周有一镑以上的其它收入，则发给的数额就要减少。每一个人在六十岁时都可以领取老年福利金。普遍的年老退休金，则不管有无其它收入都照数发给。每一个人在六十五岁时都有权利每年领取年老退休金，这项金额在

1940—1941 年度开始为十镑，以后每年增加二镑十先令①，直到这项金额达到同老年福利金金额一样为止。这样，到 1949 年，这项年老退休金即为三十二镑十先令，而到 1988 年才能达到一百三十镑的最高限额，也即是达到每周二镑十先令的最高限额。

新西兰自 1926 年以来就已实行发给家庭津贴的制度，但规定津贴的发给必须经过家庭收入状况的调查。虽然工党政府增加了家庭津贴的数额，但在 1946 年以前，一直没有做到不管每个家庭父母的收入如何，普遍地发给这种津贴。从
1946 年开始，对十六周岁以下的或在学的儿童， 232
按每人每周十先令发给其母亲。这在家庭收入方面总算是稍微承认了母亲的权利了*。

1930 年和 1931 年通过的"失业救济法"，批准了从已设置的"失业救济基金"中发放生活津贴给失业者；但是负责管理这项基金的失业救济

---

① 当时新西兰属于"英镑区"。据英国货币单位，一镑等于二十先令。这里所说的二镑十先令，即是二镑半。按此计算，即可得出 1988 年的年老退休金最高限额一百三十镑。——译者

局，一般认为只应对那些完成了失业救济工程中的工作的失业者发给生活津贴。该局主要致力于办理失业救济工程。工党政府当权以后，却宁愿让工人们做赚取全工资的工作，而在他们找不到工作的情况下，便发给他们生活费。这种态度在“社会保障法”里已有所体现。这项法令承认人们在失业的情况下有维持生活的权利，并对依靠失业丈夫过生活的妻子另外发给津贴。对由于疾病而失去工资的人员，也同样提供生活津贴。

整个社会保障制度的经费，来自对所有一切形式的私人收入的课税，政府也从正常岁入中给予必要的追加拨款。这就意味着对个人的收入进行了一些再分配。收入多的人，由于缴纳社会保障税而付出的款额，会多于他们可能从各种福利

* 1965 年主要的社会保障福利金如下：

老年福利金：60 岁以上的单身者每人每周 5 镑 6 先令；每对夫妇每周 9 镑12先令。如果领取者每周有超过 3 镑的其它收入，则其福利金的数额就得减少。

普遍的年老退休金：单身者每人每周 5 镑 6 先令；已婚者每人每周 4 镑16先令。

失业和疾病救济金：按老年福利金标准发给。

家庭津贴：每个儿童每周15先令。

——作者

金得回来的数额，而收入少的人，情况则适相反。再则从政府总岁入中拨出的款额，其中一部分也是来自对高收入者按高税率征收的所得税。因此， 233
虽然一切领取工资或赚取其它收入的人对他们的社会保障的规定都作出了贡献，但是这些福利金在很大程度上却是按照需要进行分配的。

政府于1937年开始实行的住房计划，可以被部分地看成是属于政府的人道主义立法的总纲领的范围。不管怎样，经济萧条造成了住房的严重缺乏，使许多家庭居住在拥挤不堪和令人不满的情况下。政府插手这个问题，其意图在于保证设备良好的房屋的租金必须是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的家庭所能付得起的，因而他们可得住上这种房屋。这种房屋的租金，从一开始就使之低于通常租赁属于这类标准的住房所需的租金。并且由于房租不是随着其它物价的上涨和工资的提高而增加，因而租用国家房屋的住户实际上就等于得到类似家庭津贴和医疗津贴的福利金。由于战争时期产生了对其它类型的建筑工程的迫切需要，住房建筑计划曾被搁置了下来，但到1948年年底已建成住宅二万九千五百四十幢，而根据1945年的普

查，该年全国已有住户的住宅共为四十三万五千幢，前后两个数字可以相互对照。

工党政府与第二次世界大战

工党政府在其执政的六年间，组织全国投入了战争工作。这就需要实行各种管制和调节，而这些管制和调节在战争时期比在和平时期是较易于为人们所接受的。政府早已开始执行一项对经济生活加以较大幅度的调节的政策。这一事实给它为适应战争的特殊需要而实行的各种管制和调节提供了一种可以依靠的现成基础。战时新西兰能有大量农牧产品供应英国，其实就是原来对奶制品的管理制度进一步的扩充所带来的结果；进口的管制要不是早已付诸实施，那么，此刻也必得开
234 始采用。国内销售局能够做到扩大新鲜蔬菜的生产，以供应太平洋地区的美国和其它国家的军队。

战争时期的重大问题之一，是要防止通货膨胀——按可得到的货品的比例，有太多的货币在流通。对一切从事战争工作的人，政府必须付给他们以货币；但由此得到的却是一批批受过训练的人员、兵营、医院和军火，而不是可供普通消费

者购买和使用的货品。这样便产生了货币很多而货品缺乏的现象。物价迅速地上涨，必需的货品供不应求，有些人获致暴利，而人们则要求提高工资来应付高昂的物价——这种现象周而复始，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为了防止这种现象，必须实行定量供应，控制物价，并进行其它许多方面的调节，使现有的货物能得到最好的和最公平的使用。这种方针同政府已经在尝试进行的工作是一致的，所以新西兰虽然难免出现过某种程度的通货膨胀，但与大多数其它国家相比，通货膨胀是不那么严重的。

有些人曾要求工党政府仿效英国的做法，同国民党联合，成立一个国民政府，由两党分担职责，致力于共同的事业。国民党的领导人终于被邀请参加了一个同这个国家的正式政府分开设立的特设战时内阁。不过，除了科茨和亚当·哈密尔顿以外，国民党所有其他领导人不久都辞职了，因为他们不赞成政府对怀卡托矿区劳资纠纷的处理。为了满足战争工作的特殊需要，工党政府能从各工会方面赢得的支持，要比任何一个非工党政府所能赢得的支持都多，这是可能的事情。

工党政府的垮台

我们已看到，工党在1935年的选举中获胜，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那种可以称之为工会的选票给予了它巩固的支持，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它吸引
235 了一些农牧场主的选票和“中间的”或“浮动的”选票所致。既然工党在1935年以前从未执政过，它便成为人们希望给予一个尝试机会的政党。工党的工作于1938年受到了选民的赞许，虽然工党在这一年的选举中失掉了一些议席，但它在城市选举区和农村选举区赢得选票的比数，是切实地比1935年的为高。

1943年，工党所获选票的份额开始下降（特别是在农村地区，这种下降尤为显著），并失掉了八个议席。1945年，“选举修正法”取消了乡村选票的定额（这是指在选举区的范围确定以前给予农村地区人口增加的百分之二十八选票额），此后便根据成年居民的人数划分选举区。这样，城市选民们由于是人口中的日益增长的部分，他们在选举中得到了数量上的十足比重，这是一个可能对工党有利的因素。尽管如此，工党在1946年的

选举中又失掉了三个议席，这使它成为只超过反对党四个议席的多数党。不过，工党获得总票数的比例是百分之五十一点二八，这个比例仍然比它赢得压倒多数的议席的1935年为大。

在1949年的选举中，投工党的选票继续下降，致使它失掉八个议席，从而使国民党成为超过工党四个议席的多数党。于是工党政府立即辞职，这时工党政府的首脑是彼得·弗雷泽，他是自萨维奇于1940年4月死后一直担任此职的。在几乎所有的选举区都出现了选票从工党转到国民党方面去的现象，这样转移的选票，平均每个选举区约有一千票。在工党以前取得微弱多数的地方，如在工党以前取得四个议席的奥克兰郊区、三个中等城镇以及拉格伦的农牧场主、矿工、铁路工人的混合选举区，议席都易了手。

从上述事态的发生到现在，或许因为时间尚
短，以致我们还不能肯定工党政府执政十四年后 236
垮台的各种原因；但下面的分析可以提供一个线索，以便人们作出更充分的考虑。1949年选举前的形势，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几年的形势有点相似。工党如同早期的自由党一样，贯彻执行了一

项包罗广泛的立法规划，这是人们所确实需要的，而这种立法规划最初也确曾使奉行它的工党具有明显的特色。可是，反对党也接受了这种立法的许多内容，因此，即使是更换了政府，这种立法也将继续生效。这个执政党，除了已经完成的工作以外，再也拿不出什么东西来献给选民，因而它这时也就会显得和它的竞选对手没有多大区别之处了。工党政府所依靠的是它已完成的工作，而不是它倡议要做的工作。同时，一个执政多年的政府，其所受到的批评总是不断增多的，工党政府所受到的批评尤其如此，因为工党的政策曾意味着要在生活上的许多方面大大地增加政府的活动。在这些情况下，一些在1949年的选举时不再忠诚于工党的选民，多半会这样争辩说："改变一下不会有什么害处"。

在关于工党政府政策的论述中我们已经指出，它接受了经济生活的资本主义基础；但是，为了保证资本主义为多数人的福利服务，为多数人提供社会保障，工党认为必须对资本主义加以调节和管制，同时它又主张采取对一些人征税以补贴其他人的办法，部分地根据普通人的需要而实

行收入的再分配。在工党执政的初期，世界经济状况正在好转，新西兰出口商品价格的上升比它所支付的进口商品价格的上升更为迅速，因而工党能够执行这种政策而没有遇到很多的困难。后来战争爆发了。这就意味着，虽然所有的人在战争所需要的生产事业中或在武装部队中都能找到工作，但国内生产的和进口的消费品都感缺乏。 237
为了保证这些消费品都得到合理的分配，并防止随着物价迅猛上涨而来的危险的通货膨胀，工党政府扩大了管制的范围，人们一般地也把这种做法视为必要而予以接受。1942 年的“稳定经济紧急条例”体现了这种管制体制的主要特点。

战后，货品缺乏的现象不能立即得到克服，因而“稳定经济紧急条例”还得继续实行。即使是在消费品的供应日益增多的时候，也必须考虑续完那些在战时停顿下来的未完成的大型公共工程，如水力发电站等。因此，本来可以用于购买或生产消费品的金钱和用于生产消费品的劳动力，这时却必须投到公共工程的建设方面。而且，虽然我国的出口商品的价格不时有所提高，但在战争期间以及在战后的头几年，进口商品的价格上升得

更快。后来这个差距虽然缩小了，但在1948年，我国从出口商品换来的货物，其价值仍少于战前年代。工党执政最初几年的很有利的形势一去不复返了。

劳动力的继续缺乏，使一些战前曾提供的服务工作，如肉店和杂货店送货上门的业务，被压缩或取消了。这对家庭主妇是一个重大问题。城镇里的大量就业机会，吸引了那些本来可能投进农牧产品生产事业的劳动力，而在农牧产品生产事业中，劳动力的不足又妨碍了出口商品的增产。不管新西兰的地方工业已有所扩展，它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要依靠农牧产品的出口。

这种比较不利的形势，明显地暴露了工党的"福利国家"政策中所包含的另一个问题。社会服务工作和经济生活的调节，不仅意味着要增加公
238 务人员的数目，而且也意味着增高这些公务人员以及政府部长们几乎每天都得在处理一些问题上作出的决定的重要性。这就存在着一些危险：他们或者是逃避问题，不作出决定，或者是基于错误的根据而作出决定；在一大堆表格和规章的后面隐蔽着他们的缺乏常识和缺乏仁慈为怀；他们

办事拖延和引起人们的不便，将抵消他们所提供的服务的价值。受雇于政府各部门，职位是比较牢固的，但在一个仍然主要是以市场法则为依据的经济结构中，为公众服务的意识能否成为促进工作效能的充分动力，这却是一个问题。从工党政府受到的批评中可以看出，它没有完全摆脱上述危险。另一方面，在公务人员中也有一种感受，就是认为他们的薪俸和状况比不上从事其他职业的人。

到1949年，工党的政策开始着重于稳定，而不是着重于改进——1948年通过的“经济稳定法”强调了这一点。工党政府声言，通过它的管制和调节工作，已实现了对生产成果的公正分配。在不打碎现存的经济制度的情况下，不可能更多地把资方的利润转移到劳方的工资上来——而当前却又不存在改变制度的明显要求。要生活水平有任何进一步的改善，都必须通过增加生产来取得。这样的说法常常是工党政府经由它的发言人对它的支持者所提出的论点。

国民党一方面赞成这种观点，另一方面却认为工党政府为保持经济稳定而实行的各种管制和

调节，对增加生产起了妨碍作用而不是起了鼓励作用。国民党认为，对进口实行管制，规定物价，实行津贴以使物价下降，限制土地和房屋的自由买卖——这些措施都阻碍了企业的经营。如果在市
239 场上为自由竞争提供较多的机会，生产就会上升，政府开支就会减少，而结果也就可以把征税降低。竞争将导致生产效率的增高，将使物价下降，从而“使新西兰镑更顶用”——这是国民党在竞选中经常使用的口号。工党政府本身已在着手减少津贴和取消一些管制项目，这个事实也为国民党的上述宣传提供了有利的论据。因此，问题只是这些改变过程究竟应该进行得多快和应该走得多远罢了。工党政府还被指责动用了储备银行的信贷来掩盖生产和它所鼓励的高生活水平的要求之间的差距，其所产生的后果只能导致要求提高工资以应付上涨的物价，而为了支付提高了的工资，又得把上涨了的物价再进一步加以提高，从而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工党和国民党之间的差异，已变成仅仅是执行政策的程度上的区别，而不是原则上的不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工党政府的各项工作在许多

细节上却为人们的批评提供了很多机会。在这种情况下，毫不奇怪，便会有足够多的原来没有坚定地依附哪一个政党的“浮动的选票”转向国民党，从而造成工党在选举中的失败，虽说这种转向的程度是出人意料的。

工党内部的分歧也削弱了它的力量。工党的比较激进的支持者，批评工党的领袖们谨小慎微，指责他们放弃了党章中仍然载着的社会主义目标，却对资本主义作出让步。有些较为好斗的工会声称：稳定经济的政策实际上有利于资方的利润的增加，而不利于靠工资为生的劳方；必须切实增加工资，借以保持相当的生活水平。由于对仲裁法庭和其他工业当局的不满，结果引起了罢工、停工和同政府的摩擦。重要的是，在工党政府垮台 240
以后的一个时期，有许多重要的工会从劳工联盟分裂出来，组成了一个单独的工会联合会。有些工人谴责工党政府放弃了他们的事业，而另一些工人则批评它没有采取更强有力的行动来对付那些较为好斗的工会。

1949年，当工党政府决定根据国际形势的需要实行强制性军事训练的时候，工党内部再次出

现了裂痕。工党大会强迫工党的领导人把这个问题提交公民投票；但是，工党的领导人对待反对者的态度以及争取支持强制性军事训练的决定的运动所采取的方式，都使党内一些忠诚的党员感到不满。

工党内部的这些分歧，并不意味着那些通常投票选举工党的人都转而投票反对它，也不意味着在票数纪录中出现了许多弃权票。但工党内部的这些分歧确实意味着对工党组织及其竞选运动中的行动都缺乏积极的热情——这一点同国民党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值得注意的是，在不少选举区内，只要是提出比较激进的候选人，不管这个候选人是作为执政党工党候选人被提出来，还是象在某两个选举区是作为工党的“叛逆者”(既反对执政党工党，又反对国民党)被提出来，则选票转向国民党的现象极少或者完全没有发生。

在较早的时期，当自由党和革新党已不再是可供选民选择的两个截然不同的政党的时候，第三个显明不同的政党——工党兴起了，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导致其它两个政党的合并。目前虽有某些类似的情况，却不存在历史重演的迹象。

J·A·李先生在1940年被工党开除出党后，企图建立民主工党，但这个企图没有成功。于1921年 241
创立的共产党，虽然在某些时候和在某些问题上，它所产生的影响比之人们从其党员人数所能料想到的要大得多，但它在议会选举中从未取得成功。在1949年的选举以前的时期，共产党还受到了工党领导人和工会运动中比较保守的工会组织的猛烈攻击。在参加1949年选举的十六名共产党候选人当中，没有一个候选人得票超过四百张，那些曾在1946年充当候选人的共产党人，在1949年的选举中都是失去了选票而不是增得了选票。

如果经济形势变得更糟糕，政治局面很可能会发生变化。世界形势是不稳定的；各种新的发展正在出现，这也许需要新西兰方面作出一些再调整。可是，如果我们对与此有关的一些问题作一番简单的思考，我们就会比较自然地进而探讨新西兰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的历史。

242 第二十二章 新西兰与世界事务

世界联系网

早期的移民们来到这个国家时，它还是一块长满羊齿植物和灌木丛林的地方，与世界文明中心相隔有三、四个月海上航程的距离。他们做梦也想不到他们的子孙会看见新西兰在世界事务中起着积极的作用。可是，在一个世纪内，他们的这个新兴国家就已派出武装部队，最初到南非作战，尔后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又开往中东、欧洲和太平洋作战，其所派出的武装部队的数量，几乎和这些移民原来的国家所派出武装部队的数量一样多。

新西兰作为欧洲人社会被建立起来，是世界其它地区的发展的结果，而我们已看到新西兰的命运同世界其它地方的状况是多么密切相关。这只是应用各种发明于生产事业上的过程的一个部分。人们可以利用来自世界各地的原料去制造

一件物品，快速的运输和交通设备已使相距遥远的地区能够互相接触，从来未曾互相见面的人们的利益已联结在一个世界联系网中。

要对这种物质上的发展加以和平利用，就要有各种新形式的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因为物质上的变化以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速度发生了，人们感到他们在思想上和在组织上都难于赶上 243
它。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要做到从全世界的角度出发来认识事物和思考问题，是不容易的。人们之间的关系的组织，落后于他们的物质力量。其结果，我们有了战争，而我们的知识既用于和平生产上，也用于破坏上。由于这些发展是世界规模的，所以即使象新西兰这样一个小而遥远的国家，也日益同其它国家发生关系，并介入世界大战或世界和平这些问题中。

我们可以从如下三个方面来讨论新西兰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大不列颠和大英帝国；国际联盟和联合国组织；东亚和太平洋的问题。

新西兰与大不列颠：扩大自治权

英国政府自从十七世纪开始以设置移民区的

方式开拓殖民地以来，它的政策是允许建立由选举产生的殖民地议会，但不允许这种议会拥有对政府的真正控制权。这是十八世纪英国同各美洲殖民地（当时这些殖民地已经形成为一些相当大的社会）发生纠纷的主要原因。英国失去这些殖民地后，并没有立即在政策上作出多大改变，而类似的纠纷又导致 1837 年在上加拿大和下加拿大（粗略地说，相当于现在的安大略省和魁北克省）发生的叛乱。这就引起了稍微激进的政治家德拉姆勋爵的调查。他挑选爱德华·吉本·韦克菲尔德和“系统化开拓殖民地”的另一个拥护者查尔斯·布勒协助他进行工作。

德拉姆发现，在加拿大的每个省，总督和他的
244 政务委员会同由选举产生的议会相争，差不多已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这种现象与英国已失去的各美洲殖民地所发生的情况恰好相同，与十七世纪英国斯图亚特王朝及其遴选的大臣们同英国议会相对立的情况也极相似。1839 年，德拉姆在向英国政府提出的报告书中建议：如果允许各殖民地的代议制议会发展起来的话，那么，就应该授予他们管理殖民地事务的实权。应该指示总督，

他所行使的职权与英王当时在大不列颠所行使的职权大致相同。总督应停止积极地参与政治活动，并应将政府工作委托给那些受到移民们选出的代表所信任的部长们。

有关在新西兰实施这些原则的问题，在本书第九章已讨论过了。曾引起最大关切的问题，是保护土著居民的利益的问题。这个问题没有被包括在德拉姆的报告书中。但在其它方面，他却认为应该限制殖民地的部长们的权力。德拉姆除了建议英国政府控制公共荒地以外（已在上面讨论过），还建议它控制殖民地的宪法、外交事务和对外贸易。

这种明确的权力划分，必与英国立宪制度的发展的一贯方针不相协调，而且实际上它从来也没有被严格地执行过。虽然直到最近为止，英国政府和英国议会在理论上具有干预各殖民地或各自治领的事务的合法权力，但总的趋势是把越来越多的职责交给海外各正在发展中的社会。根据1852年关于实行宪法的法令，新西兰议会具有修改宪法的相当大的权力。在处理公共土地和处理 245
出售公共土地所得的款项方面都不受任何限制。在1858—1859年，加拿大坚决地主张：没有掌握

贸易政策的自由，自治政府将是一种神话。这一主张取得了胜利，于是加拿大制定了为保护其工业而征收关税的条例。这项征收关税的条例甚至适用于对付英国制造品的进口。1892 年，巴兰斯就增加立法委员会的成员名额问题向英国政府提出的请求，也获得顺利的解决，本书第十七章对此已作过叙述。这一事也进一步加强了殖民地实行自治。

对外政策

大约到了十九世纪末叶，殖民地还有一个重要的领域必须归由英国控制，这就是对外事务问题。英国政府已将大部分关于殖民地的防务职权交给各殖民地，但它对于可能影响它和其它国家的关系的种种问题仍有控制权。例如，英国政府曾反对限制中国移民移居于各殖民地的方法，它认为这可能得罪中国政府。同英国政府对之负责的英国的世界范围的利益相比较，各殖民地的力量是微小的，其利益是局部性的。从这一点来看，英国政府以上的做法是非常自然的。它不允许各殖民地采取这样的一些行动，即可能导致发生主

要地要以英国的资源去进行的战争，或者可能在国际关系日益困难的时候妨碍英国同一些国家的关系。但是有过这样的时候，即当各殖民地或各自治领本身愈益受到那些国际关系的困难的影响时，它们就愈益迫切要求在英国政策上有某种发言权。英国在它这一边也感到有得到它们的支持的需要，由此就产生了寻求处理对外政策的某种新方法的问题。

英国在十九世纪的大部分期间内处于很强大 246
的地位。它在经济发展上远远走在其它国家前面，能够以比较价廉物美的商品供应常是比较广阔的市场。它的海军是世界上最强大的，能够对分布广阔的地区施加压力，而人民所负担的军费比欧洲大陆各国人民所负担的要少。当它为国内发生的社会和经济困难所迫时，它可以采取移民、贸易或投资的形式向海外扩张，而不必冒着遭受其它国家的反对的风险。英国政府越来越少干预各殖民地的内部事务，而在英国政府的保护下，各殖民地不会受到其它国家的威胁并且还会感到安全。

但是这种现象是不能持久的。其它国家在工业发展方面前进了，它们为争夺原由英国工业供

应商品的市场而展开同英国的竞争便日益加剧。1870年以后，这种竞争特别明显。参加竞争的除了有工业发展比较早的法国以外，还有工业发展很迅速的美国和德国，在某种程度上还有俄国、意大利和日本；而许多国家为了保护其国内市场，也提高了关税率。当其它国家的工业发展产生了类似引起英国向海外扩张的问题时，夺取市场的竞争便趋于变成向海外扩张的竞争。这种现象在1880年以后表现得最为明显。非洲、太平洋群岛以及亚洲的一些部分为欧洲列强所瓜分——或是被完全占领，或是被划分为各种势力范围。英国过去没有受到挑战的地方，现在却出现了尖锐的竞争，其背后潜伏着战争的危险。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在太平洋地区除了已存在着的法国利益以外，德国和美国的企业也日益
247 引人注目地出现了，这时澳大利亚各殖民区和新西兰便发出了呼吁。它们催促英国政府采取更加积极的政策，在南太平洋扩大英国的领土和加强英国的海军力量。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以来，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各殖民区共同地和分别地催促英国政府兼并新几内亚、新喀里多尼亚、

新赫布里底、斐济、萨摩亚和库克群岛。英国没有采取行动，于是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各殖民区便急于自己动手。早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乔治·格雷爵士和塞尔温主教就在这些方面打过主意。1883年，年逾七十的乔治·格雷，作为一个非内阁成员的议会议员，在新西兰议会提出了一个法案并获得通过。这个法案使新西兰能够在太平洋诸岛屿“采取步骤，以确立它的统治”，因为“任何外国强国占领这些岛屿，都会损害澳斯特雷拉西亚①的利益”。这个法案没有为皇家政府所批准，因为它已被总督保留下来。

沃尔格、斯托特、塞登和新西兰驻伦敦总代表狄龙·贝尔，都积极地向英国政府提出建议。但是，英国的大臣们普遍地不愿意承担新的责任，而宁愿同其它强国达成协议，和平地瓜分太平洋群岛的领土。对一些岛屿，曾加以兼并，并于1901年把库克群岛置于新西兰的管辖之下。

新西兰政府和澳大利亚政府力陈赞成大规模兼并的各种理由；但它们的真正的动机看来是害

① 澳斯特雷拉西亚（Australasia）系指新西兰和澳大利亚这两个国家。——译者

怕外国对这些岛屿的占领会危及它们的安全，并且它们也希望能获得更多的机会来进行贸易和投资。关于土著民族的福利问题，也有一些议论。但
248 是对于这一问题，英国政府比各殖民地政府似乎抱有更为真诚的关切。

各殖民地政府似乎没有认识到，虽然在当时兼并岛屿是很容易的事情，但这样的兼并必会影响其它强国的态度，因为当时这些强国的贸易利益也正在扩展中。英国政府由于考虑到全世界各国利益的冲突问题，所以更加注意到同外国发生纠纷的可能性。如果采取一项不够慎重的政策，就可能引起其它国家加深对英国的敌视并削弱英国在世界上的地位，这实际上也就会削弱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各殖民区的安全。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来临

尽管如此，英国的政策还是发生了变化。虽然在拿破仑战争以后，英国常常对欧洲事务施加影响，并同其它国家订立了各种协定，但它却不愿意深深地卷入于承担长期的义务。英国的势力依赖于它的商业和金融力量，并有强大的海军作支

持。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在情况开始变化以后的一个时期，它仍然继续执行这种政策。虽然英国同1879年的奥德同盟的国家以及同1882年的“三国同盟①”的国家（包括意大利在内）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并且把同这些国家订立的协定看作是对在那个时期的它的主要劲敌法国和俄国的有效遏制，但是它并没有成为这个集团的伙伴。

当1891年至1894年法国和俄国结成一个同
盟来对抗德奥意“三国同盟”的时候，英国的地位
被说成是一种“光荣的孤立”。但是随着其它国家
工商业的扩展，以及随着欧洲大陆两大集团的军 249
备的增长，有些英国政治家开始考虑到这种孤立
已不再是光荣的了，并且他们开始为英国的实力
和影响寻求更多的支持。其办法是，一方面同其
它国家订立协定，另一方面同各殖民地作好较明
确的安排。有趣的是，从1895年到1903年担任
殖民地事务大臣的约瑟夫·张伯伦首先于1899
年提出同德国达成谅解的建议，而建立“帝国联
邦”的思想也是他提出来的。

① “三国同盟”(the Triple Alliance)指德国、奥地利、意大利的三国同盟(1882—1883年)。——译者

在英国，有些人认为各殖民地正在享受着的自治权的分量日益增加，将会导致它们的完全独立，到那个时候，它们便会有它们自己的对外政策。另一些人则认为可以制定一项联邦计划，各殖民地根据该计划可以在联合对外政策上有发言权，并在执行这项政策中分担责任。1872年，迪斯雷利①指责了自由党人“在准予实行自治这个似乎有理的借口下”，企图“引起英国帝国的瓦解”。他主张自治政府应当履行一些附带条件，即自治政府应当执行帝国的关税条例而不是享有贸易政策上的自由，应当“保障英国人享用那些尚未拨用的土地，并应当遵守一种军事法规，其中必须明确地规定保卫各殖民地的方法和职责，英国在必要时可以向各殖民地要求援助。而且，自治政府还应当在其首府设立某种代议制议会”。

250 “帝国联邦”要包括成立一个议会，以代表大不列颠和实行自治的各殖民地，其职权是掌管这一类的问题如对外政策，国防，或者贸易，并且掌

① 迪斯雷利的全名为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 1804—1881)，于1868年及1874年至1880年任英国首相。——译者

管筹集资金，为行使这些职能提供经费。居于“帝国联邦”的首位机构将是一个内阁，它对议会负责，执行议会所作出的决定。从理论上来说，“帝国联邦”的成立将意味着在英国方面要向各殖民地交出一部分掌握对外政策的权力，而在殖民地方面则要明确地承担一部分执行对外政策的责任。

新西兰是唯一支持成立“帝国联邦”的殖民地。早在1852年，坎特伯里移民区的奠基人戈德利就已经提出过这么一种计划；以后沃格尔把它接受过来。塞登继续支持这种计划，而约瑟夫·沃德爵士在1911年的帝国会议上还提出了成立“帝国联邦”的明确草案。在那时候，成立帝国联邦的思想已明显地处于江河日下的境地，但是甚至在1917年的帝国会议上，梅西仍表示相信“这种安排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得到发展”。其它一些殖民地的政治家，如加拿大的威尔弗里德·劳里埃爵士和南非的路易斯·博撤则反对成立“帝国联邦”，其理由是：大不列颠可以接受的“帝国联邦议会”，必然给英国代表在投票上造成优势，因此各自治领就不会真正地分享到支配政策的权力，而只有协助执行政策的义务。他们害怕自治的整个

原则会受到危害。现有的安排也许是不合逻辑的，但是他们感到在实际上这种安排比之帝国联邦似要在纸面上提出的美妙的解决办法，更为令人满意。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大不列颠和各自治领是沿着其它的轨道发展它们之间的关系。

251 大不列颠在它同其它国家的关系上，也没有象张伯伦所建议的走得那么远。它所安排的唯一具有完全约束力的军事义务是1902年缔结的英日同盟。这个同盟对于欧洲地区并没有直接的影响。虽然如此，由于“三国协约①”的签订，大不列颠实际上已卷进了两个欧洲集团中的一个集团。在1899年至1901年间，大不列颠曾试探同德国订立协定，但没有获得什么结果。德国政府确信英国不会同法国和俄国取得和解，索价很高，超出了英国政府所准备支付的限度。于是英国政府便转向法国，并在1904年解决了英法两国的全部重大分歧。1907年，英国又同法国的盟国俄国取得了某种类似的谅解。

虽然构成“三国协约”的这些协定都没有规定

① “三国协约”（the Triple Entente）指英、法、俄三国缔结的协约（1907年）。——译者

英国承担提供军事支援的义务，但在那时的紧张的国际形势下，这样密切的关系几乎不可避免地会导致英国实际上承担这种义务。事实上，作为英法两国参谋人员会谈的结果，军事首脑的计划和海军力量的分布是那么样的，如果法国和德国之间爆发了战争，英国几乎肯定是要卷进去的。英国政策的这一发展就是国际形势出现种种困难的明证。各强国之间爆发战争的危险已在日益增加，而这些强国的利益是如此广泛，以致影响到世界的大多数地区。

当1914年战争爆发的时候，英国仍然对可能牵涉到整个大英帝国参加战争的政策负责。虽然各自治领不必提供任何积极的帮助，但不管它们喜欢与否，它们都是处于战争状态中。在1911年的帝国会议上，英国政府所能作出的最大诺言是，“尽可能地”和“在时间、条件和题材内容许可的情
况下”，通知各自治领政府并和它们协商关于签订 252
条约的问题。这比一些自治领，特别是加拿大，所想要的东西少得多。各自治领拒绝成立“帝国联邦”作为一个解决办法，但它们又提不出一个为英国所能接受的办法。

不过，新西兰却没有这一种顾虑。新西兰政府只是在它认为英国政策对大英帝国的利益缺乏热情时才对这种政策提出批评。早在1885年，新西兰政府曾提出，倘若英国同俄国发生战争，它将派出一千名训练有素的军队到海外(例如到印度)服役。后来，塞登曾提出派兵占领萨摩亚。当1899年战争在南非爆发时，塞登立即派出十个由六千五百多人组成的志愿兵分遣队前往作战。他的这一行动受到大多数人民的热烈支持。1902年，塞登参加了殖民地会议，他敦促每个殖民地应建立一支特种部队，专门为大英帝国服务。这个想法受到英国陆军部的欢迎，但没有得到其它实行自治的殖民地的支持。

同时，自1897年以来，新西兰每年补助英国海军费用二万镑。这项补助金在1903年增至四万镑，在1908年增至十万镑。1909年，当英国同德国的海军竞赛变得紧张的时候，出现了一场“惊慌”。这一事情已被证实是部分地由一个军火公司的头子制造出来的。约瑟夫·沃德爵士通过新西兰议会把一艘“新西兰号”战列巡洋舰作为礼物送给英国。1912年，革新党政府决定采取一项政

策，即建立一支在和平时期由它自己指挥的地方海军。这一政策，澳大利亚已在执行。新西兰在政策上的这一变化，其部分原因是每年给英国海军的补助金和赠送军舰，实际上并没有加强大英帝国的海军力量，而仅仅减轻了英国纳税人的某 253
种负担而已。否则，英国政府还是会要求他们为这些海军费用纳税的。反之，新西兰花钱建立一支地方海军，倒是会加强在太平洋地区的英国海军力量。新西兰刚开始执行这项政策，就由于世界大战爆发而中止了；但在1919年海军上将杰利科勋爵向英国政府提出一个报告以后，新西兰政府又恢复这项政策的执行。

1909年，新西兰实行强制性军事训练。虽然它没有派兵到国外服役的义务，但是这种军事训练制度是为了在万一发生战争时派遣远征军出国之举奠定基础的。这样，当英国在1914年参战的时候，毫无疑问，新西兰不仅给予积极的帮助，而且已作好了部署，以便及时而有效地采取行动。1914年8月29日，新西兰的一支一千四百人的部队，在没有遇到抵抗的情况下占领了萨摩亚。同年10月16日，远征军的主力部队启航赴埃及。

世界大战结束以前，新西兰的现役兵力有十二万人以上，其中有十一万七千人被派往海外。这个数字约占新西兰总人口的百分之十。

在加利波利、巴勒斯坦、法国和比利时，新西兰军队在勇敢、锐气和刻苦耐劳方面都赢得了良好的声誉。黑格勋爵把新西兰军队赢得的声誉概括如下：“无论是从作战上军队的勇敢行动方面看，或是从战场以外军队的良好行为方面看，在法国没有一个师能比新西兰军队所建立起来的声誉更高。新西兰军队的成绩给他们的国家赢得了荣誉，也给他们为之战斗的大英帝国赢得了荣誉”。关于新西兰军队的功勋，如在加利波利登陆，攻击朱努克·摆尔，1918年3月从费兰德斯冲杀下来，堵击德军在艾伯特附近的突破，以及8月开始进攻围有城墙的古老城市勒·凯诺伊市并以占领该市告终，我们无法缕述。但重要的是，我们要认识新西兰军队在他们国家的发展中所占的地
254 位。新西兰有一支包括各种兵种的人员在内的大军，在要求有伙伴关系和团体精神的条件下驻扎海外，这使在国内的和在国外战场上的新西兰人都感到，新西兰在世界上占有非凡的地位。

英联邦

虽然其它自治领没有象新西兰那样毫无异议地忠于英国政策，但是它们参战的态度是积极的。正如一个英国历史学家 A·J·格兰特曾一度论述过的那样，它们在战争中所作的努力，“除了具有实际的军事价值以外，乃是极宝贵的，因为它们的努力给我们带来勇气和希望”。在英国，人们都赞同英国和各自治领的关系的现有形式应该有某种改变。在世界大战期间实际上也作了一些改变。大英帝国已经为各自治领建立自治政府采取了大规模的措施，由此正在出现一种在权力上平等的一些国家的联合。这就是人所共知的英联邦。人们可以看到英联邦在世界大战之前已有了开端，只是这种变化一时还没有得到法律上的承认。建立英联邦是替代建立“帝国联邦”的一条路径，世界大战及其和平解决为各自治领走上这条路径提供了一些决定性步骤。

在世界大战期间，于 1917 年召开的帝国会议在议会记录中载明这样的观点：在英国和各自治领的关系上的任何调整，都应承认各自治领在对

外政策方面有充分的发言权，并且应提供有效的协商办法作为几个政府决定采取一致行动的基础。过去召开的帝国会议，最初称作殖民地会议，从1887年以来每隔一定时间都按期召开，这些会议已为实现当前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特别是在1907年的会议上，有了一个重要的改变。殖民地
255 的代表们不再谒见英国殖民地事务大臣，而是由英国首相主持会议。这样，各个政府就在较为平等的基础上开会。后来，在世界大战期间，组成了“帝国战时内阁”。它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内阁，而是在战时的特殊情况下召开的一种协商会议，因为英国政府首脑和各自治领首脑之间所达成的各种协议，还须送请各该国政府批准，并须获得各该国政府对之负责的议会的支持，否则，这些协议对任何一个政府都没有约束力。所以，“帝国战时内阁”实质上是各政府之间的合作，而不是一个单独的政府。

各自治领的新地位，在1919年的和平会议上得到了其它国家的承认，它们在代表权上，得到了同其它小国如比利时一样的良好待遇。它们用自己的国名签署和平条约，国际联盟并承认它们为

单独的成员国。战后，这种趋势在各方面都有所加强。例如有些自治领任命了代表本国政府的公使驻节外国政府所在的首都（1948年，在有些情况下，它们派遣大使）。各自治领用自己的国名签署各种条约，不受英国政府的任何干涉。但它们签署这些条约总是在这样的一种谅解下进行的：如果这些条约影响到英联邦的其它各成员国的利益，则它们就必须与这些国家协商。1927年，加拿大由国际联盟大会选任为国际联盟理事会临时理事国之一。这个职位分别于1930年、1933年、1936年由爱尔兰①、澳大利亚、新西兰继任。

在1926年的帝国会议上，对英国和各自治领的相互关系问题进行了很充分的讨论，并且努力去把会议中取得一致的见解加以明确的叙述。会议所产生的《鲍尔弗报告书》堪与《德拉姆报告书》 256
相媲美，而成为一个里程碑。报告书指出（用斜体

① 爱尔兰原是英国的殖民地，1921年，爱尔兰南部的二十六个郡成立“爱尔兰自由邦”，享有自治权。1937年爱尔兰自由邦宣布改为独立共和国，仍留在英联邦内。1948年12月爱尔兰共和国宣布脱离英联邦。1949年4月英国被迫承认爱尔兰共和国完全独立。这里所说的爱尔兰是指处在自由邦时期的爱尔兰。——译者

字① 以示着重之意)：

“虽然它们统一于对英王的共同效忠，并自由地联合为英联邦的成员国，但它们是大英帝国内部的自治社会，具有平等的地位，在它们的内政或外交事务的任何方面，都不存在相互从属的问题。”

在1930年的帝国会议之后，1931年通过了“威斯敏斯特法”，给予各自治领以同英国具有平等地位的合法形式。“威斯敏斯特法”所给予的这种完全的自由，从下列事实表现出来：1939年战争爆发时，南非议会辩论着保持中立问题，而爱尔兰实际上已决定实行中立。或者可以这样说，爱尔兰实际上由此而断绝了同英联邦的联系。事实确实如此。1948年，爱尔兰议会通过了一项法令，根据这项法令，爱尔兰同英国的最后的些微联系也于1949年4月18日消失了。但是很可能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即爱尔兰同英联邦的各国的关系，在友好方面不亚于过去，在合作方面甚至比过去更好。在爱尔兰仍留在英联邦的时期，若不是给予它以自由，要做到这一点几乎是不可能的。印

① 中译本改用楷体字。——译者

度、巴基斯坦、锡兰①在英联邦内达到了它们自己的目的，这一事实也说明英联邦允许它们的独立的真实性。

在爱尔兰最后成为共和国的十天内，英联邦内的各国达成了一项协议，即印度可以成为一个共和国，唯仍留在英联邦内，不必宣誓效忠于英王，只接受“英王作为英联邦各独立成员国的自由联合的象征，并且是英联邦的元首”。到了1959年 257
年底，巴基斯坦也成为共和国②；加纳、马来亚和新加坡都是英联邦的新成员国。缅甸于1947年选择了完全独立的道路③。

新西兰对各种变化采取的态度

新西兰没有要求这种日益增多的独立性，但是只因为其它自治领不接受更少的独立性，所以它对自治领地位的发展表示默认。事实上，“威斯敏斯特法”作了一项规定，即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不

---

① 锡兰现称斯里兰卡。——译者

② 巴基斯坦共和国宣告成立，惟仍为英联邦的成员国，其日期是1956年3月23日。——译者

③ 缅甸脱离英联邦宣告独立的日期是1948年1月4日。——译者

必接受该法所授予的权力。所以 1947 年以前，新西兰一直都没有采取这个步骤。

新西兰的这种颇为保守的态度，或许是自然的。新西兰在英联邦的海外成员国中，是一个最小、最年轻、最遥远和最偏僻的国家。它的创立与英国在十九世纪的海军力量有密切的联系。新西兰人口太少，它的各方面的条件与英国太相似，不能发展任何很独特的新西兰文化和传统，而它的经济发展特别依赖于同英国进行产品交换。新西兰的人口绝大部分有英国血统。因此，在同英国的关系上，新西兰比其它自治领都更满足于采取一种依赖的态度，有时表现得“比英国人还要英国化”。

不过，新西兰工党政府在 1935 年采取了稍有不同的态度。它反对大英帝国任何统治自治领或其他民族的思想，而赞同把国际合作看作是争取和平的手段的思想。在各自治领和英国的关系这一问题上，工党政府欢迎而不是反对各自治领从
258 默认英国的领导地位转变为实行独立和合作。虽然新西兰在国际联盟所讨论的一些问题上，有时同英国的意见有分歧，但是随着国际形势的恶化，

工党政府十分明确地表示它仍然非常重视与英国的联系，并且，如果战争爆发的话，新西兰一定同英国站在一起。

新西兰与国际组织：国际联盟

鉴于新西兰对大英帝国事务的态度，当国际联盟于1919年成立时，梅西政府对此没有表示多大热情，那是不足为奇的。在梅西看来，国际合作似乎是某种可能削弱大英帝国的团结和威望的东西。他也不欢迎这种思想，即让各自治领作为单独的成员国参加国际联盟。在早期国际联盟大会历次会议上，新西兰代表团的阵容并不强大，而且在新西兰议会的辩论中也几乎没有多少注意到国际联盟。

新西兰对于国际劳工组织的冷淡态度，除非从它对任何“外国的”东西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厌恶这个根源加以说明外，是不易给予解释的。国际劳工组织召开的最初十八次年会，新西兰只有一次派代表出席。或许有人这样想，新西兰的社会和工业方面的立法远远走在其它国家的前面，因而没有什么东西要向别国学习的。即使如此，新

西兰也可以从其它国家的生活水平的提高方面学到很多东西，而其它国家也会希望它积极地参加一个旨在实现这个目的的国际组织；但实际上，新西兰的生活水平在许多方面也并没有达到国际劳工组织历次年会采纳的协议草案所规定的标准。
259 从新西兰当局和一般公众对待国际联盟和国际劳工组织的态度来看，似乎他们都还没有认识到从十九世纪以来，国际形势起了多么大的变化。

新西兰工党不持上述观点。当它在1935年执政的时候，正如它欢迎大英帝国变成英联邦一样，它对国际联盟和国际劳工组织的发展给予充分的支持。新西兰工党的这个做法正是在国际联盟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这些工作似乎有希望促成更大的进步）以后而在防止侵略战争这项主要工作上出现失败的迹象的时候采取的。虽然国际联盟调查团实际上已谴责日本在1931—1932年进攻中国的行动为侵略行为，但是它的各成员国并没有对此采取有效的行动，因此日本得以随心所欲地占有从战争中掠夺得来的东西。纳粹德国破坏国际协定的行为除了受到一些纸上的抗议以外，没有受到任何制裁。到了1935年年底，意大

利发动了对阿比西尼亚的侵略。虽然各国根据通过国际联盟达成的国际协议，断绝了对意大利的一些补给品的供应，但极关重要的石油的源源输入意大利，却没有受到干预；更不必说把苏伊士运河关闭起来，也不必说筹划任何制止侵略的军事行动。接着在1936年，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不顾它们和其它一些国家已签订的互不干涉协定，公然对反抗西班牙正式当选执政的人民阵线政府的叛军提供大量的援助。俄国人对此采取报复行动，给西班牙政府以援助。1937年，日本再次侵略中国。接着在1938年，德国和意大利在欧洲进一步扩大侵略。

日本和德国都退出了国际联盟，随后意大利也退出了。英法两国政府倾向于采取这样的看
法，即国际联盟的各成员国实际上无法履行以集 260
体行动来抵抗侵略的义务，因此，应通过对那些威胁要进行侵略的强国给予妥协和让步来求得和平。这些妥协都是由在国际联盟以外进行的讨价还价所达成的，而集体安全的思想便被置诸脑后。

新西兰政府反对这些倾向，竭力主张应继续努力，使国际联盟成为一个真正有效的实体。新

西兰争辩说，只要国际联盟的各成员国准备履行它们的义务，这一点是能够做到的。国际联盟发信给它的各成员国，征求它们提供关于改进它的工作的建议，1936年新西兰政府发出一份备忘录作为回答。在这份备忘录中，它明确地和强烈地表白了这些观点。备忘录说，为求有效，对破坏国际联盟盟约的行为所采取的行动应该是立刻的和自动的，所采取的全面的经济抵制在必要时以武装力量加以支持。新西兰政府准备同意建立一支在国际联盟控制下的国际部队，或者由各国分派一定的兵力交给国际联盟指挥。各国应设法使其人民赞同这些原则。新西兰政府发表了这样的意见：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签订的和平条约，"本身就包含着未来冲突的幼芽"，因而它建议国际联盟盟约应同和平条约分开，并且和平条约应由一次世界会议加以重新考虑。"国际联盟盟约的条款及其实施，集体安全的任何其它普遍性措施的条款及其实施"，也可以提交一次世界会议去讨论，而且，还可以对各种经济情况进行一次世界规模的调查，因为它们对世界和平有所影响。为了尽量方便全世界人民了解国际联盟的工作，应该

把国际联盟的会议记录广为传播。最后，新西兰政府表示了这样的信心：虽然集体和平制度不是万能的，但总比没有这种制度要好些，“任何这一 261
类的制度在它成为一种万能的制度之前，都是不能完全地令人满意的，因此，我们应该尽一切努力去达到这个目的”。

虽然上述这些观点可能没有表现出工党政府对国际事务的困难给予足够的重视，但它们确实表明了工党政府对待各种世界问题的精神。工党政府的这种态度也在国际联盟面临的一些重大问题上表现出来。恰好新西兰从 1936 年至 1939 年是国际联盟理事会的理事国，这个地位使它能充分地表明它的立场。在阿比西尼亚、西班牙和中国问题上，新西兰都始终如一地坚持要履行国际联盟的义务，并拒绝承认使用暴力所获得的结果是合法的。

本着这种态度，新西兰在一些情况下反对英国的政策，并且除了同直接有关的国家联合外，还同 1934 年加入国际联盟并支持集体安全制度的苏联联合。由于苏联和一些西方国家都受各法西斯国家日益增长的侵略势力所威胁，所以人们希

望它们能在国际联盟中站在一起，使国际联盟成为共同反对侵略、保持世界和平的有效工具。可是，这些希望（其中有新西兰政府的一份）后来都破灭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与联合国组织

由于受到威胁的各强国缺乏团结，致使纳粹德国胆壮起来，而在1939年9月就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新西兰除了第二次派遣远征军到希腊、克里特①、埃及、利比亚、突尼斯和意大利作战外，还派出别的部队在许多战区作战。日本于
262 1941年12月进攻英、美在太平洋和东南亚的属地，新西兰便变成了美军的基地之一。新西兰人修建了兵营和医院，建造了小型船只，进行了各种维修工作，并生产了大量粮食（包括新鲜蔬菜），以供应在西南太平洋作战的美军。有一个时期，由于日本有进攻新西兰的可能性，因此新西兰组织了国防警卫队和紧急警备队。1943—1944年，新西兰的一个师在所罗门群岛服现役。新西兰人在

① 克里特是地中海东部的一岛，属希腊。——译者

国内和国外都做了很多有价值的科学研究工作，而新西兰的妇女在许多直接地或间接地与战争有关的活动中也起了重要的作用。事实上，新西兰整个国家都动员起来，为争取胜利作出多方面的贡献。

当1941年纳粹德国进攻苏联而日本进攻美国领地的时候，那种为了反对侵略性的军国主义国家而在和平时期所未能实现的各国团结，却在战争时期的共同斗争中实现了。世界上三个最大的强国，在许多较小国家的支持下，在被蹂躏的国家的人民群众抵抗运动的支持下，都参加了争取胜利的共同事业。虽然三大强国过去的分歧是不容易克服的，但是在它们的领袖的会谈中，开始出现了把为战争而合作扩大到为和平而合作的思想。1944年，在美国敦巴顿橡树园召开会议，起草成立联合国组织的基本原则，中国代表也参加这项起草工作。所有向德国、意大利或日本宣战的国家都参加1945年4月举行的旧金山会议，最后通过了联合国组织的宪章或宪法。

新西兰政府自然支持这些做法。它的代表在 263
旧金山会议上，在后来的联合国大会的历次会议

上，以及在同联合国组织有关的其它机构的会议上，都起了积极的作用，有时起了卓越的作用。它对于发展集体安全制度的思想，对于设立管理尚未独立的领土的托管理事会，以及对于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工作都给予特别的注意。新西兰政府曾批评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中任何一国对重要决定都可使用的“否决权”，其理由是这种否决权妨碍集体行动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我们必须记住，如果各大国之间没有真正的合作，联合国组织的工作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受到妨碍，而取消否决权，也不能保证各国的合作。即使给予其它国家以权利来压制一个反对大多数国家的观点的大国，实际上要实行这种压制，也不是一件容易办到的事情。作为最后一着，这种压制将意味着另一次世界大战。争取和平的真正工作乃在于创造一些使合作更加容易实现的条件，亦即发展一些条件，确保各国人民在不支配别国或不受别国支配的情况下，都有发展的机会。这样，我们就可以消除受别国支配的恐惧，而这种恐惧孕育着各国之间实施戒备措施和反戒备措施，进行军备扩充，采取战略行动和相互指责。不幸的是，关于这个

问题如何才能得到解决，还存在着深刻的意见分歧。

新西兰与太平洋：一般背景

不管新西兰的地理位置如何，直到最近为止，它对太平洋沿岸各国都不大感兴趣。当新西兰正在发展成为欧洲人社会的时候，太平洋西海岸的 264
人民正在陷入于受西方商业界支配的境地，而西方商业界往往都有本国的军事力量作后盾。东方文化曾一度比欧洲文化遥遥领先；但后来由于西方关于生产、运输、交通和动力等方面的科学知识有了迅速的发展，东方文化便落后了。东方无法抵御这种新的侵略势力，广大地区便变成了西方列强的殖民地。中国① 虽然在名义上仍是独立国家，但它被迫出让许多对西方人及其贸易和投资有利的特权。

但是在新近年代，太平洋的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西方对全世界的支配地位削弱了。太平洋的亚洲沿岸出现了一些新兴力量，新西兰虽然比

① 指旧中国。——译者

过去更加能够在经济上自立，也必须面对这些新兴力量。欧洲人所说的远东，现在已成为西南太平洋的两个英属自治领的富有活动力的“近北”。首先是日本的崛起。它终于威胁着要撵走欧洲势力，并要在东亚和西太平洋强行确立它的统治权。其次是中国和其它或多或少受西方控制的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其目的在于谋求本国从外国帝国主义的支配下解放出来。在这些民族解放运动内部，由于各个集团对其已获得解放的国家的前途有着不同的计划，因而这些集团之间开展了进一步的斗争。它们反映出在关于如何才能最好地求得和平和正义的问题上，存在着世界范围的严重的思想冲突。最后，美国是一个西方强国，但它在其背景和思想的许多方面与欧洲国家不同。它在太平洋的力量，正如它在其它地方的力量一样，有了巨大的增长。

265 日本的崛起和衰落

在十九世纪中叶，当美国舰队的一个中队在东京湾停泊，谋求通商的时候，日本统治者审慎地实行闭关自守、使日本和外部世界隔绝的政策，

已经有两个世纪以上的时间了，并且它的封建机构已在崩溃中。但是日本的闭关自守政策却使它成为一个免遭十九世纪日益扩张的西方势力的支配的重要国家。虽然日本不得不向西方国家作了一些让步，但它紧接着就采取了一种剧烈的和迅猛的革新的政策，其中包括采用西方国家的某些方法，其目的在于使日本强大到足以在平等的基础上与西方列强相抗衡。这样发展来起而成为一个强国的日本，是一个新与旧、科学效能和中世纪信仰的稀奇混合。在一个被认为是源出天神的皇帝之下，日本的实权是由军人和控制日本大部分财富的豪门所把持的。这两个集团都和过去的封建贵族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农民和工人是贫困的、受压迫的，而统治集团则密切地注视着他们在政治上流露不满的迹象。

日本从欧洲列强之间的日益加剧的摩擦中得到了好处。1902 年日本和大不列颠结成同盟国，就是一个例证。在 1904—1905 年的日俄战争中，日本打败俄国而震动世界，就是这一同盟的结果。一个亚洲国家打败了一个欧洲强国，这个事件激起了亚洲人民对免受西方支配的未来寄予希望。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作为西方列强在太平洋的一个得力盟国，进一步加强了它在这个
266 地区的地位。随着德国势力的消失，太平洋成为大不列颠、美国和日本三大海军强国之间角逐的中心的危险便出现了。这种危险曾由于1921—1922年华盛顿会议所达成的协议而暂时地减少，但随着世界经济萧条带来动乱和自1931年以来欧洲的国际关系日益恶化，日本又以对中国施加压力的形式恢复其活动，到1937年发展成为对中国的全面战争。日本的压力也威胁其它强国在中国、东南亚和西南太平洋的利益。它企图囊括这一整个地区，建立它的统治权，于1941年12月开始袭击珍珠港、马尼拉和新加坡，而达到其冒险行动的顶峰。

日本虽被打败，但问题并未解决。日本的面积约比新西兰的面积大一半。它是一个多山的、资源不富饶的国家。它的人口有八千万以上，并且仍继续增长着。只要它能从国外获得工业原料并能向其它国家销售其工业产品，它的人民就能维持相当好的生活水平。其它国家有时候限制日本商品的倾销，而日本当局则争辩说，他们凭借武力去取得工业原料和销售工业产品的市场，只不

过是重复其它国家先前已做过的事情而已。这自不能证明日本的政策是正确的，也不能证明日本统治当局在其人民当中所鼓励的残忍的、傲慢的军国主义精神是正确的。不过它提醒我们，西方国家过去的态度，无助于一个亚洲国家在世界上找到和平的和独立的地位。

如果日本将来要成为一个和平的、民主的国家，它就必须有其经济发展的适当机会。日本怎样才能达到这种经济发展，而又避免从前的军国主义势力复活、利用经济发展来达到其侵略目的的危险？如何帮助日本人在新的、和平的、民主的 267
道路上取得经济上自立呢？鉴于日本过去的历史，这个问题不是容易回答的。这主要取决于日本人本身，同时也取决于人们要求日本人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性质。

新西兰在拯救亚洲和太平洋免遭日本统治的战争中，曾出了一份力量。它有一个时间分担过英联邦占领军的任务。它是设在华盛顿的远东委员会的一个成员。对日和约签订以前，该委员会一直负责决定远东问题的政策。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设于东京，由美国、苏联、中国和英联邦各派

一个代表组成。新西兰对于英联邦派往参加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的代表的任命，享有发言权。新西兰虽然是一个小国，但它也有助于形成这样一种性质的世界，即其它各国人民必须在其中找到其和平发展的机会。

中国的兴起

中国人对西方压力的反应较日本人缓慢。中国皇帝和他的官员们没有采取增强中国力量的步骤，实际上却借助外国列强来镇压各种革新运动，如1851年至1864年的伟大的太平天国起义等。结果，他们不得不向外国势力作出让步。虽然如此，在1911年，当时的皇帝终于被孙逸仙博士领导的一个规模广泛的运动所推翻。孙逸仙的目的，正如他在其《三民主义》中所阐述的，是要使中国成为统一的国家，免受外国的控制；建立民主政府；
268 贯彻经济和社会改革，以结束地主、高利贷者和巨商对中国人民大众的剥削。这个运动遇到各种巨大的困难。中国曾有一个时期被贪婪无厌的、肆无忌惮的军阀所割据。但是，孙逸仙在广州成立了一个政府，而在1925年他逝世以后，在蒋介石的

领导下开始了北伐，到1929年，整个中国至少在名义上是在设于长江南岸的南京的国民政府统治之下。

1927年，中国又遇到了另一个困难，即在民族解放运动中，与地主、资本家相勾结的较保守的集团，同主张为工农利益而进行更激进的革新的集团之间发生了分裂。蒋介石同保守派命运与共，因而激进派遭到残酷的镇压。但是，一些曾为孙逸仙所接纳参加他倡导的政治运动的共产党领导人，不管蒋介石向他们发动了一系列军事围剿，还是设法在一些比较偏僻的地区确立了他们的势力。若干年来，他们的主要力量是在江西。但是，1934年他们突破了威胁他们的包围圈，经过艰苦的长征以后，将他们的主要中心转移到西北，并在陕西省的延安建立了他们的总部。

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力量的不断壮大，导致它同各外国强国发生摩擦。最初，英国作为主要的帝国主义强国，被认为是中国的头号敌人，但后来日本取代了这个地位。日本于1931—1932年对满洲和上海的进攻，乃是它要在中国变得太强大之前强迫中国作出让步的时期的开始。1937

年，中日之间又爆发了公开的战争，并且这次战争一直持续到 1945 年为止。

269 中国长期的抗日战争使它在世界上获得了新的地位。中国遭受外国势力的统治的时代结束了，它成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但是这个承认并没有使中国强大和稳定。蒋介石同长期以来主张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共产党人之间的不和，到了 1937 年终于实现了和解。这个和解的实现主要是由于若干中国军队①不愿同中国共产党人作战，而不是由于联合起来抵抗日本的侵略。关于中国的前途问题，共产党人和国民政府的统治者之间存在着种种分歧，这些分歧在抗日战争结束之前已引起了双方的摩擦，并且在随后的几年间由摩擦发展为内战。同国民政府有联系的许多人都有贪污行为和不民主的观点，这使国民政府非常不得人心；反之，共产党人进行的各种改革，尤其是在农民中进行的减租和重新分配土地，使他们受到许多非共产党人的广泛的欢迎。到了 1949 年年底，蒋介石政府逃往台湾避

① 指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译者

难，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宣告成立。新政府成立以后不久就得到大不列颠的承认，但其它一些国家，其中包括美国、澳大利亚①和新西兰②，都没有承认它。它在联合国的席位也还没有被承认③。

新西兰人在中国人民有困难的时期，曾对他们提供过一些援助，如赠送医药用品、衣服和派遣专家到中国去帮助工作。人们特别赞赏一个杰出的新西兰人路易·艾黎④所从事的工作。在艾黎出色地完成组织水灾和饥荒的救济工作以后，当他看到大部分现代工业所在的沿海地区都遭到日本人的蹂躏时，他感到有必要在距离沿海较远的 270

---

① 澳大利亚已于1972年12月21日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同日起两国建立外交关系。——译者

② 新西兰已于1972年12月22日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同日起两国建立外交关系。——译者

③ 联合国大会已于1971年10月25日以压倒多数的票数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并立即把窃据联合国的中国席位的蒋介石集团从联合国组织驱逐出去。——译者

④ 路易·艾黎(Rewi Alley)长期在我国工作，撰写有关我国情况的介绍和报道，著作很多，其最新的著作是《中国见闻》一书(北京新世界出版社1973年英文版)。——译者

内地发展工业。不过，他认为在内地发展工业应适应中国生活的各个方面。他主要负责组织中国工业合作社。他相信，通过有组织的人们在合作的基础上进行劳动，并尽量利用地方上可得到的原料，工业就能在绝大多数中国人民居住的广大农村中发展起来。象艾黎那样耐心地、坚定地对待困难的人是不多的。他深信普通人只要同心协力地劳动，是能够做出成绩来的。他的这个信念无疑是鼓舞他的力量的源泉。

东南亚的民族解放运动

在印度和中国之间向南突出的亚洲部分，包括作为其附属物的各岛群，除了暹罗① 以外，都曾沦为大不列颠、法国和荷兰的殖民地。东南亚地区的资源，先是香料，后是橡胶、锡和石油，都吸引欧洲势力的注视。他们在这个地区所开发的自然资源，比当地居民所曾开发的要多得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地区出现了一些领导人物，他们对自己的同胞所处的从属地位感到不满。他们起

① 暹罗现称泰国。——译者

来寻求获得政治上的独立和经济上的发展，而这种政治上的独立和经济上的发展必将取决于本国的利益，而不取决于欧洲投资者的利益。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日本的进攻摧毁了这个地区的西方势力的结构时，这个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更加高涨起来。一些领导人同日本人合作，共同摧毁西方帝国主义，希望由此增进他们自己国家的利益。另外一些领导人则组织抗日游击运动，为击败日本而奋斗。当日本在 1945 年投 271
降时，谁也不愿意看到西方列强恢复他们过去的地位，而且许多人准备为争取独立而斗争。西方列强不得不作出一些让步。缅甸获得了完全独立。美国履行了他以前的诺言，允许菲律宾独立。法国和荷兰也愿意作出让步，分别让印度支那和印度尼西亚实行很大程度的自治。虽然在印度支那和印度尼西亚的自治问题上都签订了协定，但在把协定的条款付诸实施中又产生了纠纷。1950 年初，荷兰承认了印度尼西亚的独立；但在印度支那，战争却继续进行着。*

---

* 越南、老挝和柬埔寨于 1954 年独立。——作者

这个地区的各种情况在一个时期内可能还不会得到很好的解决①，但这个地区的人民将和亚洲其它地区的人民一道，坚持要求人们倾听他们的呼声，这一点却是明确的。在同太平洋其它各国人民建立关系上将起作用的正是他们，而不是以前统治他们的那些欧洲国家。他们的国家有可能成为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国家，而广大的人民群众也将寻求较高的生活水平。这也许会造成对新西兰产品的新的需求。

太平洋群岛

我们已知道,新西兰最早与之发生关系的是太平洋群岛中的一些较邻近的岛屿,而库克群岛和西萨摩亚都被置于新西兰政府的管辖之下。在这两个地区都有种种困难发生。这些困难的发生似乎较多是由于缺乏在处理这一类问题上训练有素的人员,较少是由于缺乏良好的意愿;因为新西兰政府对任何剥削土著居民的势力都不表同情,而一直

①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民主柬埔寨和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已分别于1976年7月3日、1975年4月17日及1975年12月2日成立。——译者

真挚地致力于推行各种改良的措施。就西萨摩亚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它由被置于国际联盟 272
的委任统治制之下转变为被置于联合国组织的托管制之下，新西兰政府曾采取了各种步骤来增加萨摩亚人分担他们的政府工作的分量，并以在1961年实现西萨摩亚的独立为其目标。①

在战争期间，许多岛屿具有作为军事基地的价值；许多具有最新的机械化装备的军队带着相当多的美金来到这些岛屿，影响了土著居民的生活；各盟国决定不把以前日本占领的岛屿归还日本。所有这一切，都不断吸引人们对这些岛群及其人民的注意。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自然对此表示很大的关切，所以在1944年1月两国政府签订了堪培拉协定。在协定的条款中，除规定的其他各点外，有一点是两国政府同意在世界安全的总体制的范围内，必须在西南太平洋和南太平洋地区建立起区域性的防御区。这个防御区以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为基点，经由澳大利亚以北和东北面

① 西萨摩亚于1962年1月1日获得独立。1970年8月它成为英联邦的成员国，于1975年11月6日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译者

的形成弧形的各岛屿，伸展到西萨摩亚和库克群岛。协定的另一条款还明确地规定，两国政府在战后不愿把它们控制下的任何地区的领土让给其它国家充当军事基地。它们还宣布，凡签订关于太平洋任何岛屿的未来管辖权的任何协定，都必须得到它们的参与。

堪培拉协定中有整整的一节专门叙述“太平洋地区土著民族的福利和进步”这一问题。两国政府同意，“‘托管’的理论……从广义的原则来说，是适用于太平洋地区和其它地区的所有殖民地领土的，而托管的主要目的乃是增进土著民族的福利以及促进他们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要在太平洋地区实现这个目的，各有关政府之间的通力合作是可取的。

273 1947年1月，澳大利亚政府召开了一次会议，出席会议的除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代表以外，还有美国、英国、法国和荷兰的代表。会议的结果是成立了南太平洋委员会。该委员会是一个谘询机构，设有常任工作人员班子，进行有关各岛屿民族的发展和福利及其领土问题的调查工作。这次会议还决定要召开一种有土著民族的代表参

加的会议，并且这种会议至少每三年举行一次。这些安排到底能收到多好的效果，要视握有最后控制权的各政府的态度而定。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已经宣布，它们所追求的目的是促进各岛屿民族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而上述这些安排乃是它们为追求这个目的的实现而提出的倡议的直接结果。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合作

堪培拉协定的其它方面为本章关于新西兰在世界事务中的地位的探讨提供了一个结论。一方面，人们承认，这两个南太平洋的自治领不能再把它们的安全寄托在英国身上，它们自己必须担负起更大的责任。另一方面，美国、苏联和正在站起来的亚洲各国人民在太平洋地区已成为比过去更加重要的因素。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两国政府正是为了面对这样一个变化着的形势，才在堪培拉召开会议，从当时的战争情况注意到未来局势的发展。两国政府保证它们之间要进行更充分的协商和合作，同意“在处理西南太平洋和南太平洋地区上两国共同关心的各种问题方面采取一致行动”。

"两国应通过协商，并在双方同意的情况下，通过
274 共同拟订计划来促进两国之间的商业和工业的发展；两国应通力合作，以实现两国国内的充分就业和达到最高水平的社会保障"。"为了保证根据协定所制订的方针进行继续不断的合作和便利于执行协定所规定的各种任务和职责"，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每一方各已设立了一个"澳大利亚-新西兰事务秘书处"。虽说这两个国家设法通过相互合作，增加力量，以便在对它们有所需求的世界中更有效地发挥新的和更大的作用，它们都仍然同英国以及英联邦的其它国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且都在设法谋求提高联合国组织的效能。

第二十三章　从过去走向未来

275

粮食和人口

今天的新西兰，主要是过去一个半世纪人们在了解其周围世界中迈步前进的产物。这些应用科学于日常生活上的巨大成就主要应归功于欧洲人。他们往往对人类的稳步前进抱着很乐观的态度。但是现在我们正在认识到，人们在改造其周围世界的过程中，同时也给他们自己造成往往意料不到的种种问题，而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就会威胁他们过去已取得的成就。上文已经提到，由于错综复杂的社会结构所引起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的问题，需要有效地运用人们已经取得的知识来解决。但是，还有人们和其周围的天然资源之间的关系的大问题，也隐约地正在出现。

因为粮食、其它必需品和舒适品的生产较多，医药和卫生设备有所改善，所以今天比过去有较

多的人能够生活在世界中。十九世纪，欧洲的人口迅速地增长。后来，当他们习惯于较高的生活水平时，人口的增长又缓慢下来。在二十世纪的
276 上半个世纪内，大部分西方国家的人口有一个时期似乎趋于稳定，或甚至有所下降。这种趋势本身有持续下去的可能，但是自战争以后，人口增长得相当快，特别是在一些比较“新的”国家如美国和英国的各自治领，更是如此。人口增长的各种原因还是模糊不清的，但它们似乎反映着改变了的社会态度，而社会态度的这种改变也许是由于西方各国采取了社会保障、政府保健计划、家庭津贴和免费教育等普遍的措施的结果。因此，对未来人口的估计必须加以修正，把它放大一些。但当欧洲的知识和方法传播给其它国家的人民时，这些国家的人口也开始增加。根据《1959年联合国人口统计年鉴》，1958年全世界的人口估计已经达到二十八亿人，并且每年约增加四千五百万人。

通过开垦新的耕地，改进耕作方法和育种方法，粮食已经增加了。但是粮食的增加是有一个限度的。目前，有些高级权威人士对粮食供应的

增长是否能跟得上人口的增加，表示怀疑。现在死于疾病的人是减少了，但有一些民族的生产率已使他们习惯于高生活水平，另有一些民族则正在力求提高其生产率和改善其生活水平，二者是有摩擦的，而随着这种摩擦的日益增长，就有可能发生为取得可以得到的粮食供应而进行的日益剧烈的竞争。因此，目前迫切需要把粮食生产提高到最大限度。

新西兰土壤的利用

新西兰是一个盛产粮食的国家，是世界上享受最高生活水平的国家之一。有效率的生产和装有冷藏设备的运输工具在新西兰的发展中起了一些作用，但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乃是新西兰的温和 277
而均匀的气候，这种气候节省了农业生产上所需的人力。虽然丹麦的奶油通常以较高的价格在英国市场上出售，而丹麦的奶油生产者从其劳动得来的收益也许是比较少的，可是没有人怀疑他们的效率。

在一个迫切需要粮食的世界里，任何丧失效率的事情都将受到惩罚。如果我们滥用我们的土

壤，我们的良好气候是挽救不了我们的。现在我们正为过去我们的一些罪过而自食其果。由于土壤受侵蚀，每年损失成千上万吨的土壤。这主要是过去木材工场主，特别是移民们，对天然森林滥加破坏的结果。这种情况使得这个国家更容易发生铁路、道路被冲毁以及山崩的现象，有时还会发生水灾。土壤受侵蚀的另一个原因是在丘陵牧地上放牧太多的牲畜。牧畜寻求饱食，使土壤变成光秃秃的，结果，表土层就容易被风刮走或被雨水冲洗掉。许多供放牧羊群的“高地”已经变坏了，而要使这些地方复原乃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为了全面处理土壤受侵蚀的问题，新西兰于1941年设立了“土壤保持和河流管理委员会”，并把水库管理局的工作置于它的监督之下。为了修复过去被轻率地破坏了的一些森林，正在以被引进的树苗为主进行植树，借以造成新的森林，但问题仍然是严重的。

也有这种可能性，即我们是过滥地使用了土壤。在处女地种植作物以及在新近焚烧过的丛林地带播种牧草，起初的成果都是很令人鼓舞的。后来，由于采用了以化学肥料进行土表追肥的方

法，贫瘠的和衰竭的牧地便有了新的生产能力。不过，一些权威人士认为，如果我们希望保持土壤的丰产性和牧畜的健康，我们就应当和许多其他的民族一道，更加细心地处理我们的土壤。这可能意 278
味着要改变我们的耕作方式和我们的产品品种。

新西兰在全世界生产和交换中的地位

增加生产已是可能做到的，因为人们和一些国家已在某种程度上把精力集中在一些专门的生产工作上，然后以所生产的货品进行交换，而不是直接地为他们自己的需要而生产。显然，除非人们之间和各国之间确能实行产品的交换这一点能得到合理的保证，按照这种方式进行生产，是没有多大意义的。要不然，最好还是让一个国家的人民多生产一些满足他们自己的需要的东西，即使他们从事这类的生产工作的效率比他们过去从事专门的生产工作的效率低一些，也还是值得的。

我们知道，新西兰坚定地把注意集中在牧畜业的生产上，并且严重地依赖于能够在国外销售这一方面的产品。只要这种交易能顺利地进行下去，那么，这对新西兰是有利的，对全世界也是有

好处的。但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出现的经济大萧条中，这种交易再也不能顺利地进行下去了。人们发觉他们生产了没有人能买得起的东西，而成千上万的人发觉没有人愿意付给他们工资以从事生产。这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从此以后，许多国家都企图保护它们自己，使自己可以多少避免遭受一种没有任何控制的世界交易制度的变动的影响，其办法有二：一是它们进行计划生产和计划交换，二是它们生产更多供国内消费的产品。我们已经看到，这就是工党政府的政策的一部分，或许任何一个政府都会在某种程度上在同一的方向上受到影响。

今天，又有另一个因素对世界市场上的自由
279 交换起着相反的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打乱了世界的经济平衡。当世界上一些最先进的工业国家受到破坏时，或者它们的旧有的生产基础为战争的迫切需要所打乱时，美国的生产能力不但没有受到损坏，而且大大地扩大了。虽然美国主要是为了战争的目的而扩大生产，但它的商品也挤进过去由大不列颠和欧洲供应货物的普通市场。这样，竭力主张在世界市场上进行自由交换的美国，

和其它国家相比较，便处于一个很强大的地位。但是美国有一些企业仍然寻求保护，以抵御外界的竞争。其它一些国家则顾虑重重，唯恐由于在美国开始的新的经济萧条，这种自由市场将再一次给人们带来灾难。

因此，新西兰是这样的一个国家，即在兴盛的世界产品交换中它能获得巨大的利益，但是世界市场的不稳定也会给它巨大的损害。新西兰在建立一种较为"绝缘的"经济上，它的政策应该走多远？为了促进世界的产品交换，它的政策又应该走多远？如果沿着第一种方向走得太远，则可能会降低我们的平均生活水平，而且其它国家的人民依靠以他们的特有产品同我们的产品进行交换来发展他们的国家的机会也会受到阻碍。但是，过去的经验证明，完全信赖世界交换制度似乎也是不行的。

在1947年和1948年分别于日内瓦和哈瓦那召开的世界贸易会议上，新西兰政府的政策可以描述如下：如果世界贸易许可比较不发达的国家有一些计划和一些保护性措施，并规定通过利用本国资源发展二类工业以增加就业的机会，那么，

新西兰是赞同进行充分的世界贸易的。问题在于求得恰当的平衡。

280 两种经济制度的冲突

人们都在谈论最大限度的生产和产品的顺利交换。这种谈论涉及整个世界所面临的一个问题。什么样的经济制度(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在衣、食、住和娱乐等日常事务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该怎么样)才能产生最好的效果？关于这个问题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这两种观点都会同意这样显而易见的事实，即人们就其总体说，必须从事生产劳动，否则就会饿死；但对于应该通过什么样的渠道来使基本必需品对人们起作用，这两种观点就不一致了。许多人也许认为，在这两种相反的观点之间找出一个折衷办法是可能的。

在我们讨论自由-工党政府的一些社会措施，讨论为发放失业救济金而开始筹集基金以及讨论工党政府的社会保障计划时，这个问题曾出现过好几次。我们在讨论国际关系以及亚洲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时，也碰到过这个问题。在这里，我们再度遇到这个问题，我们把它看作是一个赢

得最高产量的诱因的问题。

站在一个极端的人们持这样的观点，即在私
营企业制度下能够取得最大限度的生产。大多数
在十九世纪发展其工业的国家，特别是大不列颠，
都强烈地持有这种观点。现在美国依然坚持这种
观点。在这种制度之下，生产资料，如土地、机器、
工厂、轮船等等，都归那些能够获得必需的资本的
人们所拥有并由他们加以组织。大多数人受雇于
这样组织起来的企业，并且除非订出保护性措施，
他们都不免要为求得职业而进行竞争，也都不免 281
要遭受大量失业的危险。在经济大萧条时期，就
业的竞争和失业的危险都已表现为痛苦的现实
——在许多国家，无数人民的生活水平已降低到
过得去的生活水平以下。自从那次经济大萧条以
来，大多数国家日益增多地通过了各种社会立法，
旨在提供失业保险和保障工资水平。此外，人们
越来越相信，政府能够并且应该采取措施，防止任
何类似在经济大萧条时期出现的经济活动的总崩
溃。人们往往广泛地抱有这种信念，即对就业的
竞争和对失业的恐惧，是一种必需的诱因，没有这
种诱因，人们就不会有效率地劳动。这种信念，即

使在私营企业的势力仍然很雄厚的美国，现在也大大地减弱了。私营企业的性质已经有所改变，而且还在改变中。各大企业的所有权现在已经广泛地分散在许多股东手里，因此，这些企业都为经理所控制，而不为业主所控制。强有力的工会运动能够有效地同资方进行讨价还价。社会保障制度保护工人免遭最不幸的失业之患，而美国政府也和其它国家的政府一样，采取了一些措施以防止局部性的或暂时性的经济萧条发展成为经济总崩溃。尽管如此，在美国和其它国家，人们仍坚信竞争是一种诱因，而那些抱有这种信念的人往往倾向于把竞争看作是民主政治的一个基本方面。

站在另一个极端的人们，即集体社会组织或社会主义社会组织的拥护者们，其所持的观点是，在私营企业制度或资本主义制度下，必须为挣得工资而劳动的多数人，其一部分的劳动果实为雇
282 用他们的少数拥有生产资料的业主所剥夺。持这种观点的人还认为，如果以集体的公有制代替生产资料私有制，并且按照周密制订的计划进行生产，人们将会各尽所能地工作，因为他们感到他们分享增加生产的利益有了保证，人人都能按劳

取酬。有些人认为，在这种集体制度或社会主义制度下，随着时间的推移，促使每个人各尽其力去做好工作的推动力会变得如此强烈，并且产品会变得如此丰富，以致人们能够根据他们的需要分享集体劳动的果实，这样就完全达到共产主义。根据这种观点，人们认为，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开始和民主政治发生冲突，而要使民主政治得到更充分的发展，必须实行社会主义。这是1917年俄国革命的第二部分和苏联的发展所遵循的理论基础。但许多人却怀疑苏维埃的实践是否和这个理论相一致。最强烈反对苏联的人认为，苏联是一个主要为了权力而组织起来的极权国家，它一意想扩展这种权力，以统治其它国家的人民。

在大不列颠和新西兰，虽然有上述两种观点的支持者，但是这两个国家也和其它一些国家一样，倾向于寻求一种折衷办法。这两个国家已有很多社会立法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十九世纪的资本主义原则，而这些社会立法也时常受到那些坚持资本主义原则的人们的批判。在经济生活上，大不列颠和新西兰比美国有较多的计划性和较多的调节。它们不让产品的分配过多地取决于市场

上的竞争，而是部分地根据对需要的考虑，调节产品的分配；同时，它们的目的是要使人们得到充分的就业。不过，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制度还没有转变成为另一种不同的经济制度。

283 在这个“福利国家”里，究竟是什么样的诱因在对生产起作用？是十九世纪期间那种失业的威胁在起作用呢，还是参加集体努力、人人从其中分享利益这个观念在起作用呢？或者有没有可能是两种因素混合起来而有效地发挥作用呢？这在新西兰是一个具有真正重要性的问题，因为在这个国家里，人们强烈地支持福利国家的思想；但是，在我们相当长的一段历史中，特别是在本世纪，我们曾享受种种比较有利的条件，而这些比较有利的条件既没有鼓励我们去很认真地思考这个问题，也没有鼓励我们去体会那些较少幸运的民族的不同经验。

在新西兰和大不列颠，那些支持工党的人们相信，社会主义对于建立一个人道主义的、有效的经济制度是必需的。他们也普遍地相信，民主政治是一种政治制度，能够把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逐渐地转变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在这一点

上，他们的看法和那些拥护苏维埃制度的人们有所不同，后者认为资本主义只能是局部的民主。

当前，美国和苏联是世界上两个最强大的国家，许多人都把它们的抗衡看成是不同经济制度的产物，因此，这个全球性的两种经济制度的竞争问题就变得复杂化了。不幸的是，这两个国家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为打败法西斯强国而进行过合作，但是自此以后，两国便放弃了和平竞赛，而代之以敏锐的猜疑，互相指责对方有好战的意图。于是实力竞争的问题就开始起作用了。这一问题包含着采取一些外交和战略行动，而这些外交和战略行动的采取总没有包含打算对竞争的双方给予公正的考虑。苏联指责美国反对共产主义的和平传播和支持那些腐朽的、暴虐的反共集团，而美国则指责苏联领导人是在实行苏维埃 284
帝国主义，不是在实践他们所信奉的学说。这样，基本的经济问题便被实力的竞争搅乱了。

移民

我们的资源的最好的利用就其同世界的需要的关系而言，也引起这样的问题：究竟应该有多少

人生活在新西兰，而这些人又应该从哪里来。这对经济制度又有关系。反对移民的人所持的理由之一是担心移民会加剧对现有职业的竞争，特别是如果新来者比目前的劳动人民更习惯于较低的生活水平，那么，就业竞争就会更加剧烈。

在过去，移民显然是新西兰人口的一个重大因素。那些已在新西兰居住的移民，其人口增长率也是高的。但在1927年至1947年这二十年间，移民入境没有受到积极的鼓励，而不是由政府资助前来这个国家的移民，为数也不很多。新西兰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也下降了。倘若新西兰的人口按照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普遍的增长率增加的话，虽然它将会继续增长一个时期，但它将趋于稳定。然而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新西兰人口的增长率上升了，在1951年至1956年间每年增长百分之二点三一。

由一个已建立起来的社会把一小群一小群的移民加以同化，常常出现一些困难。如果移民们和他们所移居的国家的人民的生活方式是大体相同的，同化的困难最少。在过去，差不多所有到达新西兰的移民都是来自不列颠诸岛。只有数千名

斯堪的纳维亚人①、德国人和德籍波希米亚人②移居新西兰，他们主要定居在丹尼维尔克、诺尔斯伍德和普霍伊等特设移民区。唯一来自欧洲偏南 285
地区和欧洲东部（这些地区的生活水平较欧洲西北部为低）的重要的移民群乃是南斯拉夫人。根据1945年的人口普查，移居新西兰的南斯拉夫人约有三千人，其中不包括在新西兰出生的他们的儿女。不论是在新西兰或是在其它地方出生的属亚洲血统的人，共有印度人一千多人和中国人四千多人，其中有些不是永久性居民。

对移民的资助，在中断了二十年以后，又于1947年恢复起来。从1950年起，新西兰的人口通常每年增加移民七千人以上。1952年、1953年和1954年的数字更高得多，平均每年超过一万七千人。这种现象一部分是由于特别安置了大量来自荷兰的移民所致；不过，从荷兰来的移民从未超过来自大不列颠的人数。这样，大不列颠仍然

① 斯堪的纳维亚人（Scandinavians），即北欧人，包括挪威、瑞典、丹麦和冰岛等国人民。——译者

② 波希米亚（Bohemia）从前是中欧的一个国家，现在是捷克斯洛伐克的一地区。德籍波希米亚人指自波希米亚移居德国并取得国籍的人。——译者

是到新西兰来的移民的主要来源，但是大不列颠的人民对移居新西兰的要求已不象从前那样强烈了。英国的社会条件有所改善，就业的机会通常比较多，特别是有熟练技能的工人（这种工人最受新西兰欢迎），其就业的机会更多，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不很高，这些都使人民不愿离开大不列颠。

如果新西兰要寻求增多移民，它能较容易地从人口压力较大的国家（如荷兰），从生活水平较低的国家，或从“失去祖国的人们”① 中得到解决。任何失业的威胁，都会引起工人们及其组织反对移民。

正视未来

在这最后的一章里，我们已提出了我们面临的一些重要问题。我们的国家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之一。我们在高度生产率的基础上已经达到了一种很高的生活水平。在这一点上，一个因素
286 是我们的国家有良好的气候，另一个因素是我们的国家与世界上工业最发达、生产率最高的国家

① “失去祖国的人们”(displaced persons)指因战争或政治迫害而逃离本国的人。——译者

之一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但是世界是在不断变化中的，如果我们认为我们过去具有的优越条件是理所当然的，那么，我们就几乎不能应付世界不断出现的新问题。这就存在着一种危险，即我们可能沉迷于试图从世界上其它国家夺得一种生活水平，而这种生活水平不是依靠我们的效率而获得的，却是单纯地建筑在我们对我国天然优越条件的垄断的基础上的。这样一来，不用多久就会引起其它国家人民对我们的不满。如果我们正视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变化着的世界的现实，并相应地调整我们的内部组织和我们同世界其它国家的关系，我们就能够避免上述情况。只有我们采取正视未来的态度，我们过去的有价值的东西才能继续存在下去。

287 跋(1960年)

世界形势

“产业革命”一词，往往是指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在大不列颠发生的以动力发动的机械代替手工操作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由于科学上的种种进展以及人们把科学上的这些进展应用于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和舒适品的生产上，某些堪与产业革命相媲美的事情已在发生中。因之，一切形式的人类劳动的生产能力都已有了巨大的增长，而能够生产出来的产品的数量超过了人口的巨大增长。如果全世界的人民能够组织他们的生产和组织他们之间的关系，那么，用伯特兰·罗素的话来说，他们就可能有一个人间天堂出现在他们面前。

但是，生产的组织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组织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问题，而科学的发展已使这个问题的解决变得更为迫切。原子裂变和原子

聚变方面的伟大科学成就，已产生了原子弹、氢弹
和原子能发电站；导弹可以安装原子弹头，从一个
洲发射到另一个洲。这标志着我们的社会组织还
落后于我们对科学的应用。这对我们所有其它方
面的成就乃是一个可怕的威胁；正如罗素和其他
的人所指出的那样，如果人们选择人间天堂以外
的其它道路，那就有可能使人类归于毁灭。况且，
即使在战争中不使用原子武器，但是原子武器的
生产和为使新武器臻于完善的研究，也会大大地 288
减少可供和平享用的丰富物品的生产。

除了这个范围广泛的国际性的组织问题以外，还有一个国内的组织问题。这个问题主要是如何分配人们的劳动果实的问题。采用更好的方法可以生产更多的产品，这样便有可能给所有的人提供更好的、更富裕的生活。但是根据什么原则进行分配？是不是这个社会内部的所有集团的收益在现有的份额的基础上均匀地提高？或者是不是一些人取得较大的份额而另一些人则取得较小的份额？或者是不是有计划地增加那些生活最不富裕的人的份额？在已增加的总产量中，应该有多少用于消费？应该积存多少以供将来改进生

产之用？对上述这类问题的看法，人们是有种种分歧的。正是这些分歧造成了一个国家内部的紧张局势，并且构成了政争的大部分基础。

从另一个角度看来，亦即从国际的角度看来，分配问题也是重要的问题。大多数国家都在改进它们的生产，而在各比较不发达的国家，改进生产的需要也已吸引了人们很大的注意。但一般地说，在发达的国家，生产发展的速度依然较快，因此，发达的国家与比较不发达的国家之间的差距在许多方面是扩大了而不是缩小了。这种差别不但可能造成情绪上的紧张，而且也可能引起各种经济困难。比较不发达的国家的人民可能没有能力购买这一类的产品，即它们是高度机械化工业制造出来的商品，而对于各出产国的人民来说却是平凡的东西。

要是能够消除世界上各国人民之间的这种缺乏平衡的现象，那将会给人们带来极大的好处。正如著名的英国科学家J·D·伯纳尔教授在其所著《没有战争的世界》一书中所说的那样，问题
289 不在于“要求必须给予下层社会的人们以权利，使之能享用他们应得的世界商品的份额，而在于要

求必须给予他们一个公平的机会，使之能生产他们所需要的产品，从而使他们不再被看作是低劣者或从属者”。但只有各国人民之间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和良好的组织，科学才能对实现迅速的改革提供可能性。

生产方法的不断改善也意味着，一个已经处于先进国家行列、具有高生活水平、却依赖世界贸易的国家，在其向前发展的过程中是经受不起发生落后现象的。如果它不能不断地改善它的生产方法(这也意味着不能解决造成其国内紧张的各种问题)，那么，它就会处于一种不利的地位，就会停滞不前，或者甚至倒退。目前的世界就是这么一种性质的世界，我们将在这样的世界中探讨1949年至1959年底这一时期新西兰的内部历史。

〔原出版者注：我们感到，1949年以来世界事务发展过程中的种种事件距今为时尚短，所以我们不把它们总结在本书内。〕

经济的发展

在这个时期，新西兰国内的经济继续沿着和过去相同的方针发展，但速度加快了。农牧产品的生产普遍地扩大了，尤其是羊毛生产的扩大更

为显著。1950年，羊毛的价格急剧地上升，此后一般地仍保持着高价格。从1949年到1958年，羊毛的生产约增长了百分之三十五。同一时期的肉类生产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二，而乳脂生产的增长也和肉类大致相同。从事农牧业的人数增加很
290 少。牧畜业生产的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增加了对牧地使用航空土表追肥。

二类工业产品的生产也继续增长。从1949年到1957年所有各类产品的总产量约增长百分之三十，但工厂制造品的产量则增长百分之四十五以上，而从事制造业的人数约增长百分之十八。应该把所有这些数字与人口的增加作一个对比。1949年至1958年间，新西兰的人口约增加百分之二十三。这样，情况是明显的：按每人计的产量是增加了；二类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继续占着比较重要的地位。1949年至1958年间，主要利用河流的电力的发电量有了成倍的增长，这一事例也部分地表明了二类工业的重要性。

英国和新西兰合资发展的一项新的工业就是木材加工工业。这项工业是把在北岛中部种植的外来品种的林木加工成为纸浆、纸张和纸板。这

些产品有小部分已出口销售。关于利用废旧金属和铁砂建立炼钢工业的可能性的问题，关于建立制铝厂和炼油工业的问题，目前已经开始讨论了。

新西兰有许多工业为国内的地方市场制造产品，但依赖进口的原料。到1959年，我们以出口农牧产品偿清的进口商品，有百分之八十是工业原料或工业设备。因此，我国的工业发展没有解除我们对于对外贸易的依赖；而牧畜业产品仍约占我国出口商品的百分之九十五。

大不列颠原是我们的主要市场，但现在它的相对重要性继续降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我们的出口商品通常约有百分之八十运往大不列颠；在1946年至1949年间，每年平均为百分之七 291
十三；此后这个数字下降到百分之六十五左右，1951年和1957年分别下降到百分之五十八和百分之五十八点六的低点。我国对其他英联邦国家的出口的比例约占百分之七，而我国对其他国家的出口上升了——1950年以前每年平均不到百分之二十，1950年以后为百分之二十六或更多一些，1957年还高达百分之三十三以上。

世界市场的价格

主要出口商品的价格的波动对两个主要政党的命运具有某种影响。1950年，羊毛的价格急剧地上升，1951年上升得更为剧烈，为1949年的价格的三点七倍。1952年羊毛的价格回跌，但仍保持高于1950年的高价格。羊毛价格的这种突然上升，打乱了整个社会各不同部门之间的平衡，并导致进口商品的增加，而当羊毛价格下降时又不能迅速地将进口商品削减到足以恢复平衡的程度，这就引起偿付国外债务上的困难。对于这种价格上的波动，原需要付出一些努力来加以控制，但这种做法不受大众欢迎，也得不到执政党的支持。羊毛价格的上升加上取消进口管制，是使国民党政府难于实现其选举前所作的“使新西兰镑更顶用”这一诺言的因素之一；国民党政府在大大地放宽了进口管制以后，又不得不于1952年重新加紧对进口的管制，直至1954年年底为止。自此以后，巨额的进口使国民党政府在偿付国外债务上或在确保进口为国家发展所必需的商品上发生新的困难。

奶油价格在1957年的下降以及在1958年和1959年初的更显著的下降，使上述困难增多。在1957年的大选中以微弱的多数议席取代国民党政 292
府而执政的工党政府面临如下的严重问题：从出口所得的收入的下降，巨额的进口，及由此而产生的国外可动用的资金的迅速耗尽。政府一方面实行严格的进口限制，另一方面鼓励地方的生产，以弥补进出口的差额；此外，政府还必须向国外借款，为当前的贸易提供资金。因大选时工党许下的诺言而实行的赋税减免，其施行的时间被限制为六个月。1959年夏，由于欧洲气候干旱，奶油产量减少，新西兰的奶油价格迅速地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峰，这才缓和了新西兰的困难局面。但也应该指出，它并没有消除我们对于我国主要牧畜业产品的市场的前途的关切。

政党

尽管如此，在这一时期，新西兰并没有发生足以引起重要政治变革的重大危机。新西兰社会的一般结构是资本主义，其中有一些控制办法和福利措施，用以保障某些方面的生活水平。这种社

会结构仍然是两个政党①所能接受的。两党的竞选纲领都是在接受了这个共同主题的前提下互有一些不同的纲领。它们以一些不会打乱现有经济结构的办法，如赋税的减免以及社会福利的微小改善，对选民进行引诱。以这一类的诱饵去诱惑选民，是同开展如下的重大工作需要庞大的开支相抵触的：兴建对国家具有重要意义的工程，如建设水力发电工程，以适应急剧增长的人口的需要和工业上的越来越大的需求；进行为改进一切领域的生产所必需的研究工作。

此外，还有某种互相抵触之处。赋税的减免往往缩减了为发放各种社会福利金所需要的总金
298 额；减轻赋税和增加社会福利金是难以同时并举的。进一步看，如果赋税减免政策的制订是为了讨好那些最强烈地要求这一政策的富有的人，那么，那些比较重视社会福利金的、比较不富裕的人大致会感到不满。赋税的减免也会引起这样的问题，即究竟是谁将从它获得最大的好处——是收入多的人还是收入少的人？在新西兰这样的社会

① 指新西兰工党和新西兰国民党，下同。——译者

里，工党倾向于更多地指望靠工资为生的工人们的支持，而国民党则倾向于更多地依靠那些在资本主义企业里投资而收入很多的人的支持。两党都得考虑这两部分人的态度，同时还要考虑那些没有坚定政治倾向的中间阶层的态度。在这个时期内的普遍繁荣日子里，有许多雇佣劳动者对劳资之间曾经有过更加尖锐的冲突的时日毫无所知，因之，他们构成了许多“浮动的”选票。

两党也都接受了强制性的仲裁制度和强制性的工会主义，并且都敌视好斗的工会的活动。国民党从前曾攻击过强制性的工会主义，并建议修改1936年的条例——这项条例要求一种工业中所有接受仲裁法庭裁决的工人都要加入工会。但当国民党执政时，它发现反对修改这项条例的不仅有劳工联盟，而且还有各种雇主的组织，因之，它撤销了这项拟议中的立法。

这样，正如1948年的“经济稳定法”所设想的，与生产有关的各不同行业之间的关系保持着相当稳定，但是有着逐渐发生通货膨胀或生活费用上升的趋势。仲裁法庭裁决提高工资来补偿生活费用的增高，但雇主们则紧接着提高物价。这在后 294

来又导致工人们进一步要求增加工资，而雇主们又进一步提高物价。社会福利金除非定期增加，在物价不断上涨的情况下总是失去其价值，因之，社会福利金的增加一般地都是落后于物价的上涨，其结果是发生一些艰难困苦。对制止这种通货膨胀和实现物价稳定的尝试在两党追求选票（这是决定哪一个政党执政的关键）的情况下，似乎注定是要失败的。

劳资双方的领导人都接受这种制度，这就意味着劳资之间的冲突不是尖锐的。但是，一种真正的稳定局面，即货币的价值保持不变和分享日益增多的产品的份额保持原状，并没有出现。这就说明了劳资双方继续存在着微小的冲突。只是由于劳资双方交替地互相让步，才避免了这种微小的冲突演变为巨大的冲突。通货膨胀是一种必然的结果。工党政府试图采取国民党在1957年落选前采用过的以削减信贷（信贷是有助于提高生产效率和扩大生产的）来制止通货膨胀，它的这种尝试倾向于增加冲突的因素和阻碍原可掩盖这种冲突的扩大生产。

对这种情况的不满和对没有根本差异的两个

政党之间的争论的不满，导致第三个政党即社会
信用党的成立。它在1954年的大选中得到了百分
之十一的选票。但这似乎是选民们对其它两党的
不满的结果，而不是他们确信社会信用党本身会
提供一条令人满意的途径。在1957年的大选中，
社会信用党的候选人没有一个当选，而且它获得
的选票总数下降到百分之七，其所失去的百分之
四的选票，似乎大部分为工党所获得。两个势均
力敌的政党在政策上没有多大的不同，它们的共
同基础是继续保持一种没有巨大贫富悬殊，却有
高生活水平，并辅之以各种福利措施的经济局面，
而它们之间的竞争只是在这个共同基础上的一些
细节方面的竞争。人民的不满还没有强烈到足以 295
支持一个采取完全不同的政策的第三党。只有经
济情况的改变才能产生这样的结果或造成现有的
两个主要政党之间更加深刻的分歧。

劳资冲突

更具有实质性的不满的因素已在1951年的大选的背景中表现出来，但大选本身表明这种不满还不是那么广泛或强烈到足以突破现有的结

构。在1949年执政的国民党政府，在执政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就要求举行大选，而不等待执政三年后举行大选。国民党政府此举的背景是，码头工人与雇主之间的长期的摩擦达于极点，发展成为码头工人持续一百五十一天的停工。码头工人声称，这是停业而不是罢工，然而其它一些工会会员为支援码头工人所采取的行动显然是罢工。

这次罢工斗争也许是我们正在研究的这一时期的新西兰国内历史中出现的一个引人注目的插曲——这是一次对现有秩序的挑战，但以失败告终。这次罢工是在工党政府下台之前已经有所表现的某部分工人的不满的总爆发。某些工会会员认为，实行强制性的仲裁制度和使资本主义制度稳定下来，都是对工党事业的背叛，因此，他们开始攻击这个制度。他们这样做，使人想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红色劳工联盟的某些情况。早在1949年，工党政府的劳工部长就已根据“仲裁法”撤消了奥克兰木工协会的注册，并为资方所扶植的新工会根据“仲裁法”申请注册敞开大门。

296 工党政府和劳工联盟领导人都曾与在这个国家的经济上占据重要地位的强大的码头工人协会

发生过争执。码头工人的雇用条件不是由仲裁法庭决定，而是由分别于1940年和1946年成立的码头业委员会和码头业管理局（一个比前者更高级的机构）决定。工党政府下台后，在1950年劳资双方在如下两个问题上的摩擦加剧了：一是关于工人要求增加工资的问题；二是关于一项特殊事件，即装卸烟墨①的工资额和条件的问题。同年9月，船主同意直接地同码头工人协会就有关装卸烟墨的问题及其它问题进行谈判，才结束了码头工人在装卸烟墨问题上的罢工。劳资双方的直接谈判就是把码头业委员会和码头业管理局撇在一边。码头工人协会的刊物《运输工人》把这一点看成是这次争端的基本问题。该刊宣称，比在工资额问题上取得的协议更为重要的是这一事实，即“工会挣脱了国家机器和合法主义的桎梏，夺得了与那些一贯发号施令的船主进行直接谈判的权利”。许多脱离劳工联盟的工会在1950年初组成工会联合会。上述这种心情早已在这个工会联合会的成立上反映出来。工会联合会在度过其

① 烟墨或称油烟，是从前用以制造颜料和油墨的原料。——译者

不很有活力的生命后便宣告解体，于是对强制性的仲裁制度的攻击便以失败告终。

关于工资问题的谈判失败了。1951年2月，码头工人决定拒绝每周四十小时以外的任何加班劳动。雇主为了对拒绝加班劳动的工人们进行报复，给予他们“两天的处罚”(即两天不给工作)。不久，大多数的工人都受到这样的处罚，因此，码头上的工作实际上也就停顿下来。当码头工人协
297 会拒绝把这个争端提交码头业管理局解决时，雇主只答应给那些事先同意在必要时接受加班劳动的工人以工作——这是新西兰全境码头工人协会历次会议都拒绝过的条件。

1932年的“公共安全维护法”授予政府以很大的权力来颁布紧急条例。政府根据这一法令宣布新西兰处于紧急状态，出动了武装部队来装卸货物，结果引起了海员和司机的罢工。冷却业工人、矿工和其他工人为了抗议紧急条例的施行，也举行罢工。政府招来新工人(其中包括许多热心的志愿工人)，并把他们安排在军事保护下在各码头工作。这些新工人组织了一些没有全国性组织的新工会，按照政府规定的条例进行活动。

劳工联盟强烈地反对码头工人协会。工党一般地是采取不承担义务的态度的。船主和政府坚持对码头工人协会采取坚决的态度。在这方面，除了紧急条例的严厉性受到一些批评外，船主和政府从公众方面得到切实的支持。紧急条例把人们支持码头工人或正在罢工的工会会员的大部分做法都视为非法的。码头工人终于被挫败了。他们决定于7月11日复工，但由于他们原来的工作岗位已为新的工会所占据，在许多情况下他们都得不到工作。

国民党政府解散了新西兰议会并在大选中受到了选民们的欢迎。这使国民党在议会中成为增加了议席的多数党。国民党政府有了这个胜利做后盾，遂即提出了修正“违警法”、“劳资调解和仲裁法”的立法。于是紧急条例所包含的许多条款都被纳入通常的成文法之中。虽然政府所提出的这两项法令的修正案遇到各方面的批评之后，已 298
作了颇多的修改，但最后制定的法令仍然遭到一些批评，即被指责为背离了英国法律的一般传统。1959年工党政府建议废止这些法令，把其中的一些条款并入其它一些法规之中，并删掉其最严厉

的条款。可是，新西兰议会1959年的最后一次会议对工党的这个提案没有作出任何决定就闭幕了，而国民党反对上述改变的意见却被记录在案。在繁荣的年代里，当不满情绪降低到最低限度，而这一类的立法不大可能付诸实施时，它就显得不甚重要。但是，这一类的立法，甚至是经过一番修改的这一类的立法，竟然被视为必需的，竟然被加以接受，这对于那些把新西兰社会看成是无可怀疑的公正的和完美的社会的想法，也许是一种警告。

索　引*

* 本索引各条目后的数字是原书的页码。原书索引的大部分条目含有细目，占用篇幅较多，对于使用中译本的读者，用处不大。本索引对于这部分的条目，一律只列条目，略去细目，唯保留同一条目诸细目的页码。有些条目，其内容和页码与正文不同，均根据正文加以改正。——译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新西兰简史
作者＝［美］Ｊ．Ｂ．康德利夫 Ｗ．Ｔ．Ｇ．艾雷
页数＝４４８
ＳＳ号＝１０１１７２０９
出版日期＝１９７８年3月第１版